

在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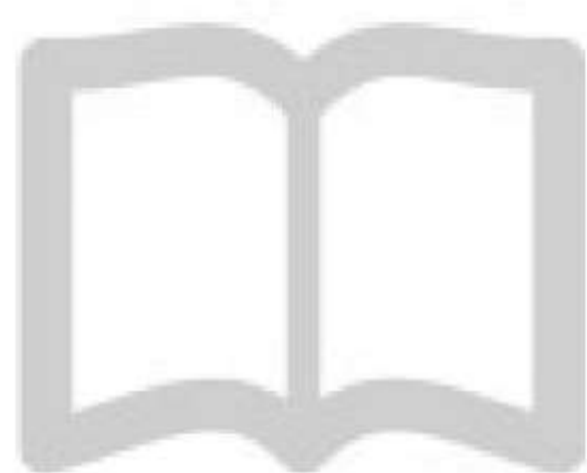
尋找中國

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中日互動

吳偉明 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在日本尋找中國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在日本尋找中國

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中日互動

吳偉明 編



中文大學出版社

本書的出版獲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翻譯與出版協助項目」贊助，特此致謝。

This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Support Program for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Japan Foundation.

《在日本尋找中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中日互動》

吳偉明 編

© 香港中文大學 2012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996-542-6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Searching for Modernity & Identity in Japan-China Interactions in the Modern Period* (in Chinese)

Edited by Ng Wai-mi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54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 目錄

導言：中日在歷史互動中塑造現代性及身份認同 吳偉明.....	vii
-----------------------------------	-----

## 第一部：文化交流篇

翰墨情緣兩地牽：近代日本向華學書述要 黃 天.....	3
明治時期赴日文人王治本之基礎研究 王寶平.....	23
近代中日筆談的型態研究：以《大河內文書》為中心 王曉秋.....	45
一件實物的來世：明治時代有關公元57年金印的辯論 Joshua A. Fogel( 傅佛果 ).....	61
從戰後中國電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看戰爭與和解 祖運輝.....	73
日本流行文化改造中國三國歷史 吳偉明.....	93

## 第二部：思想交流篇

「中體西用」、「東道西藝」論與近代中日女子教育 陳瑋芬.....	113
-------------------------------------	-----



大隈重信「東西文明調和論」中的日本及中國的定位 沈薇薇.....	131
小室信介的中國觀：以《第一遊清記》為探討中心 徐興慶.....	145
德川及明治時期的參考書與日譯西書對中國的衝擊 Douglas R. Reynolds .....	163
大正後期日本學界有關漢文直讀的論爭 陶德民.....	175
「相對化」意識下司馬遼太郎的中國觀 王 海.....	189

### 第三部：政經交流篇

金港堂與商務印書館：中日近代教科書出版業的互動 尤怡文、遲王明珠、蘇基朗、蘇壽富美.....	205
「朝日新聞富士倉庫資料」與中日戰爭照片審查問題 貴志俊彥.....	223
王韜及其日本友人的琉球問題認識 薄培林.....	245
從張謇的立憲運動看晚清中國人的日本觀 村田雄二郎.....	265
大正日本的對華融資：上海申新紡織貸款與橫濱正金銀行 遲王明珠.....	281
執筆者一覽.....	300

# 導言：中日在歷史互動中 塑造現代性及身份認同

◆ 吳偉明 ◆

自古以來，中國和日本就是關係極其密切的東亞近鄰，彼此在互動中成長。雖然「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等老調並非客觀的學術陳述，卻多少反映中日兩國人民的主觀感情。<sup>1</sup>中日在地理上絕非「一衣帶水」，歷史上多少使節、商人及僧侶被相隔兩地的汪洋大海吞噬。既非太近、亦非太遠的距離令歷代日本在吸納中國文化時，能夠保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及民族意識。身處中華文化圈外圍的日本善於將中國文化本地化，以豐富日本文化的內涵。

日本自古受中華文化薰陶，唐風興起，與和風互相輝映及融合。即使日人自隋唐以來積極吸納中國文化以開拓其現代性，但從未因此忘記自身的民族及文化認同。以修史為例，奈良前期朝廷差不多同一時間編纂了兩部史書：《古事記》(712)及《日本書記》(720)。前者借用漢字作日文音標，內容充滿本土意識；後者用中文寫成，而且體裁、甚至故事多參考中國史籍。這種二元文化發展取向正代表了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似近還遠、若即若離的微妙關係。<sup>2</sup>即使到了儒學、漢文及唐風大盛的德川時代(1603-1868)，儒者從未忘記日本人的身份，並努力將儒學本地化。<sup>3</sup>其實不少德川儒者同時也

是神道家，甚至明言或暗示儒學中心已東移日本。即使是做夢遇見中國三代聖賢以及講漢語要使用中國人口音的大儒荻生徂徠(1666-1728)也絕非忘本之中國崇拜者，他只是想借古代中國為德川日本所用而已。德川儒者對中國的感情十分複雜，多抱厚古薄今的態度，他們也許仰慕中國三代聖賢之遺風，但對眼前中國卻評價不高，甚至以滿清為夷狄入主的「他者」(other)。儒者兼兵學家山鹿素行(1622-1685)便蔑稱清朝為「支那」、「外朝」及「異朝」，認為日本才配稱「中華」及「中朝」。

近現代以降，時移勢易，主客互換，日本反過來成為中國尋找現代性(modernity)及身份認同(identity)時的重要參考。在兩國政治外交緊張，甚至兵戎相見之際，中國從日本引進現代語彙、制度、技術及思想。日本從昔日被中國人忽視的「東夷」或「倭人」，搖身一變成為可敬可畏的世界級強國。相反，對日本人而言，中國從以往的「上國」淪為「他者」，他們對中國形成「貴古賤今」的態度。<sup>4</sup>中國人的抗日意識及日本人的「支那批評論」都有助兩國建立及鞏固近代國家的意識形態。

近現代中日在互動中尋找及塑造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現代性是指在近代化(modernization)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下的文化趨勢及價值取向。究竟如何將西方標準及本國傳統融合成為中日知識分子的共同關注課題。近現代日本經歷了從明治初期的熱衷西化，到明治後期的回歸日本及東亞傳統，直至戰後日本才尋找到適合將西方標準及本國傳統融合的歷史土壤。對中國人而言，在西方及中國模式外，還有日本模式可供參考。<sup>5</sup>近百年來中國在多方面尋找現代性時，日本總是陪伴左右。反日情緒無礙中國向日本取經的決心。清末民初，日本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模範，戰後中國經濟現代化多借助於日本，當今日本流行文化成為中國發展文化產業的重要參考。<sup>6</sup>

身份認同是指在近代化及全球化下的民族及文化認同，涉及在日本人、中國人、東亞人及地球人等錯綜複雜及重疊的身份中如何



取捨及決定優先次序。<sup>7</sup> 在尋找自我( self )時，中日均不時以對方作為「鏡像自我」( looking glass self )，彼此十分在意對方對自己的看法，並在對方身上看見自己。

現代性及身份認同是近現代東亞史上的兩大重要課題，對理解中日交流史很有啟發。承蒙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慷慨資助，我們在2010至2011年度結集北美、日本及中國兩岸三地的代表學者，組成十多人的跨國研究團隊，從事「從近現代日中文化交流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探索」( Searching for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Japan-China Cultural Flows in the Modern Period )的研究項目。本書跟一般中日交流史的論文集有所不同：第一，這不是傳統的歷史研究，而是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執筆者具有不同的學術背景，各自在擅長的領域撰文，從歷史、考古、思想、書法、教育、電影及流行文化等不同角度，探討近現代中日兩國如何在對方身上尋找及塑造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第二，這不是拉雜成書的論文集，而是有主題的研究成果，所有文章對瞭解近現代日中兩國的現代性及身份認同均有啟發。第三，這不是單方面強調日本如何影響近現代中國的陳述，而是以中日歷史互動為切入點的分析。第四，本書非以專家同行為重要對象，而是針對廣大的大學生，希望加深他們對東亞歷史及文化的認識及興趣。

本研究在結構上分三大部分：文化交流篇、思想交流篇及政經交流篇。文化交流篇重新檢視近現代日本對中國的複雜情懷及從考古與流行文化之中反映的中日文化互動。明治日本的中國情懷十分複雜矛盾。在近代化的過程中，不少日本人對中國失去了昔日的敬意，儘量與其保持距離，甚至以它作為反面教材。<sup>8</sup> 福澤諭吉( 1835-1901 )的「脫亞入歐論」及岡千仞( 1832-1914 )的「支那三毒論」( 經毒、煙毒及貪毒 )便是這種貶中態度的代表言論。支那批評論在明治文化人之間十分普遍，也可說成為當時一種主流的中國觀，這方面的研究相當充實。明治日本其實有其傳統及親中一面，例如：漢

詩及漢學塾十分流行，明治領袖在做政治及軍事決定時會參考《易經》的占卜結果等等。<sup>9</sup>黃天、王寶平及王曉秋的論文讓我們窺見明治日本人在支那批評論以外的另一種中國情懷，書法家、漢學家及文人墨客對清末民初的中國同行依然尊敬有加，而且積極跟他們交流與學習。在書法及漢詩等傳統文藝上，中國仍未失去其指導者的角色。傅佛果( Joshua Fogel )的研究顯示中日相關的考古文物( 金印 )如何塑造日本人的自我認同及學術的現代性格。從德川中葉至今，日本學界為金印的五字刻文如何解讀費盡思量。明治學界用文字訓詁帶出實証學風，透過解讀金印刻文重新思考作為日本人的意義何在。祖運輝及吳偉明則分別從電影及動漫審視身份認同及現代性的形成。戰後中國電影中日本人形象的變化反映出中國人在不同歷史階段尋找新的身份認同。從早年正邪分明的二分法到現在亦正亦邪的日本人形象，中國電影不但脫離泛政治化的權力支配，也反映中國人在尋找現代性及身份認同時，其關注從獨特性( particularity )過渡到普世共通性( universality )。日本人透過小說、漫畫、動畫及電子遊戲改造中國三國歷史，這種文化改造雖然引起中國一些文化原教旨主義者( cultural fundamentalist )的攻擊，但是從文化全球化( cultural globalization )的宏觀角度來看，這不但是日本人對中國傳統的致敬方式，更是一種將中國三國歷史據為已有的文化挪用( cultural appropriation )。

思想交流篇探討中日文化交流的主客互換現象。早於德川時代已有日人挑戰中國的華夷之辨及中華世界秩序，甚至認為日本才配稱「中朝」，才是繼承三皇五帝及周孔之道的地方。<sup>10</sup>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不但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取代中國成為東亞盟主，在思想文化上也要爭取正統及優勢。沈薇薇、徐興慶及王海的論文，分別透過剖析大隈重信( 1836-1933 )、小室信介( 1852-1885 )及司馬遼太郎( 1923-1996 )的中國觀，明確反映明治以降日本人將日本取代中國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觀點。以大隈重信為例，其主張的「文明調和



論」是西洋文明及以日本為首的東方文明的調和，中國文明早已被邊緣化。對大隈來說，中國傳統的精華已被日本吸收，當今積弱的中國只有向日本及西方學習的份兒，而日本願作其「監護人」。小室信介西遊中國後，如很多明治時期訪中的日人般，在目睹晚清朝野的積習流弊後，對中態度從景仰變成蔑視。司馬遼太郎探索中國文明的本質，得出儒家思想鼓吹漢族中心主義因而阻礙了中國文明發展的觀點。對反對漢民族中心說及中華思想的司馬來說，東洋史去中國化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任達(Douglas Reynolds)及陳瑋芬的研究顯示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處處優於中國，學習日本成了中國邁向近代化的捷徑。任達探討翻譯西方著作與現代化的關係，指出近代中國人依靠日人翻譯的西方著作來吸收西方知識，其中以百科全書至為重要，有助於清末民初中國人尋找現代性及身份認同。陳瑋芬比較近代中日女子教育，發現日本不論在理念及實踐上都優於中國。陶德民的文章讓我們明白日本人研究中國時背負的意識形態包袱及身份認同危機。究竟日本人閱讀漢文時是否需要像中國人般「直讀」(或「音讀」)? 還是應該沿用日本行之已久的「訓讀」? 這古老問題從德川至今一直糾纏着使用漢語的日本人。<sup>11</sup>

政經交流篇將亦敵亦友的中日政經關係呈現在讀者眼前。日本改革政治及經濟的經驗成為近代中國的重要參考，日本人亦積極參與中國的政經活動。可是在另一方面，近代日本對中國的野心表露無遺，不斷加強對中國政經的控制。在這種形勢下，中國人跟日本人合作務必倍加小心，企圖在不損害民族尊嚴及利益的原則下，借助日本的經驗及實力，發展中國的政治與經濟。<sup>12</sup>換言之，就是以中國人的身份，借日本之力推動現代化，因此身份認同及現代性持續呈現緊張狀態。薄培林及貴志俊彥的文章分別論述吞併琉球及日本侵華的歷史。若前者代表着日本挑戰中華帝國的秩序及周邊利益，後者則是在直接侵犯中國的主權及核心利益。歷史發展往往十分弔詭，中國向日本學習的時期正是日本侵犯中國的時期。村田雄



二郎、尤怡文(代表)及遲王明珠從立憲運動、教科書出版及銀行融資的角度來看近代中日政經交流的本質。張謇的立憲運動、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出版及上海申新紡織向日方的借貸都是中國借助日本之力開展現代化的例子，他們同樣因民族主義的衝擊而受挫折，可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兩者不時存在矛盾及緊張關係。

在全球化急速發展的今天，傳統以血緣、地域及習俗為依據的身份認同開始變得模糊，人們透過消費及生活風格(lifestyle)去尋找及釐定自己的身份。<sup>13</sup>現代性的定義亦從以往重視的政治、經濟、外交及軍事等「硬力量」(hard power)，擴大至傳媒、流行文化及價值觀等「軟力量」(soft power)。身份認同及現代性的概念需要重新詮釋。希望這個研究計劃能夠加深我們認識近現代中日兩國如何在歷史互動中互相影響及塑造現代性及身份認同。這只是一個開始，期待日後出現更多從跨學科角度對當下的中日交流作深入全面的調查分析。

本書的出版獲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資助，特此致謝。此外，對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編輯林穎博士及楊彥妮女士、香港商務印書館董事總經理陸國榮博士、香港科技大學蘇基朗教授及我的研究助理鄧曜強先生在此書出版上提供的多方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 1 有關「一衣帶水」的來源及其謬誤，參石曉軍著：《中日兩國相互認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7-11。陳舜臣對中日「同文同種」表示質疑，參陳舜臣著：《日本人と中国人：同文同種と思いきむ危険》(日本人與中國人：迷信同文同種的危險)(東京：祥傳社，1971)。
- 2 David Pollack, *The Fracture of Meaning: Japan's Synthesis of China from the Eighth through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對此有精闢獨到的分析，特別是第一及第二章。
- 3 Kate Wildman Nakai, "The Natur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okugawa

- Japan: The Problem of Sinocentr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0:1 (1980): 157–199.
- 4 Stefan Tanaka 討論近代日本如何建立其日本版東方主義，將中國作為他者，與它保持距離，甚至蔑稱之為「支那」。參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 into History*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chapters 3, 6.
  - 5 不少清末民初的中國人重視日本模式，參 Noriko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及 Wai-ming Ng, "Zhang Jian's Nantong Project and the Meiji Japanese Model,"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 16, No. 3 (2009), pp. 34–47.
  - 6 有關日本「軟力量」(soft power)對當今中國的衝擊，參 Utpal Vyas, *Soft Power in Japan-China Relations: State, Sub-state and Non-state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7 有關近代中日知識分子尋找身份認同，日本方面，參 Kenneth B. Pyle, *The New Generation in Meiji Japan: Problem of Cultural Identity, 1885-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中國方面，參 Edmund S. K. Fung,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8 有關明治日人如何透過異化中國來建立民族認同，參 Urs Matthias Zachman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China Policy and the Japanese Discourse on National Identity, 1895-1904*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9 前者參 Margaret Mehl, *Private Academies of Chinese Learning in Meiji Japan: The Decline and Transformation of Kangaku Juku*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3)，及入谷仙介：《近代文学としての明治漢詩》(東京：研文出版，2006)；後者參 Wai-ming Ng, "Divination and Meiji Politics: A Reading of Takashima Kaemon's Judgments on the Book of Changes (Takashima Ekidan)," in Huang Chun-chieh and John Tucker, eds., *Dao Companion to Japanese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New York: Springer, forthcoming).
  - 10 W. G. Beasley, "The Edo Experience and Japanese Nationalism," *Modern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8, pp. 555–

- 566; Ronald Toby," Contesting the Centr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Japa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7:3 (Taylor and Francis, August 1985), pp. 347–518.
- 11 雖然訓讀一直是主流，自荻生徂徠以來，一直有日人主張音讀。參太宰春台著：《倭讀要領》(1728)及岡田正三著：《漢文音讀論》(京都：政經書院，1932)。
  - 12 近代中國未必一定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下被動的受害者，反而不時把握機會發展現代化。See-heng Teow 研究二十世紀初中國如何與日方角力，企圖運用日本歸還的庚子賠款發展中國社會及文化事業，便是這方面的例子。參 See-heng Teow, *Japanese Cultural Policy toward China, 1918-1931: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3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 第一部：文化交流篇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翰墨情緣兩地牽： 近代日本向華學書述要

❖ 黃天 ❖

## 一、引言

古代的中國，曾擁有燦爛的漢唐文化，令四鄰艷羨。日本亦不甘後人，西渡中土，吸收中國的先進文化。尤其在唐代，日本派出16次遣唐使船，搭載大批留唐生、問學僧，不避艱辛，渡海來華，勤學苦讀。<sup>1</sup>他們學成東歸，形成一條可媲美絲綢之路的「求學之路」。<sup>2</sup>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日本，將大唐文化移植東瀛後，悉心栽培，靈活取捨，隨即孕育出天平文化。雖然如此，日本並沒有驕傲自滿。至宋代，有很多僧伽乘搭商船來華修禪，同時研習文化藝術和飲食養生之道，對往後日本的精神和物質生活都帶來極深遠的影響。迨至江戶時代，雖有鎖國體制，但幕府官員仍帶頭向來航的唐船洽購大批典籍，從書本中求索，形成一股漢學之風，一直影響到明治年間，甚至二次大戰結束前。

清帝國自從鴉片戰爭失敗後接連簽下屈辱的不平等條約，荏弱的中國似乎再沒有值得日本學習的地方。正因如此，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這個課題，都比較集中在留日、師日這些方面，較少注意到在西學東漸

的期間，也還有日本的書法愛好者專程來華拜師學藝。日本學習中國書法藝術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那些醉心於書道和篆刻的日本學子，並沒有因為明治維新的成功而認為日本的書道不必再求教中國的書家。正是通過這次虛心學習和交流，明治以後的日本書壇迎來了空前的輝煌時代。本文就是要介紹明治年間日本向華學書的幾段師弟情緣，從而探討近現代中日文化交流中兩國所處的角色和身份。

## 二、江戶書壇概觀

日本的書道(即我國所說的書學或書法，在行文中也會使用書道一詞)傳自中國，有約一千五百年的歷史，但也有其獨特書體，即假名書道。江戶時代的書道，可以用「和樣」與「唐樣」來區分。先說「和樣」：自從公元894年停派遣唐使之後，日本國內掀起一股有別於大唐的和風，就連書法亦呈現出脫離晉唐的和樣體，其後更發展至草書假名，奠定了和樣書體的地位。十四世紀，尊圓親王創出豐滿有力的書風，被奉為「世尊寺流」，公卿、貴族爭相仿效，風靡了數百年。至鎌倉幕府時代，武將的公文、通令等，一概由善於書法的人來謄寫，這些人被稱為右(或作祐)筆。為免文書有誤，家家均使用「世尊寺流」書風，又被稱為「御家流」。德川家康亦規定所有公文須以「御家流」來書稟，全國三百大名無敢不從，下令右筆如式書寫。曾有丹波篠山藩的家臣因不書御家流而改習「唐樣」，結果被處罰閉門七日思過。<sup>3</sup>就這樣，「和樣」在整個江戶時代只有「御家流」一體，毫無變化，愈寫愈衰微、無力，其窘狀一如清代的館閣體，最終成為末流。

雖然如此，「和樣」的書家還是有的，其中最著名者，首選「寬永三筆」——近衛信尹、本阿彌光悅、松花堂昭乘；中期則有近衛家熙、森尹祥、加藤千蔭；藝文界的池大雅和松尾芭蕉也很出色。特別要提的是禪僧良寬(1758-1831)，詩、書、和歌堪稱三絕。良寬作



書，不受「御家流」束縛，純樸得出塵脫俗，彷彿連字也出了家，百年後的李叔同(號弘一，1880-1942)，可能在留日時看到良寬的書道而有所領悟，其書法也無半點世俗氣。

接着說「唐樣」：德川家康在取得天下、穩定國內局勢之後，實行一系列鎖國政策，禁絕天主教，驅逐葡國人，不許再入境，僅開放長崎和對馬。長崎供中國和荷蘭的商船泊碇貿易；對馬則開放給朝鮮。<sup>4</sup>至於本國人，一律禁止外訪，片板不得外流。日本這種前所未有的自我關閉的鎖國體制，使國家轉變為單向交流，守候貿易的被動局面。在治國建制方面，德川幕府尊崇儒家，講求修身，提倡漢學，陶冶世心。於是文人、武士、禪僧競相研習誦讀儒學著作，傾倒於漢唐文化，效唐人作詩臨池。這種習寫唐宋法帖的書道，日本稱之為「唐樣」。德川幕府雖然嚴令鎖國，但為了學習中土文化，歡迎名士、高僧東來傳授學藝和梵經，准許他們長居，甚至入籍歸化。事實上，在明末清初抵登長崎的明遺民和禪僧對江戶初期的漢學和佛學起到了教習和弘法的積極作用。

東渡日本的明遺民中，以大儒朱舜水(1600-1682)最受敬重，影響也最深。至於禪僧，首推隱元隆琦(1592-1673)，他是日本黃檗宗的開山祖。<sup>5</sup>在他之後，他的弟子木庵和即非也先後抵達長崎，幫助隱元弘揚佛法。<sup>6</sup>這三位禪僧也頗能書，有「黃檗三筆」之稱。他們在說佛之餘，也傳授書法。在明遺民中，原籍浙江仁和的戴笠，字曼公，早有書名，風格近於王寵。戴笠於1653年流寓長崎。翌年，隱元在鄭家兵船護送下也來到長崎。戴受戒於隱元，改字獨立。因獨立善書，追隨者甚眾，就連江戶期唐樣創始者北島雪山也求教於獨立。<sup>7</sup>

北島雪山(1636-1697)是肥後熊本藩醫的兒子，寬文年間(1661-1672)，隨父至長崎，拜在從杭州來的俞立德門下。俞以雪山穎悟，將文徵明筆法傳授他，三年後，雪山得成大器。雪山一出來就令和樣失色。後來，雪山轉游江戶，結交了木下順庵、林春齋等名家，還收了細井廣澤和都筑道乙入門。細井廣澤(1658-1735)盡得北島雪

山心傳，尤其是行書，俊逸有致，將唐樣書風吹遍扶桑。廣澤著述甚勤，有《觀鵞百譚》、《臨池復古篇》、《撥鐙真詮》等，足為唐樣建言立論。細井廣澤的弟子關思恭、三井親和等人，加上同期的書家佐佐木文山、伊藤東涯等，都是以明人書風作啓蒙，再上追唐宋諸家。江戶中期，松下烏石最初師事佐佐木文山，後轉師細井廣澤，藝事大進，但仍虛心求索，專攻王羲之，開後世尊王(羲之)風潮。

唐樣書道盛行，學者日衆，但名師難求，且關山阻隔，問津無門，惟有求諸法帖。在鎖國體制下，好研漢學的人士依靠長崎港這扇窗戶，從由唐船輸入的大量漢籍中吸取中土文化。研究江戶時代漢籍輸入的權威學者大庭脩，在其專著中可以看到輸入漢籍的詳細書目，法帖的種類、數量不在少數。<sup>8</sup>碑帖鑑藏家伊藤滋兄根據大庭脩的研究作出分析，指出輸入的法帖可分為集帖、單帖和碑帖三種，碑帖限於唐碑，以顏真卿書體為主，至於六朝、漢碑的拓印幾近於無。從整體來說，以董其昌、趙子昂、蘇東坡的法帖數量最多。<sup>9</sup>正與清代前、中期熱捧董、趙書風和尚帖的風氣相吻合。

直到江戶後期，晉唐書風仍然盛行，幕末三筆——卷菱湖、市河米庵和貫名海屋，雄視書壇。卷菱湖(1777-1843)，在新潟出生，曾從龜田鵬齋習書，楷書宗法歐陽詢，行書研習李北海，草書則學李懷琳。有弟子大竹蔣塘、中澤雪城、養子卷菱潭，能繼承他的書風，活躍於明治初年。市河米庵(1779-1858)，本名三亥，字孔陽，因傾慕米元章書品，遂改字米庵。壯年遊長崎，得到清人胡兆新的指點，書藝精進，真行書有唐宋意，傳說受業弟子五千，甚受諸侯禮待，有《米庵墨談》、《楷行薈編》、《書訣》和《墨場必携》等著作。貫名菘翁(1778-1863)，在德島出生，本名苞，晚號海屋、海叟。書學米南宮，後因探訪出家為僧的叔父，登抵高野山，有機會看到空海的真蹟，窺出其中妙諦，再遍臨《聖教序》、《十七帖》、《書譜》、《千字文》和《爭座位》諸帖。<sup>10</sup>他集各家之長，故真書能褚能顏，行書出入晉唐之間，潤茂清勁，氣韻高古，佳作有《山田公雪冤碑》、



《大字心經》和《左繡敘稿》等，被推為江戶書家中之巨擘。<sup>11</sup>同期的狩谷棧齋(1775-1835)，也熟習晉唐書法，其弟子小島成齋和賴山陽俱為著名學者，因而書作亦為世所重。儒學出身的佐久間象山(1811-1864)，其後又成為吸收西洋知識的開明人士，其書法展露新風，能取法漢隸《石門頌》，行書則學顏平原。

篆刻技法東傳，肇自江戶時期，由獨立和心越兩禪僧傳至日本。獨立已見上文，心越(1639-1695)乃浙江金華人，詩文書畫皆精，尤擅篆刻，1681年抵長崎，為水戶天德寺開山祖。心越傳刀法與榊原篁洲。其時，習得篆印的還有：今井順齋、細井廣澤和池水道雲。但限於識見，當時的印風，跟明末清初如出一轍，僅有裝飾趣味一途。其後，隨著古銅印譜和名家印譜經長崎陸續輸入，繁榮了篆刻界，一時風起雲湧，名家輩出，印聖高芙蓉亦乘時而生。原籍甲斐的高芙蓉(1722-1784)，早歲游藝京都，有幸看到新近輸入的印譜，遂能融會貫通，開創出格調高雅的新意象，一洗過去的頹風陋習。高芙蓉的弟子有：葛子琴、初世藏六、曾之唯、源惟良、稻毛屋山等，皆一時俊彥。芙蓉的摯友池大雅、趙陶齋和韓天壽等，鐵筆造詣之高，也非一般文人餘事可及。初世藏六繼承芙蓉衣鉢，在江戶開宗立派，其後的二世藏六與淨碧派的初世益田勤齋合稱為江戶二名家，成為幕末至明治年間的兩大巨匠。<sup>12</sup>

縱觀江戶時代的儒者，多醉心中國書法，在鎖國體制下，雖然較難直接交流取法，但仍透過輸入的法帖來研習臨摹。到了明治維新，國門開放，嗜書者便渡海至中土尋師學藝，延續中日文化交流的傳統。以下就將以幾段感人的學書逸話為例，加以說明。

### 三、心泉、梧竹渡清開明治書壇新氣象

明治維新以後，一方面傾向全盤西化，甚至有文部大臣提出廢除漢字和日語；<sup>13</sup>另一方面，在復古運動聲中也有人喊出：廢漢



字，捨唐樣；用假名，取和樣。按理，在這些不利的條件下唐樣書體理應受到排斥，走向衰微，又何以反趨鼎盛，開展了近代書壇的新氣象？

原來，倒幕志士的領袖人物大多出身藩士、武士，他們在德川幕府的鼓勵下，熟習儒家朱子之學，對詩文書畫有很高的修養。如今倒幕成功，又貴為明治開朝元勳，他們將嫻熟的漢文應用到公文和書翰上，捨棄使用假名的和樣御家流。這些元勳中擅長書法的有：勝海舟、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久保甲東、伊藤博文和副島蒼海等。在解除出國禁令後，那些嚮往中華文化的學人、僧侶又重拾前人舊路，踏上求學、交流、認知之旅。

從明治書道史來看，比較早渡清游學的要算北方心泉(1850-1905)。他出生於金澤市東本願寺派的常福寺，屬於日本佛門世家，他聰穎過人，能詩擅書。1877至1883年，他被派到上海一帶傳教，有機會與時下文人交往，其中與博學鴻儒俞樾(1821-1907)相交甚篤。<sup>14</sup>岸田吟香就是委託心泉邀請俞樾來編輯日本人所寫的漢詩，成四十餘卷本的《東瀛詩選》。<sup>15</sup>心泉親睹晚清書壇大張碑學，六朝書風熾熱，在耳濡目染下，他手摹心追，雖未真正拜師，已能寫出北碑趣意。心泉返日之後，曾作書參加國內的博覽會，令審查員也為之傾倒！1891年，心泉與悟竹、一六、鳴鶴等並世大名家共遊大阪，可見其書壇地位之高。1898至1899年，心泉又到中國，在金陵創辦了東文學堂，並拜訪了吳昌碩。

說回長崎，過去曾是唐樣書體的資料集散地，習書者多心存嚮往。中林梧竹的老師山內香雪、師祖市河米庵都曾先後前往長崎求教清國人。中林梧竹因此也循着先師足跡，於1877年刻意應聘到長崎縣廳任職。中林梧竹於1827年生於佐賀縣小城，幼名勇吉郎，以梧竹為號，世代襲為藩士，故宗奉武士道精神。梧竹在長崎縣廳任職不到一年便因病辭職。早於1871年，日清兩國簽訂了《修好條約》，按規定，清朝須派出理事官(即今天的總領事)到長崎履職。<sup>16</sup>1877年12月

16日，清朝首任公使何如璋率同長崎理事官余璣等抵達橫濱。翌年7月，余璣來到長崎上任。<sup>17</sup>關於余璣生平的資料並不多，只知他字元眉，以內閣侍讀領銜四品出任大清駐長崎港正理事官。有富士和富賢兩子，來長崎就任時也帶着他們。余璣雖然提倡書學六朝，但其書風近似子昂，題匾則帶劉墉筆意。<sup>18</sup>

余璣如何邂逅中林梧竹，迄今仍難考出。據說是余璣看到神社新揭門額，書法莊嚴渾厚，因而詢問書者。原來梧竹抵達長崎不久，獲聖福寺善應大師垂顧，收留在寺中，所以余璣很快便訪得書者是中林梧竹，二人從此結下翰墨情緣。<sup>19</sup>醉心書藝的梧竹得見遠從清國來的余璣，大為欣喜，虛心求教。余璣告訴他國內爭相臨摹六朝碑版的書壇新風尚，令梧竹開闊眼界，也學習上追漢魏。

1882年10月10日，余璣因公務回國，中林梧竹獲得善應禪師等人的資助，跟隨余璣由長崎出發渡清。抵達北京後，古道熱腸的余璣帶了梧竹到梅竹斜街和琉璃廠去蒐訪筆硯和碑刻拓本，又引薦梧竹給自己的業師潘存，請他指授梧竹。<sup>20</sup>余璣把梧竹安頓妥後，旋於翌年(1883年)1月，先行返回長崎復職。同年8月，余璣回鄉省親，至12月底始返回長崎。這期間，相信余璣也會到京城探視師友，並看望梧竹。1884年4月，中林梧竹經過約18個月的留清研習之後回到長崎。他拜謝了余璣，與諸友話舊。7月，他移居東京，一試學書多年的筆力。同年年底，梧竹聽說余璣任滿即將歸國，特意從東京趕回長崎，與余璣重會於聖福寺。從1878年二人訂交起，至今臨津惜別，梧竹捨不得恩師摯友，而余璣亦滿腔離愁，揮毫贈詩勸勉愛徒：「觸目盡塵累，如師真不群；圓明水中月，去住嶺頭雲；意為乘風快，名應過海聞。」<sup>21</sup>

余璣已看到梧竹在東京嶄露頭角，足可證明當年的慧眼，所以再加勉勵，深信梧竹將來的成就一定會更大——其書名可以越洋過海，自己在華夏也能聽聞。余璣這首贈詩，是現存與梧竹交往的最後證物，惜別之情，令人悵然！中林梧竹果然沒有令余璣失望，他



書體多變，草書學羲之，有飄逸靈動之感；隸書得力於漢碑，故能與日下部鳴鶴(1838-1922)並列為日本早期的兩大隸書家，同時，他又與鳴鶴、巖谷一六(1834-1905)合稱為「明治三筆」，一同為明治書壇帶來新氣象。<sup>22</sup>1897年，梧竹重遊北京，並為翰林院題匾，真正實現了乃師余璣的心願——名應過海聞。只是中林梧竹性情孤高，追求鍊心、鍊筆的清高書品，故無緣收得衣鉢傳人。1913年5月，梧竹離開生活了29年的東京返回故鄉佐賀，三個月後病逝，終年86歲。

#### 四、日本近代書道啟蒙恩人楊守敬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東渡日本弘法、講道、傳藝的友好使者成百上千，其中最受推崇的當數唐代的鑑真大和尚，繼後又有明末清初的隱元及其弟子，和同期的大儒朱舜水等人，他們都深受日本人欽佩，奉為師尊，敬若恩人。而清末渡日的楊守敬可說是日本近代書壇啟蒙開眼的恩人。

楊守敬生於1839年，湖北宜都人，字惺吾，晚號鄰蘇老人。他四歲喪父，幸得祖父誠齋公培養薰陶。自幼尚古，尤其偏好輿地之學。他曾經說：「年二十即好輿地之學，壬戌[1862年]計偕入都，始嗜金石文字，庚辰[1880年]至日本，又致力目錄。<sup>23</sup>此三端者，皆自信不隨人作計，而於輿地，尤始終不倦。」<sup>24</sup>楊守敬自壬戌會試名落孫山以後，多次赴京應考皆不利。雖然科場失意，但他結交了不少學者、文人，助他走上了學者之路。這些人中，他首先結識的是陳喬森(1833-1905)，並成為莫逆之交。在陳喬森的推介下，得與鄧承脩(1841-1891，字鐵香)訂交。受到鐵香等人的影響，楊守敬也研究起碑刻金石文來，常與鐵香結伴到琉璃廠訪尋碑拓，因而藏日豐。楊守敬蒐得碑版，勤加鑽研，很快便寫出《評碑記》和《評帖記》兩部著作。與此同時，陳喬森還引薦他拜識了潘存(1817-1892)。<sup>25</sup>



上文提到的余璦，也曾師事潘存，並引介中林梧竹向潘存學習。潘存字孺初，廣東文昌人，富收藏，工書法，「用筆得古人秘鑰，能懸腕作蠅頭細楷……故所作書，駸駸入古人之室，中朝外國，爭寶貴之，日本、高麗人尤重」。<sup>26</sup>著有《楷法溯源》，由楊守敬刊刻於武昌。潘存樂於提攜後進，還從經濟上援助楊守敬。1880年，何如璋邀請楊作為他的隨員一同赴日，潘存擔當了甚麼角色？從潘存與余璦及何如璋的關係，便可知一二。

楊守敬作為使館人員渡日，竟有驚人之舉——他帶同自己珍藏的一萬多件碑版法帖前去履職，這實在令人難以想像。也許愛書之人手不釋卷，一刻無書不歡，由此也可知使館之職不過是楊守敬的副業，讀書著述才是他畢生的事業。他到了日本，跟在北京一樣四出訪書，他發現很多中土的佚書竟能在此處尋得，驚喜之餘，他又是購買，又是以自己的藏帖來交換，遂至盈篋滿筐。楊守敬對這些藏書進行深入研究，寫成了《日本訪書志》、《古逸叢書》和《留真譜》等書，付之棗梨。

楊守敬駐日四年，於1884年5月回國。其後，他應湖廣總督之邀出任武昌兩湖書院的地理部主講。他繼續鑽研，潛心著述，編纂出版了《水經注疏要刪》、《歷代輿地圖》、《水經注疏》等著作，而窮一生精力於晚年寫就的《水經注疏》，卻因辛亥武昌起義爆發而不得不放棄藏書，倉惶出走，避居上海，在最困難的離亂日子，廣發書函籌款刊刻自己的心血巨著。1914年，他應袁世凱之邀北上加入參政院，實是曲意順從，只盼政府能資助出書，其苦心令人歎歎。但翌年1月，因為久病難治，齎志而逝。他的巨作《水經注疏》在其身故40年後始由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

楊守敬為清末大學者，羅振玉推許他的輿地學為清代三絕學之一，可謂獨步千古。<sup>27</sup>楊氏的書法成就雖不及輿地學，但他並取北碑南帖，秀發出新，尤擅行書，方圓頓挫，沉穩中有流動，可以稱得上是千多年來踏足日本的唐人中書法之至佳者。他攜同一萬多件

秦篆漢隸六朝碑版拓刻登岸，震動了整個日本書壇。

其時，私淑貫名菘翁多年的日下部鳴鶴和巖谷一六，邀請了貫名的弟子松田雪柯(1819-1881)至東京教授筆法。當時雪柯已提出「學帖不如學碑，學碑不如臨真蹟」的理論。正當他們學得熾熱之際，楊守敬翩然而至。當得知楊氏帶來逾萬件碑刻後，他們急往求見，當看到那大批碑拓藏品之後，不禁大為驚歎，始知書學史上還有這麼多精品是日本完全未知未聞的。在驚喜之餘，從筆談中他們又感悟到楊守敬識見高邁，蘊蓄深遠。<sup>28</sup>於是，鳴鶴、巖谷、雪柯便一起師事楊守敬，稍有空暇即登門雅聚，一起觀賞珍拓名碑，聽楊守敬講述各碑的優劣，這段經歷令三人眼界大開，書藝大進。其中，松田雪柯從游年餘便逝去。巖谷一六書風闊達莊整，終成明治三筆之一。

日下部鳴鶴經楊守敬啟悟，由帖入碑，力追六朝碑刻，以迴腕法作書。又於1891年渡航至上海一帶造訪吳大澂、楊見山、吳昌碩等當世名家，品玩三代秦漢金石文。東歸後，隸書更加方勁古拙，篆書亦臻妙境，不獨是明治三筆之一，更被譽為「當代東海書聖」。適逢明治年間流行立碑，鳴鶴名重藝壇，一生題碑逾千，其中以《大久保公神道碑》為平生最佳傑作。鳴鶴壽高，影響深遠，門下弟子渡邊沙鷗、近藤雪竹、丹羽海鶴、比田井天來、山本竟山、吉田苞竹、巖田鶴臯等，均各擅勝場，成為大正、昭和書壇的領軍人物。

楊守敬回國後，仍有很多日本的書藝愛好者或慕名拜訪，或懇請揮毫，所以守敬的書名在東瀛更著於華夏。1911年，楊守敬避居滬上，生活困頓，但來自福岡縣的水野元直詣門求學，楊守敬「以老髦且遭亂離辭之」，但水野執意不回，楊老「憫其誠，許之」，親授書學四月餘。水野歸國前，楊守敬作《書學邇言》贈別。是書內容可分為緒論、評碑、評帖、評書、題跋五個部分。後來，這本書學著作在日本出版，並有翻譯、注疏，在書學界造成一定影響。而水野元



直感銘楊守敬化雨之恩，亦以詩表謝：

欽仰風容玉樣溫，胸無城府共談論；  
夏彝周鼎精稽古，秦碣漢碑遠溯源；  
介紹一生翰墨妙，奇書萬卷草堂尊；  
殷勤向我傳心畫，正是深高海嶽恩。<sup>29</sup>

## 五、圓山、秋山拜入徐三庚門下

隨着幕末的門戶開放，更多漢學學者和書畫文人到長崎游學，跟清國人訂交，虛心求教。如小曾根乾堂(1828-1885)便是在長崎得到啟示，追摹秦漢篆印，因而其篆藝能一掃近體的庸俗氣。1879年，圓山大迂(1838-1916)較北方心泉後兩年，也來到上海，向當時的大名家徐三庚習印。回國後，他展示了用中鋒兩刃刻石的新法，放棄了日本只用偏鋒單刃的舊刻法，並大力提倡徐風，被譽為新派印學的先驅。1899年，圓山有《篆刻思源》出版，內裏提到「余曾遊清國，親炙袖海先生數年」。

上文的徐三庚(1826-1890)乃浙江上虞人，字辛穀，號袖海(或作袞海)，因上虞城外有金壘山，故又號金壘道人，或井壘。徐氏兼善書法、篆刻、竹刻，能透徹領悟《天發神讖碑》，只攝其意態神采，然後威稜灑落，在篆書藝術史上允稱一代名家。他的篆刻獨闢蹊徑，自成一家，主要是以鄧完白的篆書並參合漢晉碑刻的篆法為體，而以浙派切刀刀法為用，在結構上誇張疏密聚散的處理：密者愈緊，疏者彌闊，又能突出運筆的起止輕重，故體態婀娜多姿，其精彩作品往往有「吳帶當風，姍姍盡致」之妙。只是到了晚年，有些作品過於姿媚取態，致有纖弱造作的毛病。<sup>30</sup>

在當時的書壇，徐三庚開創的風格，風靡一時，「徐風」亦吹到東瀛去。繼圓山大迂之後，徐三庚又收了一位日本弟子，而且成



為他的愛徒。此人姓秋山，幼名純，字儉為，初號探淵，後改號碧城，最後以白巖行。1863年生於江戶，六歲隨重野成齋習書，後轉往卷菱潭私塾學習。其間，認識了清國公使館的參贊葉松石，並學了些簡單的中國語。後來，經葉松石引介，拜識公使何如璋。何公使以秋山嗜書，建議他渡清訪師進修。1886年1月，才22歲的秋山跟隨何如璋西渡上海，再由岸田吟香(1833-1905)推薦，拜在徐三庚門下。<sup>31</sup>65年過後，名書家西川寧(1902-1989)詣門拜訪其父的摯友秋山白巖。<sup>32</sup>他請老人憶述當年拜師學藝的詳情，秋山娓娓道來：「別人是登門求教一二次，回日本後就說是某某的門人。我是遵照中國傳統行了三拜禮，正式進入師門的，而且還特意拍了照，永留紀念。」

白巖向徐三庚學篆書，兼及楷、隸。徐三庚曾手書範本送給白巖臨摹，其中包括《楷書蘭亭序》、《臨天發神讖碑》(四屏)、《冬心體字冊》。白巖中途曾返回日本，徐三庚以《篆書出師表》(二帖)贈呈，書後題款說：「儉為學弟歸日本，忿忿書之。光緒丁亥〔1887年〕乍秋，汗下如雨以記……。」另又作《隸書臨郭林宗碑》，並題款云：「茲日本弟子秋山儉為屬，撫二百七十字，自謂頗得漢人神髓，而剛健婀娜之氣，未能出其模範，不識鑒者足為然否。……袖海徐三庚記。」還有《八分書大字雙鉤本》等。<sup>33</sup>

1889年，白巖歸國，徐三庚卧病床上，但仍力疾書成《文憑》一卷，持贈愛徒。這是難得一見的清朝畢業證書，謹將全文錄如下：

本立而道生，文字之道，獨不然乎！日本儉為秋山純，自丁亥春，從予肄業，于今既三年矣。專習篆隸六朝，後潛心篆刻，迄無荒謬廢弛等情，已上其堂，極其奧，所謂根本先立者，其進有不測者焉，予門非眇，暗練精熟，如儉為者，蓋不易得，況儉為異域之人，以身委道，涉海遠來，不勝欣喜。予愛其心志之切，嘉其慧學之熟，立此文憑以與焉。然儉為猶富春秋，

能不安于今日，益期他年聞達，潛精積思，庶幾凌駕古人，是予所企望也。

光緒十五年十月日，立文憑 徐三庚(印二)  
介紹 岸田吟香(印二)<sup>34</sup>

秋山儉為(白巖)除向徐袖海先生學篆隸楷外，還在徐師的引介下，師事書畫名家蒲華(1830-1911)，攻習行書。蒲華對白巖亦甚關愛，曾以行草書作《黃州竹樓記》、《後赤壁賦》、《滕王閣序》和詩聯等贈給秋山。<sup>35</sup>緊接《文憑》之後，蒲華題詩贈勉道：「學問從知根祇在，耽書不負富春秋；漢時隸法六朝楷，筆底真能一攬收。」<sup>36</sup>1889年年底，秋山白巖返回日本，曾開辦「東京弘書學院」。

在晚清，徐三庚的書法篆刻能抗行趙之謙，名重藝林，就連日本也刮起徐風。圓山大迂東歸後又將徐風印藝發揚光大。這期間中村蘭台(初世，1856-1915)的印作轉呈徐風，甚有可能是看到圓山攜回的徐三庚印譜而作出改變。而西川春洞(1847-1915)早已傾倒於徐三庚的妍美書風，曾函請岸田吟香代蒐徐氏書作以便研習。當春洞在秋山白巖處親睹徐三庚手蹟，喜不自勝，難以釋手，徵得白巖同意借回《篆書出師表》和《隸書臨郭林宗碑》，用心雙鉤成兩冊，留作自己朝夕臨摹之用。由是春洞的篆隸書一度變身為「日本三庚」。其後，他又參以漢碑，成為明治末年一大書家。春洞門下弟子眾多，俊彥奇才輩出，與日下部鳴鶴一派並駕齊驅。春洞的大弟子豐道春海能舞動巨椽之筆寫出逾丈摩崖字，震驚中日書壇。春洞子西川寧，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主導日本書壇三十載。他的首徒青山杉雨繼任盟主也有十多年。

## 六、師事吳昌碩的河井荃廬

清末的書壇，金石書家大放異彩，雖有吳讓之、趙之謙和徐三



庚相繼辭世，但另一座藝術高峰——詩書畫印皆絕的吳昌碩——拔地而起。時代愈往後，中日的船運交通愈便捷，商貿和文化交流也愈密切。前田默鳳(1853-1918)便是在1883年至1887年間涉海來華研習書法和金石學的，他將有關資料攜回日本編印梓行，在書道界產生很大影響。曾受楊守敬洗禮的日下部鳴鶴，也於1891年遊訪蘇州，拜晤了俞曲園、吳大澂、楊見山，在上海與吳昌碩訂交，請吳為自己刻名印。<sup>37</sup>篆刻家桑名鐵城(1864-1938)也曾兩度遊華夏(1897和1899年)，拜識了吳昌碩。他們西行東歸，帶回吳昌碩的作品和印譜，令同輩諸友艷羨不已。視篆刻為生命的河井荃廬，已急欲拜叩昌碩大門，一切只欠盤纏。

河井荃廬於1871年生於京都，初名得，後字子得，號仙郎，後改號荃廬，聰慧穎悟，18歲入篠田芥津(1827-1902)門下學習篆刻，不久即稱譽於時，得窺浙派堂奧。其後，驚見吳昌碩篆印，大為折服。28歲那年(1898)，荃廬大着膽子，敬裁尺簡，連同自己的印作寄呈昌碩懇求賜教，亦表欽佩之情。吳昌碩收到河井的書函與印稿，亦驚歎其才藝高逸，遂回信鼓勵他，並贈送自己的近作以誌留念。荃廬捧讀覆函，歡忻感奮，即修書致謝，又訴說望能早日渡海求教。這通意懇詞切的書函，有幸荃廬留下底本，可以讓我們感受一下昔日異國文人交往的情懷。

倉石先生閣下：僕前不自揆，漫呈一書，先生不咎其非禮，辱賜還音，感荷無已。僕曩又郵寄拙刻印存，意實在欲請大正。而今見貴書中所言勉，卑先生而揚僕，如其評拙刻，言固過褒不敢當，僕不覺慙汗沾背。書中又曰：嗟乎子德碧海茫茫，神山嶮嶮，相距遼闊，握晤何由，臨啟恨然，不盡所云，情洋洋溢紙上。僕欲一遊貴國，叩大門以請青誨者有年矣，而未果者無他，僕素一介寒生，因不能支其費而已。然竊信數年後，必有遂宿志之期。先生與僕未有半面之識，而眷愛之厚，既業如

此，一讀再讀，感極潸然淚下。先生更見惠大作印存，直秦直漢，古樸蒼然，妙不可言，高誼之貺，銘肝不知所謝，當子子孫孫永寶焉。……先生以後每有大作，為僕特印一葉以賜之，忻幸無量。蓋僕所言，雖類頗厚顏無耻之徒，亦實出至情不能制也，冀諒焉。……伏祈自重自愛。

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念四日，河井得頓首再拜。<sup>38</sup>

兩年後，亦即1890年，河井荃廬儲足盤川，買棹航來上海，拜在吳昌碩門下。其時，荃廬年方30，吳昌碩春秋57。此後，河井每年均有渡華，幾乎沒有間斷。在上海，他見聞日廣，印藝大進，除了跟昌碩習印外，又上追秦漢古印，博涉融會鄧完白、吳讓之、趙之謙等名家樣式，開創出高格精嚴的印風。大概在1907年，才37歲的荃廬，已雄視日本印壇，中經大正而至昭和20(1945)年，儼然印壇至尊，更被譽為自高芙蓉之後日本印壇的第二座高峰。

吳昌碩對這位好學才高的日本弟子，早有稱許之詞。1906年，荃廬到蘇州訪昌碩，請賜題「寶書」室名。吳昌碩以拿手的篆書題寫，款書：「子得先生舊雨，淵雅篤學，流覽古本，書甚夥愛，以寶書二字顏其龕。光緒丙午暮春，來吳屬瑒，幸正。安吉吳俊卿昌碩記。」<sup>39</sup>若說這只是對荃廬在藏書和研究方面的讚賞，對篆藝方面又有何評價呢？據吳昌碩晚年的高弟王个移說，河井的弟子西川寧多次作為日本書壇的代表來中國書藝界交流，1961年，西川率團訪問上海時與王个移會面，王老深情地憶述昌碩的話：「河井荃廬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人，有機會你一定要認識他。」<sup>40</sup>

其實荃廬和當時中國的印人也有很深的交往。號稱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創於1904年，創社四英(吳隱、葉銘、丁仁、王禔)筆路藍縷，艱辛異常。1906年，荃廬聞訊，泛海而至，參加印社，還用他的漢文寫下〈西泠印社記〉的第一記。<sup>41</sup>河井也由此成為印社創建期的社員。他不獨印藝拔群，精於賞鑑，而且深於古文字學。殷



墟發現甲骨後，他立即蒐集資料研究，早在1917年便跟林泰輔博士合著《龜甲獸骨文字》，稱得上是甲骨學濫觴期的名著。才華橫溢的河井荃廬，一如昌碩，亦成為印壇一代宗師，對篆刻的提高和普及起了積極作用。可惜在二次大戰將要結束之際，河井荃廬死於東京大轟炸之中，終年74歲。其印譜有《荃廬印存》、《繼述堂印存》、《荃廬先生印存》和《河井荃廬の篆刻》等多種。荃廬的印藝有弟子小林斗盦傳其衣鉢，並創設北斗文會，門下弟子能書善刻者眾多，主導了當今日本印壇，其繁榮景象，誠如王个簃題寫的兩首七絕所述：

尋師渡海留佳話，金石淵源結友情；  
記取缶翁稱道語，斯人才學自崢嶸。

一枝鐵筆開宗派，幾卷遺編發妙姿；  
薪盡火傳風格在，揣摩古法出新枝。<sup>42</sup>

## 七、結語

明治維新推行全盤西化之際，一批對漢學修養極高的開朝元勳和儒學者堅決保留這門東方特有的藝術——書法，經過向華學書，憑着他們刻苦、認真、勤奮的治學態度，很快便把衰退、僵化的唐樣書道扭轉過來，在昭和時代創造出日本書道的鼎盛期。在成功的背後，也真要感謝那些書家、文人，儘管在離亂動蕩的時代，依然無私、後來更無怨地傳授書藝，其精神值得後人尊敬和銘記。

明治之後半個世紀，當年書壇的巨擘、宗師已先後謝世，但他們的書藝仍能薪火相傳；他們的探究精神依然長存。上世紀六十年代又開始了中日書法代表團的互訪，這些第二、第三代傳人歡慶一堂，同門相認，喜極賦詩，即席揮毫，互贈為念，場面感人。除了上文提到王个簃和西川寧的逸話外，還有1979年西泠印社75周年大慶之日，日本篆刻代表團專程參與盛會，造訪杭州孤山，參詣印

學聖地——西泠印社。那一刻，團員心潮澎湃，歡欣鼓舞。其中小林斗盦更加激動，因為他踏上了當年師父河井荃廬的足跡，來到西泠，仰望創社前賢，細賞缶廬(吳昌碩)墨寶，一種虔敬歸宗之心油然而起。此時斗盦的印藝名震中日印壇，也受到師叔輩如沙孟海、王个簃諸老的稱許，薦為西泠印社名譽社員(其後更成為名譽副社長)，與先師荃廬前後輝映。

今天，人們的視線多集中在中國和日本兩大競爭對手在經濟、軍事上如何角力，缺乏互信，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其他一些領域，特別是傳統的文化藝術和儒學等方面，交流遠遠多於對抗，中國文化仍深受日本人推崇和熱愛，書法正是其中一個好例子。明治書家透過與清末民初的文人墨客的交往學習，提升個人的藝術境界，留下一段段感人的友好佳話。但願這些翰墨情緣能如江河不絕，繼續譜寫、流傳下去。

- 1 日本委派遣唐使有委出和成行之別。委出的次數，學者間的計算略有差異。木宮泰彥著、陳捷譯：《中日交通史》(台灣：九思出版社，1978)定遣唐使19次，見頁82-93；東野治之著：《遣唐使船》(東京：朝日新聞社，1999)則將公元746年任命、但中途沒有出發的石上乙麻呂遣使也計算在內，定為20次，見頁28-29。筆者同意東野治之的計算方法，定遣唐使的委出為20次。至於出發成行的則有16次。
- 2 以商貿為主的絲綢之路，早已為世所公認。至於位處東北亞的日本，在近二千年之中持續吸收中國文化，特別是在唐代，遣唐使及留唐生在返回日本時會帶回大量典籍經卷。王勇教授因而提出「書籍の道」的見解(見2010年4月23日《朝日新聞·夕刊》)。但攜返書籍研習，僅是其中一個目的，一種學習的手段。筆者認為，日本人為了學習先進文化甘冒生命危險來到華夏，為了通俗易懂，不妨把這樣的一條海道稱之為「求學之路」，庶幾近矣！
- 3 藤原鶴來著：《和漢書道史》(東京：二玄社，1978年7月)，頁312。
- 4 德川幕府的鎖國，通常會被指留下長崎作對外的窗戶以通中國和荷蘭，



但另有不常談的幾個通外口岸，就是對馬通朝鮮；薩摩通琉球；松前通Ainu。參考自佐賀縣立名護屋城博物館編：《4つの窓と釜山》(佐賀：佐賀縣立名護屋城博物館，2006年3月)，頁4-5。

- 5 拙作：〈長崎的唐人・唐船・唐寺・屋敷和媽祖文化〉，載於《九州學林》二卷三期(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2004年秋季)，頁323-324、326-327。
- 6 同上，頁324-327。
- 7 鈴木晴彥著：〈書道史概說・江戸中後期〉，收錄於《圖說書道史》(東京：藝術新聞社，2003年7月)，頁161。
- 8 大庭脩著：《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年10月)，又譯本由戚印平、王勇、王寶平合譯：《江戸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1998年3月)。
- 9 伊藤滋著：〈江戸期における舶載碑法帖雜感〉，載於《圖說日本書道史》(東京：藝術新聞社，2003年7月)，頁177。
- 10 日本僧人空海(774-835)，乃真言宗開山祖，謚號弘法大師。公元804年隨遣唐使到長安青龍寺學法，修因通慧，成為一代高僧。書學晉唐，得羲之神韻，是日本三筆之一，也有草聖稱號，所作《風信帖》，是日本書蹟中之神品。
- 11 相澤春洋著：〈江戸時代書道史〉，載於《日本書道文化史》(東京：雄山閣，1942年7月)，頁225。
- 12 小林斗盞著、黃天譯：〈日本篆刻概說〉，收錄於《書譜》(香港：書譜雜誌社，1987年第二期)，頁33-34。原載於日本河出書房出版的《書道全集》(別卷)，1987年在香港舉辦「日本篆刻展」，小林先生將原稿增訂，交筆者譯出。
- 13 見拙著：〈日本人的漢學造就清末留日學生帶回大量和製漢語〉，2008年5月發表於中國珠海舉辦的「中國留學文化研討會」上。
- 14 俞樾，浙江德清縣人，字蔭甫，號曲園，1850年進士，曾主講於蘇州紫陽、上海求志等書院，並主持杭州詒經精舍30多年。俞氏學問淹博，於經史、小學、詩文、地理，皆深有研究，是清末第一大儒。其書法古樸有碑意，尤擅隸書，晚年的行書作品張繼《楓橋夜泊詩碑》，深受日本人推崇。
- 15 表立雲撰：〈北方心泉〉，載於《近代日本の書》(東京：藝術新聞社，1981年10月)，頁55。

- 16 長崎縣史委員會編：《長崎縣史，對外交涉編》(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在兩國開港地，彼此設置理事官，處理本國商民事務。」(見頁857，原文為日文，筆者據意漢譯)。又據羅森等著，王曉秋點，史鵬校：《早期日本游記五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46。
- 17 佐佐木盛行著：《中林梧竹》(上)(東京：二玄社，1983年11月)，頁114。
- 18 從《中林梧竹》書內所收余璠的書作，可看出其行書是受趙孟頫影響。至於題匾，筆者在長崎拍得余璠書於福建會館內的「星聚堂」匾額，字型肥滿，頗有劉墉筆意。
- 19 《中林梧竹》(上)，頁123。
- 20 同上，頁140。
- 21 同上，頁149-150。
- 22 亦有將善寫顏體的長三洲(1833-1895)和巖谷一六、日下部鳴鶴列為「明治三筆」。
- 23 舉人參加會試稱「計偕」。
- 24 楊先梅輯、劉信芳校注：《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3月)，頁225。
- 25 潘存的生年不詳，但筆者參考了《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的〈潘孺初先生哀啟〉資料，推算出潘存生於1817年。
- 26 《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頁179-180。
- 27 〈寄羅振玉之一〉，載於《楊守敬題跋書信遺稿》，頁182。清代的三絕學還包括王念孫、段玉裁的小學、李善蘭的算學。
- 28 《近代日本の書》內收山本棠舟著：〈幻の書家松田雪柯再考〉(東京，藝術新聞社，1981)，頁20。
- 29 楊守敬著：《學書邇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12月)，頁7。
- 30 引自黃天編：〈徐三庚和他的篆刻藝術〉，載於《馬國權印學論集》(香港，三餘堂，2011年7月)，頁310。又馬國權著：〈徐三庚とその篆刻芸術〉，載於小林斗盞編：《中國篆刻叢刊，徐三庚一》(東京：二玄社，1984)，頁183-189。
- 31 岸田吟香，岡山縣人。曾當記者，活躍於文化界，後經商，並創立了東亞同文會和同仁會。在明治年間，為中日文化交流和文人交往起到很好的橋樑作用。
- 32 西川寧，其父西川春洞乃明治年間大書家，門下高足甚多，主導大正、昭和書壇。西川寧承傳家學，並畢業於慶應大學中國文科，曾留學北京



兩年，先後任教於慶應和國學院大學，是謙慎書道會創立人之一。1960年代起直至他離世，一直是日本書道界盟主。

- 33 西川寧著：《書の變相》(東京，二玄社，1976)，頁196-199。
- 34 同上，頁200。
- 35 蒲華，字作英，浙江嘉興人，早歲畫花卉，晚愛寫竹，擅行草書，僑寓上海，與徐三庚稔熟。後又與吳昌碩、徐新周，何汝穆等往還，相交甚篤。
- 36 《書の變相》，頁201。
- 37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之〈吳昌碩二〉(東京：二玄社，1981)，頁171，刊有「日下東作」白文印，邊款刻：「鳴鶴先生大方家，辛卯〔1891年〕五月，昌碩吳俊。」
- 38 小林斗盦編：《河井荃廬の篆刻》(東京：二玄社，1978)。
- 39 松村茂樹著：〈日本における吳昌碩の受容——明治編〉，載於《中國近現代文化研究》第9號(東京：中國近現代文化研究會，2007)，頁51。
- 40 尚友會編：《荃廬先生印存》內載〈西川寧跋〉(東京：二玄社，1976)。原文為日文，筆者據意譯出。
- 41 林乾良著：《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杭州：西泠印社，2004年4月)，頁17-18，114-115。
- 42 《荃廬先生印存》，頁1扉頁題詩。王个移題此二詩時，是在1964年。

# 明治時期赴日文人王治本之基礎研究

❖ 王寶平 ❖

## 前言

近代的中國與同處於漢字文化圈的日本之間的交流呈現出空前的盛況。以往的研究多集中於外交官和著名文人，而對普通文人的關注則相對薄弱。客觀地說，明治時期在日開展的文化交流中，普通文人的作用不可小覷，他們較之駐日使節，交流的時間早，空間大，對象廣，與外交官互為表裏、互為補充，構成了一幅中日交流的絢麗多彩的全景畫卷。王治本(1835-1908)是眾多寓日文人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他於1876年歲暮赴日，先後任日清社、同人社漢語教師，以及中國駐日公使館學習翻譯生，1906年回國。王知詩能文，寓日時間之久，交友之廣，留下史料之多，在同時代的留日文人中罕有其匹。

王治本在中國史上原本不見經傳，最早揭開其歷史面紗的是早稻田大學已故教授實藤惠秀。早在1943年的二戰酣戰中，實藤在埼玉縣平林寺發現了近百冊的《大河內文書》，其中有大量的王治本與日本友人筆談記錄等第一手資料，從而打開了沉睡已久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史料寶庫。<sup>1</sup>他同時還從全國各地挖掘眾多新史料，撰寫了〈王治本在金澤之筆談〉及〈王治本之日本漫遊〉等論文，開王治本



研究之先河。<sup>2</sup>20年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曉秋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一書中將實藤的成果首先引介到中國。<sup>3</sup>早稻田大學已故教授六角恒廣則從近代日本漢語教育史的角度對王治本開展研究。<sup>4</sup>相對於上述研究，鄭海麟和筆者試圖在史料的挖掘上作出突破。鄭海麟在《清季名流學士遺墨》中，輯錄有王治本致岡鹿門的四通信函。<sup>5</sup>筆者在《中日詩文交流集》中影印公佈了王治本的《舟江雜詩》以及其他與日本友人交流的詩文；在《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和《清季文人東瀛遺墨——王治本序跋輯佚》中，對王治本為日本友人撰寫的20條序跋作了較為系統的輯佚。<sup>6</sup>進入廿一世紀後，王治本的事蹟逐漸引起故鄉浙江慈溪的重視，2009年3月《古鎮慈城》(總第37期)推出一組研究王治本的論文，包括王勤漢〈慈城黃山村王氏兄弟在1870年後進行的中日民間交流〉、王勉善〈我對曾祖的追思及黃山的回憶〉、以及張如安〈天涯隨處著遊鞭——寧波近代詩人旅行家王治本初探〉，從地方史的角度，對王治本的生平事蹟做了補充，尤其是糾正了王治本1905年卒於長崎這一學界的主流觀點，促進該課題的研究。最近，《古鎮慈城》(總第46期，2010年12月)又發表了季學源的〈王治本：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功臣〉、沈忠根〈漆園先生墓碑追憶〉二文，進一步充實了王治本研究。

本文擬在前人時賢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日本外交史料館和中日圖書館度藏的史料，結合對王治本故鄉的實地考察，對王治本的生平、詩文、著作等基礎文獻做一有系統的梳理，冀能還原一百年前清季文人渡日這一歷史，喚起學界對這一群體現象予以應有的重視，並為今後的更深入研究打下堅實基礎。

## 二、王治本簡歷

王治本，浙江慈溪人。他在與日本友人筆談中寫道：「小弟寧波府學增生，籍貫慈溪縣，向在杭州教授生徒。賤姓王，名治本，號

黍園，近號不陋居主人，又號吾妻過客。」<sup>7</sup>他於1857年考入府學，1868年考取增廣生，1878年捐貢，得到一個「候選道庫大使」的虛銜。《日本名家經史論存·凡例》中記載他的身份亦為「學習翻譯、道庫大使王治本」。<sup>8</sup>

關於王治本的赴日時間，實藤惠秀認為是在1875年。<sup>9</sup>六角恒廣及季學源亦循其說。但據王治本本人的說法，應為1876年農曆12月末。1880年初，王治本曾一度回國，回國前吟詩〈即日擬由神戶回國遙寄留別五首〉，其中首句「東國遊檣已五年」後注曰：「余自丙子臘尾出東，今得庚辰正初歸里，蓋已五年矣。」<sup>10</sup>「丙子臘尾」即1877年1月14日至2月12日。這時離他赴日時間未久，記憶當較為準確；與下述他任教日清社的時間亦比較吻合。

王治本為甚麼浮槎東渡，其動機不明。赴日未幾，就被日清社聘為漢語教師。日清社為廣部精(1854-1909)於1877年創辦，是日本民間創辦的最早一批漢語培訓機構，旨在培育精通漢語，具有振興亞洲的遠大抱負的人才。廣部曾寫道：「余曾設日清社，自清國招王黍園翁等為教師，授諸生漢學、漢話，兼刊行《寰海新報》，以求教於方家。」<sup>11</sup>根據當時的條件，廣部直接從中國招聘王治本的機率不高，六角推測，王治本東渡後，寄宿王惕齋(1839-1911)家中，日清社創辦人廣部精通過王惕齋認識王治本，從而聘為日清社教師。<sup>12</sup>王惕齋為王治本族弟，1876赴日後在築地經營店舖，主要從事筆墨生意。

日清社當時有學生15人，其中走讀生11人，住校生4人，年齡在15至25歲不等，學費分語學(口語)和漢學兩項，前者50錢，後者35錢，王治本教授語學。有日本外交史料館檔案為證，王治本受聘時間為1877年3月10日至8月11日。<sup>13</sup>該檔案依次記錄了僱傭方和被僱方的人名、職業、月薪、期限、住址，以及解僱年月。據此可知，3月10日起，客居東京芝公園內廣慶院的千葉縣平民廣部精，僱用王治本為日清社漢學教師，為期六個月，月薪50日元。



當年東京一石( 142.25 公斤 )精米的平均市價為5元46錢4厘，慶應義塾大學一年的學費為18元。<sup>14</sup>可見王治本的50元月俸是不菲的收入。王受聘後未幾，日本國內爆發西南戰爭，學生紛紛赴外地避難，《寰海新報》的讀者銳減，日清社難以為繼，於是被併入同人社。王於1877年8月11日被解僱，實際只履行5個月的合同。8月1日，他開始任教同人社，月薪減為22元。

同人社設在東京第四大區三社區小石川江戶川町十七番地，與慶應義塾和攻玉塾並稱為三大義塾，創始人為與福澤諭吉齊名的著名學者中村敬宇( 1832-1891 )。王治本的合同至1878年1月31日，但檔案備註：僱傭至3月13日。他被解僱後，生活無著，托日本友人宮島誠一郎及大河內輝聲( 1848-1882 )為其斡旋，曰：「同人社聘約已解，現閒居，未得其所，乞諸先生周旋焉。」<sup>15</sup>這時，他移居東京下谷池端茅町十七番地，租賃房上下各有三間，風景絕佳，可飽覽有小西湖之稱的上野公園內不忍池的景色。王吟詩道：

煙波靜處是吾廬，飽看群山懶讀書。  
觸我離愁紅芍藥，滯人鄉夢碧荷蕖。  
水禽啼到更深後，游馬歸來日暮初。  
攜取青氍湖上坐，客緣問字漫停車。<sup>16</sup>

為解決嚴峻的生計問題，擴大交際圈，並在精神上有所寄託，王治本於同年6月6日在比鄰的端茅町十九番地租借場地，成立聞香社。聞香社每月兩次，由他教授作詩，其族弟王琴仙傳授漢語，會員中有森春濤、永阪石埭等著名漢詩人，並積極爭取副島種臣等政治家的支援。這段時期不穩定的生活對王的心緒產生負面影響。他在該年新春訪問漢文學家永石週二時作詩曰：

怎奈離愁別恨天，又逢春到客樓邊。  
碧波間我三千路，白髮催人四十年。

未得還鄉尋舊夢，聊將入定學詩禪。  
近來愛向東瀛住，欲買青山苦乏錢。<sup>17</sup>

厄運並未困擾他太久。1877年10月，以何如璋為首的中國首屆駐日使節抵日，王治本於1878年8月15日至1879年12月29日成為使團一員，月俸庫平銀30兩，正式身份是學習翻譯生。<sup>18</sup>這時王治本赴日才一年半，日語並不熟稔，並且與何如璋素不相識。首屆公使館百廢待興，很需要王治本這樣熟悉日本的人。副使張斯桂是其同鄉，從中斡旋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在進入使館工作前，王治本賦詩道：

欲將別意告湖神，只恐湖神也蹙顰。  
三月流連同過客，幾番殤詠謝詩人。  
閑鷗瞋我渾多事，歸燕笑來未了因。  
去向芝山公廨往，無才聊學宰官身。<sup>19</sup>

詩中未見春風得意之情，更多地透露出尷尬之意。在任期間，他為《歐蘇手簡注解》(西川文仲)作序，為《亞細亞言語集》(廣部精)《薇山摘葩》(水越成章)題辭，為《日本名家經史論存》(關義臣)撰寫評語，積極開展與日人的文化交流活動。

1880年初，王治本受人事關係困擾，一度被遣往神戶領事署，未幾回國。在這期間，他與日本妻子御濱所生的兒子羸生一直由摯友大河內輝聲照顧。大河內原為高崎藩第十代藩主。1871年明治政府廢藩置縣後，他熱衷於與中國文人交往。他在與中國人和西洋人交流後得出結論：求名者宜交西洋人，求雅者，宜交清國人。<sup>20</sup>他與王治本更是過從頻密，往來殆無虛日。1880年5月，在大河內的熱情邀請下，王治本再度返回日本。這次大有「前度劉郎今又來」之感，寓居大河內家，成為大河內之師，每日教授詩文作法。王治本的《大河內文書》即為這時期筆談的產物。大河內自1881年7月起開始在修史館工作，於是王治本不得不另謀生路。他與大河內的筆談



至是年9月戛然而止，此後離開大河內家，開始赴全國各地漫遊。

據實藤考證，王治本有四次較大規模的漫遊。第一次是1882年至1884年，主要漫遊日本本州中部地區；第二次是1885年至1887年，赴本州西部、四國和九州；第三次是1892年至1893年，遊東北地區；第四次是1905年至1907年，重遊福井、金澤、富山、津、愛知縣、長崎等地。<sup>21</sup>此外，據王曉秋補充，1883年7月及1884年春天，王治本還去過北海道函館。<sup>22</sup>其足跡幾乎遍佈全日本，所到之處，論詩談文，題字作序，無不受到熱情的接待，稱得上是明治時期漫遊日本最廣的一名中國人。

由於沒有固定的工作，漫遊成了王治本的主要生活方式，這也使他的才華得不到充分的展示。1885年7月，他又將西遊，行前張宴招同人飲，席間有中村敬宇、向山黃村、龜谷行等著名漢文學家。他率賦二詩，以述其志，並遍求和作。詩云：

地北天南曾遍行，片帆風順復西征。  
十年作客長兒子，四海逢人皆弟兄。  
書館夜深燈欲語，硯田春暖筆能耕。  
壯心未已頭先白，冀得知音效一鳴。

裘敝囊傾興不窮，天涯浪跡類萍蓬。  
病余短髮因愁白，老去衰顏皆酒紅。  
別淚多於梅節雨，詩情清似竹林風。  
悲欣聚散渾無定，都付琴樽一醉中。<sup>23</sup>

總之，王治本在日時運不濟，任職時間都不長久。或開設聞香社，或寄住大河內家，更多的是漫遊日本，漂泊不定的生活成為他在日生活的主旋律。他的「地北天南曾遍行，片帆風順復西征」一詩，確實是他常年東奔西走形象的縮寫。<sup>24</sup>

### 三、王治本傳世作品

王治本客居東瀛三十載，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無暇整理自己的著作，其詩文也散見於日本各地。筆者爬梳剔抉，輯佚出以下詩文、著作，以及為日人著作而作的評語：

#### 1. 詩

據查，王治本留下以下31首詩歌：

(1)明治十年，〈題詩〉2首，見《皇漢金石文字墨帖一覽》二卷，青木可笑編，東京：酉山堂，明治十年刊。

(2)明治十年，〈四車詠〉2首，見《新文詩》第16集，森春濤編，東京：森春濤，明治十年六月刊。

(3)明治十年，〈水亭撥悶〉，見《新文詩》第19集，明治十年六月至七月刊。

(4)明治十年，〈湖樓酌月有序〉，見《新文詩》第26集，明治十年九月至十月刊。

(5)明治十一年，〈訪永石埭週二玉池仙館酒間和其新春原韻〉，見《新文詩》第30集，明治十一年二月刊。

(6)明治十一年，〈席間步毅堂先生韻〉，見《新文詩》第32集，明治十一年三月刊。

(7)明治十一年，〈敬步原韻答呈鴻齋先生騷座〉，見《芝山一笑》，石川鴻齋編，東京：文升堂，明治十一年刊；《中日詩文往來集》，王寶平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68。

(8)明治十一年，〈天德寺小集，沈梅史畫虞美人草分韻〉，見《芝山一笑》，《中日詩文往來集》，頁68。

(9)明治十一年，〈桂閣君招沈廖王及余於向島七松園，酒間賦一絕呈〉，見《芝山一笑》，《中日詩文往來集》，頁70。



(10) 明治十一年，〈戲贈鴻齋先生〉，見《芝山一笑》，《中日詩文往來集》，頁70。

(11) 明治十一年，〈敬步栗園仁翁大人韻〉，見《東洋新報》第31號，明治十一年二月。

(12) 明治十一年，〈贈栗園淺田仁翁大人〉，見《東洋新報》第32號，明治十一年三月。

(13) 明治十一年，〈偕友赴木根川探梅，時春已過半，微雨初晴，谿路傾仄，歸途率成一律〉，見《東洋新報》第34號，明治十一年五月。

(14) 明治十一年，〈陽曆四月一日池之端旗亭今兩社期也。社翁森春濤及諸友十餘人分韻聯吟，采拈得鴉字，即席率成四絕句〉，見《東洋新報》第36號，明治十一年六月。

(15) 明治十一年，〈一日春森翁今雨□社，余亦往焉。題系湖上尋秋。此題頗風雅，惜無佳句以抒寫之，未免呼□負負也。錄拙作一律，以博粲正〉，見《東洋新報》第38號，明治十一年七月。

(16) 明治十一年，〈近移居池端聞香舍，偶吟四首之一〉，見《東洋新報》第38號，明治十一年七月。

(17) 明治十一年，〈招入芝山公署，辭別蓮池戲賦一律〉，見《東洋新報》第42號，明治十一年九月。

(18) 明治十四年，〈送春濤翁遊新潟〉，見《新文詩別集》第14號，明治十五年五月刊。

(19) 明治十四年，〈送春濤詞宗遊越，次其留別詩韻〉2首，見《新文詩別集》第13號，森春濤編，東京：森春濤，明治十四年八月刊。

(20) 明治十五年，〈將遊北越，留別東京諸君〉，見《新文詩》第83集，明治十五年五月刊。

(21) 明治十五年，〈西湖雜咏〉3首，見《興亞會報告：亞細亞協會報告》第11篇，黑木彬文、鱒澤彰夫編，東京：不二出版，1993年，頁115。

(22)明治十六年，〈天王日月鏡詩，為柏原屋山作〉，見《新文詩》第95集，明治十六年七月刊。

(23)明治十七年，〈將赴神戶，日邦諸士開祖筵於上埜旗亭，即席賦此留別〉，見《翰墨因緣》(上卷)，水越成章編，神戶：船井弘文堂，明治十七年十二月刊，《中日詩文往來集》，頁21。<sup>25</sup>

(24)明治十七年，〈二十七日，在輪舟中，霽日光風，艙樓晚眺，率成一律，仍用前韻〉，見《翰墨因緣》(上卷)，《中日詩文往來集》，頁21。

(25)明治十七年，〈荷惠和章，金鈴形圓，玉磬聲徹，朗誦一過，餘韻繞梁三日。再疊前韻，以答耕南作家詞壇，並希正之〉，見《翰墨因緣》(上卷)，《中日詩文往來集》，頁22。

(26)明治十八年七月七日，〈乙酉夏日將作西行，置酒話別，率賦二詩，錄請粲正，並求賜和為幸〉，鄭海麟輯錄《清季名流學士遺墨》，《近代中國》第11輯，頁271。

以上31首詩中，除(21)〈西湖雜詠〉3首外，皆作於日本。此外，《四明清詩略續稿》(八卷，董沛輯，上海：中華書局，1930年刊)卷四(頁42)亦載王治本〈襄陽昭明台〉、〈角陵賦別〉、〈壬辰新春志感〉(時客日本，錄一)、〈上巳出遊〉、〈登瑞龍山謁明征士朱舜水先生墓〉(2首)等6首詩，其中，〈壬辰新春志感〉和〈登瑞龍山謁明征士朱舜水先生墓〉作於日本。前一首詩中寫道：「重到扶桑歲又春，白頭愁作異鄉人。出門卻喜逢新識，游囊依然似舊貧。」可見1892年王治本依然行囊羞澀。

## 2. 文

共檢得王治本在日撰寫的文章20篇，臚列如下：

(1)《文學雜誌》第17號，同人社編，明治十年九月刊。內載王治本〈玉池仙館記〉一文。



(2)《維新大家文抄》三卷，松本萬年編，甲府：溫故堂，明治十年刊。光緒三年七月王治本序，該書內載王治本〈郵便論〉一文。

(3)《眾教論略》五編，加藤熙，東京：櫻陰社，明治十年至十一年刊。光緒二年夏五王治本跋，光緒二年夏四月王治本序。

(4)《三音四聲字貫》十二卷，高井思明編，市川清流校，東京：山中市兵衛，明治十一年刊。光緒四年荷月王治本序，王藩清書。

(5)《韻華帖》(一名中學習字本)五卷，長三洲書，東京：兒玉少介，明治十一年刊。光緒四年七月王治本序。

(6)《芝山一笑》一卷，石川鴻齋編，東京：文升堂，明治十一年刊。光緒四年七月王治本序。

(7)《日本名家經史論存》十五卷，關義臣編，東京：溫故堂，明治十二年至十三年刊。光緒四年夏日王治本跋。

(8)《唐話為文箋》一卷，渡邊約郎編，東京：正榮堂，明治十二年刊。光緒四年長至月王治本序。

(9)《歐蘇手簡注解》四卷，西川文仲編，京都：竹苞書樓，明治十四年刊。光緒五年正月王治本序。

(10)《續日本文章軌範》七卷，石川鴻齋編，東京：稻田佐吉，明治十五年刊。光緒六年八月王治本序。

(11)《鴻齋文鈔》三卷，石川鴻齋，東京：山中市兵衛，明治十五年刊。光緒六年中秋前十日王治本跋。

(12)《東旋詩紀》一卷，岡千仞，東京：草私史亭，明治十六年刊，《藏名山房雜著》第一集之一。光緒六年夏月王治本序。

(13)《禹於日錄》一卷，岡千仞，東京：草私史亭，明治十六年刊，《藏名山房雜著》第一集之一。光緒七年春季王治本跋。

(14)《熱海遊記》一卷，岡千仞，東京：草私史亭，明治十六年刊，《藏名山房雜著》第一集之一。光緒七年春日王治本跋。

(15)《近史偶論》二卷，大野太衛，東京：大野太衛，明治十四年刊。光緒七年夏月王治本序。此序亦載《文學雜誌》58號，明治

十四年八月。

(16)《王夢樓絕句》二卷，王文治撰，宍戶逸郎編，東京：東崖堂、林安之助，明治十四年(1881)刊。光緒七年人日王治本序。

(17)《羽北遺藁》，佐伯真滿著，矢土勝之評，仙台：伊藤安右衛門明治二十七年刊。內載〈全唐詩閣記〉，光緒十九年春王治本撰。

(18)《增補高島易斷》四卷，高島吞象述，柳田幾作記，王治本譯，橫濱：高島嘉右衛門，明治三十四年刊。光緒二十七年三月王治本序。

(19)《東遊日錄》一卷，小杉熙，富山：玉井義信，明治四十五年刊。光緒三十一年秋九王治本〈富嶽晃山月游紀〉序，時年七十一。

(20)《雪炎百日吟稿》一卷，永井久一郎，出版地不明，明治三十八年刊。光緒三十一年王治本序。

以上序跋上起1877年(明治十年)，下迄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橫跨28年，內容涉及語言、文學、歷史、藝術等領域，可窺見王治本知識之廣博。

### 3. 評點

王治本共為以下29種日人著作(含雜誌)評點，以及題簽、題辭，撰寫識語。

(1)《新文詩》一百集，森春濤編，東京：森春濤，明治八年至十五年刊。王治本、何如璋、黃遵憲、王韜、張斯桂、俞樾、黎庶昌、姚文棟、楊守敬等評點。

(2)《新文詩別集》二十八集，森春濤編，東京：森春濤，明治九年至十七年刊。第21集(明治十五年五月)載新潟野崎元《玉峰小詩》，王治本多有詩評。

(3)《明治詩文》五十六集，佐田白茅編，明治九年至十三年刊。葉煒、黃遵憲、沈文熒、何如璋、錢鐸、王韜、齋學裘、王治本、



廖錫恩等評點。

(4)《文學雜誌》九十三集，同人社編，明治九年七月至二十六年三月刊。王治本為以下作品評點：中村敬宇〈經濟辨妄序〉、中村敬宇〈日本全史序〉、吾妻兵治〈奢氏傳略〉及廣部精〈送丸多松村兩君游清國序〉。

(5)《東洋新報》四十七集，東洋新報假本社編，明治九年七月至明治十一年十二月刊。王治本為以下作品評點：中村敬宇〈象山詩鈔序〉、小永井嶽〈濠西小築〉及淺田惟常〈六月念八，過忍池聞香舍，席上次王漆園移居偶吟韻〉。

(6)《皇漢金石文字墨帖一覽》二卷，青木可笑編，東京：酉山堂，明治十年刊。光緒三年初夏王治本題詩，王治本題書名。

(7)《近世偉人傳》二十二卷，蒲生重章編，東京：蒲生重章，明治十年至二十八年刊。光緒三年季冬王治本題辭(仁字集二編)王治本題辭(仁字集五編)。

(8)《眾教論略》五編，加藤熙，東京：櫻陰社，明治十年至十一年刊。王治本評點。

(9)《芝山一笑》一卷，石川鴻齋編，東京：文升堂，明治十一年刊。王治本、沈文熒、黃遵憲、廖錫恩評點。

(10)《日本名家經史論存》十五卷，關義臣編，東京：溫故堂，明治十二年至十三年刊。何如璋、王藩清、黃遵憲、王治本、沈文熒、張斯桂等評點。

(11)《日本文章軌範》七卷，石川鴻齋編，明治十二年。王治本題書名。

(12)《彤管生輝帖》二卷，跡見瀧野編，明治十三年刊。卷末載王治本題詩。

(13)《總譯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四卷，廣部精譯，東京：青山堂，明治十三年刊。光緒五年端月王治本題辭。

(14)《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七卷，廣部精編，東京：青

山清吉，明治十三年至十五年刊。光緒五年端月王治本題辭。

(15)《薇山摘葩》二卷，水越成章，神戶：熊谷幸佑，明治十四年刊。光緒五年冬王治本題辭。

(16)《古今小品文集》四卷，阿部貞，東京：快雪堂，明治十四年刊。王治本、沈文熒、黃錫銓評點。

(17)《送麻利闊、馬津島兩君游清國序》，廣部精，明治十四年十二月刊。張滋昉、王治本評點。

(18)《鴻齋文鈔》三卷，石川鴻齋，東京：山中市兵衛，明治十五年刊。王藩清、沈文熒、王治本、黃錫銓、黃遵憲評點。

(19)《開化詩集》一卷，石川義暢編，東京：以文會社，明治十五年刊。何如璋題字，王治本評點。

(20)《和漢合璧文章軌範》四卷，石川鴻齋編，東京：鳳文館，明治十七年刊。黃遵憲、黃錫銓、沈文熒、王治本、何如璋、姚文棟評點。

(21)《明治詩文第三大集》十三卷，佐田白茅編，東京：大來社，明治十七年至十八年刊。姚文棟、汪松坪、沈文熒、王治本、何如璋、陳允政、張滋昉、黃超曾評點。

(22)《鳳文龍彩帖》一卷，前田圓編，東京：鳳文館，明治十八年刊。光緒十一年春仲王治本題辭。

(23)《牧山樓詩鈔》二卷，佐藤楚材，東京：吉川半七，明治二十三年刊。金嘉穗、孫士希、錢鐸、王治本、孫點評點。

(24)《蒲門盍簪集》二卷，蒲生重章，東京：大倉書店，明治二十七年刊。黎庶昌、陳衡山、孫點、王治本、徐少芝、張滋昉評點。

(25)《增訂總譯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五卷，廣部精譯，東京：青山堂，明治三十五年。光緒五年端月王治本題辭。

(26)《聚亭詩鈔》二卷，蒲生重章，東京：蒲生祐之助，明治三十五年刊。黃遵憲、孫點、傅雲龍、王治本、顧厚焜、王韜識語。



(27)《省軒文稿》四卷，龜谷省軒，東京：榊原文盛堂，明治三十五年刊。沈文熒、黃遵憲、何如璋、孫點、王治本、徐少芝評點。

(28)《省軒詩稿》二卷，龜谷省軒，東京：榊原文盛堂，明治三十六年。黃超曾、孫點、沈文熒、王治本、王韜、黃鈞選、黃遵憲、陳允頤、文廷式評點。

(29)《敬宇文集》十六卷，東京：吉川弘文館，明治三十六年刊。何如璋、黃遵憲、王韜、王治本評點。

#### 4.著作

王治本共有七種著作，或為合著，或為譯著，或為校閱，不一而足。

(1)《歐蘇手簡注解》四卷，大槻東陽注，西川文仲編，京都：竹苞書樓，明治十四年刊。

本書錄歐陽修和蘇軾手簡，並加以注釋。漆園王治本刪定。光緒五年正月王治本序，盛讚大槻東陽「博學多識，能文章，愛讀二公遺書，而尤注意於此簡，為之稽考年月，採核事實，並詳其問答之人，考古證今，賞奇析義，閱寒暑而成，是注心良苦矣」。

(2)《周清外史》二十二卷，馬杉繫著，王治本閱，東京：江嶋喜兵衛，明治十四年刊。

敘述中國簡史之書，首起東周，歷經秦漢魏晉，下迄清光緒，凡二千多年。「本編全系清人王漆園先生檢閱，然清祖南臨以往，以觸忌諱，先生辭檢閱，故使兒虔代仇校之。」

(3)《舟江雜詩》一卷，王治本著，阪口仁一郎編，新潟：井筒駒吉等，明治十六年刊。

王治本自題書名頁，首有阪口恭、小崎懋題詞、王治本自序。據1883年王治本的自序，此為明治16年遊歷新潟，吟詠90天結下

的詩集。「舟江」似為新潟別稱，正文收詩28首，附錄6首，多為吟頌當地人文、自然景色的作品。每首詩後，有明治時期著名書法家日下部鳴鶴、阪口仁一郎、小崎懋等日人的評點。

(4)《新潟繁昌記》一卷，王治本著，抄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首有1888年岡千仞撰〈新潟新繁昌記序〉、1884年12月除夕日本蒲生重章撰〈新潟小志序〉，以及小山朝弘於1885年寫〈新潟小志序〉的識語。識語後有1884年冬月日本龜谷省軒(1838-1913)撰寫的拜稿記——〈題詩〉。據序判斷，此書原名「新潟小志」，1888年改為「新潟新繁昌記」。〈新潟小志序〉稱：「清國王黍園先生來我邦東京久矣。去歲癸未夏遊北越新潟，至今冬迺還。」知王治本自1883年夏至翌年冬，客居新潟達一年半之久。因此，《舟江雜詩》和《新潟新繁昌記》都是這時期的產物。有龜谷省軒、石川鴻齋(1833-1918)、蒲生重章(1833-1901)的評點。他們皆為當時名聲卓著的漢文學家，與王治本交誼深厚。王治本為蒲生《近世偉人傳》題辭，與黎庶昌等為《蒲門盍簪集》評點，與黃遵憲、王韜等為《聚亭詩鈔》題寫識語；為石川《芝山一笑》、《續日本文章軌範》和《鴻齋文鈔》撰寫序跋，為《日本文章軌範》題寫書名，與黃遵憲等為《鴻齋文鈔》、《和漢合璧文章軌範》評點；與何如璋等為龜谷《省軒文稿》和《省軒詩稿》評點。全書分為地輿、風俗、水利、街市、沿革、佛寺、學校、神祠、醫院、商業、遊寓、先民、流覽、酒館、妓樓等，凡15節，「賅而能盡，簡而能括，使人一覽領全港之梗概」。新潟雖為北陸地區大港，但迄今未見專書記載，王治本的《新潟新繁昌記》，為首部著述。

王治本赴新潟，並客居一年半，具體原因不得而知。筆者認為，很有可能應當地文人邀請前往撰寫此書。邀請人中，《舟江雜詩》的編者阪口仁一郎(1859-1923)當在其中，並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阪口仁一郎，字思道，號五峰，新潟人，家庭代代殷實，善詩文，多次當選眾議院議員，長期擔任新潟新聞社長，編著的《北越詩話》名傳遐邇，有《五峰遺稿》等遺世。



(5)《日本警察新法》一卷，小幡儼太郎譯，王治本校閱，東京：善鄰譯書館，明治三十二年刊。

首有善鄰譯書館編輯局於1899年撰寫的〈日本警察新法序〉，內稱：「今也，西鄰兩邦〔指中朝兩國——引者注〕警察之設，尚屬草創，其參酌外法，取長補短，亟致完備，以期乎文明豈非方今急務乎。」可見此書是為了向警察制度尚屬草創期的中朝兩國推介近代警察制度。全書分行政和司法兩部分，司法為一編，行政析為保安、靖亂、人事、保護、救災、風紀、營業、衛生等編。

(6)《戰法學》二卷，石井忠利，王治本訂，東京：善鄰譯書館，明治三十二年刊。

永阪石埭題書名頁，元帥侯爵大山巖題字。首有石井自序，內稱1895年至1896年作為外交官駐北京期間，「有感於時事，著本書以贈王大臣等諸王公」。近來，「善鄰譯書館謀多編新書輸諸中韓，以資其文化。因想此書幸流傳兩國，其於厘革兵制，或有少補」，於是重新修訂出版。全書分為高等戰法學和初等戰法學(戰術學)各一卷。前者下設戰略學、軍制學(編成學、給養學、募兵學等)，後者分為行軍戰軍駐軍總論、軍紀總論、教育總論、訓練總論等。

善鄰譯書館為成立於1899年的出版社，旨在向中韓等鄰國推廣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翻譯出版新學著作，受到中國《申報》等媒體的關注。是年12月首批推出《大日本維新史》(重野安繹著)、《國家學》(吾妻兵治譯)、《日本員警新法》和《戰法學》四書。<sup>26</sup>王治本作為協修參與其半。據《善鄰協會主旨·著譯凡例》第一條：會友中專門碩學耆宿，一稱協修，而著譯校仇，各從其所長。<sup>27</sup>可知協修為善鄰譯書館聘請的「碩學耆宿」。《著譯凡例》後作了修改，該條改為：「本會立專門碩學、立論精微、一世所推服者為賓師。每有譯述，使其仔細閱讀，以其一語無誤，然後刊行之。」<sup>28</sup>可見「協修」被視為「賓師」，其具體任務是為譯著嚴把品質關。

(7)《增補高島易斷》四卷，高島吞象述，柳田幾作記，王治本

譯，橫濱：高島嘉右衛門，明治三十四年刊。

首有高島吞象、王治本、栗本鋤雲和副島種臣序，末有中村敬宇跋。據王治本序：「一日，余於友人處，獲晤高島翁，談及《易斷》之妙，翁曰：『惜此書純用和文，不克流傳海外，請君一譯漢文。』友人亦相與勸說，余遂應命。卦首先釋象義、字義及陰陽變動、參互錯綜之旨，後系所筮斷驗。余為之循其意譯其詞，從事於筆硯者，八閱月乃成。」知他在友人處獲晤高島，受高島之托，傾八月之力，譯竟此書。又據高島序，此書原為高島講述，友人柳田幾作筆錄，為謀在華流傳，請王治本補正。而栗本、副島、中村的序跋原為高島的《易斷》、《易占》而作，因不忍割愛，乃錄於此。該書為高島吞象根據《易經》占筮實踐的結晶，高島在明治時期享有「易聖」之譽，許多占斷刊登在報刊上，在朝野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據實藤惠秀研究，1883年時，王治本能大致閱讀日語，但不諳口語。23年後（1905年），他已克服了口語的障礙。<sup>29</sup>此書為王治本唯一的譯著，可以證明晚年時他具有閱讀、翻譯日文書籍的能力。

除以上書籍外，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和大東文化大學圖書館藏有《大河內文書》。該文書為大河內輝聲與清末赴日中國人筆談記錄，其中與王治本有關的《棗園筆話》17卷、《王治本在金沢筆談記錄》11冊，這些都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手史料，彌足珍貴。

以上著作，(1)《歐蘇手簡注解》和(2)《周清外史》、(5)《日本警察新法》和(6)《戰法學》、以及(7)《增補高島易斷》，分別出版於1881、1899及1901年，時間橫跨20年；在著作方式上，筆談、校閱、刪定、翻譯，各種形式不一而足。但唯有(3)《舟江雜詩》和《新潟新繁昌記》為王治本的著作。這兩本書，一詩一文，吉光片羽，歷經滄桑，倖存至今，彌足珍貴。但是，揆之內容，它們也並非王治本的代表作。<sup>30</sup>

此外，明治時期著名漢學家中村敬宇的《敬宇文集》（卷四，東京：吉川弘文館，明治三十六年，頁6）載有中村為王治本撰寫的〈旬



六遊篇豆州紀遊詩序》，知王治本還著有《旬六遊篇豆州紀遊詩》一書。豆州，即著名的伊豆半島，疑為王治本遊該島時吟詠的詩集。中村在序中稱，該書「或抒寫景物，或憑弔古跡，或酬答諸人，興酣淋漓，筆翰如飛，而音調高雅，不啻若構思而後得之也」。序中還透露，王治本與中村關係友善，曾寄宿中村家，朝夕相談；數日不見，必有一篇新作問世。

## 五、結語

以上我們對王治本的生平、以及他遺世的作品——詩文、評點和著作做了梳理。限於篇幅，拙文未對其內容，以及與日交流情況作進一步的分析，但為日後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王治本自1877年初赴日，1906年回國，在日生活長達30年，是晚清寓日時間最久的中國文人。他以文會友，以文為生，在東瀛留下了豐富的作品，管見所及，計有詩31首、文20篇、評點著作29種、著作7部。見微知著，可見其交友對象廣泛，而且具有良好的文化素養，作品豐富。

明治前期著名漢文學家松本萬年(1815-1880)曾這樣評價王治本：「王氏渡航之初，余與之交善，為人泊然寡欲，亦為風流瀟灑之才子。其文多作駢麗對偶，然工字法，措辭綺靡。」<sup>31</sup>而與福澤諭吉齊名的學者中村敬宇也對王治本讚賞曰：

王子博雅，善詩文。頃寓我社，為人沖澹有真氣。余歎以謂：使王子逢水府義公，烏知其不為舜水乎？使逢艸山元政，烏知其不為陳元贊乎？使其來在文政、天保間，余知其決不在於江芸閣、程赤城之下。反而思之焉，使舜水之來在今日，烏知其不為王漆園氏乎？物少則貴，人亦如此，浩歎。<sup>32</sup>

中村在此將王治本與明清時期赴日中國人朱舜水、陳元贊、江

芸閣、程赤城等人相提並論，予以高度評價。遺憾的是，受時代的限制，王治本終生都未能一展雄才，只能空懷抱負，不知疲倦地在日本全國漫遊，詩文終老。廣部精嘆曰：

棗園先生客居我邦，十年於茲，而時與志違，利器未得其所。初余設日清社，招先生為教師。丁丑〔1877〕之亂，社亦瓦解，遂相與依敬宇中村翁於同人社。居一來年，先生出社去游於南總、於北海道，後遊三越，今春〔1885〕自越歸東，未半載，頃將復出遊西。<sup>33</sup>

王治本的摯友廣部精的這段話語描繪了王治本在日本的人生軌跡。雖然王治本「時與志違，利器未得其所」，但與在國內相比，他在東瀛風雲際會，尋覓到屬於自己的一片藍天，施展了文學才華，為明治時期中日民間文化交流起到了主力軍作用，同時，也為自己贏得了不菲的經濟回報。但是受時代和學識的限制，王治本雖然能在中國傳統文化領域獨步一方，甚至叱吒風雲，但在政治上，止步於門外，不能施展抱負，有所建樹。從這一點上說，他是介於中日兩國的邊緣人。

明治維新後，日本一方面在政經及軍事等領域傾力西化，與中國的關係日趨緊張，甚至兵戎相見，但在文藝上依然尊重中國，以獲得中國學人的首肯為榮。因此，在民間仍有不少類似王治本的文化大使，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貢獻。與近代首位訪日的中國人羅森相似，王治本在中國寂寂無名，在日本卻為當地文化人所重視。這反映出明治日本現代性的多元化及複雜性。筆者撰此小文，試圖還原一百年前這段被人遺忘的真實歷史，以喚起學界對發生在近代轉型期的這一文化現象應有的關注。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日本藏晚清中日筆談史料集錄與研究」中期成果之一）



- 1 實藤惠秀編：《大河內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東京：平凡社，1964）及實藤惠秀、鄭子瑜編校：《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研究會，1968）。
- 2 兩篇論文收錄在實藤惠秀著：《近代日中交渉史話》（東京：春秋社，1973）。
- 3 王曉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230-237。
- 4 六角恒廣著：《中國語教育史之研究》（東京：東方書店，1988），頁105、108、115-116。
- 5 鄭海麟著：《清季名流學士遺墨》，《近代中國》第11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 6 王寶平著：《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及〈清季文人東瀛遺墨——王治本序跋輯佚〉，《文獻》2009年10月第4期。
- 7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宮島誠一郎文書》C筆談錄2《明治十年筆談》，頁3。
- 8 關義臣編：《日本名家經史論存》15卷（東京：溫故堂，1879-1880）。
- 9 實藤惠秀編：《大河內文書》（東京：平凡社，1964），頁12。
- 10 日本早稻田大學藏：《大河內文書》No. 42B, 缺本寫本《庚辰筆話》肆，明治13年初5日王治本致大河內信函。
- 11 廣部精著：《總譯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卷一下〈跋〉。
- 12 六角恒廣著：《中國語教育史之研究》，頁108。
- 13 (日)外交史料館藏：《私雇入表》自明治九年七月，門3類9項3號11。
- 14 甲賀忠一等著：《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物價文化史事典》（東京：展望社，2008），頁28、272、450、398。當然，與官方僱傭的人員相比，王治本的50元月俸屬於較低收入。
- 15 王治本與宮島誠一郎之筆談，《清客筆談》1878年，頁10。
- 16 王治本著：〈近移居池端聞香舍，偶吟四首之一〉，《東洋新報》第38號，1878年7月。
- 17 王治本著：〈訪永石埭週二玉池仙館酒間和其新春原韻〉，《新文詩》第30集，1878年2月。
- 18 王寶平著：〈清末駐日外交使節名錄〉，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編：《中日關係史論考》（北京：中華書局，2001）。
- 19 王治本著：〈招入芝山公署，辭別蓮池戲賦一律〉，《東洋新報》第42號，1878年9月。

- 20 大河內輝聲著：〈芝山一笑後序〉，《芝山一笑》，收錄在《中日詩文往來集》，頁63-64。
- 21 實藤惠秀著：《近代日中交涉史話》（東京：春秋社，1973），頁229-232。
- 22 王曉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236。
- 23 收錄在鄭海麟編：《清季名流學士遺墨》，《近代中國》第11輯，頁271。
- 24 1906年春，王治本回到故鄉。1908年6月16日卒於故鄉，享年74歲。
- 25 (16) (17) (18)三詩的確切年代難以判斷。此據《翰墨因緣》出版時間，姑系於明治十七年。
- 26 狹間直樹著：〈關於善鄰譯書館〉，《東亞》第417卷，霞山會，2002。
- 27 《清議報》第二冊，1898年11月21日，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影印本，頁104。
- 28 《譯述方法》（乙稿）第三條，狹間直樹編：《善鄰協會·善鄰譯書館關係資料》（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字情報研究中心，2002），頁89。
- 29 實藤惠秀著：《近代日中交涉史話》（東京：春秋社，1973），頁171-175。
- 30 校對此稿時，筆者又喜獲王治本著《食研齋文稿》稿本2冊，容作異日之券。
- 31 松本萬年對王治本《郵便論》之評語載《維新大家文抄》，1877年刊。原文日語，引者譯。
- 32 中村敬宇對王治本《玉池仙館記》一文評語。原文漢文。《同人社雜誌》第17號，1877年九月。王治本時寓同人社。
- 33 1885年7月初7日，王治本張宴招同人飲，席間有中村敬宇、向山、龜谷、廣部精等。此為廣部精席間和王治本詩前的序言。《亞細亞協會報告》，1886年刊，頁219。原文漢文。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近代中日筆談的型態研究： 以《大河內文書》為中心

❖ 王曉秋 ❖

## 一、前言

筆談，又稱筆話、筆語，顧名思義就是用筆寫文字，代替口說語言進行交談。用毛筆寫漢字交談是東亞漢字文化圈內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等各國人士之間一種特殊的文化交流和人際溝通的方式。特別是近代晚清時期，是中日文人筆談的最盛期。雖然日本早已有了自己的假名文字和語言，但日本江戶時代和明治時代，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影響力還很大，許多日本官員和文人、武士都會寫漢字、讀漢文、做漢詩。因此中日兩國人士相遇時，有時儘管語言不通，卻往往可以通過筆寫漢字的方式來進行交談。由於筆談訴諸於文字，用筆寫在紙上，往往可以保存、流傳下來。故此至今在日本和中國的一些圖書館、檔案館以及民間私人文書中，還收藏有相當數量的中日筆談記錄原本。這些筆談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大量既珍貴又有趣的原始材料。

那麼中日筆談有些甚麼特色？第一，它是一種文化交流的原生態，也就是它原始和真實。它是中日人士本人當時當地親手寫下的



談話原文，不是後人記述或編撰。同時，它也是筆談者當時真實思想、心理的表達流露，沒有經過修飾、剪裁，保留了真實的異文化交流原生態。第二，內容的多樣及廣泛。它是中日人士之間的談話聊天，往往無拘無束，談天說地，包羅萬象。同時，由於中日筆談者的身份、地位、職業、經歷、學問、修養、性格等等的差異，以及筆談時代、環境、背景、政見等等不同，筆談內容更富於多樣、廣泛及複雜。第三，互動和趣味。它是中日筆談者之間的一種互動交談，雙方常常會發生爭論、辯駁或探討、點評，令人深思，耐人尋味。筆談記錄形式還猶如戲劇劇本的人物對白，有的甚至注有當時的場景、人物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因此讀起來很有趣味。當然整理起來難度也很大，筆談往往是即興隨手所寫，字跡潦草，有時很難辨認。有的不注明筆談者姓名，或只有簡稱、代號，還需加以考證、識別。<sup>1</sup>

本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三十多年，一直關注並收集、研究中日之間各種筆談史料。從清初的漂流民、商人、武士到近代的文人、學者、外交官、政治家、留學生等。在各種類型的筆談史料中，我覺得內容最豐富、最有趣的還是《大河內文書》，特別是其中黃遵憲(1848-1905)與源輝聲(1848-1882)等日本文人的筆談最能代表。因此本文以該史料為中心，並補充黃遵憲與宮島誠一郎(1838-1911)、岡千仞(1833-1914)等人的筆談史料。

## 二、筆談的參與者

明治初年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文人學者在日本尚享有很高聲譽和影響。自從中國使團進駐東京以後，日本各界人士從官員、儒者到武士、僧侶紛紛來訪，競相與中國公使館人員或筆談交歡，或以詩酒翰墨共樂。有人曾描寫當時公使館內盛況：「執經者、問字者、乞詩者，戶外履滿，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sup>2</sup>而去中國公

使館最多的是一些日本的漢學家、漢詩人。他們尊崇中華文化，不滿明治初年棄漢學崇西學的傾向，更願意在與中國外交官的筆談交流和詩詞唱和中來提高漢學修養、尋找精神寄託和快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本文要着重論述的源輝聲及其《大河內文書》。

源輝聲，號桂閣，祖居大河內，故又稱大河內輝聲或源桂閣。他生於1848年，原是江戶時代日本世襲高崎藩主。明治維新後廢藩置縣，他任高崎縣知事，因不贊成明治新政而辭官歸鄉，改封為五品華族，入修史館，以後長期間居於東京墨江（即隅田川）畔。大河內精通漢學、漢詩，嗜愛翰墨，廣交文士，尤喜與旅居日本的中國人、朝鮮人交往，特別是與中國公使館的官員、甚或僕役、小孩都用漢字筆談，甚至遇到使團會講日語的翻譯，他也寧願進行筆談，因為這樣可以留下墨蹟好作紀念。所以他每次去中國公使館都準備好筆談用紙，一問一答都寫在上面，當天晚上就把這些紙裱好，精心保存起來，甚至連當日接到與筆談有關人物的信柬、便條，也附貼在筆談紙之後，然後按順序編排，裝訂成冊。這些筆談存稿統稱為《大河內文書》，總共有96卷，（現存73卷71冊），其中包括與中國公使館官員、旅居日本的中國文人、中國書畫家、朝鮮人的數百次筆談。

《大河內文書》在大河內輝聲去世後原來保存在大河內家族墓園埼玉縣野火止平林寺的書庫內。1943年，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最初看到這批資料，冒着美軍轟炸的危險，陸續從平林寺借出來抄寫。實藤惠秀與新加坡華人學者鄭子瑜在1960年代合作編輯《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1968年由早稻田大學出版社出版。另外，實藤惠秀又選譯該資料的一部分編為《大河內文書》一書，1964年由平凡社出版。1986年筆者訪日前，曾接到實藤惠秀先生來信，表示希望與我共同研究黃遵憲、中日筆談和中國留日學生等問題。可惜我尚未赴日，先生已經去世，深感遺憾之至！《大河內文書》原本後來大部分被捐贈給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小部分收藏於大東



文化大學(早大也有膠捲)。我在1986年至1987年訪日期間，專程到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特藏室看了三個月《大河內文書》原稿和膠捲，作了一些抄錄和複印，但回國後因其他工作忙，未能及時充分利用和研究。本文除了參考校對當年抄件、影本以外，主要依據最新出版的《黃遵憲全集》(中華書局2005年)所收「與日本友人大河內輝聲等的筆談」。這是1992年鄭子瑜先生專門為《黃遵憲集》提供的《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的「最新改訂本」，並囑「編黃集時請以此為依據」。<sup>3</sup>黃遵憲與宮島誠一郎的筆談，則依據早稻田大學收藏的《宮島誠一郎文書》和國會圖書館收藏的《宮島誠一郎關係文書》。黃遵憲與岡千仞的筆談，是依據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特別文庫收藏的岡千仞《蓮池筆譚》手稿和部分筆談手稿原件整理，現也都已收入新版《黃遵憲全集》。

《大河內文書》中的這些中日文人筆談，內容涉及中日兩國的政治、外交、學術、文化、風俗，以及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幾乎是無所不談，無一點掩飾與做作。內容豐富多彩，精華與糟粕並存，頗能反映筆談者們的真實思想與生活。這些筆談漢字由於是用毛筆隨手書寫，有的字跡潦草，不易辨認，而且沒有署名。好在細心的源桂閣在許多篇筆談上都注明時間、地點與在場人物，有時甚至還記下他們的動作、表情，以及進來與離開的時間。筆談者姓名往往用一二字代全名，如以「公」字代表黃公度(黃遵憲)，用「桂」代表源桂閣(大河內輝聲)，用「如」代表何如璋(1838-1891)等，讀起來猶如一部演出用的劇本，觀筆話如觀其人，音容笑貌，栩栩如生。下面着重剖析一部分筆談內容。

筆談充滿大河內對中華文化的仰慕之情以及中日文人之間的互相謙恭。在《戊寅筆話》(1878年)中他第一次見到黃遵憲就說：「今日得相見，蓋萍水之歡，可謂不盡矣。希自今締交，為莫逆之好。」黃則答：「自今締交，敢不如命？懼僕學識蕪陋，未敢以辱君子耳。」桂又說：「弟扶桑黃口小兒，不足以踐君子之庭，而多受諸君之愛

顧，蓋大幸也。」源桂閣讚揚黃的詩曰：「章章出金玉，希取出一冊而見示。弟寫完而藏庫司。如拙稿則僅僅二三篇耳。何能電覽！」黃謙虛地說：「弟素不工文，又生性疏散，隨作隨棄，更無清本，亟欲讀大著耳。」桂忙說：「東洋鄙人，何與中華雅客相鬥乎？宜師事而受教也。希賜一讀！」後來黃懇切表示：「我等文字相交，一面如舊相識，無庸客套，君毋太謙乎！」<sup>4</sup>大河內還講到自己在明治維新後辭官隱居之事，「王政維新之後，有人薦弟於陸軍尹，弟心甚不快，遂斥其言，潛跡於墨江，食天祿而消光陰耳，其不才可憐」！公使館隨員沈梅史立即說：「所謂士各有志，出處一道，固自有斟酌，鐘鼎山林，皆有賢人也。閣下不必過謙。」<sup>5</sup>

宮島誠一郎，號栗香，明治初年曾任職於修史局和宮內省。作為官員，他的筆談更富政治色彩。如1878年4月19日他與黃遵憲初次見面時說：「敝國與貴邦結交誼始於今日，而學漢字蓋隋唐以來，連綿不絕。敝國本是東海孤島，幸以貴邦之德，制度文章聊以增國光。今日更得拜晤，以後事事講求，互討論兩國之是非，不無補益於政治。」黃遵憲也客氣地表示：「今日之外交，亦時勢不得不然。然僕輩得因此而觀其山川之勝，士大夫之賢，政教之良，不可謂非大幸也。」關於東西文化，黃遵憲說：「竊謂今日之西學，其富強之術，治國者誠不可不參取而採用之。然若論根本，聖賢之言，千秋萬歲應無廢時也。」宮島則表示同意曰：「此論明確，千歲不廢。我邦敬神愛國，即千歲之國教。自入孔聖之學，忠孝二字之大義益顯著。今日之西學，唯取其長以謀富強而已。」<sup>6</sup>

大河內酷愛筆談，在公使館遇到翻譯梁縉堂時，旁人介紹「縉堂東語頗熟，口談為便。」他卻偏要筆談，「弟口訥不喜口談，惟以一支筆換千萬無量言語。冀使他勉為筆談，則弟之幸也。」連遇到何如璋公使13歲的兒子何其毅，也要與他筆談一番。當別人說他年紀小，「恐筆談未慣，而說則言語不通，奈何？」桂忙說：「以少年屬文為奇，何管慣與不慣，請切呼出！」迫不及待要與孩子見面筆談，



「其毅之筆談，大人猶避三舍，何有愧於弟等乎，切請招之！」13歲的何其毅後來居然也與大河內筆談起來，互問年齡和家中情況。桂請他來墨江游玩，其毅答「異日同子敬到府拜」，大河內不禁用日語大叫「油羅須！油羅須！」(即日語よろしゅう之音)，並驚嘆這孩子「可愛！可敬！可怕！可驚！」<sup>7</sup>

### 三、政治與外交論

中國駐日公使館官員畢竟是外交官，與日本文人筆談中，自然會涉及政治、外交方面內容。如1878年日本明治政府實權人物大久保利通(1830-1878)遇刺，震驚內外。大河內輝聲問：「大久保之遭刺客，公署之詳說謂如何？」何如璋就批評說：「大抵頑固之俗未化，十年來貴邦文明無進步也。」反對新政的大河內也抨擊明治政府：「口唱進步，心為退卻，中有木戶孝允以早逝，倖免刺客，然亦不免為伍子胥鞭屍之事歟。」黃遵憲打聽：「近來傳聞如何？聞刺客黨羽甚多，如何？」石川鴻齋(1833-1918)答：「新聞妄說，俚巷之風，非有實證也。」黃又問：「刺客專委其罪於大久保，又欲鞭木戶孝允之屍，意倘謂此人既死，國事即將蒸蒸日上耶？」石川鴻齋道：「南薩之人(指九州薩摩藩人)，偏陋頑固，數誤大事，與中國人(似指本州西部中國地方之人)議論不相合，故有此難也。」何如璋與黃遵憲還要求大河內把刺客所懷之《斬奸狀》逐條寫出來。他不願再說，推脫說：「若欲問奸狀事，問於當路君子，如弟則山水遊玩是視耳。」<sup>8</sup>

有一次，黃遵憲問宮島誠一郎：「有板垣退助者，亦維新功臣，聞已退居。其為人何如？」宮島答：「明治之初年至六年，我輩大親睦，共謀國事。其為人忠實果斷，且有軍功。今與政府異議。」黃即追問有甚麼異議？宮島說：「板垣以為，維新之初，天子下詔曰：廣采眾議，萬機取決於公論，施行政治。今日政府之所見，全國士民

知識未暢，朝廷先立國是，以施政事。此板垣與政府異其見也。」沈梅史認為：「貴國近尚西法。西人言利與民權，皆致亂之道也。人皆爭利，不奪不厭。民苟有權，君子何有？」而黃遵憲卻認為，「然其為人忠實果斷，則大可兼收並用也」。宮島忙問：「兼收並用何義？」黃答：「謂雖偶與政府不合，亦必有可補偏救弊者。朝廷用人，不必專以一格也。」但當時黃遵憲也批評板垣的自由民權論：「近於墨人自由之說。大邦二千餘年一姓相承，為君主之國，是豈可行？」他認為，「若以素日不學無術之人遽煽自由之說，又大國武風俠氣漸染日久，其不為亂者幾希。故僕私謂教士取士為今日莫急之務。如鐵道等事，其次焉者也」。<sup>9</sup>

中日文人也曾為琉球問題發生爭執。黃遵憲說：「琉球小國，從古自治，近為貴國小兒輩〔執政之流〕所欺凌，彼臣服我朝五百餘年，欲救援之。」石川鴻齋卻認為：「琉球洋中一小國，先年為薩人島津氏所奪掠，爾來貢于我，聞亦貢于貴國，使者往貴國，忘用貴國年號，來於我者，用我國年號。中有漂然不為二國者。」黃又指責：「近來太政官乃告琉球阻我貢事，且欲干預其國政，又倡言於西人，既與我言明歸日本，專屬鼠偷狗竊之行，可恥孰甚！」沈梅史也譴責日本吞併琉球：「遂夷於九縣，非惟我國之所不忍聽，亦西鄰之所不能平也。」大河內輝聲想看琉球人與中國官員的筆話，問「琉球人筆話何故不許閱？」黃答以保密之故：「方與貴國議此事，他日事結，亦無不可觀。此事不欲告日本人，少留日本情面也。」<sup>10</sup>在與宮島誠一郎關於琉球交涉的筆談中，黃遵憲尖銳地指出：「然貴政府若有事於球，非蔑球也，是輕我也。我兩國修好條規第一條即言：兩國各屬邦土，務各以禮相待，不可互有侵越。條規可廢，何必修好？故必絕聘問，罷互市。吾輩不得不歸也。」「我國近始遣使交鄰，此事而遂置之，何以為國？足下試為吾輩籌畫，豈有遇此事猶腆面在此與貴國及他邦往來者乎？」<sup>11</sup>在筆談中，公使館官員有時還無意中透露了館內的分工，如沈梅史告訴大河內：「今日要發奏摺，



乃將今年所辦之事奏皇上，此事黃(遵憲)主稿，廖(錫恩)寫之，而弟封之，故不得聞。」<sup>12</sup>

#### 四、文學與藝術論

源桂閣等日本漢學家和中國公使館的文人外交官們筆談觸及最多的還是文學和藝術。中日文人在筆談中暢談兩國文化淵源，評論古今各種作品，互相介紹彼此國內的文學藝術及學術狀況，發表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見解。《戊寅筆話》第21卷中有一段很有趣的關於兩國文學名著的筆談。日本漢學家石川鴻齋說到：「民間小說傳敝邦者甚夥，《水滸傳》、《三國志》、《金瓶梅》、《西遊記》、《肉蒲團》數種而已。」黃遵憲見他沒提到《紅樓夢》，便說：「《紅樓夢》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得其妙也。」王黍園接着補充道：「《紅樓夢》寫盡閨閣兒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盡矣。讀之可以悟道，可以參禪。至世情之變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於其極。欲談經濟者，於此可以領略於其中。」黃還說：「論其文章，直與《左》、《國》、《史》、《漢》並妙。」大河內聽了不服氣，便舉出日本古典小說名著《源氏物語》與《紅樓夢》抗衡：「敝邦呼《源氏物語》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說榮國府、甯國府閨閣，我寫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才女子紫式部者，於此一事而使曹氏驚悸。」石川鴻齋補充道：「此文古語，雖國人解之者亦少。」黃遵憲也表示遺憾，「《源氏物語》亦恨不通日本語，未能讀之。今坊間流行小說，女兒手執一本者，僕謂亦必有妙處。」鴻齋又介紹說：「近世有曲亭馬琴者，效《水滸傳》作《八犬傳》，頗行世，凡百有餘卷。今現為演戲，行之島原新富座。」黃也讚揚日本戲劇：「貴國演戲，盡態極妍，無微不至。僕亟喜觀之，恨未知音耳。」大河內說：「此書非為戲而作，故方演其戲。近來俗輩換其腳色，卻失馬琴本意矣。敝邦戲之妙者，以《忠臣藏》為第一，

蓋因為戲而作也。然其學問淺薄，非其《還魂記》、《西廂記》之類，皆可笑也。」<sup>13</sup>

在1879年的《巳卯筆話》中，黃遵憲曾坦率地對日本文壇提出批評，他說：「僕之蓄於胸中未告人者曰日本人之弊，一曰不讀書，一曰器小，一曰氣弱，一曰字冗，是皆通患，悉除之，則善矣。」石川鴻齋虛心接受：「僕輩未免此病，頂門一針，可愧！可愧！」黃遵憲又補充道：「大約日本之文，為遊記、畫跋、詩序則甚工，求其博大昌明之文，不可多得也。近來《曾文正公文集》，亦日本之所無也。」鴻齋歸結其原因為日本國土太小：「國之大小，必顯於書，僕一遊貴邦，將經名山大川，養其胸中鬱悶之氣。然則如僕拙忽，詩文亦自有所見乎？冀閣下歸國伴僕去。」黃則指出：「日本山水靈秀清奇，未必輸我，惟博原高大之處或不及也。」<sup>14</sup>

在筆談中常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士向黃遵憲、何如璋等請教寫詩、作文及書法、讀書的方法，並請他們評點日本漢學家的詩文。同時黃遵憲等人也經常向日本文人瞭解日本的歷史、制度、典籍以至風俗人情，有時還請他們幫忙尋找和翻譯日本的史書和資料。有一段筆談反映了日本文人對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的讚譽。龜谷省軒(1838-1913)說：「《雜事詩》刻於貴邦，想洛陽紙價為之貴。」黃遵憲解釋道：「一刻於北京，一刻於香港，敝邦人見之，以為見所未見，書之工拙不暇問也。」龜谷又說：「閣下之書，敘櫻花之美，兒女之妍，使讀者豔想。此書一行，好事之士航海者必年多於一年。」談到詩文之事，黃遵憲指出：「文章之佳，由於胸襟器識。尋章摘句，於字句求生活，是為無用人耳。」龜谷表示贊同：「詰章訓句，徒費力于斷簡，經生之無用更甚。」黃又進一步發揮道：「國家承平無事，才智之士無所用，故令其讀書，所謂英雄入彀中也。比如富家巨室，衣食充裕，其子弟能喜古玩，好書畫，亦是佳事。謂此古玩、書畫為有用則不可也，謂為無用亦不必也，視其所處之時地何如耳。」<sup>15</sup>

筆談中還有不少趣事，有的反映了中日兩國生活習俗的差異。



如有一次中國駐日公使館邀請大河內輝聲出席慈禧太后壽辰招待宴會，席上菜肴豐盛，但大河內由於口味清淡胃口不佳，而公使館官員們卻再三說「請你多吃」！黃遵憲還說：「中國禮俗，客就主席不飲食為大不敬，欲守吾禮，則不能怨君過也。」大河內只好辯解道：「我邦之禮，以主客食不食任自己所喜為好，卻以應人之招或託病不來為大無禮、大不敬。」公使館隨員王琴仙又補充說：「敝邦必以主讓客，客不食，則主亦不下箸，故無物必讓之。」大河內最後自嘲打趣：「飯硬如岩石，東洋人腸胃軟弱，不堪吃焉。唯膽堅如鐵，能併吞五大洲浩然氣。」沈梅史也表示歉意道：「請君來此，竟不能飽，歉甚！」<sup>16</sup>

## 五、中西文化論

在《大河內文書》的中日筆談中也涉及到對日本明治政府提倡學習西方文化的看法，在這個問題上，日本的漢學家和中國駐日公使館官員大多傾向於力圖維護以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為中心的東方傳統文化的地位。如在《戊寅筆話》第11卷中有大河內給何如璋的一封信，請中國人不要誤以為日本人都追求西洋文化。他說：「顧我邦上古文物質素，民俗醇樸，其仰教于中華，學道孔家之遺訓，禮儀服飾，宮室器用，率折衷於此。又鴻儒碩學輩以我邦固有之風俗為貴，非方今專溺洋習者之比也。大河內竊恤中華人或誤信我邦人自古浮薄利、喜新奇，專學殊域之風。則不獨桂閣抱杞憂，即我朝之恥也。」<sup>17</sup>為此，他特地送何如璋《前賢故實》20卷一部。在《戊寅筆話》第25卷1878年11月16日的筆談中，還有這樣一段對話。黃遵憲說：「敬仰高義。近者士風日趨於浮薄，米利堅自由之說，一倡而百和，則竟可以視君父如敝履。所賴諸公時以忠義之說維持世教耳。」日本漢學家松井強哉即表示：「弟等固不知歐洲巧言令色趨利之敏，惟墨守孔孟之教，故樂諸先覺之游談耳。」使館隨員沈梅史說：「貴

邦多節義之士，與他州唯工言利者殊，弟所以樂與諸賢遊者在此。近日西學盛行，所以節義之士多隱居高蹈。」隨員廖錫恩也寫道：「孔孟之教在貴邦，今日幾為廣陵散矣〔指很稀少之意〕，諸君猶能毅然守之，可謂人中之傑，不為世俗推移。敬服！敬服！」<sup>18</sup>

《大河內文書》是在晚清中日開始建立邦交互派外交官的時代產物，日本明治初年正處於新舊勢力、東西文化思想激烈變化衝突的階段。對日本明治新政和西化傾向不滿而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崇拜迷戀情結的日本舊貴族、漢學家們，熱衷於與中國駐日公使館文人外交官們用漢文筆談或作漢詩唱和，以此為樂趣和精神寄託。原高崎藩主大河內輝聲的《大河內文書》就是這種現象的集中寫照。因此它對研究晚清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明治時代日本人的思想、心理及東西文化的衝突，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

中日知識分子對東西文化的認同與比較，還可以看到黃遵憲與岡千仞的一段很有意思的筆談。岡千仞，號鹿門，精通漢學與西學。明治維新後，他曾任修史館編修官、東京府書籍館幹事（館長）等職，後因對藩閥專制不滿而辭官辦塾，教育學生並著書立說，著有《尊攘紀事》、《法蘭西志》、《米利堅志》等書。1884年，他訪問中國，寫了《觀光紀遊》。在1879年3月的一次筆談中，岡千仞告訴黃遵憲，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國是大變，崇信洋學，至廢大學，別開洋校，專講西學。漢學一般目為迂疏不足取，故大成殿〔孔廟〕一閉不開至今日。」直到他此前一年「受府命總書籍館務，竊慨此式不興，異端謬妄橫行無忌憚至此。極與館僚議，每春秋設小式〔祭孔〕，聊表祭聖之誠」，但可惜自己力微，不能影響政府。

黃遵憲對岡千仞說：「孔子之道，其大如天，不可分國而尊之。」比如說，「孔子魯人，若分國師之，則晉秦齊衛亦不必師，有是理乎？今歐米尊事耶穌，未聞斥為羅馬人而各尚其國學也。宋元以來儒者誠不免拘迂，然萬不可以此並議孔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不變，道亦不變也。」他讚揚岡千仞：「先生有見於此，亟為此



舉，以為轉移教化之權，功可謂大矣。」黃遵憲還回憶起當年曾與明治政府要員大久保利通議論「造士之方」，主張東西方文化應該互相取長補短。「吾謂去國學、漢學、洋學之名，仁義道德之說取之漢學，而勿事其拘陋泥古之習；行政立事，造器務材惠工之法取之泰西，而去其奔競縱侈之習；其他衣冠風俗因於日本，輿地史書專求日本，而相戒去其輕浮之氣、見小之心，則應幾其可乎！」當時大久保「拍掌稱快者再。故亟亟議學校讀書先以《論語》、《孟子》為本。惜乎其遽遘難而死也」。

岡千仞對黃遵憲的這番議論表示贊同，並加以補充曰：「此論萬古不磨。洋人之學出於羅馬，所謂羅甸語者〔拉丁語〕，英佛日〔西班牙〕俄皆活用此語為各國言語學術。東洋各國，如朝鮮、安南及陋邦，皆用漢字以為國體風俗，猶洋人活用羅甸語。然則漢學，東洋各國之學。漢學以外，豈有國學者乎？魯衛則亞細亞之羅馬也。夫子之大德至聖，萬國仰其澤者。耶穌以妄誕不經之教，猶能廟食百世。況以夫子之大中至聖，百異於耶穌以一切方便諭野蠻人民之比乎！」

黃遵憲又進一步發揮道：「其〔耶穌〕妄誕不經之說，則以當時泰西人尚野蠻，不為神奇，不足以堅其尊信之心耳。然考其大旨，多有與吾儒相合者。在當時野蠻中忽出此人，可謂天縱聰明。」但他也批評西方傳教士：「至於今日，傳教之士競競然奉之如天，敬之如地，則可笑也。耶穌之教施之未經開化之國則可行，必欲施于東洋諸國聖賢早出之邦，抑又愚矣。」<sup>19</sup>

關於當時中日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和東西文化價值觀，我這裏還想引用大河內輝聲在〈芝山一笑後序〉中一段非常坦率的自白。他說自己在幕末也曾學過西學：「慶應年間，余結交於西洋人，講習其藝術，窺其所為，無事不窮其精妙者，大喜其學之窮物理，以能開人智。」然而明治維新以後，實行廢藩置縣，他在政治上失意，感情上也有變化。「自是後，以無用於世，乃改轍結交清人〔中國人〕，相識日深，情誼日厚，而其交遊之妙，勝於西洋人遠矣！」他把西

方文化和中國文化進行比較：「蓋西洋人神氣穎敏，行事活潑，孜孜汲汲覃思於百工器用製造也。至清國人，則不然，百官有司，廟謨之暇，皆以詩賦文章，行樂雅會，善養精神，故性不甚急也。」所以他認為這兩種文化適合於不同階層、不同氣質之人。「京畿之商賈、天下之人士，其求名趨利輩，宜交西洋人。高臥幽棲，詩酒自娛之人，宜交清國人也。」而他自己則是屬於後一類人，當然「以清客為益友固宜矣」。於是他與中國公使館何如璋公使、黃遵憲參贊等人，「來往無虛日，談笑戲謔，以至彼我相忘」。<sup>20</sup>

而談到中日知識分子追尋現代性及東西文化認同與思想的轉變，還可舉黃遵憲的自白。他在剛到日本初期，「時值明治維新之始，百度草創，規模尚未大定。論者或謂日本外強中乾」。而且與源輝聲一類日本文人交往較多，「余所交多舊學家，微言刺譏，咨嗟歎息，充溢於吾耳」。正如前面所引筆談中的一些內容，使他曾對明治新政改革產生懷疑。後來駐日時間長了，加上調查研究，「及閱歷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思想有了轉變，「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sup>21</sup>1881年10月12日，日本天皇發佈將於明治23年開設國會的詔書，黃遵憲大為讚賞，他在同年10月30日與宮島誠一郎的筆談中說：「明治二十三年開設國會，僕輩捧讀詔書，亦誠歡誠忭踏舞不已。君民共治之政體，實勝於寡人政治，況閱閱勳舊之組織者。」<sup>22</sup>

## 六、結語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種文化交流的原生態形式即中日人士之間的筆談，很值得重視和深入研究。它對我們探討明治時代以來中日知識分子在文化交流中對現代性和身份認同的態度變化也很有史料價值。

由於《大河內文書》等原生態筆談中，中日雙方的筆談者都是具



有較高漢文化修養，能文善詩的文人，而且筆談中談得最多的內容就是文學藝術、點評詩文。筆談中還收錄了一些中日文人之間的通信和唱和詩文，這些都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大河內文書》是中日文人私下即興筆談，不免也有不少酒色、風月文字，有時甚至還開玩笑互稱狗、猴打趣，這也正反映這些筆談是沒有顧忌，未經修飾的原生態交流。《大河內文書》包含中日文人幾百次筆談，內容極其豐富、龐雜，本文由於篇幅關係，只能介紹其中比較精彩的一些片段而已。

《大河內文書》反映了在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文化人對中國學問仍保持相當尊敬，而且積極與中國文人交往以求獲得啟發與肯定。這種一脈相承的共同文化情懷加強作為亞洲人的身份認同，足以給明治現代性的複雜性作一註腳。

- 1 參拙文，〈海外文字緣：清代中日筆談交流研究〉，《人文中國研究》16期（2010年12月），頁607-636。
- 2 石川英著：《日本雜事詩》跋，見黃遵憲著：《日本雜事詩(廣注)》（湖南：嶽麓書社1985），頁793。
- 3 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553。
- 4 《大河內文書》，《戊寅筆話》第4卷，《黃遵憲全集》上冊，頁562、567。
- 5 同上，頁563。
- 6 《宮島誠一郎文書》，《黃遵憲全集》上冊，頁716。
- 7 《戊寅筆話》第15卷，《黃遵憲全集》上冊，頁601-603、627。
- 8 同上，頁630-631。
- 9 《宮島誠一郎文書》，《黃遵憲全集》上冊，頁724-726。
- 10 《戊寅筆話》第26卷，《黃遵憲全集》上冊，頁678。
- 11 《宮島誠一郎文書》，《黃遵憲全集》上冊，頁732-733。
- 12 《戊寅筆話》第25卷，《黃遵憲全集》上冊，頁675。
- 13 《戊寅筆話》第21卷，《黃遵憲全集》上冊，頁648。
- 14 《巳卯筆話》第15卷，《黃遵憲全集》上冊，頁690-691。

- 15 《庚辰筆話》第21卷，《黃遵憲全集》上冊，頁709。
- 16 《戊寅筆話》第20卷，《黃遵憲全集》上冊，頁643。
- 17 《戊寅筆話》第11卷，《黃遵憲全集》上冊，頁616。
- 18 《戊寅筆話》第23卷，《黃遵憲全集》上冊，頁670-671。
- 19 《與岡千仞等筆談》，《黃遵憲全集》上冊，頁793-794。
- 20 源桂閣著：〈芝山一笑後序〉。
- 21 黃遵憲著：〈日本雜事詩自序〉（1890年8月），《黃遵憲全集》上冊，頁6。有關黃在使日期間的思想變化，參 Wai-ming Ng, "The Formation of Huang Tsun-hsien's Political Thought in Japan (1877-1882)", *Sino-Japanese Studies*, Vol.8, No. 1 (October 1995), pp. 4-21.
- 22 《宮島誠一郎文書》，《黃遵憲全集》上冊，頁783。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一件實物的來世： 明治時代有關公元57年金印的辯論

❖ Joshua A. Fogel( 傅佛果 ) ❖

## 一、序

《後漢書》的〈東夷傳·倭人〉有如下記述：「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換言之，公元57年今天日本之地有使節赴東漢朝貢，光武帝賜以金印及紫綬。這個在中國史書中粗略提到的金印不久便從歷史中銷聲匿跡。1784年九州一農民在修理灌溉渠時發現金印。當地漢學者龜井南冥( 1743-1814 )確信這正是《後漢書》提到的金印，自此有關這個金印的重要性或可疑之處的激烈辯論持續多年。無數的問題湧現，例如在日本群島上誰是金印的受領者？它怎樣遺失？為何出現在該處？以及上面「漢委奴國王」的刻字有甚麼意義？這些問題成為了幾個世紀以來學者熱心探討的課題。德川末年相關的討論曾冷卻下來。儒者加以讚美；國學家輕視其重要性或認為是偽造。對於印字內容及受領者身份一直沒有共識。明治時代著名史學家三宅米吉( 1860-1929 )撰寫的出色論文成功解開金印文字的部分謎團，並重新燃起有關的討論。他破解印文的秘密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所使用的方法。他使用文字訓詁去將一個半宗教討論轉化為主流學術議題。三宅的貢獻是開拓了歷史文獻學。他改變了金印的討論方向，



猶如明治史學改變了沿自江戶時代的史料編纂法。一系列的經典，不論儒學或神道，不再是所有真相和意義的來源，一切要以文字訓詁去驗證問題。本文會仔細考究三宅米吉發表於東京帝國大學史學權威刊物《史學雜誌》的論文，同時會研究明治時期的讀者如何回應三宅的論文，以及那些持相反意見的人的看法。

## 二、三宅論文的背景

改變典範的作品或方程式多十分簡單，例如 $E=mc^2$ ，然而它們卻改變了我們對不同學科的看法。當三宅的論文〈漢委奴國王印考〉刊登在東京帝國大學的重點史學雜誌《史學會雜誌》（後改名《史學雜誌》）時，該月刊已出版三年。<sup>1</sup>在翻譯此論文及討論此爭論前，讓我先介紹此論文出版時有關金印討論的背景。為何明治日人可以使一個在江戶後期已冷卻的題目再次火熱？其實不獨金印，幾乎所有日本史上的題目，特別是上古及史前的，都被明治（及後來大正）史學家重新檢定。新實証主義者採中歐學術立場，批評舊有研究方法為幼稚及帶偏見。當明治末年（1906）京都帝國大學成立文學院以抗衡東京帝國大學時，有關中國及東亞的實証主義研究法亦被重新檢視。

為何日本上古史特別受學界關注？第一，實証派的訓練讓近代日本學者只接受「硬」（最好是文獻上的）證據。對於神代之說，早在江戶時期的山片蟠桃（1748-1821）已認為純是無稽之談。他在其時代是異數，到了明治得到很多支持。第二，明治日本不但出現內部發展及改革，也是日本「脫亞」的時代，雖然這個過程在明治以前已開始。在現代世界，日本人重新思考作為日本人的意義何在？不是從傳統國學立場，而是從弱肉強食的國際秩序的架構下。答案可能藏於上古，而金印，若接受其為真品，就提供了首個日本接觸外面世界的證據。

江戶時代最後80年間學者就如何理解金印的刻文提出不同的看

法。爭論焦點是第二及第三個字，即「委」及「奴」，而首個字「漢」及最後兩個字「國王」意思明確，在解釋刻文意義時不用辯論（後來有學者關注它是否屬漢朝印章）。江戶晚期的一般共識是「委奴」讀作いと(ito)，是九州古地名，並提供不同圖表為証。三宅的論文推翻了此說。

在三宅發表其論文的兩年前，有幾篇與金印相關的文章剛好在同一學刊刊登。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久米邦武(1839-1931)、菅政友(1824-1897)及星野恒(1839-1917)。久米曾任岩倉具視(1825-1883)的秘書，追隨岩倉在1871年遍遊世界，考察西洋制度及爭取廢除不平等條約。菅是伊勢神宮主持，星野是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三宅在論文中有多處引用他們的觀點。久米及星野比三宅年長21歲，菅比三宅大36歲，年齡之差對學問有影響，年輕一代用最新的史料整法(文字學)去取代上一代的方法。以上三人的研究，至少有關金印的，只不過是上承江戶時代的討論而加以精密考証。在三宅提供証據後，他們均加以接受並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 三、三宅米吉的新解釋

以下是三宅米吉的論文漢譯：

〈漢委奴國王印考〉

史學會會員三宅米吉

就金印一事，先輩之考說甚多，吾不欲重提。唯本誌曾刊菅政友之〈倭人考〉，其謂「委奴」乃怡土郡之「怡土」(久米邦武贊同此說)。<sup>1</sup>星野博士的〈日本國號考〉謂「委奴」乃怡土鄉之土野。<sup>2</sup>吾以兩說皆非，於金印遂述己見。

金印之真偽至今仍無定論，吾不見偽作之確證。此印於天明四年四月廿三日筑前國那珂郡志賀島之南邊稻田中被發現(青柳種



曆考說)。一大石下三石側立，古墳石塚中似有物於其中。此印以黃金為質，方七分八厘，厚三分，高四分，重二兩九錢。蛇紋，印有陰文篆體五字「漢委奴國王」。

「漢委奴國王」如何讀乎？從來多以「委奴」讀作「怡土」。藤井貞幹、青柳種麿、伴信友等皆然，以此附會《後漢書》之「倭奴國」。蓋《後漢書》之「倭奴」，《唐書》之「日本古倭奴也」。後人皆以「倭」稱之。本居宣長謂「倭奴」與「倭」不同，故自發見金印以來，人皆誤以「倭奴」「委奴」相通，以此附會「怡土」。

「漢委奴國王」五字應讀作「漢之委之奴之國之王」。委者倭也。奴之國者古儼縣，今那珂郡也。《後漢書》之「倭奴國」，倭之奴國也。《魏志》之「奴國」為古九州北部大國，位帶方郡至耶馬臺之道中。《魏志》所列舉諸國之戶數作比較，對馬千餘戶，壹岐三千許家，末盧(肥前松浦)四千餘戶，伊都(筑前怡土)千餘戶，奴國(筑前儼縣)三萬餘戶，不彌(不詳)千餘家，投馬(應在備後備中之內)四萬餘戶，耶馬臺(大和)七萬餘戶，可見奴國在九州北部諸國中戶數特多，是大國，為九州北部最有力之國，此國早與漢通。史稱：「倭云云，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奴國為三十許國之中。

光武中元二年，奴國來貢。史書記：「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其史官於「奴國」加「倭」，以示奴國在倭之中。「倭」亦為我邦凡百餘國之總稱。史官不只加「倭」之總稱，復加「東夷」以示方位。〈東夷傳〉(注：《後漢書》)曰：「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此本紀記事之略記，亦加「倭」。又謂：「倭國之極南界也。」以示奴國之位置。「極南界」者，與怡土及儼縣均不合。《後漢書》之編者參考《魏志》最後所列倭之諸國。《魏志》曰：「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云云，不屬

女王。」故以奴國位倭國之極南界。伊都之次的奴國及最遠之奴國雖互相矛盾，可見編者以「倭奴國」為「倭之奴國」。星野博士謂：「極南界為女王國極北界之錯寫。」錯寫常有，但南北倒置難以想像。吾以為范曄（注：《後漢書》作者）實以倭奴國為倭國之極南界之奴國。自博士始，以「倭奴」為「怡土」，南字成問題，不明范曄而攻擊之。余以諸君以「極南界」為范曄之誤解，蓋因金印出土之處為恬土附近。菅氏以「極南界」為耶馬壹。此與松下見林以倭處極南界相似。

《後漢書》之〈本紀〉之注曰：「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注：帶方為朝鮮）本文之「倭奴國王」，倭為位置，倭奴國為倭之中之奴國。若「倭奴」連讀成一國之名，則本文之註解無價值。《唐書》以「倭」與「倭奴」同，令人誤解。以「倭奴」為「倭」不合理，應作「倭之奴國」。倭為總稱及位置。

《唐書》撰者以「倭奴」與「倭」同，此古書之誤讀也。蓋「奴」有「奴隸」之意；古歧視日人為「倭人」，因此誤用「倭奴」形容「倭人」。

《後漢書》之「倭奴國」與上述金印之「委奴國」相同，倭與委同。怡土說之論者亦以倭委相通，其舉證已多，此不再說。第一，印章之字體位往往有字畫之增減。第二，倭字原出委字，互通也。第三，倭寫作委之例甚多。伴信友曾舉此例，《日本書紀》繼體紀七年之本文曰：「穗積臣押山。」其〈百濟本紀〉有注曰：「委意斯移麻岐彌。」法隆寺所藏《法華經義疏》將「大倭國」寫作「大委國」。《醍醐地藏院》亦作「大委國」。《萬葉集》中「倭文」作「委文」。《和名抄》之〈鄉名〉亦以「倭文」作「委文」。《日本書紀》列任那有四邑：多多羅、須奈羅、委陀及發鬼。其中委陀亦寫作倭陀。繼體廿三年及推古紀八年書「委陀」，敏達紀四年書「和陀」。可見「委」「倭」通用，「倭」「和」又通用，「委」「和」亦通用。可見金印之「委」字與「倭」字同。



此外，「委奴」之音不可同時為いと或いど。首先，「倭」之音烏禾反切為わ，與委同。有人謂「委」之本音於為反切為み。怡土作いと與此不同。《魏志》之「伊都」為「怡土」之正音。委伊兩音之相異顯著，外人於我方言強調其別。近來我邦み音殆亡，無人區別み及い。支那極重開合之發音，此實支那語之性質所在。不明此區別，言語無法相通。《魏志》不會用「伊都」作「怡土」。「委」字與「怡土」之い音不合。其次，「奴」字與と或ど均不合。其帶鼻音ね或の。其韻之變化可作ね、の及な，唯其起音不變。猶「倭」字之韻變不同，可作わ及み，唯其起音不變。「奴」讀ど者，忘支那之原音。《魏志》之〈倭人傳〉以「奴」為國名以外之意甚多，用法有「卑奴母離」、「奴佳鞮」、「狗奴國」及其它奴國等。本居宣長為了附會地名，將奴讀な或の。菅氏以「奴國」、「卑奴母離」等以「奴」均讀な，唯「倭奴」時，「奴」讀ど，究竟何解？故「委奴國」應讀「わのなのくに」。「委奴」與「怡土郡」及「怡土鄉」無關，實指金印出土近鄰之奴國即儼縣。金印出土之地即古之奴國國境。究竟志賀島何有奴國王墳墓則有待判定。

從這篇精鍊博學的論文中，三宅宣稱已徹底解決圍繞金印五字的謎團。他指出土地與印文相連，如其結論所提示般，使討論邁向新方向。當代讀者對此文基於歷史、地理、語言及考古學的精簡論點應該能夠理解。所有不同的讀法被破解，學者們建立新的信念，這是在革命性新論出現時常見的現象。

#### 四、三宅的新典範

三宅米吉何許人也？他是博學歷史及考古學學者，出身和歌山藩武士長男。在慶應私塾(慶應大學前身)學習六年後，在千葉執教，其學生包括後來成為東京帝國大學東亞研究巨匠的白鳥庫吉(1865-

1942)。從1886年至1888年，他在美國及英國遊學兩載後返日，成為出版社金港堂的編輯及雜誌《文》的主編。1895年他與下村三四吉創立日本考古學會並在1901年成為會長。大正年間所獲高職與獎項不斷，在逝世之年，即1929年，他被委任為東京文理科大學(現為筑波大學)首任校長。從以上譯文得知三宅擅長用跨學科角度研究歷史，為明治及大正日本建立了健全的歷史方法論。他在上述論文中不引《論語》或《日本書紀》。即使他引古籍也是因其史料價值而非依其半宗教的權威。古籍所述不一定就是真理，個人或道德價值與學術無關。知識世俗化的過程同時也在西方出現，學問漸漸擺脫基督教為首的宗教枷鎖。明治日本探索真理的手段是文字學。現今文字學在北美等英語世界被評為迂腐，其實它早期曾促進知識世俗化。

借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之概念，金印的最初典範由龜井南冥在1784年金印被發現數週後以其驚世文章〈金印辨〉所奠定。<sup>4</sup> 龜井此文承載了以後一個世紀所有爭論的元素，直至1892年三宅的論文才帶來典範轉移。三宅沒有抹去龜井的貢獻，正如愛因斯坦的 $E=mc^2$ 沒有將牛頓的 $f=ma$ 放進垃圾箱。以上兩例，都是後者在前者的基礎上將討論提升至新層次。

龜井及三宅對金印的論述具有有趣的相關點。龜井致力證明金印為真品，三宅反對19世紀中愛唱反調的松浦道輔(1801-1866)有關金印的觀點。三宅接納金印的真實性，因它與《後漢書》有關光武帝授印的記述相吻合。龜井將金印的「倭奴國」讀作やまとのくに。這種讀法不符合現代語言分析，但重點是龜井跟三宅一樣，明白印文中間的「奴」字並無貶意，以及「倭」同「委」不可讀作いと或いど。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都明白此中日關係文物的重要性。

三宅石破天驚的文章沒有即時改變學界對金印的看法，但其影響深遠。此文於1892年12月刊登，但論點要待數年後才為學界所接受。1893年，吉田東伍(1864-1918)在研究日韓朝代史的巨著中率先放棄對金印的舊說，而採三宅新論。<sup>5</sup> 不久久米邦武等人亦紛紛接



受三宅的看法。明治後期至大正年間，三宅的觀點已成學界主流。隨着1910年吉田東伍出版其多冊的史學辭典《大日本地名辭書》，「倭奴國」三字讀作わのなのくに已成定論。吉田確認了一些三宅的看法，例如「倭」、「委」相同，以及奴國即儼縣。<sup>6</sup>

不過舊有的聲音並沒有完全消失，1900年，多產的語言學家高橋龍雄(1868-1946)審視三宅米吉、星野恒及本居宣長等人的論說後，在其書中一短章介紹三宅的觀點。他的結論卻認為「奴」是在漢朝大中華世界觀中對鄰近小邦的貶稱。這正是龜井反對，但卻無法完全消除的看法。高橋認為「委奴」寫いど，是九州小國，非日本全土通稱。<sup>7</sup>這種觀點與三宅以「委奴」為わのなの读的讀法及奴為古日本當中小國的觀點相反。<sup>8</sup>

いと或いど論不會完全被わのな論所取代，但後者已是主流。1905年，當久米邦武在近七十高齡出版其古代日本史鉅著時，他勇於改正，完全接納三宅有關金印印文的觀點，包括以「奴」為古地名儼縣。久米對《後漢書》提出一些個人附帶看法並加以嘲笑，例如它以「奴」為處「極南界」反映中國人以為奴在樂浪郡之南端，故不可作正確的地理資訊看待。這沒有造成多大麻煩，因在久米以前已有人質疑為何「委」沒有「人」字邊。<sup>9</sup>其實久米曾不止一次對印文提出不同解釋，不應因此就批評其作為史家的學問，這恰恰反映了金印是具有爭議性的題目以及三宅觀點的得勝。

## 五、那珂通世的創見

那珂通世(1851-1908)雖從未在大學執教，但他是明治時代具有開拓性的重要史家，其《支那通史》是現代世界首部詳盡的中國通史。此著作漢文寫成，在中國也流通。著名學者羅振玉(1866-1940)為它寫序，感嘆這項工作竟完成於外國人之手。那珂也是首位將《蒙古秘史》從蒙古文翻譯為日文的人。<sup>10</sup>在其日本外交史的巨著

中，基於文獻，那珂對金印的討論，批評各家之言及提出自己詳盡的見解。真知灼見藏於大量引文中，例如他指出《後漢書》記載有關光武帝授金印及紫綬的年份分別是中元二年閏月及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讀者均以前者為後者之簡稱；沒有學者認為此處值得討論。那珂寫道：「此年號二年是光武帝執政的第33年及最後一年。二月光武卒。」<sup>11</sup>最後有趣的一句用細字體，雖無推論奴的使節在首都出席皇室葬禮。可惜史書對此並無記錄留下。

那珂擅於運用《後漢書》及《魏志》的不同段落，在舊題材中尋找新視角。現今電腦的尋找功能令這種事情較容易進行，但在那珂的時代，這非博聞強記不能勝任。對「委奴國王」的分析，他部分像龜井南冥，部分像16年前的三宅米吉，他靈巧地否定「奴」有貶意及指出它是倭的附屬國，否定「委奴」代表全日本。史料有關金印出土之地記作力才ノ濱及叶崎，他引地方志證明是指同一地方，這個有趣的看法至今仍存疑。那珂從地理學多於語言學的角度，不同意前人將「委奴」讀作いと的看法。他引經據典證明「倭」與「委」同。跟三宅一樣，他從中國及日本典籍找出了證據。<sup>12</sup>

落合直澄(1840-1891)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國學家，他在1888年，即三宅發表其論文前四年，已指出《後漢書》的「倭奴國」是指倭之奴國，以及此正是《魏志》的奴國。他甚至引用《日本書紀》證明該地是指儼縣。<sup>13</sup>

那珂同意三宅，他又搜集資料證明金印的「委」與「倭」同。他補充一要點，就是儼縣在古代日本不是小國，只是被地方豪族控制，仍未被納入倭帝國的版圖。不過從漢帝國來看，不論大國、小國，甚至部落均稱「國」，而其統治者為「王」，因此金印有「國王」印文。對於不確定的地方豪族，那珂估計可能是志賀島安曇家的祖先。安曇家至今仍是島上望族。那珂引一些文獻作為佐証，但無法確定。該島泥土肥沃，沿岸魚產豐盛，可支持《魏志》所記載的二萬餘戶。那珂推測，因為近海及富裕，奴國人擅於航海，故能赴漢從事海上貿易。<sup>14</sup>



## 六、小結

自金印於1784年出土後，引起跨世紀的學術爭論。這場爭論的核心涉及金印在日本文化史的重要性及信史前日本人的身份認同。1892年極其優秀的年青歷史學者三宅米吉揭開金印之謎，讓我們瞭解上古日本人的身份認同。三宅的重要性在其應用最新的歷史文字學方法替古舊的爭議打開新局面。這嶄新的史學方法帶來日本學術界的革命。人們不可再訴諸儒家或神道經典作為防衛。學界接受三宅的新史學帶來的新觀念，連對金印曾抱固有看法的學者亦紛紛接受三宅的論點。

大正初年有關金印的研究甚多，1913至1916年之間，一共出現18篇直接或間接與金印有關的文章。昭和初期相關研究減少，直至1950年代中期再達另一高峰。1955及1956年各有六本書/文章論及。1960年代又是另一盛世，有關研究穩定地出現。這個題目仍吸引着日本人，他們希望明白如何定義日本人。從江戶時代到戰前實証主義時代，再到對戰前一切重新評價的戰後，這個古老問題仍在不斷變化中。在新論推翻歷史分析的過程中，金印回到舞台中央。

(吳偉明譯)

- 1 《史學雜誌》3.37(1892年12月), 頁874-881。
- 2 〈漢籍倭人考(上)〉,《史學雜誌》3:27(1892年2月), 頁138-148。
- 3 《史學雜誌》3.30(1892年5月)。
- 4 收錄在《龜井南冥·昭陽全集》1:3(福岡:葦書房,1978), 頁60-68。
- 5 吉田東伍著:《日韓古史斷》(東京:富山房,1893), 頁128-129。
- 6 吉田東伍著:《大日本地名辭書》(東京:富山房,1910,1972重印), 冊4, 頁156。
- 7 高橋龍雄著:《大日本国号考》(東京:同文館,1900), 頁19-23;也參山田義久著:〈「漢委奴国王」金印の読み方について〉,《古代史の海》38(2004年10月), 頁66。

- 8 即使遲至1968年，日本古代史學者三木太郎(1933-)研究《後漢書》及《魏志》後宣稱「倭」「委」不相同，而委奴應讀作いと。他數年後又提出在志賀島發現的金印非《後漢書》所提的金印，而是怡土在公元57至107年之間或公元二世紀中葉遣漢使團所獲的不記於史籍的金印。三木所提並非革命性看法。受三宅文章的影響，戰後日本將「委奴國」讀作いとのくに的看法不斷減少。參三木太郎著：〈「後漢書」記載の倭漢交渉記事について〉，《歷史教育》16:4(1968年4月)，頁94-95；〈「漢委奴国王」印について〉《日本歷史》297(1973年2月)，頁120-127。此論令人想起古典研究的一個笑話，有人謂《伊利亞特》(*Iliad*)及《奧德賽》(*Odyssey*)不是希臘詩人荷馬(Homer)所寫，而是出於另一同名之人。
- 9 久米邦武著：《日本古代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05)，頁380-382。
- 10 參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東京：中央堂，1888-1890)及三宅米吉〈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君伝〉，《那珂通世遺書》(東京：大日本圖書，1915)，頁27。那珂的蒙古史出版作《成吉思汗實錄》(東京：筑摩書房，1943)。
- 11 那珂通世著：《外交繹史》，見《那珂通世遺書》，頁283。
- 12 同上，頁284-288。
- 13 落合直澄著：《帝國紀年私案》(東京：飯島誠，1888)，頁6。
- 14 那珂通世著：《外交繹史》，見《那珂通世遺書》，頁291，293-296。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從戰後中國電影中的日本人形象 看戰爭與和解\*

◆ 祖運輝 ◆

## 一、導論

隨著經歷戰爭的老一代逐漸步入歷史，沒有直接經歷戰爭的年輕一代中國人對於戰爭的看法難免發生變化。中國人今天從傳媒、留學、旅遊、消費和工作上所接觸到的日本，與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肯定有很大的距離。過去30年，在中國內地，尤其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人們對日本的觀感的確起了變化。1978年改革開放的一個結果是日本流行文化的流入，內地民衆接觸到青春純情歌手山口百惠，電視連續劇《姿三四郎》和《阿信》那樣的「健康」日本娛樂文化。<sup>1</sup>日本的軟硬產品均大量湧入中國市場，雖然民衆對日本的態度仍然有保留的地方，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接受日本的流行文化產品。<sup>2</sup>追捧日本流行文化的「哈日族」現象，從臺灣傳到香港再傳到內地，就是中國人社會普遍開始接受戰後日本的佐證。<sup>3</sup>這種既恨又愛的矛盾心態在流行文化以外的領域也可以發現。一項消費者意識調查顯示，內地主要城市的消費者一方面對日本有不好的感覺，另一方面卻欣賞日本製品的品質。<sup>4</sup>總的來說，內地人民對日本的觀感有兩極分化的現



象：一方面有老一輩對日本的反感，有對日本文化侵略的憂慮，也有憤青的反日言行；另一方面又有對日本的嚮往和對日本產品的愛好。本研究從戰後中國拍攝的中日戰爭電影探索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意識變化，反映當今銳變中的中國在文藝領域的思想突破及中國人尋找人類共同性的身份認同。

## 二、中國電影的中日戰爭敘述

中國電影的中日戰爭敘述在過去 60 年間所發生的變化，是中國社會對日本的觀感的變化的一個層面，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本文主張中日戰爭電影的敘述經過三個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以「鬼子」為敘述中心比喻，第二個階段以「中日家庭」為敘述中心比喻，第三個階段以「危機中的個人」為敘述的中心比喻。<sup>5</sup>

第一個階段從 1949 年起到 1977 年為止。這個時期的中日戰爭電影所表現的是一個黑白分明，正邪不兩立，正義一方必勝的世界。在這個道德二元化的世界裏，中國抗日英雄和日本鬼子（以及他的漢奸幫兇）是處於完全敵對的關係。這是「典型社會主義抗日戰爭敘述」，在這個典型敘述裏的英雄是完美的聖人，而跟他對頭的鬼子則是徹底的壞蛋，兩種角色是完全對立的。第二個階段從 1978 年起到 1999 年為止。中國電影在這時期的重大發展是第五代導演的出現和他們的作品在國際影壇上取得的成就。<sup>6</sup>可是中日戰爭電影敘述的第二階段的變化卻與第五代導演沒有太大直接關係。「中日家庭」的中心比喻的出現，主要是反映了國際形勢的變化，也就是在中日關係正常化（1971）和友好化（1978）的基礎上，兩國政府決定加強經貿關係和文化交流的新時代。中日家庭的比喻借用中日家庭成員戰時遭遇的苦難和戰後團圓的經驗，來強調兩國人民必須克服戰爭的包袱，創造美好將來的政治信息。可是中日家庭的比喻無法取代鬼子的地位，它頂多不過是一個弱小的聲音，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雜音。

第三個階段從2000年起到現在。這時期裏出現的新的比喻是「危機中的個人」。採納這個比喻的戰爭敘述不再塑造聖人一般的抗日英雄，同時它所塑造的日本角色也不一定都是十惡不赦的鬼子。中國人的角色有內心的掙扎，部分日本人的角色也有內心的矛盾，結果是正邪之間出現了曖昧，黑白之間出現了灰色。二元化的道德世界的消失，正是第三階段中日戰爭敘述的最大特色。

### 三、第一階段：鬼子

日本鬼子是古典社會主義抗日戰鬥電影敘述的中心比喻，可以說完全支配1950年代到1970年代內地製作的所有抗戰電影。雖然在21世紀初期的今天，鬼子已經不再是敘述中日戰爭的唯一比喻，這個形象繼續在中國人社會廣泛流傳，深入人心。本節分析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戰爭電影如何利用鬼子的形象表現正邪對立，宣揚民族主義，建立共產黨的威信。這些電影刻意塑造無垢的抗日共產黨英雄男女，為黨員的光明、智慧、正直和勇氣的形象，與鬼子的殘暴、貪婪和愚昧的醜態營造強烈的對比。電影裏的抗日群眾跟黨員一樣，是完全正面的人物。他們對共產主義有絕對的信心，在黨的領導下完全忠心，在抗日的鬥爭過程中表現非凡的智慧與活力。反過來，鬼子和他們的爪牙卻雖然殘忍貪婪，但最終是脆弱的。以下我們分析五部電影來說明鬼子比喻的功能。

《平原遊擊隊》(1955)設在1943年的華北，故事的開端是日軍準備攻擊八路軍某處山裏的基地。為了擾亂敵人的行動，共產黨員李向陽和他率領的遊擊隊奉命攻擊松井指揮的日本軍和支援他們的偽軍。李向陽的另外一個任務是到村裏打糧以補給山上的抗日基地。正當李向陽和一些同志在李家莊的愛國農民家裏計劃秘密行動時，莊裏富戶向日軍告密，以致大批日軍和偽軍迅速掩至。李和同志們鑽進地洞躲避。日軍因為找不到抗日分子，就遷怒於村民。為了



分散敵人的注意，遊擊隊攻擊偽軍陣地，又攔截日軍運送軍火的火車，迫使松井帶兵回頭營救。在最後決戰的關頭，遊擊隊一方面進城爆破日軍軍火庫，另一方面把日軍主力引進村裏一舉消滅。

《鐵路遊擊隊》(1956)描述共產黨遊擊隊劉隊長和李政委如何在日軍佔領的山東破壞日軍鐵路運輸，擾亂日軍對山區抗日根據地發動的掃蕩。起初劉和李領導的游擊隊成功偷襲日軍火車，奪得大批軍火。可是後來劉被敵人槍傷，需要寡婦芳林的照顧。同時，在另外一次的行動中，劉率領遊擊隊與敵人正面衝突，結果寡不勝眾，加上火力不夠，被迫匆忙撤退，還讓李政委受了重傷，必須送到山裏治療。劉只好帶領遊擊隊撤退到湖上的一個小島躲避敵人。不過日軍聯合偽軍大舉圍剿，又俘獲為遊擊隊傳送消息的寡婦芳林。在情況危急萬分的關頭，李隊長和游擊隊員英勇作戰，結果扭轉局勢，打退日軍，還救出被俘的芳林。

《地雷戰》(1962)的故事發生在日軍佔領的華北膠東地區。共產黨民兵隊長趙虎學會製造地雷以後，回到家鄉趙家莊組織抗日。趙動員莊裏男女老少，一起研製各種地雷，在莊裏莊外埋下多處陷阱，一再阻擋敵人入侵。最後日軍空巢而出，用俘獲的村民作人肉擋箭牌，又動員偽軍作前鋒，向趙家莊發動總攻擊。不過村民已經巧妙鋪設了各種地雷，加上民兵從山上左右交叉射擊，把敵軍打得落花流水。

《地道戰》(1965)敘述日軍對冀中的一處抗日基地發動掃蕩時，高家莊的共產黨民兵如何挖地道對抗。起初村民挖的地道非常簡陋，後來村民在學習毛澤東思想後，採用新的地道設計，有通風口、水溝、隱蔽的槍眼和通往村裏村外的多個出口。當日軍再次連同偽軍進攻村莊時，民兵便與敵人展開一場生死鬥。結果依靠地道的優勢，村民殲滅了敵人。

《沙家浜》(1974)根據同名的革命京劇拍成電影，因此保留了很多舞臺舞蹈的成分。故事開始時，一批受傷的新四軍隊員來到陽澄

湖邊的沙家浜休養，得到地下女黨員阿慶嫂的接應和愛國村民的歡迎。可是當地軍閥胡傳魁在曾經留學日本的參謀刁德一的慫恿下，決定投靠日軍，跟侵略者合作圍剿抗日共產黨戰士。弱勢的抗日部隊雖然一時被困，情況危急，但在阿慶嫂的幫助下，克服了軍火和物資短缺的問題，英勇地夜襲敵營，把日軍和偽軍的頭領一網打盡。

以上五部電影都是抗日戰鬥電影的典型，它裏面的鬼子都是沒有絲毫人性的。他們的主要功能有二：第一是壓迫中國人以激發觀眾的愛國情緒；第二是面臨被抗日勢力徹底消滅的命運，以滿足觀眾的復仇心理。共產黨員不會向鬼子進行思想教育，愛國的群眾也堅決不要跟他們來往。值得注意的是鬼子的造型不單止是邪惡的，他往往還是矮小和笨拙的。相對之下，抗日英雄都是高大英俊、聰明伶俐、對黨忠心、對人民熱情的模範。在兩者對抗的場合裏，鬼子都顯得無能和愚蠢，被抗日分子玩弄於掌中，最後無可避免的落得悲慘的下場。直到今天，鬼子仍然是中國戰爭電影裏的主流形象，例如《犬王》(1993)和《舉起手來》(2005)都繼承了這個傳統。

#### 四、第二階段：中日家庭

1976年文革結束及1978年改革開放的結果，導演可以較自由地探討中日戰爭的意義。同時，中日關係打開新的一頁，中國調整對中日戰爭的詮釋。中國電影不得不為抗日戰爭尋找一個新的比喻，以配合國內外的新動向。本節分析的五部電影，即《櫻サクラ》(1979)、《玉色蝴蝶》(1980)、《一盤沒有下完的棋》(1982)、《清涼寺的鐘聲》(1992)和《秋雨》(2004)，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強調中日非戰鬥人民所遭受的戰爭殘害，並且特意描述戰後雙方人民如何達成和解。為了突出中日人民之間堅韌的友誼，這些電影都採用「中日家庭」的比喻來敘述兩國之間的關係。所謂「中日家庭」，是指一個包括有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家庭；具體地說，有中日夫婦組成



的家庭，也有中國養父母和日本養子女所組成的家庭。這個比喻的主要含義是家庭可以經過很多艱難，有誤會，爭執和分離，但是家庭成員始終是要和解和團圓的，而中日兩國的關係也當如此。

《櫻サクラ》的故事顯示它有兩個目的，一個是治療中日兩國之間因為戰爭而造成的「外傷」，另外一個是治療國內因為文革而造成的「內傷」。故事是這樣的：1975年，工程師陳建華從下放的鄉下被調回城裏參加一項中日合作工程項目，成為日本女專家森下的翻譯。森下來中國除了為了工作，還有個人的理由。原來她是一位戰爭孤兒，日本投降後她被一位中國農民婦女收養，到十多歲才回去日本。她回國以後一直與養母音訊不通，這一次借工作的機會，來中國打聽養母的消息。陳在翻譯的過程中意識到森下要找的正是他的母親，而森下本人就是他童年記憶裏的大姐。不過當時陳因為擔心惹來政治麻煩，不敢馬上相認，以致森下空手回國。後來，森下再次訪問中國，那時候文革已經結束，政治氣候有所改善，她因此能夠順利與養母相見。會面時森下在養母面前跪下感謝養育之恩，她的兒子也跟中國的祖母相認，又跟陳的小女兒成為好朋友。

《玉色蝴蝶》敘述日本生物學家長念中子來中國替她母親尋找一種珍貴的翡翠蝴蝶的經過。起初，中國方面接待她的人告訴她應該去找昆蟲學專家秋桐教授，但是為她翻譯的望東不願意合作。後來她雖然跟秋桐教授聯繫上了，但是對方回絕不見。長念中子不得要領，只好回國。不過，她跟母親報告經過之後，她母親堅決要親自來中國一趟。於是母女兩人，加上長念中子的日本丈夫和小女兒，一家四口再次來到中國，要和秋桐教授見面。秋桐教授雖然知道長念中子的母親是他多年離散的日本妻子，但是因為誤會她已經改嫁他人，所以不願相認。最後，在一次尋找翡翠蝴蝶的旅途上，雙方終於消除誤會，老夫婦相認，望東和中子重敘兄妹之情，兩邊的第三代也成為好朋友。一個長期離散的中日大家庭因此得以團圓。

《一盤沒有下完的棋》由中日兩國導演和演員聯合製作，這個

安排明顯是要反映中日兩國新的友好合作關係。故事由戰前中日圍棋高手關義山和松波的一場友誼賽開始。比賽雖然因事中斷，但兩人成為莫逆之交，松波甚至堅持要收關的兒子為徒，帶他到日本受訓。關的兒子東渡以後戰爭爆發，兩個家庭音訊中斷。戰爭時期，關家流離失所，後來關的妻女更被日軍殺害，使他變成刁然一身。勝利以後，被戰火剝奪一切的關抱著跟兒子團圓的一線希望趕到日本。可是他不但聯絡不上松波，更加發現兒子已經被殺。悲痛之餘，關回到中國以後就完全放棄圍棋。文革以後，中日兩國恢復文化交流，日本圍棋團訪問中國，團員裏竟然包括松波。同時，關的舊友勸他復出棋壇，代表國家跟日方交流，可是關堅決不要參加，以自己棋業已經荒廢為由，更加不願意跟仇人松波見面。不過松波硬是找上門來，兩人在關的家裏見面。松波在激動又傷感的情況下，向關解釋他兒子是被日本憲兵所殺。松波跪下痛哭，請求關的原諒。關起初不肯接受松波的道歉，但是在松波的妹妹的解釋下，關的態度慢慢軟化，原來他的兒子生前跟松波的女兒結婚生有一個女兒。這時候，關的一半中國人一半日本人的孫女走到他面前與他相認。關和松波的友誼和誤會，加上兩個家庭的生離死別，正好比照中日兩國從和平走向戰爭，從戰爭再走到和平的過程。這部電影的歷史信息和政治意圖是再明顯不過的。

《清涼寺的鐘聲》是紀念中日建交20週年的製作，它也採納中日家庭的比喻來詮釋中日戰爭的歷史意義。它的故事是這樣的：狗兒是日本孤兒，在日本打敗仗的時候，他的母親不得不把他交託給一名中國農民婦女撫養。狗兒的養母雖然貧窮，但她讓狗兒在一個溫馨的環境成長。狗兒後來出家，成為明淨法師，並且代表中國佛教界到日本參加中日佛教交流活動。狗兒的生母在日本偶然從媒體知道這項交流的消息，認出明淨法師是她遺留在中國的兒子。經過一番折騰，母子終於見面。母親邀請兒子到家裏，為兒子做飯，向他講述他過世的父親的事情，又向他道歉，最後更加請求他留在日本，回



家跟生母同住。但是明淨法師雖然感動，卻拒絕母親的好意，不要留在日本，堅持中國才是他的家。因此，經過一天的團圓，明淨法師就告別母親。不過他邀請母親日後到中國弔念他的養母恩人。

比較最初的三部同類型電影，《清涼寺的鐘聲》具有一定的特色。首先，它沒有大團圓的結局，反而以再次分離來結束。而且整部電影的氣氛從頭到尾都非常凝重。這部電影似乎一再向觀眾傳達一個信息，就是中國人必須像明淨法師那樣拒絕日本的物質誘惑，堅持自己做為中國人的身份和尊嚴，不要忘記回國回家的道德責任。它好像是要強調中日建交經過20年，兩國在交流上必須有節制，中國人不應該忘記自己的根，而過分嚮往或者認同日本。出現在1990年代初期，這部電影很明顯的是對當時的中國留日熱潮作出評論。

以上四部電影裏的中日家庭有兩類，一類是以中國養父母和日本養子女所組成的，另外一類是以中日夫婦為中心的中日大家庭。無論哪一類，這個比喻的基本目的是強調中日兩國的一般人民同樣是戰爭的受害者，因此戰後兩國人民應該互相理解、原諒和追求和平，就像分散的家庭成員應該珍惜再次團圓的機會。與採納鬼子為中心比喻的古典抗日戰鬥電影相比，以中日家庭為中心比喻的戰爭電影可以說是通過「血緣」而不是通過「血腥」來詮釋中日戰爭。血緣的比喻允許中日雙方達成和解，血腥的比喻卻只能容許報仇和勝利。

中日家庭戰爭電影和古典抗日戰鬥電影還有其他的差別。第一，中日家庭戰爭電影的主要描述對象從戰鬥和軍隊轉移到非戰鬥人員的一般人民，尤其強調後者因戰火而遭受的災難。因此電影裏的中國人主角不是共產黨員或者英勇抗日的民兵，而日本人的主角也不是狂熱的軍國主義者，而是普通日本人民，尤其是婦女和兒童。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同樣在日本軍隊的欺凌下受苦。第二，中日家庭戰爭電影直接傳達中國政府關於中日關係的新立場，主張日本雖然對中國進行了一場大型的侵略戰爭，兩國戰後的和解不單止是一個可能性，更加是必須的，唯一條件是日本必須懺悔道歉。

中日家庭戰爭電影雖然傳達了和解的信息，它並沒有挑戰古典抗日戰鬥電影的中心比喻和它的二元化的道德世界。鬼子在中日家庭戰爭電影裏雖然不是主角，有時候甚至連配角也不是，根本沒有出場的機會，可是鬼子的所作所為，毫無疑問是導致中日家庭悲劇的直接原因。因此，我們可以說中日家庭戰爭電影雖然不直接描寫鬼子的罪行，它的歷史敘述卻是在鬼子的前提之下展開的。

以中日家庭為中心比喻的戰爭電影雖然反映197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對日本的一種感情，它很快就因為時代的變化而顯得過時。被戰爭分裂的中日家庭的問題，到了1990年代已經大致解決。而且，跟過去比較，中日兩國人民已經可以自由接觸，不像以前那樣一定要通過官方渠道，打著交流合作的招牌才能進行。

在這個新的社會脈絡裏，《秋雨》這部電影試圖為中日家庭這個比喻賦予一層新的意義。在這部電影裏，中日家庭變成中日情侶，而他們所遭遇的試煉不是戰火，而是戰爭的遺產。故事是這樣的：年輕的日本女性梶子抱著一腔熱情來到北京要向何師父學習京劇，但是何師父起初不願意教她。後來，經過梶子的多番請求，何師傅把她介紹到自己的女弟子那裏學習。不久之後，梶子愛上了何師父的兒子何明。何明討厭京劇，不肯繼承家業，弄到父子關係決裂。不過，梶子對京劇的熱愛使何明的態度慢慢轉變，重新對京劇產生興趣，並且答應跟梶子合作演出歷史劇《四郎探母》。正當兩人的感情迅速發展，何家父子關係好轉的時候，梶子的祖父突然向何師父承認他打仗的時候在中國犯下重大的罪行，解釋他之所以送梶子到何師父那裏學習京劇，是為了贖罪。原來梶子的祖父在中國不單止吃過人肉餃子，也是下令槍殺何師父父親的日本軍官。這個駭人的消息無可避免地破壞了梶子與何家的關係，讓戰爭歷史的黑影籠罩在年輕一代的情人身上。不過電影還是提供了美好的結局。梶子與何家達成和解，一對中日情人按照計劃成功演出《四郎探母》的歷史劇。兩人在劇中的夫婦關係，正好反映兩人在台下的情侶關係。何



師父對梔子宣稱他能夠原諒，但是決不會忘記日本人侵略行為的一番話，道出中國人對戰爭的歷史和中日關係的將來的態度。同時，何明和梔子的愛情關係反映21世紀中日關係的一種樂觀的看法：年輕人的戀愛不應該被過去破壞，而應該繼續發展，結出新的中日交流的果子。

## 五、第三階段：危機中的個人

相對於古典抗日戰鬥電影和中日家庭戰爭電影裏的清楚的道德世界，1990年代以來，少數中日戰爭電影刻意營造一個曖昧的、矛盾的、不穩定的道德世界，對傳統中日戰爭敘述提出大膽的質疑。本節討論三部作品，第一部《紫蝴蝶》(2003)故事圍繞著一名中國女性和一名日本男性的關係，探討他們的個人關係如何因為兩國關係的惡化而發生變化。第二部《鬼子來了》(2000)通過一群生活在日本佔領下的中國農民的思想與行動來挑戰古典抗日愛國神話。第三部《南京！南京！》(2008)通過描述一個日本兵的內心道德掙扎來為中日戰爭做出新的詮釋。《鬼子來了》和《南京！南京！》是中國電影到今天為止對中日戰爭做出最大膽的重新詮釋的作品，它們試探了中國官方和人民對非傳統戰爭歷史敘述的容忍度。

《紫蝴蝶》的設定為1928年的中國東北。在這個日本帝國的半殖民地，中國女學生辛夏與日本年輕人伊丹是一對情人，關係密切。不久伊丹回國，兩人的關係中斷。後來辛夏的哥哥因為進行反日活動被日本極端分子在光天化日下刺殺，辛夏剛好親眼目睹一切。幾年後辛夏化名丁慧，以抗日特工的身份在上海出現，同時伊丹也被日本政府派到上海擔任情報工作。辛夏隸屬的小組的任務是要刺殺伊丹的上司山本。因此辛夏和伊丹重新見面，不過這一次他們的關係已經不是舊情人那麼簡單。兩人一面重拾舊情，一面執行各自的任務，策劃打擊對方的組織。經過一番鬥智和感情上的掙扎，電影

進入高潮：伊丹邀請辛夏到日本俱樂部跳舞，同時派同黨把辛夏的組織成員殲滅。但是伊丹也沒有完全得勝，因為一名不屬於任何一方的年輕男士突然闖進舞廳，開槍殺死伊丹，同時槍傷辛夏。隨著辛夏的意識逐漸模糊，電影的畫面回到她跟自己所屬的特工小組組長的親熱場面。

依照導演婁燁的說法，這部在第56屆康城電影節唯一獲得提名的中國電影是「充滿曖昧的」。《紫蝴蝶》將愛情故事、間諜故事和抗日故事扭纏在一起，的確搞亂不少既有的界線，打破了傳統的抗日戰爭敘述模式。通過片中主角的身份的扭曲，情人和敵人糾纏不清的關係，個人感情和工作責任的矛盾，再加上長時間的沉默，意義晦澀的對白，灰暗的畫面，以及時空的跳躍和倒錯，使整部電影顯得非常曖昧難懂，讓觀眾無法得出一個簡單的信息。《紫蝴蝶》的畫面和故事的「不清不楚」正是它跟古典抗日戰鬥電影最大的差別所在。

女主角辛夏跟片中三個男人的愛情和肉體關係完全破壞了她作為傳統抗日女英雄的資格。按照內地的尺度，辛夏跟組織裏的上司，跟日本特工，還有跟萍水相逢的男士的親密關係，簡直是有損中國女性的尊嚴。她在東北的時候，雖然還是學生，已經跟日本青年伊丹發生關係，因而遭受她哥哥和他的反日同志的白眼。她的個人操守的偏差與她的小辮子和學生制服所表現的純情年輕感覺格格不入。這種矛盾一直貫通整部電影。在她成為女特工之後，她跟上司發生關係，後來她跟伊丹重拾舊情，但又同時跟一個陌生男人發生關係。

不過，辛夏不是這部電影裏唯一的「問題人物」。那位陌生男人和他的女朋友的角色挑戰了古典抗日戰鬥電影的全民抗日（除了漢奸以外）的大前提。這對摩登的上海情人對中日之間的衝突和部分上海市民的反日活動完全不感興趣，他們完全投入上海的物質生活，沉迷於平凡和苟安的小市民世界。後來女的被辛夏誤殺，男的被日本特工錯誤處去用刑，完全是一場誤會。男的在重獲自由以後，心中



燃燒的是復仇的欲望而不是愛國的情操。他最後成功槍殺伊丹，又槍傷了辛夏，是為枉死的女朋友報仇，不是為了國家民族，他到最後一直沒有經歷政治的醒覺。這種既不賣國也不愛國的模稜兩可的角色在古典抗日戰鬥電影裏是不存在的。

最後，伊丹的角色也一反傳統的鬼子形象。他在東北的時候是辛夏真心真意的男朋友；就是上海，他仍然愛著辛夏，雖然他知道辛夏和自己屬於敵對的組織。在兩人的一次幽會的時候，伊丹緬懷他們在東北的美好時光，而辛夏只是保持沉默。伊丹在策劃殲滅辛夏的同黨的同時，向上司請求安排辛夏到日本，顯然是要保護她，希望兩人將來能夠在一起生活。電影裏的另外一個場面暗示伊丹不是一個信奉軍國主義的人，因為他的父親是被極端分子迫害而自殺的。因此，伊丹這個角色的曖昧性跟辛夏的角色同樣濃厚。他不是狂熱的軍國主義者，但是他可以毫不猶豫地去執行血腥的任務；他愛他的中國女朋友，但是他也積極籌劃去擊敗她的組織。總而言之，伊丹無疑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一個兇手，但是他與刻板式的鬼子造型相差甚遠。

如果《紫蝴蝶》突破了古典抗日電影裏的敵我界限，《鬼子來了》便是在全面地挖苦和質疑古典抗日電影的中心形象和敘述手法。在2000年康城電影節得獎的這一部電影，描述一個貧苦的中國農民如何無辜又無奈地被捲進中日戰爭的暗流和殺戮中。它結合悲劇和鬧劇，抗日和媚日，愛國和自私，不名譽的勝利和無可彌補的個人損失，尖銳的挖苦和無情的批判了中國人關於抗日的自我美化宣傳。電影描述馬大三這個再平凡不過的農民的人生，如何被一連串偶發性的事件搞得麻煩百出，最後累人累己，弄到悲劇收場。話說一天晚上，突然有一個持槍的陌生人闖進馬大三的家，用槍指著他，命令他收下兩個包袱。馬以為他是抗日遊擊隊長，所以勉強收下包袱。可是所謂包袱原來是兩個俘虜，一個是日本兵，另外一個是日軍的翻譯。村民收藏日本俘虜當然是很危險的事情，要是給日本

軍隊發現，肯定會遭受嚴厲的報復，但是他們又不敢不聽從遊擊隊長命令。問題是，馬認定的遊擊隊長一直沒有要回他的包袱，經過多番折騰，缺乏糧食又疲於奔命的村民只好接受俘虜的建議，把他們送回部隊，詐稱是他們的救命恩人，反而向日軍討糧食。日軍指揮官起初很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交易，因為他已經向上級報告部下英勇戰死，如果現在說是被俘，而且是被中國農民救出，那是很不名譽的事情。不過因為部下跟村民有約在先，他為了維護日軍的聲譽，還是親自帶兵把糧食運到村裏，並與村民一塊吃喝慶祝。正當大家吃飽喝醉的時候，日軍突然開火，把村民殺得一個不留。馬剛好因為有事不在村裏，逃過一劫。勝利以後，日本兵都被關在國民黨軍隊管轄的集中營，馬為了替村民報仇，提刀闖進營裏手刃數名俘虜，但是最後被捕。國民黨指揮官高少校判馬殺人有罪，決定公開執行死刑。不過他宣稱中國人不能殺中國人，所以命令日本俘虜派出代表執行死刑。結果，日方派出的正好是遊擊隊長交給馬照顧的俘虜，於是兩人的命運顛倒，勝利的中國人反而被打敗仗的日本人殺死，而且這個中國人曾經照顧過奉命殺他頭的日本人。

《鬼子來了》裏面既沒有古典的抗日英雄，就連一個像辛夏那樣的有缺陷的英雄也沒有。所謂的遊擊隊長除了把俘虜丟在村裏，給村民製造麻煩以外，其實甚麼貢獻也沒有。他連自己丟下的包袱都沒有好好處理，更不用說跟日本人打仗。電影裏村民一再自問隊長是誰，就是重複提醒觀眾，對馬大三那樣的農民來說，抗日勢力根本不可靠。與此同時，典型的抗日人民也不存在。駐守村外山上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每次進村的時候，村民都高高興興地出來迎接，小孩子拍手要糖果，大人殷勤地為部隊打水。他們跟古典抗日戰鬥電影裏的愛國農民相差實在太遠。這些村民的唯一目的是保命，不是抗日。為了討好日本人，同時又不得罪遊擊隊，他們只好兩邊巴結，兩邊利用。而且他們內部也不團結，常常互相指責，互相傾軋，每個人最關心的是如何保護自己。最後，村民決定把俘虜送回



部隊，更加編造謊言邀功討糧，這樣的做法已經超過自保的界限，簡直就是通敵。總之，古典抗日電影裏的傳奇性的愛國民兵和群眾在《鬼子來了》裏連影子也沒有。相反的，它裏面有的是被迫在外在勢力的矛盾中求生，自私自利，互相猜忌的人民。對這些再平凡不過的農民來說，國家和主義只是抽象和無意義的觀念；在他們眼裏，只有食慾，物慾，性慾和求生慾才是實在的。

電影裏的日本兵的造型也跟古典抗日戰爭片裏的鬼子的形象不一樣。駐紮在村後山上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和村民保持一種勉強的平穩關係。軍隊進村時是以軍樂隊的形式出現，由貌似友善的隊長帶領，他跟典型的鬼子不一樣，進村後為歡迎的小孩玩魔術又給他們派糖果。後來，這些貌似無害的海軍陸戰隊與陸軍聯手屠殺村民，返回鬼子的本來面目。可是電影暗示海軍陸戰隊的指揮官是在酒精和陸軍的影響下才有這樣的瘋狂行為，跟殘酷成性的陸軍指揮官不一樣。同時，電影強調日本軍隊對自己人也不手下留情。被俘的日本兵回到部隊以後，不但沒有得到戰友的歡迎，反而遭受責備和虐待，因為同袍視他被俘為恥，他的長官寧願他戰死，也不願意接受他以俘虜身份回來。這一幕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對自己人是同樣的殘暴無情。總之，本片對部分日軍角色有較深入的描寫，在表現他們嗜殺的同時，也承認他們有喜怒哀樂的感情。他們雖然絕對稱不上是天使，但也不完全是鬼子。

即使是中國的勝利在本片裏也逃不過成為挖苦的對象，成為人民眼前的一場鬧劇。勝利不但沒有為主角馬大三帶來伸張正義的機會，反而為他造成殺身之禍。高少校一方面不追究日軍屠殺村民的罪行，另一方面卻要嚴懲馬大三殺死日本戰俘，判他死刑。《鬼子來了》因此帶出一連串棘手的問題，究竟誰是戰爭的真正受害者？誰是真正的愛國抗日戰士？誰有真正為戰爭受害者伸張過正義？抗戰的勝利理應屬於誰？

我們固然可以把《鬼子來了》當作一部反戰電影來看，但是我們

如果停留在這個廣義的層面的話，就會看不到電影裏更深層的歷史反省。<sup>7</sup>如果我們撇開國民黨和共產黨編造的抗日愛國歷史敘述不談，那麼《鬼子來了》的確只剩下一個籠統的反戰信息。可是，這部電影的諷刺和幽默，必須通過跟國共雙方愛國抗日的自我定位的反差，才能達到最大的效果。本片對共產黨的抗日活動隻字不提，對愛國愛黨人民的懷疑，讓日本兵生存而中國農民被殺的大結局，大概都是它成為問題電影，雖然獲得國際大獎，在內地卻無法在電影院上映的原因吧。

南京大屠殺在中國人的抗日戰爭記憶裏佔有特殊的地位，濃縮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極端的殘酷性和破壞性，是中國人戰爭受害的自我形象的最鮮明的象徵。<sup>8</sup>由第六代導演陸川執導的《南京！南京！》跟過去的抗日電影最大的分別在於它對一名日本兵的深入又「同情」的描寫。加上它對其他角色的細膩的描寫，它的事實的寫實性，以及它的戰鬥場面的臨場感，使《南京！南京！》在2009年San Sebastian電影節獲獎。陸川表示希望他的作品能夠喚起世人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可是中國觀眾對這部片的反應並不完全是正面的。大部分觀眾對電影描寫的日軍暴行感到憤怒，這是容易理解的；不過部分觀眾不同意電影以同情的手法塑造一名日本兵的角色，造成電影的爭議性。

電影從國民黨軍隊棄守南京，殘兵大量湧出城外逃生開始。在絕望和混亂中，順子、小豆和少數軍人不願意放棄，決定在荒廢的街巷裏繼續戰鬥下去。起初，他們成功伏擊了一個日軍小隊，不過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很快就被敵人的大軍擊破，結果只好混入難民潮裏。日軍攻下南京之後，投降的中國士兵和避難的市民遭到大量殺害，婦女則被迫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目睹如此血腥混亂的場面，日本兵角川感到困擾，嘗試節制其他士兵過分的暴力行為。他救出順子和小豆以後，就因不勝苦惱而舉槍自殺了。這部電影的一條副線是集中營裏的唐秘書和江老師。唐秘書的老闆拉貝利用自己



是德國人的身份，為營內難民的安全與日軍交涉，江老師則組織難民的自助救援行動。可是，唐秘書為了保護自己家人，竟然向日軍告密營內部分難民密藏軍火，導致日軍入營搜捕，廝殺凌虐無辜男女，禍及家人，連自己最後也難免一死。江老師則在面臨強暴之前，被角川及時槍殺，以死逃過凌辱。

本片最大的特色是角川的角色，這也是它最有爭議性的一點。陸川對角川的心理描寫之深是中國抗日電影前所未見的。角川是敵人，這點毫無疑問，但是他並不是一個刻板式的鬼子——那種嗜殺又好色的虐待狂，而是一個具有良心和道德判斷力的人。他跟其他日本兵不一樣，他試圖遵守國際法，有限度地使用武力，並且人道地對待非武裝人員。電影暗示角川的人性跟他的教育背景和對基督教的認識有關，而這個人性的基礎讓他能夠與江老師溝通。兩人之間的人性溝通將電影情節推向高潮，促使角川寧可槍殺江老師，也不要讓她遭受同胞的凌辱。為了給觀眾適當的心理準備，電影着意刻畫角川和其他日本兵的差別：鏡頭多次強調他迷惘和焦慮的表情，顯現戰爭對他個人所造成的精神壓力和痛苦。同時，電影也通過他與一名日本慰安婦的關係，表現他渴望人性慰藉的心理。他被塑造成一個沒有性經驗的純情青年，無知地向一個因患病而瀕臨死亡的軍妓示愛，最後只落得無限的失望。他的無知和幼稚跟其他到慰安所尋求發洩的日本兵形成強烈的對比。角川尋找精神安慰的努力落空，導致他選擇自我解脫之路。他在向自己腦袋開槍之前，向部下吐露心聲：「活著比死要難」。

這部電影的第二個特點是它對大屠殺的描寫賦予中國人一定程度的積極性，但同時也似乎為日軍提供部分脫罪的藉口。以往的南京大屠殺電影都注重描寫日軍的殘暴行為和中國平民的無辜被害，結果是在渲染日本軍兇殘的同時，難免顯示中國人的無能和懦弱。《南京！南京！》一反傳統，以中國殘兵餘勇冒死抵抗日軍進城開始，鮮明地表現中國人並不都是毫無骨氣、束手待斃的人。國民黨

政府雖然放棄首都，少數愛國軍民卻不甘示弱，自發繼續抗戰，他們悲劇性的英勇行為為中國人民挽回尊嚴。可是他們的游擊抵抗行為同時似乎意味着日軍進入南京的時候是進入戰鬥地區，而不是進入已經解除武裝、放棄抵抗的城市。結果，這個描述允許日本人辯稱他們的軍隊當時無法分辨戰鬥和非戰鬥人員，結果在草木皆兵的情況下，造成大量傷亡。很不幸地，這種說法正好是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士的主要論調之一。

《南京！南京！》的第三個特點是它的樂觀的結局。因為主題的特殊性，必然包括很多令人沮喪的場面，例如日軍用機關槍掃射無抵抗的人民，火燒難民營，凌虐婦女等，但是它的結局卻出人意外地充滿希望，甚至歡樂。順子和小豆得到角川釋放後，臉上慢慢露出笑容，步伐漸漸輕快起來，最後互相擁抱，又採來路邊的蒲公英，把種子吹散，欣賞新生命的繁衍。電影也通過唐秘書的遭遇再次強調生命生生不息的信息。唐秘書雖然向日軍告密，造成難民營內的屠殺，連自己部分家人也遇害，但是電影給了他贖罪的機會，讓他犧牲自己去營救他人，還讓他驕傲地向行刑的日本軍官聲稱他逃出生天的妻子已經懷孕了。唐家的男人雖然難逃一死，但是唐家的新一代很快又要呱呱墜地。相對之下，角川的自殺代表的是完全的失望和失敗。這部電影因此刻意從恐怖和死亡裏尋找希望的新苗，表現了中國人民雖然遭遇巨大災難，卻有能力恢復元氣，重新發展下去。

## 六、結論

古典抗日戰鬥電影的影響力雖然強大，但是新的聲音、形象和故事已經出現，挑戰着「日本鬼子」對「抗日英雄」的既定程式。隨著更多質疑古典抗日敘述的戰爭電影的製作和上映，它們的累積效果必然左右中日戰爭歷史的對話內容和方向。在2009年的階段，部分



中國戰爭電影已經達到20年前無法想像的層次，它們的主人翁不再是超人或完美的人，而是有缺陷、有苦惱的普通人。他們的感情不再是完全向著黨或國家，而是糾纏著個人恩怨和利害矛盾。此外，敵我雙方已經不一定是全面的對立：個人的立場可以超越國家的敵對，少數敵人甚至可以表現出良心和人性。

不過，任何對古典抗日歷史敘述的反省和挑戰都必定會遭遇抵抗，而且反對的聲音可以是尖銳和強烈的。《鬼子來了》導演姜文參觀日本靖國神社就引起中國輿論一輪批評。《南京！南京！》導演陸川也是一些愛國主義者的批評對象，不滿他描寫角川的同情手法。比如《中國青年報》網站的一篇影評，稱《南京！南京！》的藝術性是第一流，可是它的歷史性是第三流。<sup>9</sup>

可是，「鬼子來了」並非一個偶然或孤立的現象。例如北京作家余杰就在一篇近作裏發出同樣的疑問。<sup>10</sup>余基於他個人的基督教信仰，主張中國人應該無條件寬恕日本的侵略行為。他這個說法已經算是大膽創新的，但是他文章裏的另外一個觀點才是真正的尖銳。他將古典抗日戰爭敘述放在中國現代史的脈絡裏，通過與其他歷史敘述的比較，質疑它的正當性。他指出現代中國不乏政治製造的災難和被政治歪曲的歷史，日本的侵略戰爭既不是現代中國經歷的唯一災難，部分日本人對戰爭的看法也不是現代中國歷史被歪曲的唯一例子。余因此呼籲中國人在追究日本對戰爭歷史的態度的偏差的同時，必須面對自己篡改歷史的過去，承認和反省自己國家的政治曾經一再製造的重大錯誤，而且一再掩飾這些錯誤。余杰以文字所作的訴求，正是姜文以影像和聲音所表現的疑問。他們的共同的信息是，中國人在追求與日本人達成歷史共識與和解的同時，也必須對中國現代史達到共識與和解。戰後中國電影中的日本人形象的改變是否反映中國人對抗日戰爭的新認識？或是當代中國電影有較大的創作空間？也許兩者皆是。我們估計古典抗日戰爭敘述與新的戰爭敘述的競爭大概會在中國社會上與銀幕上繼續上演下去。

- 
- \* 本文是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Grant DP07 (07–09) 研究成果之一。
- 1 參劉文兵著：《中国10億人の日本映画熱愛史：高倉健、山口百恵からキムタク、アニメまで》(東京：集英社，2006)。
  - 2 Yoshiko Nakano, "Who Initiates a Global Flow? Japanese Popular Culture in Asia," *Visual Communication* (2000) 1:2, pp. 229–253.
  - 3 酒井亨著：《哈日族：なぜ日本が好きなのか》(東京：光文社，2004)。
  - 4 Jill Gabrielle Klein, Richard Ettenson, and Marlene D. Morris, "The Animosity Model of Foreign Product Purchase: An Empirical Te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8) 62:1, pp. 89–100.
  - 5 本文所設定的三個戰爭電影敘述的發展階段並不代表單線的發展，而是複線的發展。也就是說，第二階段裏同時有屬於第一和第二階段的戰爭電影，而第三階段裏則同時有第一、第二和第三階段的戰爭電影。
  - 6 Paul Clark, *Reinventing China: A Generation and Its Film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5), pp. 75–186.
  - 7 Stephen Holden, "Heroics, Horrors and Farce in War-Torn China," *New York Times*, 18 December 2002.
  - 8 Takashi Yoshida,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History and Memory in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9 楊禹著：〈『南京！』藝術觀一流，歷史觀三流〉《中國青年報》2009年4月28日。
  - 10 Yu Jie, "The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War, Chinese Patriotism and Free Speech. How Can We Forgive Japan?" Translated by Nanyan Guo, *Japan Focus*, Feb. 2008, article ID 2654, <http://www.japanfocus.org/-Yu-Jie/2654>.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日本流行文化改造中國三國歷史

❖ 吳偉明 ❖

## 一、前言

日本人擅於保存傳統，其茶道、花道、能劇及歌舞伎等文化均能傳承至今。<sup>1</sup> 甚至連不少在中國已失傳的習俗、藝術及典籍都在日本被保存下來。<sup>2</sup> 日人同時也非常懂得改造傳統，其當代文化產業將傳統文化推陳出新，開拓無限商機與創意。戰國歷史及德川「忠臣藏」可謂是日人永不厭倦的歷史題材，它們不斷在動畫、漫畫、遊戲、電視劇、電影及小說中獲得重生。<sup>3</sup> 除日本歷史外，日人亦將世界各地傳統加以改造。因中日兩地在歷史上接觸頻密、文化相近，日人對改造中國傳統尤為熱衷。中國的歷史、小說及民間傳說均成為當代日本流行文化的素材。中國四大名著亦不例外，其中以《三國演義》被改編的次數最多，影響最大。本文探討日人如何透過動畫、漫畫及遊戲改造中國的三國歷史及建立日式三國文化，它有助我們瞭解在文化全球化下，傳統與流行文化的互動、跨國文化互動、文化挪用及文化逆輸等重要課題。

## 二、改造傳統的爭議

現代人可否改造傳統？日人可否改造中國傳統？日人將中國三



國歷史改編成漫畫、動漫及遊戲是否恰當？這涉及改造傳統的爭議。支持、反對或中立意見並存，背後的意識形態壁壘分明。

中國人對日人改造中國傳統往往持負面態度，其意識形態來自文化原教旨主義(cultural fundamentalism)及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本用於宗教，其特色是強調教祖(如穆罕默德及耶穌)及聖典(如《可蘭經》及《聖經》)的絕對權威及正統性(orthodoxy)。文化原教旨主義在思想及藝術的範疇堅持經典及祖訓的絕對性，例如儒家的孔子、茶道的千利休及能劇的世阿彌的教導都被這派奉為絕對真理，強調後世只可忠誠恪守，切忌擅自更改。因此對此派而言，《三國志》及《三國演義》是三國的經典著作，日人違背此兩大經典的作品均是篡改。

文化民族主義從民族主義角度看跨文化互動，它關注本地文化遭外來文化破壞及反對外國人改造本地文化。這種思維在中國很有市場，對日人改造中國傳統尤為反感。日劇《西遊記》(富士電視台，2006)因將原著小說的人物造型及故事大翻新，被中國傳媒及網民痛罵其侮辱中國傳統。日本成人遊戲《紅樓館奴隸》(2006)因將妓院稱紅樓館及一妓女名林黛玉，被批評成玷污《紅樓夢》之作，批評者更要求日本生產商道歉及回收該遊戲。三國遊戲龍頭的日本光榮公司亦成內地作家及網民攻擊的對象。<sup>4</sup>中國遊戲商、學者、作家及網民的反對聲音日漸強大，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對光榮三國遊戲的註冊申請常加阻撓。<sup>5</sup>近年中、日、韓掀起文化遺產爭奪戰，中國輿論嚴厲批評韓、日向聯合國搶先註冊源自中國的文化為「非物質文明」。這些都是文化民族主義的表現。

對日人改造中國傳統持支持或中立的論點主要來自社會科學學者。中立派相信傳統重建論(invention of tradition)，認為現代人所謂的傳統其實不過是經後人「發明」(invented)的仿真品。這派學者指出現在日人所宣稱的傳統大多是明治以後的「再發明」，並非自古一脈相承的東西。<sup>6</sup>這一派對後人改造傳統態度比較消極及冷眼旁觀，

他們對保持及改造傳統並不熱衷，因為既不相信有真正的傳統可以歸依，亦同時指出創新的虛偽性質。他們諷刺中國人所堅持的三國傳統其實來自小說《三國演義》，並非真正的三國歷史。

支持派受典範轉移論( paradigm shift )及文化進化論( cultural evolution )的影響。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 )是孔恩( Thomas Kuhn )提出的概念，本用於分析科學上劃時代的革命，後來社會學家用之於形容社會及文化的變革。這一派認為文化經過不同年代推陳出新，累積而成，因此在傳統基礎上創新以建立新的傳統或典範是自然的文化過程。若用典範轉移來分析日本的三國文化，可得出其典範經過兩大轉移的看法。第一次典範轉移是從《三國志》到《三國演義》；第二次典範轉移是從《三國演義》到吉川英治( 1892-1962 )的《三國志》。上田望研究《三國演義》在日本的演變，發現它在德川、明治及昭和都有不同的形象。<sup>7</sup> 田中靖彥亦指出三國文化在中國亦曾經歷多次變化。<sup>8</sup>

文化進化論是存在已久的學說，它在不同年代以不同形式出現。早期社會學家( 例如 Auguste Comte 及 Herbert Spencer 等 ) 多支持「社會進化論」( social evolution )，戰後此論說以現代化論( modernization theory )及後工業社會論( theory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的形式出現。此派指出文化不斷往前進步，日趨成熟及複雜，長江後浪推前浪，因此不用美化過去。根據後工業社會論代表學者 Alvin Toffler 的「第三波論」( The Third Wave )，人類社會經歷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及資訊社會三大階段，各階段的文化模式相異。若我們以關公信仰為例加以分析，農業社會以拜祭及話劇為表述，工業社會生產關公像，而資訊社會消費關公遊戲。

日人改造中國歷史是否對中國不敬？從文化史的角度而言，這個問題的意義不大。將傳統及歷史改造成各式各樣的流行文化是各國自古以來一直進行的事情，中國及日本亦不例外，兩地的民間小說及話劇大都如此。日本本身的歷史較短，所以除本國的歷史外，



也喜歡改造中國歷史。這其實自然不過，不見得帶有不敬之意。相反地，這種「二次創作」可以視為日人對中國傳統的重視及致敬方式，日人改造三國並應從這個角度理解。假若日人認為改造傳統是不敬，他們大概不會將日本史也改編成漫畫、動畫及遊戲等流行文化形式。事實恰好相反，越受歡迎的日本歷史人物，被改造的機會越高，例如《少女義經傳》將日本中古大英雄源義經(1159-1189)轉性為美少女，《日出處天子》將日人最敬仰的古代政治家聖德太子(574-622)設定為同性戀，《戰國蘭斯》將戰國武將化身性感美少女等。

### 三、日式三國文化的特色

日人最熟悉及感興趣的中國歷史是三國，他們對《三國演義》有一種特別的情意結，因為三國武將的忠義、勇猛及謀略是日本武士的典範，它亦包含人生哲理及企業管理藝術。蜀國英雄的失敗正合日人崇拜有高尚情操敗者的心理。<sup>9</sup>單是《三國演義》的現代日語譯本便有二十多種。<sup>10</sup>當代日本與三國相關的專書逾兩百種。一些本與三國無關的作品也喜歡以「三國志」為名作為推銷噱頭。

根據《續日本紀》的記載，《三國志》在公元769年輸入日本，可是當初影響不大。自《三國演義》在南北朝傳入日本以來，三國歷史才開始普及。《太平記》中有不少借鑒《三國演義》的典故，其中多與諸葛亮相關。<sup>11</sup>代表正義但失敗的南朝，命運猶如蜀國。南朝名將新田義貞(1301-1338)的夢想是成為日本的孔明；「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楠木正成(1294-1336)被譽為是孔明般的人物。戰國時代的武將熟讀《三國演義》，並參考當中的兵法。據說織田信長(1534-1582)在長篠之戰(1575)參考周瑜打黃蓋的兵法。德川家康(1543-1616)在三方原之戰(1573)，曾用孔明的空城計騙過武田信玄(1521-1573)。《三國演義》在德川時代大熱，和譯本《通俗三國志》(湖南文山譯)於

1689年完成，是海外首個《三國演義》譯本。它被多次重印，其插畫版《繪本通俗三國志》也大賣。德川時代的歌舞伎、小說及繪畫均有以《三國演義》故事為主題的作品，例如瀧澤馬琴的《南總里見八犬傳》(1814-1842)便多處抄襲《三國演義》的情節。

三國在近代日本一直大受歡迎。內藤湖南(1866-1934)撰《諸葛武侯》(1897)，開日本孔明熱的先河。內藤旁徵博引，試圖重組諸葛亮的歷史真貌，包括其世系及少年成長史。明治末年久保天隨(1875-1937)將《三國演義》譯成近代日語，稱為《新譯演義三國志》(1911-1912)。吉川英治撰寫《三國志》(1939-1943)小說時便參考此譯本。三國文化在戰後被流行文化發揚光大。1950年代出現小川環樹(1910-1993)與立間祥介(1928-)的兩大優秀現代日語譯本。1980年代以來，《三國演義》與漫畫、動畫及遊戲結合，產生數十種與《三國演義》相關的作品，而且在內容、評價、人物設計等多方面都建立了日本的特色。<sup>12</sup>

中國的三國文化，一言以蔽之，是演義派。中國人重視的並非正史《三國志》，而是野史小說《三國演義》。《三國志》為西晉陳壽(233-297)所著，記述從董卓亂政到孫吳滅亡九十多年間的歷史。其態度比較中立，人物評價較客觀，不會神化人物，例如批評諸葛亮欠軍事才能及呂布有勇無謀，跟後世分別以他們為金牌軍師與戰神的形象不同。《三國演義》是明清四大名著之一，明人羅貫中(1315-1385)作。它加入大量野史及虛構故事，而且偏重蜀國。以蜀國名將趙雲為例，《三國志》只有245字記述他，《三國演義》卻成與劉、關、張及諸葛亮並列的蜀國代表人物。

中國的三國文化有以下特色：第一，重蜀。以蜀為正統，貶魏輕吳。三國歷史以蜀魏之爭為主線，吳只是配角。蜀的諸葛亮、關羽、劉備、張飛及趙雲成為中心人物。第二，重道德，正邪分明。蜀被描述為正義之師，光明正大。劉備忠厚、關羽義氣、張飛正直、諸葛亮忠心及趙雲神武。曹操、董卓及呂布等則成為大反派。



第三，重演義。以《三國演義》為依歸，不太接受憑空杜撰。立間祥介引述章學誠以《三國演義》為「七實三虛」的說法，並謂人們在「三虛」中尋找想像空間。<sup>13</sup>凡有違《三國演義》者，均被視作歪曲歷史。

中國與三國相關的戲曲、電視劇、電影、動畫及漫畫，基本上恪守上述三大特色。<sup>14</sup>這種對《三國演義》的執著，在流行文化的創作上可以是一種負累。以中日合作的動畫《關公》為例，2006年傳出中方出資，日方(小學館)負責人物設計的《關公》動畫計劃，即時引起中國傳媒及網民的嚴厲批評，他們擔心日人會將關公美少年化，甚至惡搞成女性，破壞關公在《三國演義》中紅顏長面美髯公的傳統形象，結果此計劃在壓力下胎死腹中。2010年內地電視劇《三國》亦因將關羽改為自殺及將武將美型化備受指責。

日人至今已將中國的三國歷史徹底本地化，據為己有。發展至今，日中的三國文化已是「小同大異」。日式三國文化勢力日盛，日本成為三國文化大國，跟原產地中國分庭抗禮。日式三國文化有何特色？日本的漫畫、動畫及遊戲如何改造三國文化？

第一，史觀較平衡。不像中國般以蜀為正統，以蜀魏之爭為主線，日本作品較公允，回復天下三分的局面。不少作品甚至以魏(如漫畫《蒼天航路》、《曹操孟德正傳》及遊戲《三國志曹操傳》、《曹孟德：改變時代的謀略》)或者吳(如動畫《鋼鐵三國志》、小說《吳·三國志》)為主線劇情。日人作品中的三國英雄豪傑都是正邪難分。劉備不再是完美的大好人，對曹操和呂布的評價也較正面。日人對三國領袖曹操、劉備及孫權都十分敬重，認為他們都是為蒼生，以統一天下為己任的大英雄，可比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及德川家康。

第二，採日式動漫風格。日本動漫人物設計多採美型，長髮、尖面、大眼，八頭身已是慣例。日式三國作品中的人物會變身美少年及美少女。以遊戲《真·三國無雙》系列為例，除了關羽及張飛的造型較忠於《三國演義》外，其餘多美型化。周瑜及趙雲成為長髮披

肩的美少年。蜀將姜維被「正太化」(男孩化)，諸葛亮任用他時已27歲，遊戲中卻像十餘歲少年。本來不太好看的人物也變順眼，例如著名的醜男龐統戴上頗為前衛的帽子，隱藏本來相貌。月英更由醜女搖身變成美女。吳老將黃蓋被「兄貴化」(壯男化)，不再是鬚髮斑白的老翁，而是筋肉男。女角造型唯美，多童顏巨乳，例如貂蟬及大小二喬均性感迷人。

日式三國作品亦為人物加添一些日式造型。遊戲《決戰2》(光榮)出現日本古代部落領袖卑彌呼及女忍者。《真·三國無雙》系列有浪人及武士造型，例如吳將周泰便像日本武士，手執東洋刀，還使用日式刀法「居合斬」。日式三國作品還加入日本動漫常有的同志愛(例如《鋼鐵三國志》加BL[男同性愛]、《一騎當千》加GL[女同性愛])、惡搞、萌及Q版等元素。

第三，女角地位提升。女角在《三國演義》中可有可無，但在日本三國文化的重要性大增。《三國演義》甚少女將(祝融是例外)，日式作品喜歡加添女將。《真·三國無雙》系列的星彩、月英、孫尚香、大小二喬、祝融及甄姬均可作戰。遊戲《決戰2》的卑彌呼、蔡文姬、美美、里里及瑠瑠也是女將。美美、里里及瑠瑠是虛構人物，托稱是張飛女兒。漫畫《龍狼傳》的蓮花及赤飛虎均一身武功，兩人均為虛構人物。

女角的力量除自身的戰鬥力外，也來自愛情。日式三國文化多加添戀愛元素，女性往往成為戰爭的導火線，英雄與美女的三角或四角關係影響歷史發展。例如遊戲《決戰2》竟將蜀魏之爭演繹為劉備與曹操為貂蟬相爭。這段三角關係純屬虛構，貂蟬出自《三國演義》，可能是虛構人物，書中與劉備或曹操並無兒女私情。

第四，性別轉換，男角女性化。將歷史人物女性化是日本漫畫、動畫及遊戲常用的手法，以製造話題、增加故事趣味及性別曖昧的吸引力。<sup>15</sup>日本三國作品亦不例外。《真·三國無雙4》的魏將張郃在外型、表情及談吐上都十分「娘味」。他含情脈脈賞櫻，打勝仗



後甚至與士兵大跳parapara。同系列的《真·三國無雙5》吳將陸遜亦像美少女。此作深入人心，難怪在日本cosplay張郃及陸遜的都多是女性。《決戰2》將魏將于禁變成人妖，頗有惡搞的味道。動畫《呂布子》中的呂布轉生為現代「萌味」十足的小妹妹。惡搞動畫《一騎當千》更將三國武將集體變性，三國武將再生為日本高校女生，其中呂蒙的造型竟抄襲科幻經典《EVA》的凌波麗。

第五，故事多杜撰成份，甚至出現時空倒錯及惡搞情節。一些作品是假托三國之名的自由創作，除人名外與三國拉不上關係。也有三國與其它作品的跨界(crossover)作品，例如Bandai的《BB戰士三國傳》將三國人物化身Gundam。即使一些較重歷史的作品(如光榮的《三國志》及《真三國無雙》系列)亦在不少地方與《三國演義》有出入。《真·三國無雙》系列的夷陵之戰可選關羽上陣，但此役其實是劉備為關羽報仇才發動攻吳的。同遊戲亦可在赤壁之戰選孫策，但他應在此役前十年已逝世。光榮的遊戲《三國無雙》(1997)竟出現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開三國及戰國武將crossover的先河。後來光榮的遊戲《無雙Orochi》系列將此crossover推至高峰，此作可謂是《真·三國無雙》與《戰國無雙》的大拼盤。光榮的《三國志Online》出現《西遊記》的牛魔王。此外，日式三國遊戲都可以經由玩家改變三國歷史，司馬氏不一定能統一三國，吳蜀也可勝出。

#### 四、日式三國文化的流派

日本改編三國的漫畫、動畫及遊戲過百，而且大部分有不錯的銷量。據稱日本平均每個家庭最少擁有一套三國漫畫，可見三國如何深入尋常百姓家。三國故事還被改編成廣播劇、歌舞伎、木偶劇、電視劇及電視特輯。日人亦從三國學習企業管理及人際關係。<sup>16</sup>這些作品多少反映上述的五大特色。今按其內容及表達方式粗分為三大派：野史派、歷史想像派及惡搞派。

野史派泛指主要受《三國演義》影響的作品。不過這種影響多是間接的，主要透過一些日人演繹《三國演義》的歷史小說，例如吉川英治的《三國志》(1939-1943)、陳舜臣的《秘本三國志》(1974-1977)及北方謙三的《三國志》(1996-1998)。

吉川英治版《三國志》(10卷)家喻戶曉，因此日人稱三國故事為「三國志」。池田大作曾評曰：「在日本說到《三國演義》的話，指的就是吉川的《三國志》。」<sup>17</sup>翻譯《三國演義》為現代日語的立間祥介表示，有讀者質問他為何不忠於原典，原來其所指的「原典」是指吉川英治版《三國志》。橫山光輝在唸中學時閱讀吉川英治版《三國志》，結下日後改編為漫畫的緣分。吉川以《三國演義》的故事為本，加上自創的史觀、解釋及評價。若《三國演義》以蜀為中心，吉川英治則以孔明為中心。他將三國歷史的主線放在孔明與曹操這兩大豪傑的鬥爭上，故事以孔明之死作結束，刪掉《三國演義》最後16回。他對孔明推崇備至，描寫其為天才軍師，而且文武忠勇全備。不過吉川卻刪減了《三國演義》中怪力亂神的記述，又或對之作理性的解釋，例如指出孔明借東風是靠其天文地理知識，而非法術。吉川英治版《三國志》的普及令日本掀起孔明熱，孔明成為三國最受日人尊敬的人物，故有日人生子取「亮」，生女名「亮子」以示景仰。吉川英治的《三國志》小說較正面描寫三國群雄，對曹操尤為肯定。<sup>18</sup>曹被描為充滿魅力、文武全才、求才若渴、去舊立新的政治家，是千年一出的偉人。只有他才配作孔明的對手。日人對曹操的形象因此大大改觀。<sup>19</sup>唯一負面的人物是董卓。此外，它也相對地提升女角的地位，描寫較多且正面，例如增加《三國演義》沒有的劉備母親故事，以及將貂蟬改寫為自殺。

陳舜臣的《秘本三國志》(6卷)是歷史推理之作，對三國的謎團嘗試作合理解釋及揭發鮮為人知的秘密。他在創作過程中故意不翻看《三國演義》以避免拘泥俗套。《秘本三國志》加添了一些虛構人物及事件。例如托稱是黃巾首領張魯母親的少容是個有理想、材幹



及口材的人物。她在群雄中發現曹操、劉備及孫堅三人，最後選擇曹，催使黃巾降曹。他也推測早年曹操與劉備在「煮酒論英雄」時密議二人瓜分天下，曹派劉混入袁紹陣營從事破壞。他又認為在張魯遊說下，諸葛亮與司馬懿達成秘密協議，避免戰爭令人民受苦，所以彼此只作虛招，不作認真對決。他眼中的曹操、劉備、諸葛亮及司馬懿都是善用策略的英雄豪傑，他們擅用計謀減少戰火。<sup>20</sup>

北方謙三的《三國志》(13卷)是重塑三國歷史的力作。他自稱只看正史，不看《三國演義》，也不看其他作家寫的《三國志》小說，目的是直接從正史獲取靈感。北方以諸葛亮與司馬懿的對決為中心，對人物及事件的評價獨特，例如高度評價曹操及呂布、批評劉備狡猾、諸葛亮欠軍事才能及刪掉桃園結義的情節。基本上放棄《三國演義》黑白分明的人物評價，還各人有血有肉、亦正亦邪的本來面目。此作大受歡迎，自出版以來已重版33次。

野史派的代表首選橫山光輝經典漫畫《三國志》(60卷，1972-1987)，此國民級大作被重印75次，共售出逾五千萬套。它在日本的地位與影響力可與吉川英治的《三國志》小說相題並論，日人多透過以上兩作來認識三國歷史。吉川英治的小說以成人為對象，橫山光輝的漫畫使三國故事在青少年之間普及起來。漫畫《三國志》以吉川英治的《三國志》為本，但內容較全面，從黃巾之亂到三家分晉的整段歷史都完整交待。不過受吉川英治的《三國志》影響，故事仍偏重蜀及孔明，故事以桃園結義開始，以三國統一作結。橫山光輝還加添了《三國演義》沒有記述的少年孔明故事。橫山光輝的《三國志》被改編為電視動畫及超級任天堂遊戲。

光榮名作遊戲《三國志》系列(1985始，至今已出12代)亦屬野史派，其故事及人物性格均以《三國演義》為本。此作頗有歷史味，每場遊戲開始都附設歷史解說，又有人物列傳供玩家參考。人物設計、場景及背景音樂均帶中國風。遊戲中諸葛亮「智力」最高，劉備最具「個人魅力」，而曹操則是文武全才，其總分是三國人物的首

位。<sup>21</sup>不過它始終是遊戲，玩家可以改變三國歷史。自《三國志8》開始，部分人物設計趨於美型，例如諸葛亮成為長髮戴戒指的酷男。《三國志11》甚至加入《水滸傳》的角色，周泰亦採《真·三國無雙》系列的日式造型。

歷史想像派是在野史的基礎上加添大量個人虛構歷史想像的作品。它們沒有濃厚的《三國演義》味道。這派作品數目甚多，勢力日益壯大，代表作是漫畫《龍狼傳》、漫畫《霸Lord》及遊戲《真·三國無雙》系列。

《龍狼傳》是山原義人作品，講述日本中學生天地志狼及其青梅竹馬在一次意外中超越時空，回到三國時代。他遇上劉備，被邀為蜀軍師，與魏抗爭，從而改變三國歷史。此作增加大量原創角色，而且反客為主，例如天地志狼及司馬懿手下的五虎神都比三國名將更厲害。故事的重點是志狼與五虎神的恩怨。此作的人物設定相當日本化，例如張飛似日式達摩、趙雲像聖鬥士星矢、蓮花像《街霸》的春麗。武功亦動漫化，例如張飛可以一手接十多支箭，又能自由伸縮肌肉，有點像《龍珠》及《幽遊白書》的格鬥風格。此外，歷史人物的描寫並不忠於《三國演義》，例如它將忠心的周瑜變成奸角，謂他勾結司馬懿以吞佔曹操地盤及欲刺殺志狼。

《霸Lord》是池上遼一的漫畫，由武論尊編劇，出版不久便遭中港台傳媒批評它胡亂篡改歷史。此作以劉備為主角，但這個劉備竟是來自邪馬台國的日本人。他殺死壞蛋劉備，冒充其身份，與各懷鬼胎的關羽與張飛結義。其實三人是互相利用而已。池上遼一擅長描寫現代黑幫及政客，代表作為《英雄本色》，《霸Lord》可謂是古代版《英雄本色》，人物均亦忠亦奸。除劉備外，趙雲是此作另一具爭議性人物。趙雲被大膽設定為女扮男裝，與劉備及呂布有三角戀情。她本身喜歡劉，但卻與呂生孩子。此外，呂布被說成是朝鮮族王子及華雄是日本人也是引起話題的設定，仿佛三國歷史是由一班冒充中國人的日本人及朝鮮人背後操縱。此作有不少非歷史性的描述，



如張角的日式切腹、漢帝抽鴉片、女性化的周瑜統領娘子軍作戰及吳國皇室信奉基督教等。

《真·三國無雙》系列(光榮,至今已出6代)可謂是最成功的三國遊戲。玩家選一位歷史人物去參與三國著名戰役。三國人物,不分男女,均可作戰,其中趙雲十分厲害,攻守均能,此作的普及令趙雲成為日本年青人繼孔明後最喜愛的三國人物。<sup>22</sup>此作的三國人物造型嶄新,大部分被美型化,對其它三國遊戲的造型影響巨大。部分人物有點惡搞味道,例如魏延變成怪物。遠古神話人物也登場,例如《真·三國無雙2》出現伏羲及女媧。三國結局可改變,三國君主也一直長存。

惡搞派托三國人物之名作天馬行空的自由創作,大多含搞笑、萌或色情成份,這是最惹中國人不滿的一派。近年這類作品數量不斷增加,很受年輕男性歡迎。代表作品為漫畫《Dragon Sister 三國志 百花繚亂》、動畫《一騎當千》及遊戲《戀姬無雙》。

《Dragon Sister 三國志 百花繚亂》(nini作)是「後宮式」(一男多女的設定)搞笑之作。除劉備及曹操是美少年外,其餘都是美女。三國變成二人爭女的胡鬧故事。桃園結義被惡搞成一男兩女的三角關係。關羽及張飛均是巨胸少女。「中女」董卓與少女呂布大搞GL。故事一味胡鬧,加入男性讀者喜歡的「殺必死」(service,即提供男性凝視快感的東西)。少女們穿著性感,打鬥時必互相扯破衣服,踢腳必「露底」。

《一騎當千》(塩崎雄二漫畫改編)比《Dragon Sister》更荒唐胡鬧,而且色情成份更濃。故事是大部分三國武將均轉世為當代日本高校女生,各人身材都極性感,打鬥時必「爆乳」。因各人都是女生,所以有GL情節,例如呂布與陳宮變成女同志。

《戀姬無雙》將惡搞、萌及色情都推至高峰。這是BaseSon出版的18禁成人遊戲,故事有關一名現代少女來到只有美少女的三國。她答應幫助少女關羽平定天下。此作多決鬥及「殺必死」情節。人設

極大膽惡搞，例如曹操是只有140公分的女孩以滿足「妹系」的愛好者，張飛則是男性化的女孩以滿足「正太系」的愛好者。最搞笑及引起話題的人設是將大美人貂蟬化身極令人反胃的人妖。

## 五、日式三國文化逆輸中國

現在中港台年青人之間流行的三國作品不是中國式，而是日式。光榮的作品是他們最熱愛的三國遊戲，其中以《真·三國無雙》系列最家喻戶曉，多次榮登台灣遊戲書籍人氣作品首位。日本的三國街機在港台的遊戲機中心亦不可缺，《吞食天地2赤壁之戰》及《三國志大戰2》曾大熱，後者在香港曾主辦官方大賽。橫山光輝的《三國志》台灣中文版亦在兩岸三地流行，不少年輕人透過此作認識三國歷史。它曾是香港中學生最愛讀書籍之一。這是少數學校圖書館願意收藏及老師樂於推薦給學生的漫畫。中國內地青年多從網上非法下載日本三國漫畫、動畫及遊戲。部分(如光榮遊戲)有官方中文版，沒有的便由內地的網上「字幕組」附加中文翻譯。

日式三國作品不但在中港台大受歡迎，而且還影響新一代的國產三國作品。近年中港台生產大量三國作品，單是台灣的三國遊戲便多達二十多種，香港亦有多套以三國為題材的漫畫。內地亦掀起三國熱，幾乎每年都有新作。因為中港台年輕一代的製作人及消費者都接觸日式三國作品，所以近年兩岸三地的三國漫畫、動畫及遊戲均多少含日本元素，而且成份不斷增加。中國的三國文化呈現日本化現象。今引中港台例子各一加以說明。

中國內地電視動畫《Q版三國》(廣東統一影視，39集)是搞笑版三國故事，採用日人常用的惡搞及日式Q版造型與表達形式，內容一味胡鬧搞笑，大膽顛覆三國歷史。為配合內地國情，每集均有勸喻觀眾閱讀正史的溫馨提示，而且內容健康。故事以另類桃園結義開始，謂好男色的農夫劉備想非禮豬肉佬張飛，給無牌小販關羽



撞破。警察不分皂白，將他們囚於桃園監獄。三人在獄中結義，出獄後遇上失業的諸葛亮，四人決定買刀打劫富翁曹操。此作收視理想，在內地也沒有引來批評。若此作出自日人之手，難免成為中國傳媒及網民的攻擊對象。

《三國群英傳火鳳燎原》(陳某作品，東立出版)是近年港漫代表作之一，也是華人世界最受歡迎的國產三國漫畫。陳某一直有接觸日本三國作品，尤愛玩《三國志》系列，不過他承認《火鳳燎原》最主要是受日本歷史漫畫及武士片影響。<sup>23</sup> 他將日元素完全消化，推陳出新，所以表面上此作不是太日本化，但其實日式三國文化的影響隱藏在較深層次。第一，人物設定很有東洋味。兩大主角趙雲及呂布均被美少年化。一些武將竟出現日本古代朝廷的貴族髮式及眉毛。八奇的戴帽造型及呂布的頭巾束長髮造型分別與《真·三國無雙》系列的龐統及《三國志8》的諸葛亮相似。此外，大配角中竟出現日本已故男星三船敏郎的面孔，他是從邪馬台國前來助司馬懿的絕頂高手。陳某表示因為太喜歡黑澤明的武士片，所以加了一個像三船敏郎的東洋刺客以示敬意。這種加入日人角色也是受日本三國文化啟發。第二，故事與人物虛中帶實，實中帶虛。人物都是三國的歷史人物，故事的整體發展也依《三國演義》，但卻加添一些嶄新的佈局及大膽的設定。本來是蜀將的趙雲竟有另一身份，就是司馬家刺客集團的首領燎原火。三國八大名策士同屬一個門派。以上的刺客集團及策士門派均屬虛構，但這兩幫人在此作中卻能呼風喚雨，推動三國的歷史。《火鳳燎原》最大膽及引人討論的設定是將大美人貂蟬變成由宦官反串的人妖。他與呂布及趙雲構成三角關係。他還是殘兵一員，最後戰死。第三，獨特的史觀與人物評價。蜀國不再是正統及重心所在，司馬家是故事的主線。人物都是正邪兼備，彼此都為理想或生存而戰。此作為董卓翻案，指他是大改革家。呂布亦被正面評價。他被描述為有勇有謀，具商人合理精神的一代豪傑。<sup>24</sup>

台灣遊戲《幻想三國誌》(宇峻奧汀)是日本味頗濃的人氣電腦遊戲。其故事純屬虛構，與《三國演義》無關，頂多是借三國為背景。主角們均是原創，歷史人物反成二線角色，可謂喧賓奪主。故事講述姬軒及姬霜兩大主角在亂世的兒女私情，屬催淚之作。姬軒托稱是水鏡師弟亦無任何根據。人物造型日式，追求唯美，呈現美少年化、美少女化及萌化。一些造型明顯抄襲《真·三國無雙》系列，例如趙雲與呂布基本上一樣。原創人物蘇童顏則抄襲日本漫畫《棋魂》的佐為，兩者均穿古代日本宮廷服，唯一不同是無帽及變了白髮。《幻想三國誌》的動畫跟《太空戰士》(*Final Fantasy*)神似。

以上例子顯示日式三國文化的特色在新一代兩岸三地的作品中均呈現出來。複製文化反過來衝擊元祖，外地變種逆輸原產地，這在文化全球化的當代十分普遍。

## 六、結語

本研究有助我們瞭解文化全球化下的傳統與流行文化的互動、跨國文化互動、文化挪用及文化逆輸等重要課題。

日人將中國的三國歷史改造成漫畫、動畫及遊戲等流行文化商品，引來中國人的批評。這些批評多從民族主義及正統論的立場出發，未能明白三國文化早已是東亞各地共享的文化傳統及傳統與現代文化產業的相互關係。在文化全球化下，將某地文化當作獨享專利不切實際，限制當代文化產業改造傳統無助保存傳統。將傳統改造其實是自古至今一直進行的文化發展過程，中國歷代改造三國文化從未間斷。改造傳統對藝術及文化產業極之重要，現代人從傳統尋覓靈感及創意。日光之下無新事，我們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進。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外國也加入改造中國傳統。現代日本比中國在改造三國傳統上更積極、更成功。改造傳統能給與傳統新生命及時代感。若是沒有日式三國漫畫、動畫及遊戲，也許中港台的年



輕一代不會對三國歷史再感興趣。若新一代對三國歷史失去興趣，又何來保存傳統？新一代中國的年輕人大多是先玩《真·三國無雙》或看橫山光輝的《三國志》等日式作品，然後才看《三國演義》。可見傳統與當代流行文化互相依賴。傳統啟發當代流行文化，當代流行文化振興傳統。

跨國文化互動使三國文化在全球各地急速普及。不少日本的三國漫畫、動畫及遊戲在創作時加入中國的人才，製成後也多推出中文版，致力開拓龐大的大中華市場。港台漫畫家亦參與日本三國作品，例如台灣的鄭問替遊戲《鄭問之三國誌》(日本 Game Arts 公司)作人物設計及香港的陳某為《三國誌大戰》(日本 Sega 公司)的遊戲卡作人物設計。台灣智冠與日本講談社合作，將《龍狼傳》改編為中文遊戲以打入華人市場。華人的三國作品亦有反攻日本者，例如香港的陳某及李志清有三國漫畫在日本連載及發行日文單行本，《幻想三國誌》亦有出日文版。

文化挪用是深層本地化的一種形式。日人將中國三國歷史據為己有，拿了三國的背景及人物，換了日本的內容，變成日式三國文化。日本的三國流派，不論是野史派、歷史想像派，還是惡搞派，均反映日本的特色，與中國的三國文化相差甚遠。在全球化的視野下，從中國的角度批評日式三國文化為邪道的意義不大。承認兩種不同類型的三國文化並存的事實及注意它們的互動才能作出客觀的視察與分析。

在全球化的巨輪下，一個傳統及文本出現多種改造的版本，這些「第二次創作」的複製文化力量很大，甚至出現複製文化逆輸入原產地，衝擊元祖(正統)的有趣現象。它挑戰認為元祖最原汁原味，而複製多劣的傳統智慧。三國本是中國歷史，但在日本經過改造成漫畫、動畫及遊戲，日式三國文化逆輸原產地中國，衝擊中國的三國文化。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喜歡日式多於中式，兩岸三地的三國作品亦多少受日式風格影響。

- 1 Barbara E. Thornbury, *The Folk Performing Arts: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Jap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 2 有關中國典籍在日本的保存，參陸堅、王勇主編：《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
- 3 宮澤誠一著：《近代日本と「忠臣藏」幻想》（東京：青木書店，2001）。
- 4 肖桐、杜力評曰：「《三國志》系列遊戲把中國的三國歷史改寫得面目全非。」參肖桐、杜力著：《龍曆 1978-1996：轉型期中國百姓心迹錄》（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頁 323。
- 5 張奕峰著：〈四大名著的名稱不應作為商標註冊使用〉，《律師與法制》，2006 年 10 期，頁 8-9。
- 6 Stephen Vlastos, ed., *Mirror of Modernity: Invented Traditions of Modern Jap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7 上田望著：〈日本における三国志演義の受容〉，《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第 9 輯（2006 年 3 月），頁 1-40。
- 8 田中靖彦著：〈三国志文化の受容と展開〉，《創文》504 號（2007 年 12 月），頁 16-20。
- 9 Ivan Morris,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Tragic Heroe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1975).
- 10 霍松林主編：《中國古典小說六大名著鑑賞辭典》（西安：華岳文藝出版社，1988），頁 1159。
- 11 邱嶺、吳芳齡著：《三國演義在日本》（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頁 10-14。
- 12 有關日本三國遊戲的熱潮，參山名一郎著：《ゲーム業界三国志》（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97）。
- 13 立間祥介著：〈『三国演義』の「七実三虚」について〉，《一橋論叢》78 卷 3 號（1997），頁 258。
- 14 曾在內地掀起熱潮的電視劇《三國演義》（84 集，1994，中央電視台）便是最佳例子。Junhao Hong, "From Three Kingdoms the Novel to Three Kingdoms the Television Series," in Kimberly Besio and Constantine Tung, eds., *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p. 125-142.



- 15 有關日本漫畫及流行文化如何利用性別的曖昧去增加其吸引力，參 Mark McLelland, *Male Homosexuality in Modern Japan: Cultural Myths and Social Realities*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2000), chapters 3–4, pp. 43–88.
- 16 這類書籍甚多，如吉田克己、江口陽子著：《三国志で学ぶランチェスターの法則》(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2009)，本告正著：《船井流三国志の参謀学》(東京：実業之日本社，1996)及安岡正篤著：《三国志と人間学》(東京：福村出版，1987)。
- 17 譚桂林著：《池田大作與文學世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頁56。
- 18 丘振聲著：《三國演義縱橫談》(南寧：漓江出版社，1983)，頁397–398。
- 19 雜喉潤著：《三国志と日本人》(東京：講談社，2002)，頁7，153–154。
- 20 王向遠著：《源頭活水：日本當代歷史小說與中國歷史文化》(銀川市：寧夏人民出版社，2006)，頁28–33。
- 21 有關《三國志》的人物評分，參 Sun-fai Wong, "Playing History: Study of the Computer Game '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Master of Philosophy Thesis in Histor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uly 2001, p. 68.
- 22 傅隆基著：《解讀三國演義》(台北：雲龍出版社，1999)，頁229。
- 23 吳偉明著：〈與陳某談火鳳燎原的日本元素〉，《知日部屋：吳偉明日本文化隨筆》(香港：中華書局，2007)，頁184–187。
- 24 吳偉明著：〈論火鳳燎原的日式三國ACG元素〉，《知日部屋：吳偉明日本文化隨筆》，頁182–183。



## 第二部：思想交流篇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中體西用」、「東道西藝」論 與近代中日女子教育

◆ 陳瑋芬 ◆

## 一、前言

晚清「中體西用」思想的成立，與洋務運動密切相關；幕末「東道西藝」之說的興起，則端始於安政改革之際。<sup>1</sup>洋務運動及安政改革的思維基調，大抵不脫離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所謂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sup>2</sup>如馮桂芬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及佐久間象山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組不遺，表裏兼該」皆可以證之。<sup>3</sup>

「中體西用」、「東道西藝」這兩種相類的理論，卻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將中、日兩國帶往不同的路向：日本迅速展開文明開化運動，中國則呈現現代化的遲滯和挫折。闡明「中體西用」及「東道西藝」的論述已多，論者多半將「中體西用」論扣緊為官方意識型態，討論其成立及發展的經緯。<sup>4</sup>本文希望歧出此主流論述，以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為時間斷限，由「留洋者」對「中體西用」論所提出的挑戰切入，並以留洋者的女子教育觀及女性留洋者為佐證，勾勒中、日體用論之特徵，討論「中體西用」、「和魂洋才」理論為何造成中日



現代化進程的差異？其文化本質與「西化」的目標如何詰抗？並分析女子教育與女權論題如何在「民權」和「國家」的緊張關係中被構成。

## 二、「東道西藝」論：日本主體性的追求

德川後期以降的日本式西洋觀可分三類：一是基督教概念的西洋觀；二是以朱子學為基礎，由「窮理」觀點去比附理解的西洋觀，將西洋的技術、術數理解為「理」之表現；三是「唐虞三代」的西洋觀，把「唐虞三代」由古代中國移到近代西方，主張向西方學習便能取得普遍的合理性。<sup>5</sup>此三類西洋觀雖立場各異，但都以儒家式的文明觀為基礎，以學習西方來追求普世價值的實現。

「東道西藝」論衍自上述西洋觀，可以概言為在「漢才」的思想基礎上，轉而追求「洋才」的致用性。因它並非官定意識形態，而僅是主張開化的知識分子的思考模式之一，故不似中國的「中體西用」論般具備體系性及延展性，但它鮮明的特色在於「和魂」的執守，對主體性之追求毫不懈怠。

佐久間象山所著〈海防八策〉論點接近魏源的〈籌海篇〉，意在攘夷。黑船事件後，他領悟到需導入西洋技術，提出「東道西藝」論，主張「宇宙中實理無二，斯理之所在，天地無能異此，鬼神無能異此，百世聖人亦無能異此，近來西洋所發明之學，要皆實理」，且「足以資無聖學」。渡邊華山表達出超越幕藩意識和狹隘的國家主義的世界觀，強調「以天下為天下」，而非「以日本為天下」。他認為「物理之學」不限於自然科學或技術，乃貫串社會科學和教育制度，其精神可以「審天地四方，佈教利國，為唐山所不及。……西洋諸國之道即為吾道，二者合一」。<sup>6</sup>這顛覆了過去以東洋文化為優、西洋文明為劣的洋學觀。

以上兩人的開明世界觀，通過吉田松陰、勝海舟、阪本龍馬等人傳承給明治時期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進一步結合「脫亞入歐」

的觀點，提出「和魂洋才」之說，倡議日本必須脫離中華思想、儒教精神，接受西洋文明。他由「文明」的角度立論，主張把歐洲既有的文明當作目標，來促進本國的文明，是新生國家日本的課題。與福澤相反，留德的井上哲次郎所詮釋的「東洋」不是必須甩脫離棄的概念，而成為可以肯定和擁抱的對象。其編纂的「東洋哲學史」體系雖涵蓋中國、印度、日本思想，但措意於由學理證明日本民族性之優越；也十分強調面對西學時須明辨是非，「不可因其為泰西人之言而盲信之」的態度。<sup>7</sup>

概言之，幕末的佐久間及渡邊崋山等人由東西兵器之優劣、技術之精粗，注意到其差異之源頭乃學術的方法，他們所勾勒的「東道西藝」論是以朱子學的「理」為基礎，將西洋的學術認知為「格物窮理」之實學。到了維新以降展開兩種發展路向，一是如福澤諭吉般揚棄舊傳統、脫離華夏文明的議論；稍晚則出現如井上哲次郎般重新估量東方文化價值，以東方之學術為尚的議論。

### 三、「中體西用」論：恭順倫理的執守

在魏源的基礎上，馮桂芬意識到西方船堅炮利的表面下，有更深層的原理與方法，故曰：「曆算之術，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綜條貫，輪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由於「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皆得「格物至理」，而三綱五倫乃「理的具體展現」，應為中學的核心，主張採納西學西技，置於「輔」的地位。<sup>8</sup>洋務派的曾國藩和李鴻章亦主張採用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重視器用層面，目的在於強兵。納入馮桂芬「有益於國計民生」的主張後，逐漸著眼於富國，創辦輪、礦、路、電四大政策。到了1870年代末，進一步認識到西方富強的因素不單是船堅炮利，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也是要因。非洋務派主流者提出「體用兼賅」，帶有「西學源出中國說」的色彩。而鄭觀應與陳熾等人主張設立議會，讓人民分享



政權，如此將對行政官僚甚至皇權產生一定程度的制衡力量。

「中體」的核心乃恭順倫理，一旦臣民對君主的忠誠與臣服關係產生搖動，就意味着「中體」與「西用」之間的緊張與矛盾，蘊含制度危機的可能。<sup>9</sup>於是晚清最早一批留洋者萌發「即體即用」、「體用一源」思想，試圖克服「中體西用」論之罅漏。容闈在留美經驗中，體認到西方科技的後盾在於思想，而思想乃「生活方式」之產物，故主張「即體即用」，指出要吸收西方觀點的唯一良方，就是派遣中國幼童直接在西方環境接受先進教育。<sup>10</sup>在其建議下，清廷於1870年開啟幼童留美計劃，四年間選派120人赴美學習軍事、航海、法律及建築工程，學制15年，全額費用由政府承擔，但不允許獲取美籍或永久居留，而且必須每日學習中文、研讀儒家經典，農曆特殊節日聆聽正副監督宣講《聖諭廣訓》。可惜最後清廷認為多數幼童習染「夷族」之「澆風」，全數召回，「即體即用」思想終不敵綱常名教與恭順倫理。<sup>11</sup>即使這些平均接受六年以上美國教育的幼童成為一群無法替代的嶄新族群，卻沒能進入政治核心，而始終被置於「洋才」的輔助地位。<sup>12</sup>

嚴復也意識到「中體西用」之失，提出「體用一源」說，較「體用兼賅」更往前跨出一步。作為第一批公費留英學生，嚴復求學期間對史賓莎(Herbert Spencer)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大為傾倒，希望透過翻譯引進西學，將能激發「民力、民智、民德」的著作譯介到中國。<sup>13</sup>他創辦提倡西學的「通藝學堂」，強調中西學術本有差異，就如「其種人之面目自然，不可強謂似也」。他主張「一體」有「一用」，「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批評中體西用論「以牛為體，以馬為用」，「合之則兩亡」。<sup>14</sup>由於「體用不二、體用不可分」，若「以科學為藝，則西藝實西政之本」，故須就宇宙、政體、制度、和精神各方面，對東、西文化作出更細緻的觀察。他陸續刊行《天演論》、《群學肆言》、《原富》、《群己權界論》、《穆勒名學》、《社會通詮》、《法意》、《名學淺說》，及《計學淺說》等譯著，

其譯文多用文言文，因為他堅持西洋深奧的學理，必須用適合的文風，即桐城古文辭來表現。他所設定的讀者是中國有教養的知識階級，這個選擇出自以「洋才」之身與「大儒」之傳統士大夫世界平等對話的冀求，不得不練就「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的文字本事。

容闓的主張因與恭順倫理抵觸而功敗垂成，嚴復的主張則隱約透露文化有機論的色彩，不過若將文化視為有機體，只要在用的範疇上接受西學、西技，則中體也必然發生改變，不可能有體不變而用可變的狀況發生。這違反「中體西用」理論的特質，且當時「西學源出中國說」與「古已有之說〔託古〕」已然成形，令西用與中體的連結更難切斷。同時，晚清中體西用思想逐漸顯出帝國主義的意味，例如王韜認為世界有歸於大同之勢，中國必須輸入西用，以作為將世界混而為一的手段，而出自中國的聖人，也可把中體核心的「三綱五倫」推向世界。薛福成也曾說，採納西學的目的除了要護衛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更可以使聖人之道「被乎八荒，是謂用夏變夷」。<sup>15</sup> 這與「東道西藝」論在明治維新後的走向有若合符節之處。

#### 四、複製「共和國之母」形象的「賢妻良母」論

日本17、18世紀的女訓《女式目》、《唐錦》列舉一系列中、日文學典籍，儘管其目的不是開智、而是涵養婦德，但也體現了當時提倡婦女識文斷字的識見，並不強調「女子無才便是德」。1872年文部省頒布《學制》，要求所有國民均須就學，做到「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明言女子須與男子一樣接受教育，才能「開人子學問之端緒，使其明辨事理」，強調子女之是否成材，在於母親所予教育，故「其子之才不才，要在其母之賢不賢」。啟蒙思想家則批判儒家傳統的女子道德，指出西歐婦女與男子平權、教育子女亦頗有見識，日本應急起直追，造就在人格上與丈夫平等、具備足夠的教育子女的教養與知性的母親。由封建時代視婦女為「借腹之物」一變而為「教



育母親」，呈現出日本女性觀的明顯變化。同時「女權」也受到注意。1881年，井上勤將史賓賽的 *Social Statics* 中與女權相關的一章譯為《女權真論》出版；松島剛全譯該書為《社會平權論》，命名該章為〈婦人之權理〉。可以說近代日本吸納了西方的女權思想，也由教育子女的角度出發，倡導以「賢妻良母」論為基礎的女學思想，具體表徵在公派女留學生與創制女子學校之二端。

公派女留學生的主要推手是樺太開拓使次官黑田清隆。他視察歐美時對美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印象深刻，具體建議明治政府設立女子學校，並派遣女留學生留學歐美。他上書道：

夫開拓之要，在於培育人才、教育子弟。今歐美諸國，可謂能教育子弟者。為何襁褓之兒能辨菽麥？無他，必是其母已有學術。……設女黌乃作育人才之不可缺者。……今欲選幼稚女子使留學歐美之間，其學資當予以提供。<sup>16</sup>

奏文中並未提及女性作為妻子或媳婦之角色，只將其功能完全簡化為母親對子女的養育與教導，強調女性教育之重要性。把家庭定位為學校教育前重要的教育場所，進而強調母親的教養機能，他的論點令家庭這個私有領域顯出公共意義；又將女性與開拓國土之國家大業相關連，使母親之角色染上政治色彩。

黑田的構想受到岩倉具視的支持，訂出留學期間10年由政府包辦全額費用並每年支給800美元獎學金之招募條件。第一回招募未果，第二回募得吉益亮子、上田貞子、山川捨松、永井繁子與津田梅子等五位年齡在6到14歲間的少女，隨同岩倉使節團赴美留學。<sup>17</sup>嚴格說來她們的出洋並不出於自身的決定，而由父兄所為。其父兄皆曾任職於舊幕府，來自倒幕維新之際那些被視為「賊軍」的藩國，在新政府擔任較低階的官吏，因緣使然而曾參訪或留學歐美。<sup>18</sup>也許是政治的不如意，加上文化趨新的意志，他們期待女兒出洋學成後，能得到社經層面的自立。

附帶一提，此公募規則其實逸出1870年頒布的〈海外留學生規則〉之留學期間、留學年齡、語言能力等規定，可以說是一個權宜的處理，體現明治政府對男女留學生的選拔基準不同，其規則的施行也有彈性。少女們既不懂英語，和漢古典基礎也不深厚，之所以選派如此年幼的女孩出洋進行長達10年的留學，可能是考慮到她們可塑性高，容易適應異文化。

明治天皇也在她們出發前發表敕諭，闡述女子教育道：

我邦女子學制未立，婦女多不解事理，殊幼童之成立，母氏教導之事實關緊切，今赴海外者孿妻女或姐妹同行固可，應曉外國所在女教之素及育兒之法。若人人誠能注意於此，致力勤勉，則入開化之域，富強之基遂立，不難與列國並馳。汝等能體斯意，各盡本分，以符朕之所望。

強調母親對子女教育之功，甚至允許留洋者攜妻女姐妹同行，使之學習西方女教之法。文部大臣森有禮則期許女留學生能「充分蒙受合眾國的家庭生活之恩典」，勉勵她們增長見聞，以成為真正的淑女（true ladies）。他由富國強國的角度認知女子教育，強調女子教育的社會作用，主張女子教育的重點在於「培養女子為人之良妻，為人之賢母，管理家庭、薰陶子女所必須的氣質才能。國家富強的根本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發達與否與國家安危有著直接的關係」。<sup>19</sup>也許受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森主張日本男性與西洋女性通婚將可達到「民族」提升的效果，但不鼓勵日本女性與西洋男性通婚，而希望透過日本女留學生接受西方文化薰陶後生育子女，為日本帶來「文明」。

中村敬宇留英時便注意到作為「良善的母妻」的英國婦女形象。山川菊榮描述道：

先生一到倫敦，雖然年已三十五，但為了練習英文發音，立刻上小學與小學生共學英文。身為幕府鴻儒的先生，即使漢文的



問題都很通曉，對於為什麼下雨、為什麼打雷這些科學問題，卻一個也無法回答，英國孩子們卻能馬上答出。先生好奇地問道：「你們怎麼知道這些事情？」孩子們答：「媽媽教的。」留英期間，先生從各方面體會到英國為人母者知識豐、見聞廣，深感日本的女子教育若不改善，日本將無法在與外國的競爭中生存而陷入危險，決心返國後一定要振興女子教育。<sup>20</sup>

篤信基督教的中村主張「男女平權」，他創辦同人社女子學校，以彌爾的《男女同權論》、史賓塞的《教育論》、基佐的《文明史》為教材，重視語文及音樂教育，聘請外國人講授歐式家政，理科及倫理等教學與男校大體無異。他在《明六雜誌》發表了一系列和婦女教育有關的文章，在〈造就良善的母親之說〉中寫道：

自體之強弱言於母胎之時，若母體為強健，則未來必成強健之人。……其子精神心術之善惡，相類其母，其子之嗜好癖習亦多似其母也。然則，為變民之情態風俗為良善，使入開明之域，必自善母之得始。若得絕好之母，斯得絕好之子，吾等一族由此以成，是則日本可為絕好之國，人民得受修身之教及技藝之教，長成知識上進、心術良善之高尚者也。……是以吾等一族能受善母之教，則深所至望也。夫欲造就善母，不如教育女子。先使女子受修身與敬神之教育，婚嫁男子而後生子，其子於胎孕之前，蒙受康健道理與旺盛精神，吸收善德之風，沐浴天道之光，在眼目則為知識之窗，在心思則為無形之妙體，他日剛勇、果敢、勤勉、忍耐等諸德目，既備於搖籃乳養之間，亦非誇言也。<sup>21</sup>

中村認為日本之近代化端賴於人民品性的改造。要人民具備良善心性與高尚品德，首先要培養婦女為「良善之母」，如此將孕育「絕佳之子」，得以打造「絕佳之國」。他以西洋知性的婦女形象為典範，認為列強的國力奠基於母親所受的教育及其育兒態度。

上述提倡「良妻賢母」論者以為典型的女性形象，與美國18世紀末的「共和國之母」密切相關。美國獨立建國時期，儘管女性尚未被視為市民，卻受到社會大眾的期待，希望能在家庭中教育出有學養的市民。當時的女性透過「母親」的角色參與共和國的運作，私有領域中的母親角色間接影響了公共領域。到了19世紀，美國婦女已能接受高等教育，也早已跨出家庭，參與各項社會改革，但黑田清隆、森有禮、中村敬宇等人感佩的其實是「共和國之母」之順從、虔誠、貞潔、以家庭為重的形象，甚而建議將美國的家庭生活當成「普通學」來學習。他們將舊世紀美國的賢母形象導入19世紀日本的國家建設中，並得到新政府及天皇的支持。隨著明治中期以後天皇制國家主義的收束，國家主義的影響益加鮮明，對於日本主體性的強調也日益明顯。樺山資紀頒布的《高等女學校令》(1899)強調「日本獨特之女性形象」需蘊含「優美高尚的氣風和溫良貞淑的資性」，又具備「中流以上生活必須的學術技藝」，亦即既需有作為國民的自覺，又需相夫教子、善理其家。《教育時論》有不少篇章刻畫的女性形象，既不能如中國婦女般卑屈，也不要像歐美婦女般過於開放。他們批評西方婦女除了家務和育兒，社交過多，甚而投入參議院選舉，是「彼異國社會之弊風」，「有損女子特有的美德，其實是變女子為男子」，與日本的國風不相容；而中國傳統將女子纏足、禁止其學習，封之閉之，也不適合近代國家的發展的需要。強調「不是能講流利的外語、精於算術理科之學，卻怠忽家事者。盲目於現今社會風俗的歐化婦女與能歌擅琴卻拙於育兒的職業婦女皆非所需，能適應過渡時代的國情，足以培育下一代國民的婦女是所企盼。」<sup>22</sup>其保守性可見一端。

## 五、折射西方與日本思潮的晚清女學觀

中體西用論者提供西用或改革的藍圖，但因執著於恭順倫理，令晚清西化進程較日本為遲。以留學為例，容閱留美之舉早日本首



位留洋者新島襄足足19年，他所提的留美幼童之議案卻整整延宕18年。在這段空窗期裡，日本於幕於藩，均派出為數甚多的公費留法、留荷、留英、留美學生。晚清的留學政策卻始終無法貫徹，直到1900年初期，開始出現大量留日學生，以日本為中介來學習西洋學術，並借鑑日本的西化經驗。

女學和女權論述亦然，它遲至19世紀末尾才出現，約晚於日本20年。在此之前女學的推廣主要得力於傳教士。<sup>23</sup>而最初的四位女留學生都出身牧師家庭，倖免於纏足的命運，並得進入教會學校學習，成為最早接受現代教育的女子，又因緣際會得傳教士或教會之助留美。第一位女留學生金雅妹(又作金韻梅、金雅梅)之出洋恰好在幼童留美計畫遭到腰斬之年，早於日本公派女留學生約十年。<sup>24</sup>她出身寧波，父親為牧師，年幼時因父母染疫雙亡而與兄長一同被麥加梯(Divie Bethune McCartee)教士收養。<sup>25</sup>1872年麥加梯前往中國駐日本公使館任職時隨行，在日本接受初等教育，17歲轉赴美國就讀於紐約醫院附設的女子醫科大學，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成為中國近代第一位女大學畢業生，先後供職於美國東岸醫院，也曾在《紐約醫學期刊》發表〈組織學的顯微攝影〉一文，探討顯微鏡技術。福州女子許金匄(Hu King Eng)出生於福州市的基督教家庭，由福州的教會學校毓英女中畢業後，入福州婦女醫院學醫。<sup>26</sup>她的勤勉聰穎與熱忱，令醫院院長主動請求美國的婦女傳道部(Women'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出資，由傳教士帶她赴美，先後就讀於衛斯里大學及費城女子醫科大學。<sup>27</sup>江西女子康愛德(Ida Kahn)和湖北女子石美玉(Mary Stone)也受傳教士資助赴美。前者因遭算命先生判定命犯天狗，於婚姻不利而童養不成，由美國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收養，並隨同赴舊金山、日本，再返中國。後者之父為九江地區衛理公會傳教士，進入昊格矩在九江開辦女子教會學校就讀，並隨同昊格矩赴密西根大學，畢業後於芝加哥醫院實習，返國服務於九江。<sup>28</sup>

這四位最初的留洋女子才智固然不群，但主要是機緣之遇合而得接受西式教育。她們皆習醫，主動返國濟世，更致力於提升女性地位及推動女性的經濟獨立。金雅妹在廈門從事教會之醫務工作，後因患瘧疾赴日本求治，癒後活躍於神戶一帶，約於1894年間再度赴美演說在中日傳道的經驗。<sup>29</sup>之後獲任命為北洋女醫院(今水閣醫院)院長，並得直隸總督袁世凱助銀兩萬兩，創辦醫院附屬護士學堂，熱心於教育事業和農村衛生事業。許金匄除了主持嶺後婦幼醫院(今福州市第一醫院)，也領導福州地區的反纏足運動。她促使反纏足協會的成立，通過關於反纏足的七項決議，改變了以往僅僅從道德角度勸說的做法，甚至由婚姻大事的角度立論，令纏足議題由基督教內部擴展到整個社會。<sup>30</sup>世界婦女協會(International Women's Congress)於1898年在倫敦召開，她受李鴻章指定為代表，以流利的英語為中國婦女在國際上發聲。其後她被安排到福州主持美以美會所創的教會醫院媽氏紀念醫院。在她的影響下，公共衛生觀念開始發生變化，尤其霍亂和瘟疫兩種傳染病的發病率大為降低。康愛德與石美玉一同在南昌主持由丹福醫生(Dr. I. N. Danforth)捐鉅資所建的丹福紀念醫院，一個月求診人數有高達2743人之記錄。隨後康愛德再赴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倫敦熱帶醫學校攻讀文學及醫學。而石美玉則組織了中國第一個佈道組織，派遣傳教士遍及邊疆各地；並於上海興建以伯特利為名的教會(Bethel Mission)醫院、中小學、孤兒院、佈道團，在中國各省舉辦奮興會。從以上的經歷可見，四人對於西方思想的引進及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開啟了中國對女性地位的重視。此後日本的「賢妻良母」論也傳入中國，讓晚清的女學論述折射出日本思潮和西方思潮的影響。

晚清最初的女學思想提倡唯有婦女受良好的教育，才能培育出優秀的國民，洋溢「賢妻良母」論的色彩。鄭觀應指出女子學習可佐子相夫。<sup>31</sup>林紓主張女學的目的在於培養賢妻良母。<sup>32</sup>康同薇則說：「西人蒙塾，多用女師，蓋以其專精靜細也，然尚不若賢母之益。」



梁啟超也強調受教育的女性得以生育資質優良的子女，最終求得中國的富強。他指出：「女學可使女人有職業以自養。」「國人無男無女，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而無或能或不能之別，故女學與男學必相合，今之美國，殆將近之矣。……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sup>33</sup>他將前述留美女子刻畫為開先河的新典範、站上國際舞台的新女性、中國崛起的象徵、乃至於中國不可侮的代表。他在將康愛德與晚清女子相對比，指她「以中國之積弱引為深恥，自發大心，為二萬萬人請命」，期盼「海內外二萬萬之女子皆如此類」。<sup>34</sup>不過梁啟超刻意未提教會對康愛德的協助及其基督信仰，似乎不願意被基督教掠美。上海出現的第一所國人自辦女學，即經元善的「經正女學堂」，目的也是「重母教，興女學」，希望改良傳統的母教，培養婦女自養自立的能力，傳授其實用技能，使她們畢業後能直接參與社會工作，並且讓兒童得以接受良善的啟蒙教育。

20世紀之後女學思想漸有發展，嚴復在〈論滬上創興女學堂事〉把婦女能否受教一事，與國家命運、民族前途、人民素質、以及救亡聯繫起來，指出：「此後有志之女，若能努力，何患不能比迹於西人？」<sup>35</sup>他強調僅興辦女學是不夠的，還應呼籲婦女走出家門、校門，投身社會活動，爭取與男子同權；並鼓勵婦女建議自己的組織，不僅能在社會活動中吶喊助威，還能提供保障。留德的蔡元培在上海創辦了愛國女學，主張教育可激發民眾的愛國思想，提高國民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思想，女性身負教育子女之責，故應特別重視女子教育。他反對把女子培養成純粹賢妻良母式的知識分子，注重「完全人格」即德育的培養，特別把體育放在女學之首位，倡導廢纏足，希望最終實現婦女的完全自立。辛亥革命時期的愛國女學具有強烈的革命性質，重視愛國與革命情操的培養，特別強調化學課程，因為蔡元培認為女子適合從事暗殺任務。

不單是嚴復及蔡元培等人欲逐步克服「賢妻良母」重視婦女「相夫教子」功能的景況，《女報》、《女子世界》也展開對「賢母良妻」論

的批評，認為未能彰顯女權，評曰：

且夫賢母云者，良妻云者，均對於男子而言。為他人母，為他人妻，美其名曰賢母，曰良妻，實則男子之高等奴隸耳。日本女子教育，因亦有高等下女教育之評，見諸《女學世界》雜誌。……今之賢母良妻，先與女子以少許之教育，而仍奴之，此所謂高等下女教育也。……總之，賢母良妻，固不無可取者。日本之家庭，因較吾國為文明，蓋高等之奴隸自較下等為佳。此即比較的也。然試為女子思之，不能自用，而用於人，其無智者，固所當然。但男界非盡人而神聖，女子非無人能神聖。今男子設有大學，未必人人入大學，女子亦然耳。<sup>36</sup>

這些論述都凸顯了清末民初中國的女學論述已漸超越「賢妻良母」的思維，開始展現自主性。

女權觀念的引進，則主要透過日本文獻的中介及啟蒙思想家的文字。《清議報》中譯福澤諭吉所著〈男女交際論〉，聚焦於「女權」觀念的闡述。又翻譯石川半山的〈女權漸盛論〉，描述歐美諸國女權已受重視，女性雖無參政權，但教育程度高，部分擁有職業。留日的馬君武則透過日文，將史賓賽 *Social Statics* 之16章譯為〈女性的權力〉，又在《新民叢報》陸續譯介彌爾的女權之說。他強調「女權」意味著權力的主體在女性之身，提倡女子逐漸脫離附庸地位，得以參與政治，且夫婦之間必須平等。

此際，女學生夏循蘭、錢豐保、何凝香、胡彬夏、林宗素、陳擷芬、龔圓常、方君笄、秋瑾、方君瑛和唐群英等人相繼進入日本華族女子學校、實踐女學就讀，成為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第一批積極爭取女權的女性啟蒙者。他們到日本未久(1903年4月)，便成立女性組織「共愛會」，欲爭取女權、愛國救亡。1905年，實踐女學接受湖南20名女學生留學，是女子公費留學的肇始。<sup>37</sup>她們成為女權運動的骨幹，開始執筆論述婦女解放的諸種問題。胡彬夏除了在江蘇



留日同鄉會主辦的刊物《江蘇》特闢「女學論叢」專欄，擴大「共愛會」的影響力；也撰有〈祝共愛會之前途〉、〈論中國之弱女子不得辭其罪〉等文，提倡「振興女學，恢復女權」，在她的鼓動下，幾乎每位會員都有女權言論發表。

## 六、結語

在以「中體西用」、「東道西藝」論為主軸的現代化進程中，「學」受到關注較「技」略遲，中日皆然。但日本「東道西藝」思想基於一種超乎傳統的、對地球規模的先進想像，具備將「天理」轉作世界萬國之「公理」的認知基礎。<sup>38</sup>在自然認識面主要肯定西洋自然科學的普遍性，由其根柢處加以攝取，在社會理論方面則將既存秩序視為自然秩序加以擁護，排除西洋社會政治體制的影響，企圖兼備西洋的實證科學技術與東洋傳統道德的長處。其論者不若晚清「中體西用」論者之執著於「體」之不可更易，迅速走上全面西化的道路——開啟公派留學生之舉，由船載書籍、傳教士、貿易行為之「被動」受納，轉為由外交使節及留學生出洋親炙西方文化人情的主動攝取。女留學生的派遣及女子教育的振興，也獲得宮內省及開化人士一致的支持，並因此而發展出「良妻賢母」論。

「東道西藝」對於主體性之堅守，讓日本在列強環伺下維持獨立，但其保守性不容我們忽視，尤其在國家的收斂、統合力量趨強時，便益發明顯，其女學、女權的發展尤其表現了這一面向。「良妻賢母」論雖有意識地擺脫儒家式以服從為本分的女子形象，改以西歐社會中與男子平權、有能力教育子女的知性女子形象為典範，但所欲彰顯的是18世紀美國「共和國之母」以家庭與子女為重的特質，對於19世紀美國婦女參與政治、積極社交、走入社會之舉，則加以拒斥。1890年以降國家主義的收束後，政府主導的「良妻賢母主義」反過來束縛了女學的深化與進展。同時主體性的強調凸顯出國體獨尊

的思想，也令民族主義由理性膨脹為非理性；「神國」觀念與西洋技術結合，走上了軍國主義之路。可以說是因過分強調將「智」(用)由「德」(體)之中切離，推演到極端，喪失了對事物愛之惜之憐之的態度，為二次大戰的失敗埋下伏筆。

「中體西用」論在「恭順倫理」的籠罩下運作，帶著在既有體制下經世的色彩。為了在理論架構上加強體用之間的連結，也以「西學源出中國」說或託古的做法，令中體在不變的前提下，引進西用。雖有意引進自由、民主、民權之說，卻由於執守「體」之不可變，造成三綱五常與自由民主之論在邏輯上的不相容，遲遲無法突破理論格局，最後成為落實自由民主的攔路虎。容闈與嚴復等留洋者意識到以本末、根葉、主輔來分判中西學術，將造成現代化的障礙，主張一體有一用、分之則兩立，未能精研科學理論，便不可能幻想要有船堅炮利之「長技」。可惜孤掌難鳴，所論也不足以由根柢動搖中體西用的理論架構。

女學思想在中體西用的格局下，發展雖遲，且19世紀後半葉主要仰賴傳教士之功，19、20世紀之交則主要受日本思潮的影響。但20世紀後，西方女權思想經由嚴復、蔡元培等留歐者傳入後，展開新的局面，他們反對將女性拘制於「賢妻良母」的格局中，重視女性的社會參與。加之留日女子在積極投身愛國救亡運動的同時，從不忘爭取女權，且把女權的實現當作衡量民權實現的尺度。她們透過組織的成立和報章的發行，提倡愛國、救亡圖存、社會變革的同時，始終堅守女權主義立場，將自己的組織定位為女權主義的組織，將所興辦的報紙視為宣傳婦女解放思想的陣地。

當時中國依然是國際社會之弱者，而女性是儒家倫理中的弱者，由於富強中國和強化中國女性在20世紀之後被視為表裡合一的問題，而形成了強化女性可富強中國的論理。女留日學生則透過革命概念貫串了女權與民權及國權。可以說，近代中國的女權運動是在民權運動中爭取來的，並非因為實現民權便自然實現女權，而



是因為在爭取民權的過程中積極爭取女權，才讓男女之平等和平權成為可能。如此，中國的女權運動成功地跨出日本賢妻良母論的影響，與民權、國權相攜相繫，呈現獨特的面貌。

- 1 東道西藝論約發生於1840年代，而中體西用論思想的成立則與1861年推動的自強運動密切相關。
- 2 魏源著：〈海國圖志序〉，《海國圖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頁5。
- 3 馮桂芬著：〈采西學議〉，《校邠廬抗議》卷下（台北：文海出版社翻印本），頁124。佐久間象山著：《省儉錄》、《日本思想大系》第55卷（東京：岩波書店，1976），頁413。
- 4 薛化元著：《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對甲午戰爭前後中體西用思想的起源和流變有精闢的考察。
- 5 例如徐繼畲（1795-1873）及橫井時存（1809-1869）均異口同聲稱讚華盛頓以來的政體與上古三代聖人之教暗合。
- 6 佐藤昌介譯：《慎機論》，（東京：中央公論社，1978），頁116-117。
- 7 井上哲次郎著：〈泰西人ノ孔子ヲ評スルヲ評ス〉，《東洋學芸雜誌》，第1卷第4號（1882），頁13。
- 8 前引馮桂芬著：〈采西學議〉，頁123。
- 9 參楊貞德著：〈中體西用——晚清朝中理法爭議及其意涵〉，林維杰、邱黃海主編：《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中國觀點》（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頁313-366。
- 10 陳瑋芬著：〈西學之子：容闈與新島襄的異國經驗與文化認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0期（2007），頁223-266。
- 11 李喜所、劉集林等著：《近代中國的留美教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2000）。
- 12 代表計有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清華大學校長唐國安、天津大學校長蔡紹基及鋪建第一條中國鐵路（京張鐵路）的詹天佑等。
- 13 嚴復著：〈原強〉，《嚴幾道詩文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一，6丁。
- 14 嚴復著：〈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嚴幾道詩文鈔》，頁241。

- 15 薛福成著：《籌洋芻議》，收於《薛福成全集》（台北：廣文書局，1963）。
- 16 黑田清隆著：〈希望開拓使設立女學校之上奏文〉。
- 17 吉益與上田因水土不服在一年內歸國，其餘三位完成10年學業返國。  
岩崎京子著：《少女たちの明治維新：日本で最初の女子留學生たち》（京都：PHP研究所，1983）。
- 18 吉益及上田之父也都任職於外務省。山川之長兄與永井之父及長兄也曾隨使節團參訪歐洲。
- 19 大久保利謙著：《森有禮全集》第1卷（東京：宣文堂書店，1972），頁611。
- 20 山川菊榮著：《兩代女性記》（東京：平凡社，1972），頁30-31。
- 21 《明六雜誌》30號，1875年2月。
- 22 《教育時論》1889年11月5日。
- 23 1830及1840年代，郭實臘牧師夫人艾迪綏（Mary Ann Aldersay）陸續在澳門、寧波開辦女塾，是為中國女子得受教育之先聲。
- 24 關於金雅妹的資料最早見於1934年的《東方雜誌》（第31卷11號）。
- 25 麥加梯教士於1843年往赴中國傳教，當時服務於寧波長老教會。相關經歷參見Henry W. Rankin, "Divie Bethune McCartee, M. D, Pioneer Missionary. A Sketch of his Carrer,"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30:10 (1902), pp. 497-503。
- 26 許金匄的相關研究存在諸多訛誤，學術界大多數論著將其名誤譯為何金英、吳金英、何金美。考證上比較詳盡的研究可參丁春、王尊旺著：〈近代中國女西醫先驅許金匄述論〉，《福建中醫學院學報》第17卷第3期，2007年6月。
- 27 1904年起北美浸禮會婦女傳道部便開始派遣女傳教士來華，專門執行婦女傳教和教會女子學校工作（過去由傳教士的妻子代行婦女工作）。也陸續培養了中國女傳道士和女護士。
- 28 Margaret E. Burton, *Notable Women of Modern China* (Charleston: BiblioLife, 2008), pp. 43-44.
- 29 成田靜香著：〈ある中国人女性の神戸における醫療傳道：金雅妹の前半生〉，關西學院大學文學部編：《人文論究》48:3 (1998)，頁174-188。
- 30 七項決議如下：纏足女孩不許入教會學校、不允許入教、入教後纏足而又不願放足的人將被開除、教區長老會每年或每季舉行一次關於反纏足的佈道、教徒不能讓兒子與纏足女子結婚、堅持纏足惡習之官員不應得到升遷及堅持纏足惡習之人應受懲罰。



- 31 鄭觀應著：〈女教〉曰「庶他日為賢女，為賢婦，為賢母。……復能佐子相夫，不致虛糜坐食。」收於《盛世危言》（鄭州：新華出版社，1998），頁79-82。
- 32 林紓著：〈興女學〉，收於《閩中新樂府》。
- 33 梁啟超著：《變法通議·論女學》，收於《飲冰室文集·一》（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頁37-44。
- 34 胡纓著：〈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始研究》第九期（2001）。
- 35 嚴復著：〈論滬上創興女學堂事〉，《理論與改革》（1991），頁72。
- 36 陳以益著：《男尊女卑與賢母良妻》。《女報》第二期，1909年2月。
- 37 20世紀初，赴日留學的女子人數持續增長。1903年約有20名，1904年約接近百名。
- 38 參拙稿〈由「天下」與「中國」概念的轉型看日本關於國際秩序的度量衡〉，黃自進編：《東亞世界中的日本社會特徵》（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8），頁165-203。

# 大隈重信「東西文明調和論」中的 日本及中國的定位

❖ 沈薇薇 ❖

## 一、前言

大隈重信(1838-1922)是明治大正時期日本的重要政治家、外交家，也是開辦早稻田大學及創立大日本文明協會的教育家。<sup>1</sup>早稻田大學在大隈去世後整理出版其未完成遺作《東西文明之調和》。該書闡述大隈對如何融合西方文明(歐洲文明)以及東方文明(主要是以中國文明為代表的東亞文明)的理論，甚受學界重視，例如《東西文明之調和を讀む》《閱讀東西文明之調和》是由不同領域學者分工進行具體解析的論文集。<sup>2</sup>中川久嗣的〈近代西洋の終末・危機意識と大隈重信の文明論〉(近代西洋の終末、危機意識與大隈的文明論)是以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The Decline of the West*(西方的沒落)來論述大隈的文明論中意識形態的論文。<sup>3</sup>這些著作或注重於文本分析，或著力於提示大隈的文明論中對近代化問題的思考，但對於他的文明論思想中的「東洋文明」所投影的日本與中國的身份認同問題未曾進行深入探討。本文試以《東西文明之調和》與大隈的其他相關言論為材料，著重探討其文明論中日本與「東洋文明」的關係以及其中的中國觀。



## 二、《東西文明之調和》的構想與成書

大隈去世後，其口述遺作《東西文明之調和》經參與該書編寫研究的早稻田大學希臘哲學教授金子馬治(1870-1937)整理並作序，同樣參與該書編寫整理工作的早大漢文學教授牧野謙次郎寫後記，再有當時任早大校長鹽澤昌貞寫出版記，由早稻田大學發行出版。根據編者金子馬治的序言，該書的寫作計劃開始於1916年秋天，當時位居內閣的大隈在公務之餘，召集任教於早稻田大學的金子馬治與牧野謙次郎二人，來參與他的關於東西文明調和論的研究計劃。<sup>4</sup>開始的半年內，兩教授每周一次定期上門與大隈討論此研究的著手點。考慮到東西方文明內容豐富繁多，參與研究的人員精力、專長有限，經過一番商榷，他們便轉投專攻東西方文化的思想研究。最後由大隈做主，將研究重點定在了中國先秦思想與古希臘哲學的比較，即「早初東西思想的比較研究」之上。<sup>5</sup>此後同樣每週一回，每次數小時，金子、牧野二人在大隈的指導下致力於這一理論研究工作。由於大隈習慣口述作文，於是《東西文明之調和》的書面整理編輯工作主要落在金子馬治身上，牧野謙次郎則負責提供漢學研究的材料與見解。這樣的研究進行到1920年，文明比較論部分的著書已告一段落，全部材料統一匯總至大隈面前由其再度審視，定奪全書的整體方向。由於大隈的病勢，寫作計劃就此中斷。因此今日所見成書出版的《東西文明之調和》便是1920年初步完成的東西方文明(先秦諸子與希臘先哲思想)的對比部分。金子馬治在這部書的架構形成與編寫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書中有關漢學的部分主要是基於牧野的見解與建議，但兩人均在書中表示大隈的意見是整部文明調和論的綱領，他們的所有整理工作最終都曾經由大隈親自過目，這樣的說法強調書中大隈的調和論的原創性。

從大隈的角度來說，「文明調和論」這一構想在他心中植根已久。根據《大隈侯座談日記》1920年的記載，他曾以25年來的「文明

調和論者」自居。<sup>6</sup>在大隈的自我認識中，他的這一「文明調和論」早已萌生於1895年前後。他的這一說法可以通過身邊近側工作的人的回憶得到佐證。據鹽澤昌貞的回憶，在他擔任大隈宅邸招待東西方來賓的翻譯工作的20年間，大隈一直對來自東方(中國、印度、土耳其等)的貴客宣揚學習西方近代化文明的先進優點的好處；又對西歐國家的賓客介紹以日本為首的東洋文明，可謂身體力行地促進東西方來客對對方的理解。<sup>7</sup>這可以看作是大隈致力於文明調和論的一種身體力行的表現，也可以說是他後來撰寫理論著作的一個發端。

「文明調和論」的理論概念化則可追溯到1907年前後(日俄戰爭後)。1907年至1908年，在大隈主持下，日本政、經、學各界人士聚集一堂編寫了一部《開國五十年史》，其中大隈親自執筆撰寫了綱領部分。書中大隈對日本國體的主張，稱讚古代日本吸納印度及中國文明，及對近代日本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肯定都與後來《東西文明之調和》中的論調保持一致。雖然《開國五十年史》的寫作目的更傾向於表明當時的日本還應更多地學習外來文化的先進之處，與此同時，大隈也將眼光轉向了對東西文明的內在共性的探討。跟隨大隈四十餘年的市島謙吉所著《大隈侯一言一行》中謂，大隈在1906年4月在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發表題為〈東西文明的調和〉的演講，言稱「基督教的精神與儒教的精神一致」，孔子的「仁」與基督教的「愛」在精神上是一致。<sup>8</sup>大隈又於翌年3月初創大日本文明協會之時，在其刊行的《外國人的日本觀》第一冊的總論中再度論及東西文明的調和。1907年這一時期是他公開提出自己的東西文明調和論的開始。<sup>9</sup>他還曾於1918年出版《大隈侯縱談橫語》一書，這是帶有向青年人鼓吹日本宏圖大業的政治宣傳色彩的口述著作。<sup>10</sup>他在這本書中提及的東西文明調和論已與後來成書的部分一致，轉向強調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應更有所為。綜上所述，大隈對「文明調和」這一觀點，是有著長時間的醞釀及堅持的，他的「文明調和」的主體與前提是日本通過維新實現的近代化的文明進步。



在大隈眼中，文明的「調和」指的是一種落後者主動學習先進者，取長補短的進步論。他的「文明」一詞除表示古代文明外，大多數時候是指文化程度的發達。其實從大隈早年的求學至從政的經歷便可看出「文明調和」這四個字在他身上的體現。1838年，大隈重信作為佐賀藩士之子出生，7歲入藩校弘道館，接受佐賀特色的朱子學教育，連《葉隱聞書》也要修讀。根據大隈重信日後的回憶，由於這一教育顯著的封建武士道特性，他自小對此十分反感。1855年借弘道館的南北騷動之機退學，此後就沒有返回學校，而是師從有「佐賀的吉田松陰」之稱的枝吉神陽學習國學，又於1856年轉入藩內蘭學寮開始接受歐洲文化的薰陶。他在1865年進入荷蘭傳教士Guido Herman Fridolin Verbeck擔任校長的英學塾致遠館，與副島種臣共同擔任教頭，並向校長學習英語，由此接觸到《新約聖經》與〈美國獨立宣言〉。根據事後大隈的回憶錄，他在這段求學期間頗受藩主鍋島直正的影響。藩主主動引進洋學，將英學塾遷入弘道館，容納東西學兩派人才的舉動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up>11</sup>到了1868年，大隈由小松帶刀推薦開始參與明治政府的外交事務，後來在外交、財政與憲政體制建設中發揮才幹，成為明治大正時期的著名政治家。

大隈的身上同時具有舊官學的儒學根底、西學的平等進取思想，以及受國學影響的日本民族文化論，這一切都是促成他以日本為主體的「東西文明的調和」來作為自己的思考方向的基礎。

### 三、從《東西文明之調和》看大隈的文明論

《東西文明之調和》全書分序論及本論兩部分。序論由東西文明概論進入東洋與西洋的上古時代文明之比較；本論開始進行系統的東西方思想史代表人物的比較。東洋文明、西洋文明各自的體系內容紛繁複雜，大隈決定化繁為簡，以古代中國的儒學直接影響到日本文化，並且長期佔據官方地位的學術思想作為東洋文明的代表。

西洋文明則以被視為歐洲文明根源的希臘哲學為代表，以這兩股學術源流思想的比較來作為東西兩種精神文明的研究對象。他寫道：

廣義上講的東洋思想，以中國思想為首，還包括印度的宗教思想乃至古代小亞細亞的文明。在此我們縮小範圍，只選擇對本邦特別有過直接影響的中國思想來進行考察。主要限於考察其學藝源流，也就是迄止周朝晚期的思想。而另一方面歐洲學藝的淵源，不言而喻是古代希臘的文明。<sup>12</sup>

通過比較雙方的不同來探究東西之間可互通的代表人類共性的思想部分，以及比較兩者各有的長短之處、獨特相異之處。該書含序論緒言加十五章，先從所謂文明的外觀的相異之處著手，對比中國與希臘的地理地貌特徵和民族歷史的形成，總結出每個民族文明的精髓思想、政治態度反映在國民生活的實際中，故而為國民性的產生根源。繼而追溯古代希臘與中國在藝術、宗教、科學上的發展；隨後的本論十二章，立足於對比兩種文明之根本的政治與學術思想上的不同，其間列舉了東西諸先哲的思想一一進行比較，並在最後三章各舉東西文明歷史發展為例，批評了中國文化在當時因為固步自封，不主動與世界的先進文明相調和而衰落，描述了歐洲文明經歷過中世紀基督教影響後，再經文藝復興與啓蒙重返古希臘科學精神，從而進入近代化的過程，如此一直聯繫到當今實際，打通東西精神文明從古代被繼承發展到近代的脈絡。

全書宣揚的進化論、實用主義觀點因襲西方思想，對政治思想的重視以及以道德倫理為評判標準又類似中國歷史著作。縱觀全書對於民族與國民的關係的詮釋，其觀點為：每個民族文明的精髓思想、政治態度反映在國民生活的實際中，故而為國民性的產生根源。<sup>13</sup>這是大隈對文明、民族與國民性關係的觀點。

選擇中國先秦上古思想與古希臘作為東西方文明的代表進行比較，其實並非大隈憑空信手而來。從文明史比較研究的角度來說，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歐洲學術界有過這樣一番研究上古文明的熱潮。受此風氣影響，在東洋也出現援引此類研究方法對亞洲的古代文明、民俗發生興趣的研究傾向。而在涉及到文明一說時，將東洋與西洋的古老文明和思想進行排列比較的言論也並不罕見。日本的佛學研究者井上圓了(1858-1919)就曾把「孔子、蘇格拉底、釋迦牟尼、康德」並尊為「四聖」，進行祭拜。類似井上這樣給東西洋哲人思想家排座次的觀點也多見於其他同時代學者、政治家的言論中。並且，從《東西文明之調和》中對於文明發展衰落過程、文明與民族關係的論述中也可以看出與同時期斯賓格勒及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著作相類似的語調。作為開辦日本文明協會來倡導西學書籍翻譯，熱心引進西方學術思想，不忘跟蹤學界研究動態的大隈，他與參加編寫的學者金子馬治和牧野謙次郎不會不熟悉這些學術潮流，因此將古希臘與中國先秦的思想進行對比來作為書本的主體也就不顯得奇怪。

另一方面，東亞在進入近代以來，就不曾停止過對比東西方文明的討論。無獨有偶，在中國文化知識界從1915年《新青年》創刊起也開始了一場延續十餘年的關於東西方文化的論戰。這場論戰從單純羅列東西文明的優劣開始，發展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對東西文化是否能調和的討論，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新討論東西文明的發展道路，看中國該何去何從。就是在這一時期，大隈的東西文明調和論一經公佈就引起中國知識界的注意，作為一種來自海外重要人物的觀點被介紹到中國。《東西文明之調和》出版後很快有了中文版。在1908年的《漢口中西報》上，共有4月14日及15日兩段文章介紹了他的文明論，現節錄一段如下：

大隈伯之言，曰：『世界之文明，歐洲佔三分之一。其三分之二，則在亞洲。故日本之對於世界前，則直接東方之文明……後則間接受西方之文明。東、西兩洋之文明，而交集於日本。吾人稱此時代為文明衝突時代。』<sup>14</sup>

正如後世學者評論所言，這部著作與能代表幕末明治時期的「和魂洋才」、「西方物質+東洋精神」體用論不同，也與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那樣主張移植西洋文明精神於東洋的一邊倒觀點不同。<sup>15</sup>大隈有一種平等觀念，認為互相不同的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均有其優點，然天下人種其實不分優劣，基督講「愛」與孔子的「仁」也相通，所以人類的文明最終能通過四海一家，達到世界大同而實現最終的和平與幸福。這就是為何溝通調和東西方文明是一項重要的任務，也是他撰寫該書的一個理想。

但是《東西文明之調和》以對比開路，卻沒有再進一步提出調和的具體方法或理論。在書的序言與後記中，共同參與該書編寫的兩位學者也表示，1920年完成後來出版的部分後，尚有一年經大隈親手修改的過程，由於大隈的身體健康原因，以致中途擱置了這個計劃，使得這本書最終只能以未完成的形式呈現。對此，金子、牧野兩位學者也只能嘆息，非大隈這樣具有貫通東西文明想法及學識基礎且長期致力於政治外交活動的人，是不能看到通過比較來促進文明之間相互取長補短的重要性。

#### 四、大隈的儒學觀與中國論

大隈早年反對藩校官學，其後轉向國學和西學，從政後也一直熱心於日本的現代教育與西學的引進，這些經歷讓他看起來不像一個與儒學親近的人物。他對幕府時代舊官學體制的反抗，對文人情趣與漢字的抵觸更使後世一些學者傾向於將他描述成一個徹底反對儒學的人。可是從他的《開國五十年史》等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將日本古代吸收中國儒家文化這一歷史看作日本的成功，透過他的一些自述，還可以看出他對於孔子所抱有的敬意以及他自己對孔子學說的理解。比如在《大隈侯座談日記中》，他提及校園中的祭孔活動，回憶自己年幼時也時常在學校祭拜孔子，並回憶



當時的種種細節，申明自己反對的是作為官學的朱子學，而不是「真正」的孔子之道。他表示：

對大學的諸位先生而言，我這個退校生大概沒什麼稱頌孔子老師之德的資格，不勝惶恐，但我並不是因為違背孔子老師的道而遭放逐的，只是對當時獨盛一時的朱子學宋學表示反對，沒有反對孔子。<sup>16</sup>

難怪《東西文明之調和》是以中國先秦哲學，而非德川幕府推崇的朱子學作為對象。在其論述對比部分，他先以孔子的製作之說與蘇格拉底的懷疑主義並論，稱頌二人為創立東西兩大文明的先師。同樣地，他以老子對比柏拉圖、斯多葛來研究東西文明中都存在的悲觀、虛無主義。他繼而宣稱在先秦與古希臘的時代，東西兩大文明在儒教及希臘哲學思想的影響下，在道德和政治上都達到高峰。此外，書中還提到了荀子、楊子、墨子、韓非、商鞅等先秦思想家，對中國法家思想中專制主義一面加以批判。在對中國先秦思想家的評論中，大隈推崇孔子，顯示出對創新、變革、實踐等理性主義的支持。

作為受過儒學啓蒙薰陶的武士之子，大隈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自己獨到認識的一面。除此以外，作為明治及大正時期重要的政治家與外交家，他還有另一個觀察及認識中國的角度。大隈肯定早期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繼承，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古代以來日中之間的交往關係。在面對東亞格局時，他打出「親情牌」，強調日中之間「同種同文」，對中國的內政外交都表示莫大關心。比如戊戌維新前後，大隈曾一度參與中國的教育變革。1897年前後，興中會成員華商馮鏡如、維新黨人徐勤等在橫濱創辦大同學校，實踐康有為的孔子教教育，大隈不僅提供幫助，還在1899年3月18日出席其開校典禮，與犬養毅等一同參拜校內的孔子像，並發表演講。之後梁啟超在該校的基礎上增開東京大同高等學校、神戶大同學校之時，大隈也給與支持和幫助。<sup>17</sup>

另一邊廂，大隈在《東西文明之調和》以及其他書中批評當時中國政治的腐敗及學術不振。<sup>18</sup>這主要是基於其對宋學的批判。他甚至發表過漢代以後真正的儒學便衰落了言論，在他眼裏，中國政治之失莫過於「文弱」，包括其「漢字廢止」論也是出於對繁縟矯飾的「文弱」的批判，因為漢字帶來太多的藉口，讓人缺乏實幹精神。<sup>19</sup>在大隈眼中，孔子提倡實幹精神和創新，他認為日本已經給中國作出了掙脫腐舊的榜樣，值得中國學習。

大隈對儒學的認識和判斷，一方面表示其作為一個日本人對於自身儒學素養的自信，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其對當時的中國居高臨下的指導者姿態，即將中國置於日本庇護之下，由日本作為亞洲的盟主。難怪他的內閣對華提出二十一條。把日本視為落後中國的監護人的觀點，其實在20世紀初期的日本政治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五、大隈的文明調和論中日本的角色

明治維新50年後，成為近代民族國家的日本的經濟軍事實力增強，歷經日清、日俄兩次戰爭，其國際地位與民族自信達到了空前的高度。1914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依托日英同盟的日本躊躇滿志地隔海眺望西方陣營。當時日本朝野上下處在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的狂熱氣氛中，卻又覺得自己作為一個東亞人種的國家，在西方列強集團爭霸的國際大環境中尚未完全與之並駕齊驅，急欲進一步提升國際地位。大隈撰寫《東西文明之調和》時便是處於這樣一個時代背景。於是《東西文明之調和》的一個主要目的便是要通過一套理論建構來傳達「日本是承擔調和東西文明這一天命大任的國家」的主張，而這種「天命論」蘊含了一種對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的監管心態。

相比《東西文明之調和》致力於學術理論的經營，大隈於1918年發表的口述著作《大隈侯縱談橫語》則是一篇民族自我意識膨脹鮮



明，語調高揚的政治宣傳手冊。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針對當時日本青年的宣傳讀本，在這本書中可以更直白地看到他書寫《東西文明之調和》的政治目的，甚至包括一些在《東西文明之調和》中尚未涉及的如何進一步具體推進「調和」的構想。

在《縱談橫語》中像這樣鼓吹日本代表東洋承擔東洋文明的天命論比比皆是：

然而要達成此大理想，必先讓兩大人種的白人與黃種人進入同等的文明，必須要打破白人具有支配世界特權的錯誤思想。在此，日本要作為東洋的先覺者，以及其代表者，指導亞洲處於劣等文明的各國，日本有將他們帶進文明的責任。此即為日本對世界的職責，所以日本人應將世界和平的理想特別作為日本人的終極理想。<sup>20</sup>

「天命論」也成為一種「天職論」。他表示：

所以吾輩應像那部《國民讀本》中描述的那般「我國既代表著東洋文明，又處於把西洋文明介紹到東洋的地位。妥善調和東西的文明，更使世界文明醇化，讓人類的和平到來，為人道的完美謀劃，誠為我國民之理想，我日本帝國之天職。」<sup>21</sup>

大隈的「新日本之天職論」不外乎高調宣揚歷經明治維新以後的新日本採東西文化之長，願意承擔東西文化之調和這一天職。日本不僅要代表東方文化，在白人文化主導的國際局勢中更要爭一席位。他強調日本作為先進代表，必須扶植東洋的落後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大隈曾在1920年前後對當時美國的親華外交表示不滿，直言日本才是最適合擔當中國監護人的國家。<sup>22</sup>在《縱談橫語》中，大隈還曾專門撰寫一篇反駁文，批評曾任英國駐印度總督的George Curzon在格拉斯哥大學發表關於英國人最該承擔調和東西文明使命

的演說。<sup>23</sup>Curzon 謂英國人知識及技術先進，與亞洲交往較歐美他國廣泛而深入，因此最適合調和東西方文明。大隈批駁這看法是白人的傲慢與無知，激烈地辯稱日本稟承東洋文明，又成功吸收西方文明，作為一個已升格進入世界強國之列的亞洲國家，理應更具備提攜東洋進入西方文明的條件與職責。

在大隈的眼中，日本的民族特性主要是日本學習先進國家文化速度快，以及能將外來文化化為自身有機部分的能力。他寫道：

實際上，日本國民擁有能僅靠五十年就消化歐洲近代四五百年  
的文明史的強烈的消化能力。過於追求新智識而導致食傷的危  
險，對我國民而言是決不存在的。<sup>24</sup>

他相信日本的國家特性則是四面環海的地理條件以及人民不好戰的民族特性所造成的萬世一系天皇制。這種民族國民性的認知也與《教育敕語》體系下重視尊皇忠君道德的思想潮流相照應，反映了當時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一種自我認知。

最後，雖然《東西文明之調和》未曾提出調和之法的具體解決之道，在《縱談橫語》中卻有一篇提出廢除日語漢字標記，轉用字母注音來方便日語對外傳播的提議。其目的是推廣日語成為世界性的學術語言，以加快東方文明的傳播、融合，與幕末明治初的漢字廢止論有所不同。他在這部書中提出轉用字母注音的契機是與英國學者交流時，聽到對方說歐洲學界當時流行學習日語，可惜文字較難，進度不快。可見在《縱談橫語》著述之時，大隈已由積極輸入西學知識的「大日本文明協會會長」的立場轉向主動向西方輸出日本的價值觀和思想學術這一更上一層樓的思考中了。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他還是承認當時文明的主流和中心在西方，所以東洋的文明國家為了實現與其文明融合，仍需更加提升自己。



## 六、小結

正如鹽澤昌貞在《大隈侯與東西文明的調和》一文中的分析，大隈重信心中的「東西文明調和論」的基石是「新日本的文明發達」，是日本這個國家從古到今吸收外來文化成長發展的歷史所提示的「調和性」與一種包容的創造力。<sup>25</sup>相比同時期澤榮一、成瀨仁藏、浮田和民等一同創辦「歸一協會」的「調和論」，雖然他們都是出於對當時日本的社會變革狀況的關心，但「歸一協會」側重希望改良社會浮躁的風氣，更面向未來的道德、宗教上人類精神的歸一調和；大隈的調和論則是發於對日本歷史與現狀的高度肯定，對日本現時國際地位的提示，更多著眼在政治上。

應該說，大隈指導下的這一東西文明比較論由於其預設的「日本」意識，有按圖索驥尋找大隈心中文明交融的理想範本的傾向。書中提煉出的東西文明之特徵，與他認為日本吸收同化的兩大文明的優點不無關係。或者說正是大隈心目中理想的日本站在了他在書中佈置的文明的交匯點上，他要尋找的答案其實已經存在於他對日本國民性優越論上。

而且，雖然大隈在書中提出了人種平等，但其主要目的是要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與歐洲強國爭座次；另一方面，他對中國等亞洲落後國家擺出「處於高位的文明必然擠壓統領處於低位的文明」的說辭，就其本質是與歐美列強如出一轍的殖民主義，只不過他認為日本手中有一枚能在文化上同根同源的亞洲國家中間「號令盟主」的玉璽。<sup>26</sup>究其根本，大隈這番文明調和的基調還是帝國爭霸主宰世界思考模式下的產物，其「東西文明調和論」將明治日本放於亞洲現代性的最前端，進一步強化日本人的民族意識及身份認同。

- 1 大日本文明協會在1908年由大隈重信創辦，以促進日本學術文化為目標，該協會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著作。
- 2 峰島旭雄、小泉仰等著：《東西文明之調和を読む》（東京：北樹出版社，1990）。
- 3 中川久嗣著：〈近代西洋の終末，危機意識と大隈重信の文明論〉，《日本思想史》40（ペリカン社，1993年1月），頁30-44。
- 4 金子馬治著：「緒言」，《東西文明之調和》（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90），頁1-7。
- 5 《東西文明之調和》，頁3。
- 6 木村毅監修著：《大隈侯座談日記》（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8），頁324。
- 7 鹽澤昌貞著：〈大隈侯と東西文明の調和〉，丹尾磯之助編：《巨人の面影——大隈重信生誕百二十五年記念》（東京：校倉書房，1963），頁78。
- 8 市島謙吉著：《大隈侯一言一行》（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3），頁126-127。
- 9 大隈重信著：《論說：東西文明之調和》《直隸教育雜誌》第9期，1907年。
- 10 大隈重信述，福田滋次郎編：《大隈侯縱談橫語》（東京：日本書院，1918）。
- 11 大隈重信述，円城寺清編：《大隈伯昔日譚》（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頁6-7。
- 12 《東西文明之調和》，頁8。
- 13 同上書，頁19-20。
- 14 《漢口中西報》，686號，1908年4月14日。
- 15 小泉仰〈二つの比較文明論——《文明論の概略》と《東西文明之調和》〉，《東西文明之調和を読む》，頁26-46，谷中信一著：〈中国思想理解を中心に〉，《東西文明之調和を読む》，頁68-95。
- 16 《大隈侯座談日記》，頁247。
- 17 參《清議報》第十冊（光緒25年2月21日）第18冊（光緒25年5月11日）。
- 18 參大隈重信著：〈清国革命論〉，木村毅監修：《薩長劇から国民劇へ——明治政党興亡史談》，頁215-265。
- 19 《大隈侯座談日記》，頁96。



- 20 《大隈侯縱談橫語》，頁12。
- 21 同上書，頁27。
- 22 參池田淋儀編：《隈侯閑話》(1922年)，頁201-203、228-230。
- 23 參《大隈侯縱談橫語》，頁46-47。
- 24 同上書，頁31。
- 25 鹽澤昌貞著：〈大隈侯と東西文明の調和〉，《巨人の面影——大隈重信生誕百二十五年記念》，頁75。
- 26 大隈重信著：〈清国革命論〉，頁216。

# 小室信介的中國觀： 以《第一遊清記》為探討中心

❖ 徐興慶 ❖

## 一、前言

十九世紀末，東亞各國面對西洋列強的侵入，有識之士都在思考如何取捨既有的傳統學問與外來的西洋文明，對自己國家的生存之道有諸多層面的省思。這個時期，歐美的優勢及其入侵東亞的舉動，讓日本感受到無比的壓力，從而吸收他國經驗，孕育維新思想，以謀因應對策。日本希望擺脫中國的影響，思考如何與中國建立對等關係，甚至希望超越中國而避免成為被西洋列強殖民的對象。因此，深入瞭解當時代中國的動向及社會狀況，成為日本政治家、知識社群、媒體人關注的焦點。早在1862年初夏，長州藩士高杉晉作(1839-1867)搭乘德川幕府官船「千歲丸」到上海考察，當時正值太平軍與中英法連合軍隊交戰，他就已感受到上海儼然已是英法兩國的屬地，擔心英法將在短期之內入侵日本。高杉晉作探訪上海觀察入微，對中國的觀感有明顯的轉變。<sup>1</sup>

知名中國近代史學家小島晉治(1928-)在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一書過程中，閱讀了相當多日本人撰寫的中國見聞記



錄。<sup>2</sup>無論是名人或無名氏，不少內容述及當時的中國人「是徹底追求私利私欲的集團」，追求私利是彼等的宗教信仰，毫無民族意識或國家意識可言。<sup>3</sup>另外，《大正中國見聞錄集成》一書輯錄的內容，亦可窺知晚清民初，日本包括工商、政界、學界的社群相繼視察中國，詳實記述了中國社會的種種面向，鉅細無遺地寫下中國的惡習、弊端及缺失，留下不少中國紀行文獻。<sup>4</sup>這些文獻記錄着晚清急遽變動的樣貌，改變了日本人對傳統「華夷秩序」的世界觀，促使認真審思中日關係的未來，從而針對近代化的各種問題，萌生「亞」抑或「興亞」的對華意識分歧。

在諸多日本人的中國見聞錄中，本文將探討近代日本自由民權主義的推動者，同時也是新聞記者的小室信介(1852-1885)之中國紀行文獻《第一遊清記》。本書因記述時間僅短短兩個月，前述小島晉治的《中國見聞錄集成》並未加以收錄，因此中日學界鮮少探討與研究。《第一遊清記》出版於1885年1月中法戰爭之際，內容記載晚清應對戰爭的情形。時值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十年，日本朝野將注意力轉向中國有多重目的，除了觀察中國國情與實力之外，同時自我測試在政治、外交與文化上，是否可藉脫離傳統東亞以對抗列強入侵，並評估吸收西洋文明的可行性等。小室信介針對中法戰爭，提供了英、德、美等國駐中國領事的相關資訊給日方參考，多角度批評晚清的社會局勢及軍事狀態，深具參考價值。本文從(一)小室信介及其思想主張；(二)從《第一遊清記》看小室信介的中國觀；(三)同時期黑田清隆、尾崎行雄的中國觀察等角度進行考察，旨在探究小室信介透過中國見聞的經驗，如何思考、認定「他者」與「自我」的問題，進而綜述其對傳統中國文化的批判及其中國觀的轉變。

## 二、小室信介及其思想主張

小室信介原名小笠原長道，出生於京都府丹後國，為宮津藩砲

術家小笠原忠四郎的次男，號案外堂。曾遊歷京都，師事山口正養，學習漢學。1872年於京都府擔任小學教師，三年後返鄉設立天橋義塾。<sup>5</sup>1876年與小室信夫(1839-1898)之長女幸子結婚，並入贅從姓小室。1879年進入大阪日報工作，爾後升任社長，大力推展民權運動。1882年4月，鼓吹自由民權的板垣退助(1837-1919)於岐阜演講時，遭暴民襲擊受傷，當時板垣「吾人雖死，自由不死」的發言，經小室信介以「板垣雖死，自由不死」為題發表演說，引起廣泛的討論。1883年刊行《東洋民權百家傳》，批評德川時代未能重視民權政策。

小室擔任小學教師期間，陸續發表《大日本夜話初集》(上、下兩卷，1874)《大日本夜話二集》(上、下兩卷，1875)《小學綴字詞の枝折》(全，1875)《日本小文典》(1876)等著作。據今西一研究指出，《大日本夜話》的內容，大體不出賴山陽(1780-1832)撰述《日本外史》的範疇，但「國體之辨」中卻有其獨特的國體觀。小室批評洋學紳士帶動自由說、共和政治說的風潮，致使國體解說者被視為因循守舊的人；批評攘夷論者將日本膨脹為神國，神風一吹即可吹翻夷狄之船的荒謬論調；在此同時，卻又主張日本得以存續乃源於天皇血統之眷顧，是個尊皇論者。<sup>6</sup>

小室於1876年6月到東京遊學，並進入慶應義塾的「變則學科」就讀。<sup>7</sup>明治文學家柳田泉(1894-1969)曾對其思想作過如下評述，曰：

據說信介進小室家之前即是一流的民權論者，這恐怕是時勢及閱讀所促成的。其根底本是東洋流的政治思想，但是入小室家與岳父信夫接觸之後，想必受到曾放洋、具備新知的信夫，大力灌輸西洋流的民權論。加上在東京因岳父的人脈，得與諸多自由民權論者交際論談，因而成功歷練，在自由民權運動方面成為信夫的代理乃至繼承者。<sup>8</sup>

小室之所以成為自由民權論者，除了上述受到岳父信夫的影響之



外，慶應義塾普及福澤諭吉(1835-1901)的「自主自由論」對他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1875年6月，小室與粟飯原曦光、澤邊正修等35位地方有志之士，在京都府丹後成立天橋義塾。天橋義塾初設於宮津藩校禮讓館舊址，創校目的在於回應青少年迎接明治新時代的學習意願，以及人們破除封建、追求維新政治的慾望。小室擬定塾則，開宗明義即揭示曰：「培育人才自不待言，同時為保護小學教員、暢達民權而創立」；「本塾非憑藉一人一己之獨力結社而成，乃眾人愛國義務心之小分子集合、凝結而成。因此，將來亦須倚賴此集合力維持之」，強調創校宗旨是基於眾望歸依，是為培養具備民權意識的新時代人材。其授課教材，使用了竹中邦香講述的《民權大意》。<sup>9</sup>明治初期如此強調民權、集團性的地方學校並不多見，因而引起當地政府警戒。

自由民權運動，是明治維新的主流思想之一。小室記述民眾運動的歷史，並彙編成《東洋民權百家傳》一書。其出版動機在於彰顯「義民」事蹟、傳承民權家的精神，故於第二帙起更改書名為《東洋義人百家傳》，而冠以「東洋」則有與「西洋」對照之意。收錄對象以德川治世期間遭受箝制、蒙冤入獄或迫害致死者為主，描述手法則隸屬政治小說的範疇。其義民彰顯與傳承的時間概念有兩項重點，一為以現代敘述者的價值觀為基準，轉載、傳述過去的事蹟；一為藉過去的劣位事蹟規範現在，將義民與民權家作對照比較，旨在建立民權家這擔負日本未來命運的舵手之傳統價值。<sup>10</sup>書中嚴厲批判德川時代的霸權政策，並歌頌明治天皇之德政與法治：

彼等〔按：德川時代的人〕若目睹當今行政、司法分途，司法這部分甚至分為初審、控訴、大審院等，伸張人民權利至此精進程度，將何等驚訝與羞愧呀。當今之世勝於往昔，本篇所記百家傳之諸氏，如處於今世，或多可不捨一命而達志。況且，〔按：明

治)二十三年設立國會，天皇萬政繫心，與吾等三千五百萬同胞親愛和睦，治國、立法、守法，何來犯上抗官之民。<sup>11</sup>

1877年2月受西鄉隆盛(1828-1877)舉兵引發「西南戰爭」一事波及，基於恐有以自由民權之名，行反政府運動之實的理由，小室在內的「天橋義塾」領導者多人被捕入獄。以自由民權之士，拓展政治藍圖，是小室追求的目標。1875年大阪會議時，小室即靠着岳父與井上馨(1836-1915)牽線，擔任內務大輔一職，參與明治政府建立立憲政治方針的協議會議，其政治藍圖傳承的構思是相當明顯的。<sup>12</sup>

小室曾以小牟呂荒太為筆名在《大阪日報》投稿一篇題為〈琉球處分論〉的文章，內容述及：「今琉球王是我藩主，琉球藩民是我人民……我政府處分我版圖之人民，何庸遲疑猶豫、擔心中國之反應。」<sup>13</sup>對於明治政府「處分」琉球一事，小室表達其極度贊成的立場，曰：

我日本帝國臣民，若違背我天皇陛下之王化；我日本政府人民，若違犯我日本政府之法令，可加以討伐，可加以殲滅。即使燒毀蕞爾沖繩島化為焦土，屠殺十有六萬住民加以醜漬，苟為履行正理，實隨時機，勢不可止，斷然決行，有何不可？<sup>14</sup>

從上述小室激烈的言論，可窺知其為徹底的尊皇主義者，強烈主張吞併、消滅琉球，侵略色彩濃厚。

小室從1879年擔任《大阪日報》記者開始，歷經「國會開設請願運動」、《朝日新聞》(1880年11月)主筆，到《日本立憲政黨新聞》(前《大阪日報》改名)、《自由新聞》(又稱《自由燈》)創刊這段期間，四處鼓吹自由民權運動。不過，為了擔任外務省御用官的職務，他毅然脫離多年努力的自由民權運動，被昔日同志批評是「變節」行為。其實，小室心中懷抱着一個「東亞經營」的思想理念，1882年7月，朝鮮發生壬午軍亂之際，他向遣韓大使井上馨表明希望一同前往朝鮮視察，而如願隨行。1884年5月，小室促成《自由新聞》的創刊；同年8月，中法



戰爭爆發，他隨即前往中國視察；同年12月，朝鮮甲申事變再起，小室被任命為外務省奏任御用掛，立刻辭去《自由新聞》記者的職務，再度陪同井上馨前往朝鮮考察。這一連串的「變節」舉動，明白顯示小室的視角已從民權運動轉向關注亞洲現況的「東亞經營」。

小室於1884年8月29日自神戶經長崎出發，10月31日離開上海返國，展開為期兩個月的中國遊歷。期間訪問多位中國政界名人，並走訪朱舜水的故鄉餘姚，會見朱舜水兄長第23世直系子孫，同時參觀王陽明故居。<sup>15</sup>當時因發生中法戰爭，日本上海領事館下令訪問中國的日本人集結於上海。從各方資料顯示，中法戰爭爆發後，引起日本朝野相當大的危機意識，因此1885年訪問中國的日本人士特別多。<sup>16</sup>例如曾任日本第二任內閣總理大臣的黑田清隆(1840-1900)撰寫了《漫遊見聞錄》上、下兩冊。根據〈緒言〉以及〈目次〉可知，本書記述其自香港遊歷至宜昌往來12,237英里，前後長達185日，其間所蒐羅之關於中國政治體制、風俗、度量衡及貨幣、重要貿易港市等的資訊，文末並附有旅行日記以及圖繪。<sup>17</sup>

小室訪中當時，應「沿海知識人」王韜(1828-1897)之邀，自1884年5月至1885年4月，約一年的時間遊歷上海、蘇杭、天津、北京、廣東等地，經香港返回日本，回國後撰寫了近十萬字的《觀光紀游》(1886)的日本漢學家岡千仞(1833-1914)也正走訪於蘇杭一帶。<sup>18</sup>1884年9月27日，小室乘搭汽船武昌號欲前往北京，與岡千仞叔姪同舟，曾就當時中國情勢及中法戰爭交換意見。返國後小室將中國見聞彙整成《第一遊清記》一書，雖只做了短暫停留，但對當時晚清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等社會狀況以及軍事結構，卻有意外清楚的認知與精闢的剖析。

### 三、從《第一遊清記》看小室信介的中國觀

小室於《第一遊清記》前言，清楚述及其訪中主要目的在視察中

法戰爭的戰況。<sup>19</sup>並以「百聞不如一見」、「旅行中國內地十里，勝讀十年漢籍」形容其訪中前後所聞、所見的巨大落差及文化衝擊。<sup>20</sup>

從以下小室於赴北京途中與岡千仞的對談，可以明確得知小室原先抱持的中國觀。

予〔按：小室〕向翁〔按：岡千仞〕言曰：「中國之風俗可謂頹廢實甚，非如書上所聞。三代之世絕非如此，想必是蒙古、滿州等之夷狄蹂躪中國，破壞中華之風俗使然。翁之失望程度，不堪想像。」翁笑答道：「否。予認為中國固來如此，只因西洋及日本前進數步所致。」<sup>21</sup>

小室對中國的想像，原本停留在漢籍中描繪的夏、商、周之三代治世，是講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仁義禮智信五常的道德文化完善的時代。只因歷經元朝、清朝等非漢族政權的統治，夷狄蹂躪中土，致使中華文化被破壞殆盡、善良風俗隨之蕩然無存。相對於小室對中國的形象落差，岡千仞的認知似乎比較接近事實，認為中國自古即是如此，如今只是日本隨西洋進步超前了，而中國始終故步自封。

小室訪中目的在於視察中法戰局，卻不見烽火連城、煙硝彈雨的景象，這是超乎其想像的另一事項。因此，關於中法戰爭之始末，有必要作一番瞭解。1884年的中法戰爭，是清廷與法國為安南（越南）問題而起的戰事。雖說主戰場在安南，但是法國派遣海軍中將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 1826-1885）率領的遠東艦隊，於7月擊敗清廷的南洋艦隊後，隨即進犯臺灣。清廷急令直隸提督劉銘傳（1836-1896）赴臺防衛；8月5日，法艦開至雞籠港外砲轟，並企圖登陸大沙灣。在清軍的反擊下，迫使法軍退回艦上。8月下旬中法正式宣戰。10月1日法軍攻擊基隆，翌日艦隊開至滬尾（淡水），試圖長驅直入北臺灣，而與舊滬尾砲台守軍發生激烈砲戰，雙方傷亡慘重。由於法軍無法攻佔滬尾，10月20日孤拔宣佈封鎖臺灣，以十五艘軍艦分別封鎖蘇澳、雞籠、滬尾、安平、打狗等港



口。11月法軍攻陷雞籠港，但於獅球嶺遭受清軍頑強抵抗而受阻，戰局陷入膠着。隔年3月，孤拔遲遲無法攻下臺灣，於是率艦隊離開轉而進攻澎湖，同一時間在安南戰場的法軍也節節敗退。諒山之役，清提督馮子才(1818-1903)大敗法軍，於是雙方於4月4日議和，6月9日簽定「中法條約」，6月21日，法軍撤出雞籠港，中法戰爭正式結束。

小室以上海、天津、北京、長城等為主要視察地，自然看不到福州、臺灣槍林彈雨的戰地光景。中國疆土之廣大，恐怕才是真正超乎其想像的癥結所在。對於清廷力主出戰法國，小室作了如下描述：

中國政府頑強採取主戰主義，堅信憑本國軍備國力足以抵禦法國人，實屬意料之外。其堅決程度使原本認為事不至此的外國人皆發出感嘆之聲。予在北京的十月十六、七日兩日，清朝軍機大臣徐用儀及其他兩名清朝官員一同來到日本公使館，與我國公使榎本武揚談論時事，據彼等說法，眾議論皆堅決採取主戰主義。本次清朝政府深信斷然與法國人決裂並發出追討令是為最佳國策。<sup>22</sup>

文中的徐用儀(1826-1900)為浙江海鹽縣人。他在同治初年任軍機章京，歷任工部、刑部和吏部的侍郎，最終擢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sup>23</sup>榎本武揚(1836-1908)則為當時日本駐清公使，代表日本與清廷、法國交涉，結果清廷最後割讓越南給法國。

關於清廷對法國採取主戰，令小室感到意外，但也深不以為然。他批評說：

中國政府所以斷然採取主戰之議，並非真有一定程度之見識、並非自有妙算而為之。其不外只是憑藉茫然的空想而妄自以為可以打敗法國人，若觀察其實情，可知這樣的行為真是既可悲又可笑，令人同情萬分。<sup>24</sup>

接着又說道：

現今中國政府時勢與日俱衰，上情不達、下情不通，溝通管道壅塞，邊疆海陸之實情多未上奏。如清軍在福州敗耗日久，朝廷不知其實，聽信張佩倫等人虛妄進言，而發佈其與事實顛倒的上諭文，以致蒙受外人唾笑，此例即可見一斑。<sup>25</sup>

文中張佩「倫」，應作張佩「綸」。張佩綸(1848-1903)在法國侵略越南之際，曾上奏章十數篇，力主抗法。1884年中法戰爭時，被派赴福建軍務會辦。同年7月，法國軍艦入侵馬尾，張佩綸誤判情勢致使馬尾船廠被毀，成為歷史上著名的不戰而敗之「馬尾戰事」。戰役中張佩綸臨陣脫逃，後遭革職並充軍東北。1888年充軍回京後，成為李鴻章的女婿。

以下這段記錄，則顯示小室對左宗棠(1812-1885)亦有負面的印象。

左宗棠是主戰派的巨頭，儼然勇猛果敢、無與倫比的人物般與中外人士接觸，其實不過是個不諳時勢的頑固老翁。此次中法事件發生後，其意見專行於朝廷之上，威望遠大於李鴻章，而朝中人又多已吸收為己用，加上深得西太后信用，因眼下福建省多事、正當法國人之衝，依九月七日上諭，命其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sup>26</sup>

當西方勢力排山倒海般來襲時，中日兩國都出現倡議攘夷的人士，小室對此作了以下評論，曰：

蓋現今中國內閣迂遠時勢，疏忽下情，其景況難以言喻。外人屢屢聽聞其事，皆不可置信。若以日本為例，即如維新前攘夷之說盛行時，京都諸多公卿大人不明事理，僅知一味倡議攘夷攘夷，情況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自古當世道衰微、革命之秋時，帝王多年幼而不辨東西，政權落入寡婦佞豎手中，大臣百



官苟且偷安，國疆有難亦隱匿不報，只知粉飾太平，而不憂心國勢江河日下，如此事例不知幾凡。<sup>27</sup>

精準地揪出晚清政權的病灶。小室觀察左宗棠、李鴻章、何如璋、劉銘傳等中國政治人物，並分別提出評論。其中給予正面評價者，只有李鴻章一人。他說道：

清朝值得言及的人物只有李鴻章一人。李氏蒙受中外人士批評之處雖不在少數，但至少算是瞭解當今時務之人，是眼下十八省中第一流人物。或有人云：清朝四億人中唯一值得畏懼者，恐怕只有李氏一人。何故畏懼？云：唯其自知中國與外國開戰必敗之故。此說甚好。中國滿朝文武百官皆不知孰強孰弱，無人通曉內外國勢，故對戰事之勝敗茫然而無從算計。唯李氏稍知內外敵我強弱之差距，故能預先估算勝敗之數，臨敵能知其所懼而好謀略，故無大敗，可謂今日法國人之頭號大敵。<sup>28</sup>

關於李鴻章對與法軍的戰事評估及應對立場，小室據某日本人造訪總督府與李鴻章對談之內容，以「李氏之內情」為題加以記錄，曰：

李氏言道：我率領的士兵面對法軍時，我可以明確保證足以抵抗敵兵一萬人左右。然而法國若大舉入侵，派一萬人以上之大兵登陸侵襲，則勝敗之數未知。又，我麾下士兵若如貴國士兵般，制度齊整且訓練有素，則即使數萬法兵來襲，亦不足懼。<sup>29</sup>

形容李鴻章說這話時神情慷慨，認為是敞開胸襟的肺腑之言。關於李鴻章對海軍的評價與應對政策，小室的觀察是：

李氏既知海軍不足為用，將北洋艦隊皆封鎖於旅順港內，禁止擅自航海。這意謂即使戰敗、支付賠償金給法國人，因而能留有十餘艘軍艦，仍算是對國家有利。如此說法愚昧而可笑，雖

然說不上是卑怯，未嘗不是周詳地比較敵我之力後，開悟的一大妙策。<sup>30</sup>

李鴻章認為中法問題可以和談解決，不主張戰爭，與法國公使本已達成撤兵協議，後因法國政變，內閣改組遂撤銷協議，大舉增兵攻打越南。當時李鴻章與熟悉外交事務的曾國藩之子曾紀澤(1839-1890)同屬主和派，也說服主戰的張佩綸轉為主和，在朝廷形成一股主和的清流勢力。

李鴻章研判不足為用的中國海軍，據小室調查之後，作出如下評論，曰：

依據數年來中外公私報告，可知中國海軍聲勢浩大，軍艦之多、大砲之巨，數度令吾人腦海萌生畏懼之感覺。然其評價與實際情況卻有極大落差，所聞所見相違甚也。此次予渡航彼地，親睹其景況，並聽取與予同時碇泊於彼地之我邦軍艦海軍武官之說法，始知其被向來之報告誤導，近年來累積胸中的畏懼與警戒心，一朝之內煙消霧散，甚至陷於茫然失神的程度。中國海軍軍艦數量說多則多，砲說大則大。公私報告書未曾出錯，而是他們沒有能夠運用這些設備的士官，只僱用英、德兩國之人，完全遵照其指揮而運轉。然而亦僅止於平日運轉，一旦有事發生，僱用的外國人悉皆辭職離去，屆時其巨大堅固之鐵艦也只是淪為無用之物。馬尾戰敗之例即可見一斑。<sup>31</sup>

小室除了痛批「有如骨骼剛堅、血肉肥滿卻少了腦髓神經的死人般」的中國海軍之外，<sup>32</sup>對陸軍虛實的觀察也相當精闢。言及清軍於建國初期時堪稱軍制完善、裝備齊整，但近年軍中法制鬆散、疏於訓練的程度，令人咋舌。將官虛報士兵人數，以利薪糧中飽私囊；而常備軍與臨時充數的募兵質素居然相差無幾，難怪每戰必定兵敗如山倒。<sup>33</sup>濫竽充數的中國軍隊所使用的武器：「僅極少數是舶來品或仿舶來品的本國製洋槍，其十之八九都配備舊式火繩筒、大刀、楯



牌及刀劍。」小室形容身穿背後畫個像是標靶的白色大圓圈，夜裏提燈籠、雨天撐傘列隊行進的中國士兵，宛如日本武士玩偶大遊行甚或民間靈異故事中的狐狸迎親陣仗，模樣可笑至極。軍隊質素遠遠落後日本三十年。<sup>34</sup>

中國國家情勢日益窘蹙，自不待言。國內政令廢弛，百官怠惰，溝通管道壅塞，公然行賄，人心叛離，百姓積怨。一旦事發，則盜匪蜂起，致政令無法施行。對外則前有勁敵法國欲結城下之盟，其禍不遠，影響所及難測；後有俄鷲挑釁窺伺，若至北京城陷、邊防無人之日，其利爪不知將伸及幾百里。其他如英國、如德國，表面顯露親睦之色，然而其真正用意則不得而知。德國與法國是世仇，但是並未阻礙此次事件，反而隱然有贊成之意。英國於法國宣戰之前，即承認所恣發之臺灣封鎖令而不抗阻。若仔細思考此事，即可得知英德二國之真意所在。中國當下之形勢恰如同俎上肉，餓虎於其四周咆哮。<sup>35</sup>

中法戰爭之際，日本自由民權派人士，原本傾向締結中日同盟，以對抗西方列強。然而中國軍隊軟體、硬體皆不堪使用，數量、質量均難敷需求的情況下，知之愈深，對中國的敬畏、崇拜亦愈趨薄弱，乃至蕩然無存。日本朝野醞釀「脫亞(脫中)」的氛圍隨之日趨濃厚。以結果論而言，福澤諭吉在不到半年之後的1885年3月16日，在日本《時事新報》提出「脫亞論」，文中針對中國，尤其是傳統的儒教思想，也有類似小室般的犀利批判，其內涵成為學術界論述日本「脫亞入歐」的分界點。<sup>36</sup>

中國人中雖有一兩位憂國之士，亦有忠君之民。然而概觀而言，多為貪欲愛錢之小人，不知廉恥，毫無忠義，只注重私利，汲汲營營而罔顧他焉。孔孟教義講求仁義道德，教授禮義廉恥，已是古昔之事，如今不見實行。雖說往昔，孔孟教義高尚而未能推展實行於中下層級之人。然而觀察時下之中國人，

實在無法認同其為孔孟子弟，無法相信中國為孔孟禮教之邦。<sup>37</sup>

小室批判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淪喪，點出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忽視。透過親身體認、親眼目睹的經驗，重新思考如何面對顛覆典籍中形象的中國，如何以其腐敗作為借鏡，反思日本未來的發展。同時也藉由否定「他者」(中國)而確立「自我」(日本)民族的優越意識。其所涵蓋的層面，有華夷思想、領域觀念以及神國(尊皇)思想的複雜問題。

#### 四、同時期黑田清隆、尾崎行雄的中國觀察

前述黑田清隆於其《漫遊見聞錄》中，亦述及晚清社會風氣腐敗、官僚無能的問題，曰：

其士子講道、讀書，率徒皆不外為科舉考得一第、希求官榮。然而，耗盡畢生精力，考證舊書陳編之一字一句。亦或，全心沉溺於詩文書畫之末技，而他人則對其風流，賞翫贊嘆不已。此為其通弊。一旦成為官吏，往往私財貨、貪賄賂，一味致力於自肥身家，難免有罔顧官吏倫常者。<sup>38</sup>

對於職掌國家政務營運的官員，主要來自科舉制度之拔擢，造成「行非所習，習非所行」的結果深感不當。欲從八股文化中尋求適材適用之基本要素，實有如「緣木求魚」。<sup>39</sup>黑田認為「農民勤力於田畝者，稍不失淳樸之風」，然而「商則詐價背約，工則濫造粗製以欺人。騙取貨財，惟利是趨，恬知廉恥，亦以清人為最」。<sup>40</sup>

除士農工商之氣節問題外，當時中國一般人士如井底蛙般對國際情勢認知之錯誤，也在黑田批評之列，曰：「上下一般惟知自國，而不知有外國，尊大自我而輕蔑外國人，其固陋不通之所致。不拘其文化之開為全地球上最先者，視歐美人為野蠻，此亦無故之非。」<sup>41</sup>

黑田嚴辭批判中國，多少反映其出身薩摩武士的性格。但是，



對於晚清官僚的腐敗，政治改革之困難，自有其一體兩面的深切體會。因為在日本近代化、明治維新過程中，黑田本身就是制度改革的推動者。中國的見聞經驗，帶給其諸多啟示。

小室信介訪中行程自1884年8月29日由神戶、長崎、上海直至9月27日出發至北京之日為止的旅途中，有位恰巧同行而值得一提的重量級人物，就是日後有日本「議會政治之神」美稱的尾崎行雄（1858-1954），他當時的身份是時事報社的特派記者。其訪中目的：「一為視察大陸形勢，以供他日參考。一為報導中法交戰實況，以利《報知新聞》的讀者明白勝敗利弊之原因所在。」<sup>42</sup>尾崎的採訪日記爾後彙整成《遊清記》一書，記錄了晚清社會的弊端與惡習。諸如，居留上海期間，一日暴風雨來襲，周遭住屋雖骯髒發臭，卻經得起狂風暴雨依舊屹立不搖。尾崎對於中國人有能力興建堅固房屋，卻不願費心打掃維修的習性有感而發，曰：

此奇態非獨見於家屋，於國土亦見之也。夫中國境域極廣，人民極多，土壤極肥。其政府如告知修理頹敗、清掃弊習之術，則富國強兵垂手可得，足可與全歐諸國敵對抗戰，又何以被區區法國副帥蹂躪，而如此恐怖戰慄。其今日一旦東蹶西躓動，即不能保持獨立形勢之原因，在於風氣頹敗卻不知匡救，人心萎靡卻不知振作。其國家恰與家屋同，踞坐而毫不知起身加以修理清掃。<sup>43</sup>

此外，對於法國僅派兵七千名，對抗人口四億數千萬的中國，完全視泱泱大國如無物，不禁發出喟嘆：「嗚呼！亞洲不與歐洲競爭久矣，見今日法國政府對待清廷之方式，多少有大人戲弄小孩之觀，余不覺長嘆太息。」<sup>44</sup>正值尾崎如此靜思默考亞洲未來趨勢之際，窗外傳來如雷貫耳的喧嘩騷動聲，原來是蘇州河一艘滿載木炭的船與小蒸氣船相撞翻覆，引起其他船隻爭相搶奪河面漂浮的木炭，打

算據為己有。「余見此狀，不嘆有如禽獸爭食，禽獸尚有知禮讓之道者。中國人之人皆有盜心，即所謂人不如飛禽走獸者。」這是一種夾雜難以名狀的無力感與深沉鄙夷厭惡的嗟嘆。尾崎對中國的觀察是長期的，1874年的「臺灣出兵」事件、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都有其評論。

## 五、結論

明治時期的日本人對中國，由敬仰轉為失望、錯愕到蔑視，從小室信介在《第一游清記》的寫實記錄，又再次感受到其間臨場的轉變。書中內容對當時的中日關係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深具探討的價值。如前所述，不能否認小室對中國現狀的描述，帶有強烈的個人主觀意識，但陳述晚清官僚對中法戰爭應對的消極態度，人、事、物都能吻合。從《第一游清記》的描述，可以明確看到小室從嚮往中國轉換成為蔑視中國，進而逐漸相信以政治力量作後盾，足以實現其對中國、朝鮮、琉球的「東亞經營」與自由民權運動結合的願景。小室信介於1885年6月從朝鮮返日之後，計劃再度前往中國考察，不料竟因病於同年8月25日驟逝，得年僅34歲。

綜觀小室信介、黑田清隆、尾崎行雄三人對晚清的觀察，可以歸納出清末中國人普遍缺乏國家、民族意識，更罔論國際視野的缺失，貪官污吏作惡多端，軍事力量薄弱等流弊。這種腐敗現象從「臺灣出兵」、中法戰爭到甲午戰爭長達二十年間不見改善。日本朝野人士的觀察入微，成為對中國改觀以及日後應對中國的重要參考素材。亞洲侵略主義就在如此氛圍下，逐漸萌芽及茁壯。

1 見拙稿：〈高杉晋作の上海視察とその中国觀の變遷〉，收入拙書：《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4），頁158-173。

2 小島晉治著：《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



全書20卷，內容如下：卷1《上海雜記》、《贅牖錄》、《沒鼻筆語》、《清国漫遊誌》；卷2《北支那紀行》；卷3《遊清記》、《支那時事》、《支那漫遊談》；卷4《支那漫遊燕山楚水》；卷5《清韓紀行》；卷6《北清見聞錄》、《支那印象記》；卷7《巴蜀》；卷8《支那文明記》；卷9《滿韓修學旅行記念錄》；卷10《雲南四川踏查記》；卷11《航海日錄》、《清国上海見聞錄》、《唐国渡海日記》、《海外日錄》、《支那見聞錄》、《在清国見聞隨記》、《支那漫遊實記》、《清国事情探檢錄》；卷12《亞細亞大陸旅行日誌并清韓露三国評論》；卷13《長城遊記》、《支那實見錄》、《台灣視察報告書》、《實歷清国一斑》、《台灣視察談》；卷14《清国巡遊誌》、《東亞旅行談》；卷15《北清見聞錄》、《滿州旅行日記》、《七十八日遊記》；卷16《湖南》；卷17《支那大陸橫斷遊蜀雜俎》；《支那遊記》；卷18《南清紀行》、《支那風韻記》；卷19《棧雲峽雨日記》、《觀光私記》；卷20《觀光紀遊》、《葦杭遊記》(付・著者略伝)。

- 3 小島晉治著：《近代日中關係史斷章》(東京：岩波書店，2008)，頁231。
- 4 小島晉治著：《大正中国見聞錄集成》(東京：ゆまに書房，1999)，全書20卷，內容如下：卷1《我が觀たる滿鮮》；卷2《大陸修學旅行記》；卷3《山東遍路》；卷4《燕雲楚水：楞伽道人手記》；卷5《西隣游記》；卷6《支那漫遊記》；卷7《支那に遊びて》；卷8《滿鮮遊記》；卷9《遊支雜筆》；卷10《中華三千哩》；卷11《揚子江を中心として・上》；卷12《揚子江を中心として・下》；卷13《繪の旅：朝鮮支那の卷》；卷14《老大国の山河：余と朝鮮及び支那》；卷15《支那印象記》；卷16《偶像破壞期の支那》；卷17《わが思い出》、《草画隨筆：滿鮮と支那》；卷18《台灣訪問の記》；卷19《支那旅行雜感》；卷20《一商人の支那の旅》。
- 5 天橋義塾初設於宮津藩校禮讓館舊址，參與創校的有栗飯原曦光、澤邊正修、小室信介等人。創校目的在於回應青少年迎接明治新時代的學習意願，以及人們破除封建、追求維新政治的慾望，而成為當時「由民權運動」的核心地。後因政府對於政治活動的強勢壓制，天橋義塾被迫於1884年關閉。曾與高知的立志社、慶應義塾有日本三義塾之稱。
- 6 今西一著：《メディア都市・京都の誕生：近代ジャーナリズムと諷刺漫画》(東京：雄山閣，1999)，頁176。
- 7 1858年福澤諭吉奉藩命於江戶開設蘭學塾，1868年遷移至新錢座之新校舍，並明定校名為慶應義塾。1873年整頓學科，除依美式教育課程設置修業年限7年的正則(正規)學科外，另設置入學條件為17歲以上、修業

- 年限不拘的變則(非傳統正規)學科。
- 8 柳田泉著：《政治小說研究(上中下卷)》，(東京：春秋社，1935-1939)，頁378。
  - 9 竹中邦香著：《民權大意》(京都：大谷仁兵衛等，1874，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版)，上、下兩卷。
  - 10 西田谷洋著：〈歴史の物語：小室案外堂の政治小説を中心に〉，《近代文学研究》第15號，頁75。
  - 11 小室信介著：《東洋民權百家伝》(東京：案外堂，1883-1884)，全書共三帙九冊，第二帙起書名改為《東洋義人百家伝》，本文引自第二帙上冊、作者寫於1883年9月20日東京案外堂之識文，頁4b。
  - 12 「大阪會議」是指1875年2月11日，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板垣退助等人在大阪府集會，討論今後日本政府樹立立憲政治方針及參議就任等案件之協議會議。1876年〈日朝修好規約〉締結之際，井上馨曾以副使身份，隨全權大使黑田清隆前往朝鮮。
  - 13 小牟呂荒太著：〈琉球處分論〉，《大阪日報》1879年1月22日。
  - 14 同上注。
  - 15 小島晉治著：《近代日中關係史斷章》，頁81。
  - 16 例如曾任明治政府文部大臣、司法大臣及眾議員的尾崎行雄(1858-1954)也在當時訪問中國。又小室從上海到北京時，有農商務權大書記官奧青輔、御用掛峰寬次郎等人同行。
  - 17 黑田清隆〈緒言〉，《漫遊見聞錄·上》(東京：農商務省，1888)，頁1。
  - 18 岡千仞，號鹿門，日本仙台藩人。他與王韜及黃遵憲、何如璋、黎庶昌等人交往甚密。他與王韜雖私交甚篤，但二人針對「興亞」之論點大相逕庭，詳見拙稿〈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4期(臺北：臺大文史哲學報編輯委員會，2006)，頁131-171。岡千仞於1884至1885年訪問中國，留有以漢文記錄的清國日記，名曰《觀光紀游》(卷1《航滬日記》，卷2、卷3《蘇杭日記》)。岡千仞的訪華資料除彙整成《觀光紀游》外，另散見於其個人檔案及若干日本報刊中，1872年創刊的《郵便報知新聞》曾設「文苑雅賞」專欄，刊載日本漢學家的詩文作品，1884年7月9、10、11日該專欄分三次以「筆話」為題刊出岡千仞與上海書院士子的筆談錄。
  - 19 小室信介著：《第一遊清記》(東京：山中喜太郎，1885)，頁1b。
  - 20 同上，頁7a。



- 21 同上，頁 6b-7a。
- 22 同上，頁 13a。
- 23 徐用儀曾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並歷任兵部侍郎與吏部侍郎等職，最後被任命為軍機大臣。他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戰後，被光緒皇帝趕出軍機處，免其總理衙門大臣之職。不久又被慈禧太后起用，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擢兵部尚書。義和團事起，徐用儀到各國使館求援，後被清廷以私通洋人罪，斬首棄市。
- 24 《第一遊清記》，頁 13a-13b。
- 25 同上，頁 14a。
- 26 同上，頁 15b-16a。
- 27 同上，頁 13b-14a。
- 28 同上，頁 19a-19b。
- 29 同上，頁 20b-21a。
- 30 同上，頁 23a-23b。
- 31 同上，頁 21b-22a。
- 32 同上，頁 22a。
- 33 同上，頁 23b-24a。
- 34 同上，頁 25b-26a。
- 35 同上，頁 28a-28b。
- 36 見拙稿：〈傳統と近代の間：福沢諭吉の儒教主義批判への試論〉，《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大阪：關西大學，2010)第5號，頁 54-67。
- 37 《第一遊清記》，頁 28b-29a。
- 38 黑田清隆〈風俗〉，《漫遊見聞錄：上》，頁 19。
- 39 同上，頁 15。
- 40 同上，頁 20。
- 41 同上，頁 20。
- 42 尾崎行雄著：《遊清記》，收錄於《尾崎行雄全集》(二卷本，東京：平凡社，1926)，卷 2，頁 532。
- 43 同上，頁 572。
- 44 同上，頁 573。

# 德川及明治時期的參考書與日譯西書 對中國的衝擊

❖ Douglas R. Reynolds(任達) ❖

## 一、序

在中國及日本等高度成熟的傳統社會，邁向現代性及建立新的身份認同是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對於中國而言，這個過程已發展超過一個半世紀，其始於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造成的鴉片戰爭(1839-1842)，然後是太平天國運動和其它內外動盪，至1978年才開花結果。從清末民初至今，中國仍在不斷邁向現代性及建立新身份，而日本在這個過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

本文探討晚清的現代性變化。當時政府對此頗為抗拒，但部分民間人士卻相當熱衷，此研究介紹一些為中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在中國傳統及新世界中尋找出路的中國人。早在1876年，為了保護中國國內及海外利益，清政府透過總理衙門派遣使節訪問海外諸國。這些使節負責收集所在地的情報並向清廷匯報。他們在1877年到達日本後，發現一個令人驚訝的現代化世界，並在1877年至1895年之間，留下大量介紹明治日本的忠實記錄。

日本在明治維新(1868)以來從自身的思想、語言及制度等出發，走上對外開放及急速現代化的道路。現代化的根源可追溯至



1720年，即明治時代以前的一個半世紀。明治的現代化其實是這個歷史趨勢的高峰。中國的情況也相似。1978年開始的現代化運動可以說在一個半世紀前，即1840年的鴉片戰爭時已播種。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多得荷蘭啟發，中國則受助於日本，特別是晚清最後的35年(1877-1912)。本文探討日本在這段關鍵時期對中國現代化扮演的角色。

## 二、中國人在明治日本發現的書籍

中國人自1877年11月設立駐日公使館後才注意日人的著作及參考書，其中公使何如璋(1838-1891)及參贊黃遵憲(1848-1905)在駐日四年間(1877-1882)對此貢獻良多。自總理衙門於1876年派遣海外使節以來，一直要求他們匯報所在國情報，駐日公使館對此最為認真。何如璋鼓勵及資助使館人員搜集日本相關資料，此傳統被後來的駐日公使黎庶昌(任期1882-1884, 1888-1891)、徐承祖(任期1884-1888)、李經方(任期1891-1892)及汪鳳藻(任期1892-1894)所繼承。

黃遵憲是近代中國研究日本的先鋒，其《日本國志》(40卷，1887年完成，1895年刊)及《日本雜事詩》(1879)對清末民初中國人認識日本影響至鉅。他曾參考及引用超過兩百本日文及漢文著作。雖然他沒有注明出處，但學者已將部分考証出來。<sup>1</sup>

姚文棟(1852-1927)在駐日期間(1882-1887)致力尋找翻譯與日本相關的書籍，及從事著述。他本身擅長地理及經學，來日後成立一個專門中譯日文資料的小組，完成《琉球地理志》(1883)、《日本地理兵志》(1884)及《日本國志》(未刊)等著作。譚汝謙稱他為「中國第一個翻譯日本專書的人」。<sup>2</sup>他在《日本地理兵志》的〈例言〉寫道：「日本近頗留意地學。立於官者，內務省有地理局，海軍省有水路局。士民私立者，有東京地學協會。」<sup>3</sup>他在它處又提及曾參考陸

軍省及文部省所出版的地理書。姚在《日本國志》的〈凡例〉中提供99本曾參考的日文書，並列明其卷數及是否官方刊物。<sup>4</sup>可見對駐日使館人員來說，日文資料隨手可得，而且相當有用。

陳家麟的《東槎聞見錄》(1887, 4卷)大部分翻譯或節錄已出版的日文書籍。陳在〈凡例〉及各條目中列出參考文獻。他堅持「是編均就聞見者列入，其未經聞見，僅憑臆度者，一概不錄」。此作獲學者讚為「資料豐富，可信性高，描述客觀，讀之有味，非常優秀之作」。<sup>5</sup>

傅雲龍(1840-1901)於1887年以游歷使身份赴日美等地兩載(1887年11月至1889年10月)作實地調查。<sup>6</sup>他在日本時記曰：「吾首訪[1887年11月至1888年5月]以旅遊為主，此次[1889年5月至10月]旨在撰寫報告。」<sup>7</sup>其《游歷日本圖經》(1889, 30卷)大量引用日文資料，例如多次引用江戶中期的百科全書《和漢三才圖會》(1713, 105卷，寺島良安編)。<sup>8</sup>傅如何參考《和漢三才圖會》是啟發我撰寫此論文的起點，我想知道他究竟參考了哪些日文書及哪些對他特別有用。王圻的《三才圖會》是典型類書；寺島良安花了三十年編纂《和漢三才圖會》，雖大量參考《三才圖會》，但性質卻不同。它可說更像近現代的百科全書，而非傳統的類書，我認為它是全球首部現代百科全書。

### 三、日本參考書形成的內在軌跡(1600-1700)

1600至1700的百年，日本參考書因內因而成熟發展。<sup>9</sup>18世紀後日本參考書繼續改良，而且受到蘭學影響。學界對18世紀前的情況已有詳盡的研究成果。Mary Elizabeth Berry指出日本在17世紀曾經歷「靜默的知識革命」(a quiet revolution in knowledge)，其特色之一是資訊性文獻的大量出現。<sup>10</sup>當時人們喜歡透過實証觀察去尋找資料，強調親自目睹方可信的真實性。學者專注各類知識，並全面仔細地記錄下來。Berry認為很多著作都極具原創性，它們也不



斷出現更新或擴充版。<sup>11</sup> 百科全書多用通俗語寫成，附加音標及目次、主題、分題，及圖表等輔助工具，內容無所不包，一般性及專門性題材均在其中。<sup>12</sup> 資訊成為全民共享的知識財產，正如Berry所謂：「任何人想買或借均可。」<sup>13</sup> 資訊社會在德川日本的成長令 Marcia Yonemoto 如此評曰：「在德川時代，平均每年出版超過三千本書，其中九成是商業性質。」<sup>14</sup>

德川初年的知識平民化顯示缺乏一個壟斷知識的階級，這與18世紀法國形成強烈對比。當 Denis Diderot (1713-1784) 及 Jean le Rond d' Alembert (1711-1782) 編撰百科全書時，他們受到教會及貴族們的壓迫。對於德川日本缺乏壟斷知識的階級，人類學學者中根千枝將它與中國的紳士，印度的學問僧 (Brahmin priests) 及歐洲的神職人員及地主貴族作對比。日本武士雖屬領導階級，但他們既無土地，亦不壟斷學問。他們無法也不用防止知識普及。學問被認為有助德川社經及統治。中根評曰：「若德川日本，如其它很多前工業化社會般，出現一班壟斷知識的文化精英，則平民百姓不可能對文字世界產生興趣。正因為日本缺乏這種文化精英階級，平民百姓發展出充滿活力的流行文化。」<sup>15</sup> 不論其所屬世襲階級為何，德川日人均從事學問。有學者估計德川後期日本人的識字率，男性高達45%，女性也有15%。<sup>16</sup> 這與同期的中國相近。18及19世紀中國的識字率是男性45%及女性10%。<sup>17</sup> 當時中國亦出現稱為「日用類書」的參考書。<sup>18</sup>

1713年是 Denis Diderot 出生之年，寺島良安也於同年完成其花了三十多載的巨著。寺島本身是大阪醫師，大阪蓬勃的出版活動令寺島獲益良多。<sup>19</sup> 他參考大量書籍，其中包括一本叫《節用集》的參考書。《節用集》是在1469年至1487年編輯而成的大型參考字典，橫山俊夫稱之為「圖解家用百科全書」，寺島介紹曰：「條目包括通俗日語詞彙，以字母用傳統的假名文字次序排列，有些像西方英文字母排列。在假名文字次序下再細分，例如天體、官職、動植物、工具、計量詞及變化詞等。此書方便使用者尋找中文相應的日文詞

彙。」<sup>20</sup>《節用集》在德川時代被重印八百多次，「節用集」差不多成為參考字典的同義詞。<sup>21</sup>

寺島的另外重要參考還包括一些稱為「訓蒙圖彙」及「重寶記」的書籍。「訓蒙圖彙」之名稱來自中村惕齋(1629-1702)的《訓蒙圖彙》(1666, 20卷), 它是包含1482條目的參考書, 其中686項有關植物及動物, 附中文及日文名稱。<sup>22</sup>「訓蒙圖彙」成為一種參考書體裁, 例如《人倫訓蒙圖彙》便是優質參考書。<sup>23</sup>「重寶記」是一種記載實用技能(如書寫、醫療、育兒及料理)的家用生活百科事典, 特色是簡淺、有系統及多圖。<sup>24</sup>此外, 李時珍的《本草綱目》(1578)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基於三十多年搜集資料及實証研究, 李在書中列出1892種植物, 11,096種藥方, 並附1,110張插圖。《本草綱目》在1672年在日本重印, 寺島多次加以引用。

#### 四、日本參考書的蘭學及西學因素(1720-1912)

若1720年以前參考書的發展受日本及中國的影響, 1720以降蘭學因素日益重要。隨着八代將軍德川吉宗(1716-1745在位)在該年放鬆進口書籍的禁令, 並下令將荷蘭人撰寫的有關動植物及生物的著作翻譯成日文, 此代表官方承認了蘭學的正統性及實用性。到了19世紀, 日本翻譯者建立一套如何將荷蘭文譯作漢文的原則與方法。大量從荷蘭文譯來的漢文新詞在1877年後成為中國與西洋知識的橋樑。<sup>25</sup>

德川一代蘭學已為西學鋪路。當日本在1858年開國後, 英、法及德文書籍亦被譯作日文。更重要的是, 官方承認思想多元化, 兼容漢學、國學及蘭學。<sup>26</sup>這與清朝獨尊程朱的官方立場不同。德川思想文化界兼採中、日、荷蘭三大語言文化體系, 這思想彈性有助於它在1858年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挑戰。反映日人在德川末明治初的思想模式的例子是日人將 *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 譯



作《百科全書》。

明治新政府在1868年4月頒布《五條御誓文》，其第五條曰：「向全世界尋找知識以鞏固皇室統治的基礎。」箕作麟祥(1846-1897)是一位從內心相信第五條的明治政客及學者。雖然不算太有名，他是將*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譯作日文的主要負責人。「百科全書」之名自此在日本及中國成為流行單詞。*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的英文原著在1833至1835年之間出版，作者是William Chambers與Robert Chambers，其內容包涵科學及藝術差不多所有的領域。《百科全書》根據1842年版(第二版)的*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分兩冊，包括百個題目。第三版(1848-1849)也含百題目，附加索引及主要詞一覽表。每一題用16小頁解說。第四版(1857)及第五版(1874-1875)的題目過百，但日人仍採「百科」之名。像1833至1835年原著初版，日人在1873至1883年逐一題目翻譯，出版了88題目。<sup>27</sup>當康有為(1858-1927)在1897年出版其《日本書目志》時，列出《百科全書》的八十多標題。<sup>28</sup>他仿日人做法，每標題前用小字印「百科全書」四字。康不斷引用《百科全書》，令中國人將「百科全書」與基本現代學問聯想在一起。

箕作麟祥來自江戶官方蘭學世家。其父箕作省吾(1821-1846)擅長蘭學及地理；其祖父箕作阮甫(1799-1863)為著名蘭學家及醫師，於1856年被幕府委任為蠻書調所教頭。麟祥於1861年進蠻書調所學習，兩年後獲幕府委任為蘭文翻譯官。法國顧問建議幕府派使團出席1867年的法國世界博覽會，麟祥成為水戶藩藩主德川昭武(1853-1910)的隨員，一起赴法。世界博覽會結束後，他被安排留法一年學習國際法。<sup>29</sup>1868年回國後被聘為開成所(東京帝國大學前身)教授。他在1871年被委任為文部省高級編輯，兩年後升為文部省編輯寮的寮長，負責編輯新式教材。<sup>30</sup>翻譯*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正是文部省編輯寮的相關工作，屬於官方支持的「國家事業」。

*Chambers's Information for the People*吸引之處在於其百項與現

代知識相關的文章，體裁則像傳統的類書。文部省要托洋學者逐一翻譯書中各題目，而且花十年將它完成。書中一些題目如天文、地理、金屬、動植物、衣食及建築等與類書相似；也有一些嶄新的分類如動物生理學、水力氣體力學、光聲學、憲法、邏輯、自然神學、政治經濟學、考古學等。<sup>31</sup> 福鎌達夫將此翻譯計劃看作是德川末明治初興起的實學運動的一環，他將之與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出版百科全書相題並論。<sup>32</sup>

1873年文部省率先出版「百工應用化學」及「教育論」。1874年出版「醫學」、「交際及政體」、「養生」、「人種」、「經濟」、「漁獵」、「貿易及貨幣銀行」、「植物生理學」及「電氣及磁石」。各項獨自出版，1883年全部完成。<sup>33</sup> 複雜而專門的內容非以一般平民為對象，而是作為提升國家精英對西學的全面認識。<sup>34</sup> 此翻譯計劃動用47名學者，其中包括西村茂樹。他們對新知識作出注釋及潤飾。箕作麟祥翻譯以下兩項：「教導說」(1873)及「自然神教及道德」(1880)。

文部省在1883年將《百科全書》免費提供給民間出版商有麟堂及丸善出版。若出版私有化是為了令此作普及，則收全效。有麟堂在1883年至1886年分20冊出版；丸善更有商業頭腦，於1883年至1884年分12期推出，在現代日本開這種推銷手法的先河。此系列部分是日英雙語，在當時是十分創新。<sup>35</sup> 丸善分別於1884年及1885年(附索引)分三冊整套推出。

論日本對中國的影響，《百科全書》有助中國人瞭解世界。《百科全書》使用日文，標題用漢字，內文為日文，雖然假名之間有些一漢字，但不懂日語的中國人還是看不懂。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列《百科全書》的八十多標題全用漢字。《百科全書》翻譯計劃加速日本的國語運動，吸納西方知識以創新詞，令日文不再像以前般過度依賴漢文。<sup>36</sup> 難怪黃遵憲在《日本國志》的〈凡例〉表示，日本著作已多從漢文移至和文，令他難以明白。<sup>37</sup>



## 五、結語

沈國威稱1880年至1895年是中國的「停滯期」。官方減少對翻譯的支持，令1860年代及1870年代開始的翻譯活動停滯不前。從甲午戰爭結束的1895年至1919年，中國經歷「日本書翻譯期」，中文引進日文的新詞，有助中國開放思潮及認識世界。<sup>38</sup>當中國的翻譯活動停滯不前時，日本卻迎來了翻譯盛世。累積德川以來的蘭學及洋學遺產，明治日人翻譯西方名著及吸收海外最新知識，從而尋找現代性及身份認同。孫青稱讚近代日人的求知努力曰：「到了20世紀初幾乎譯完了當時各學科比較重要的西籍。」<sup>39</sup>杉山忠平及水田洋將1867年至1912年日人翻譯的西方經濟學書籍按國家列表，並提供作者、譯者、書名、出版日期等資料。<sup>40</sup>甲午戰爭以後不少中國人依靠這些日人翻譯的西方著作吸收西方知識。百科全書，不論是日式或西式，對晚清中國尋找現代性及身份認同都有貢獻。鍾少華稱百科全書是「人類知識的新工具」。歐洲學界也重視百科全書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sup>41</sup>

本文旨在揭示新知識的引進如何影響現代性及身份認同。中日歐美學者都在從事相關研究。德川及明治時代的日本人懂得透過翻譯，引進有用的新知識。日本官方自1720年以降對西方知識有選擇地吸納，以為己用。這無意間已為一個半世紀後的劇變播下種子，並衝擊中國。中國人在1877年踏入日本土地後，將日人翻譯及過濾過的新知識帶回中國，引起思想文化的大震盪。相對之下，清廷對西方閉關，在1839年至1842年才被迫開放門戶。中國遲至1978年才自主奠定改革開放路線，在全球視野下重新尋找現代性及身份認同。

（吳偉明譯）

- 1 參鄭海麟著：《黃遵憲傳》（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61-165；黃升任著：《黃遵憲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266-268。
- 2 譚汝謙著：〈中日之間譯書事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譚汝謙編：《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頁56。
- 3 姚文棟著：《日本地理兵志》，收錄在王寶平主編：《晚清東游日記匯編2日本軍事考察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4 姚文棟著：《東槎雜著》，收錄在《晚清東游日記匯編2日本軍事考察記》，頁48-50。
- 5 武安隆、熊達雲著：《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東京：六興出版，1989），頁133。
- 6 參王曉秋著：〈近代中國人世界的一次盛舉：1887年海外游歷史初探〉，王曉秋著：《近代中國與世界：互動與比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33-50。
- 7 傅雲龍著：《游歷日本圖經餘記》，收錄在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261。
- 8 此作受明朝王圻（1530-1615）的《三才圖會》（1609，106卷）所啟發，傅主要參考1884年版的《和漢三才圖會》（東京：中近堂，1884-88）。
- 9 有關日本參考書的發展史，參潘鈞著：《日本辭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0 Mary Elizabeth Berry, *Japan in Print: Information and N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pp. 18-23, 209, 211.
- 11 同上，頁19, 23。
- 12 Donald Shively指出在1650年左右，日本出現大量淺白易讀的參考書。參Donald Shively, "Popular Culture," in John Whitney Ha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727.
- 13 Berry, *Japan in Print*, p. 250.
- 14 Marcia Yonemoto, *Mapping Early Modern Japan: Space, Place and Culture in the Tokugawa Period (1603-18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15.



- 15 Chie Nakane, "Tokugawa Society," in Chie Nakane and Shinzaburo Oishi, eds., *Tokugawa Japa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ntecedents of Modern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p. 230.
- 16 Ronald Dore, "The Legacy of Tokugawa Education," in Marius Jansen, ed., *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s Modern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99-131.
- 17 這只是認識數百個基本漢字的比例。高度識字率則是男30%及女2%。 Evelyn S.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p. 140.
- 18 至今日本人對清朝日用類書的研究比中國人還多。參 Endymion Wilkinson, *Chinese History: A Manua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01-609.
- 19 大阪、江戶及京都是江戶時代的三大出版中心。參 Peter Kornicki, *The Book in Japan: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1998), pp. 192-205.
- 20 Toshio Yokoyama, "The Illustrated Household Encyclopedias that Once Civilized Japan," in Susanne Formanek and Sepp Linhart, eds., *Written Texts-Visual Texts: Woodblock-printed Media in Early Modern Japan* (Amsterdam: Hotei Publishing, 2005), p. 47.
- 21 參《平凡社大百科事典》8(東京：平凡社，1985)，頁610。
- 22 彌吉光長著：《百科事典の整理学》(東京：竹内書店，1972)，頁170-180。
- 23 Berry, *Japan in Print*, p. 196.
- 24 長友千代治著：《重宝記の調方記：生活史百科事典発掘》(京都：臨川書店，2005)。
- 25 有關西方地理詞彙如何透過德川日人譯作漢文，然後輸出中國的例子，參 Kiyohide Arakawa, "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Japanese Geographical Terminologies," in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eds.,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04), pp. 451-467. 有關中文如何吸收日人翻譯荷蘭文的新詞，參沈國威著：《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製、享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69-98。
- 26 Donald Keene 以1720年為西學在日本興起的關鍵年。參 Donald Keene, *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 1720-18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27 參福謙達夫著：《明治初期百科全書の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68)，頁22–25；鍾少華著：《人類知識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書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6)。
- 28 收錄於姜義華、吳根樑編校：《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冊3，頁261–524。
- 29 有關箕作麟祥在法國學習國際法的情況，參Alexis Dudden, "Japan's Eng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Terms," in Lydia Liu, ed., *Tokens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69–171.
- 30 參《明治初期百科全書の研究》，頁40–41。
- 31 同上，頁30–37及《百科事典の整理学》，頁196–197。
- 32 參《明治初期百科全書の研究》，頁3–15。
- 33 有關各條目的出版日期及譯者，參同上書，頁22–25。
- 34 箕作麟祥以此作闡明泰西之學的理、實及術。參箕作麟祥著：《教導說》(東京：文部省，1875)，頁1。
- 35 日文翻譯在上，英文原文在下。參《明治初期百科全書の研究》，頁79–338。
- 36 Katsuhiko Tanaka, "The Discovery of a National Language (*Kokugo*) in Meiji Japan," in Irmela Hijiya-Kirschner, ed., *Canon and Identity: Japanese Modernization Reconsidered* (Berlin: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Japanstudien, 2000), pp. 107–116.
- 37 黃遵憲著：《日本國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頁7。
- 38 參《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製、享受與共享》，頁24–25。
- 39 孫青著：《晚清之西政東漸及本土回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139–140，142–160。
- 40 "Appendix 2: Western Economics Books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1867–1912," in Chuhei Sugiyama and Hiroshi Mizuta, eds., *Enlightenment and Beyond: Political Economy Comes to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8), pp. 293–300.
- 41 Douglas R. Reynolds, "Japanese Encyclopaedias: Their Background and Hidden Impact on Late Qing Chinese Encyclopaedias," in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Rudolf G. Wagner, eds., *Chinese Encyclop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2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forthcoming).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大正後期日本學界有關漢文直讀的論爭

❖ 陶德民 ❖

## 一、緒論

在當今日本的中國學專家之間，對於「漢文直讀」這種學術上和教育上的主張曾被視為政治上的危險言論一事，恐怕知道的人不會很多。然而此事確實存在過，而且是發生在自由主義思想流行的大正時代(1912-1925)的後期。倉石武四郎(1897-1975)在提及青木正兒(1887-1964)的〈支那學革新之第一步〉以及自己在斯文會的研究例會上被勸阻發言時，曾不止一次談到以上事實。倉石在1941年如此記述到：

在《支那學》第五號上刊出〈本邦支那學革新之第一步〉時，該問題已漸漸受到關注。在東京的某個學會上，教育學的某位教授論到漢文直讀的問題，那是一種提倡用漢音直讀的溫和主張。我在會上則被一位前輩告誡說『你最好不要發言』。我知道這位前輩是出於保護我免遭危險的好意，所以也就靜靜地聽完各位的發言而已。如今想來，有恍如隔世之感，但這其實還是不滿20年的近事。<sup>1</sup>

倉石在1969年又作了如下回憶：



自己年輕時讀從創刊號到第三號連載的青木先生〈以胡適為中心的文學革命〉，及其第五號上的〈本邦支那學革新之第一步〉時，我都是如飢似渴，反復閱讀。後來從小島(祐馬)處得知，〈本邦支那學革新之第一步〉原本應該登載在創刊號上，但考慮到京都一帶的氛圍，結果被擱置到第五號。我曾想過在東京發表類似的意見，但在東京，這意見更加被視為危險思想，以致有先生告誡我不要在公開場合發言。我是在此種環境下讀到《支那學》上的一系列文章的，嚮往京都也是理所當然的。更何況在此論文中，大量的江戶時代文獻被引用，而這些文獻都是我聞所未聞的，故對青木先生的文章佩服得五體投地。<sup>2</sup>

究竟近代的「漢文直讀」論是在怎樣的契機下形成的？而其後的發展又是如何？明治前期一度提出的「漢文直讀」論，為何到了大正後期卻被視為政治上的危險言論呢？為了對這些問題理出一個頭緒，本文除了青木、倉石兩位，把作為其先驅者的重野安繹(1827-1910)的言論也一併加以考察，以便揭示日本學界對漢文所持的兩種不同的態度及其背後的文化認同。

## 二、明治前期的「正則漢學」構想

近代的「漢文直讀」論，即「訓讀排斥」論，既有江戶中期以來徂徠學的傳統影響，也與明治以後中日兩國直接交涉的必要性以及近代西洋學問方法所帶來的刺激等因素有關。其中明治政府的開化政策和外交政策所促成的接受西學和日清國交等劃時代的轉變是較為重要的因素。

1879年，既為史學家也是漢學家的重野安繹在東京學士會院發表了題為〈漢學宜設正則一科，選派少年秀才赴清國留學〉的演說。<sup>3</sup>他認為既然日本已經與近鄰的清國結成外交關係，無論是在平時的貿易往來，還是在有事之際進行和戰交涉時都有當面議論的必

要。然而依靠從前的長崎通事和漢學家的本事已無法擔此重任，因此向清國派遣青年留學生，將其培養為具有高度會話和閱讀能力的「專業漢學家」是當務之急。值得注意的是，重野的意見中強調了從語言文字入手的外國學理念，兼通「經史」和「俗語」的「言文並用」能力，以及有關漢文教育的「正則」與「變則」等概念。所謂正則英語、變則英語、正則教授法、變則教授法這些概念，都是在明治初期的英學熱潮中萌生的。實際上，在重野演說的九年之前，即在1870年制定的《大學南校規則》裏，已經有「將學生分為正則變則二類，正則生跟隨教師從習韻學會話；變則生以訓讀解意為主」這樣的記載。一位同校畢業生證言曰：「所謂正則，就是外國教師擔任，教授正確的發音和讀法；變則由本國老師擔任，重點不在於發音，而在充分講解外文的意思。」<sup>4</sup>在重野演講的七年之後，英人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 1850-1935)在《東京學藝雜誌》第61號上發表題為〈切望支那語讀法之改良〉一文。認為過去的漢文訓讀法不免被譏為「將漢文加以肢解，以其斷片隨意增加別類的一種奇物」。又論述到「必須廢除舊有的雜種讀法，按照支那語法來讀支那文章，豈非自明之理」。<sup>5</sup>這樣看來，重野運用「正則」及「變則」概念鼓吹漢文教育革新的主張本身也是順應新時代潮流之舉。

重野所期待的是通過長期的清國留學培養具有與中國人同等會話與閱讀能力的新一代漢學家，依靠他們來改變「非和非漢」的訓讀舊習，將漢文教育的內容與學生分為正則、變則二類，漢籍的出版也循此規定。這樣，可以在教育和出版方面完全參照歐美各國的範式。在西學一邊倒的當時，重野倡導漢學再興、革新漢文教育，強調派遣少年留學生赴清國的必要性，是需要相當的勇氣。重野在1879年在東京學士會院得以堂堂正正發表以上見解，這件事本身充分展示出明治前期的思想界自由奔放、富於包容力的氛圍。這與後文將要提到的大正後期漢學界的閉塞之風形成了鮮明對比。



### 三、青木論文的出版問題

其實在〈漢學宜設正則一科，選派少年秀才赴清國留學〉的演說詞中，重野盛讚荻生徂徠使「讀法為之一變。誦之以漢音，譯之以俚語，絕不欲為和訓迴環的讀法。此實為古今卓識，可謂看破了阿直歧、王仁以來的陋習」。重野以近世徂徠學排斥訓讀和提倡音讀的先例，來把自己的主張加以正當化的企圖十分明顯。<sup>6</sup>而比重野小60歲的青木稱荻生徂徠的音讀主張為「最良之策」，比重野小70歲的倉石也稱之具有「卓絕於世之見識」，可見他們兩人的看法與重野是完全一致的。

青木出身於「富於支那趣味、漢學素養深厚」的中醫家庭。明治後期，國民道德教育以《教育敕語》(1890)與《戊申詔書》(1908)為指針展開，青木正是在那個階段度過他的學生時代，因此深切感受到了儒教對家庭和社會的束縛。「年幼時，父親常讓我聽支那音曲，要我學習《孝經》、《論語》、《唐詩選》，可是，我卻漸漸對父親苛刻的家教懷抱反感。進入中學以後，雖被要求創作漢詩，我卻偷偷開始沉迷於新體詩和小說。」進入京都帝國大學以後，青木雖遞交宿舍申請，但因在其中寫到「申請宿舍是為方便晚上去圖書館」，結果被東京帝國大學漢文科出身的學生監督以「缺乏共同生活的意願」為由拒絕。後來青木回想起這件具有時代象徵意義的事件時說到：「要是當時直接說申請宿舍是因為想到圖書館讀戲劇小說的話，他〔學生監督〕定會大吃一驚的吧。」因為那時的常識是「經書是可以善導思想的，漢詩是可以鼓舞士氣的，故應大力振興儒教、提倡吟詩。這種常識固無不可，但若如此宣傳的話，恐怕漢學專業的學生要受連累而只得苦笑吧」！<sup>7</sup>

後來，青木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狩野直喜(1868-1947)的學生。入門之始，這位曾在清末留學中國的良好師便告誡青木說，既然選擇支那文學為專業，「不迷上支那是不行的」。經過十多年的求

索，青木在1920年9月與小島祐馬、本田成之等創辦同人雜誌《支那學》。他本人也成為介紹中國的「文學革命」，即胡適、陳獨秀所發起的中國白話文運動的第一人。不僅如此，青木還多次訪問動盪中的中國，積極介紹吳虞等人的儒教批判論，明確贊同以道家(老子、莊子)思想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案。<sup>8</sup>

〈本邦支那學革新之第一步〉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寫就的。青木在文章中尖銳指出，因訓讀造成的種種漢文理解上的問題，例如「讀法煩瑣，不能和支那人同樣快速閱讀」、「不能正確瞭解文意」等。在論文末尾，青木對「支那學專門家」提出如下建議，「據我的經驗推測，現今多數支那學專家採取的，還是無意識的直下默讀方式，然而這樣視線容易發生顛倒。如若加之以音讀，使眼、口、腦的理解順序不再發生錯亂，讀書能力必定會大大增進」。<sup>9</sup>然而，青木的「漢文直讀」這一學問上和教育上的主張為何在當時的漢學界和支那學界非但沒能引起反響，反而被視為危險論調呢？換言之，本應在《支那學》創刊號刊登的該論文為何延期到了第五號(1921年1月)，而該論文在被收入《支那文藝論叢》之時，又為何改題為《漢文直讀論》呢？為了解決以上疑問，有必要瞭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日兩國思想界的整體狀況以及日本漢學、支那學界的內部情況。

第一，青木的言論在某種意義上並不合當時的時宜。首先，大正後期日本國內出現了種種反權力、反體制傾向的社會運動，青木論文發表當月發生的「森戶事件」就是例子之一。<sup>10</sup>青木的論文發表後兩個月，帝國學士院恩賜獎獲獎者林泰輔(1854-1922)對時局作了如下評論：「近來歐洲大戰震驚世界，思想界也遭到感染而失去安定，所謂社會主義，所謂無政府主義，所謂馬爾薩斯，所謂克魯泡特金，也不考慮其是否合乎我國國體，都有人妄加倡導，幾乎陷入混亂狀態。」<sup>11</sup>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內藤湖南(1866-1934)在《新支那論》(1924)中也表示出類似的憂慮：



支那近來有一批所謂新人發起了新文化運動，或是作為舊道德的破壞論，或是作為文學革命而展現出來。舊道德的破壞論主要在於破除儒教，其論者中有人提倡全盤接受西洋來的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也有人要求取法舊的墨子、老子等的主義。此等眾多人們的議論皆忘了承認歷史的價值。〔中略〕支那人自不用說，最近有些迷上支那新人的日本人，倘若不注意到支那人的邏輯中的嚴重缺陷，不從根本上審視儒教的價值的話，其輕率的言論也會給日本的現代思想界帶來不好的影響。<sup>12</sup>

可見對沉迷於中國新文學和新思潮的青木，內藤湖南懷有告誡之意。

擁護荻生徂徠似乎也是當時的禁忌。徂徠這位「開創江戶儒學的一個新紀元的大儒」在明治中期以後的國家主義風潮中被蒙以「反國體」的污名。<sup>13</sup>徂徠輕視天皇和尊崇將軍的政治立場可以認為是原因之一。此外，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說，作為「民族主義者」、「日本至上主義者」的徂徠有時言詞過於奇拔，因而遭到極大誤解。「從明治時代到大正、直到昭和初期，徂徠的不幸在於他以中國作為所有價值判斷的基準，而將日本描述成非文化地域。非國民一詞，好似刻在他身上的烙印。」<sup>14</sup>因此青木正面提倡「華音直讀」這一徂徠的主張，在大正後期圍繞「山東權益歸屬問題」而日益緊張的中日關係背景下，在意識形態上確實比較敏感。

第二，青木的「孤高之論」在當時漢學及中國研究(支那學)學界也難以得到支持。首先，對大多數漢學家及中國研究專家來說，最關切的問題是如何在面臨失業的危機中保住飯碗。當時，以上田萬年為首的國語民族主義者們企圖重新提起明治後期一度撤回的「廢除中學漢文科」的主張。<sup>15</sup>他們不僅向文部省斡旋，並在全國中學校長會議上取得了共識。為了對付這一攻勢，漢學者及中國研究專家的核心團體斯文會的執行部將包括財界政界31位名士的意見(上文提到的林泰輔便是其中之一)，彙總刊行在題為《中等教育與漢文》(1921年3月)的特集中，極力呼籲「漢文與修身、國語和國史一樣，

乃是陶冶國民精神之主要學科。其存廢實關乎國運之消長。在大戰後國民思想動搖之際，正需廣為仰賴高明之大方諸賢」。此時的漢學及中國研究的教師們力圖保身，當然無法接受青木的觀點。

對於早已習慣漢文訓讀的漢學家來說，拋棄舊習並不容易。正因為如此，青木在文中諷刺道：「人們都說支那是保守的國家，那我國又如何呢？我絕不是說我國所有人都是如此，而是指那些受過所謂漢學薰陶的人，他們頭腦如何？這些人猶如被大浪扔到岸邊的章魚和尚，與其說是可笑，倒不如說是滑稽了。」<sup>16</sup>對於青木這一過激的批判，就連多次為《支那學》撰稿並對訓讀主張表示理解的內藤湖南也無法容忍。<sup>17</sup>由此不難想像，當時多數漢學者對青木意見是持何種消極態度。最後，青木只得甘受「一無伴侶，形影相弔地在曠野上行走」的孤獨滋味。

從以上背景可以清楚看到青木論文延期刊載的原因。關於六年後同論文被收入《支那文藝論叢》時的改題原因，如果將上述情況與青木當時已在東北帝國大學執教這一事實結合起來看，便可以了解，青木雖不願修正自己的主張，但由於已非在野文人（青木從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後，1911年到1918年任武道專門學校教授，1918年到1923年任同志社大學教授），當然會考慮到，與其仍舊用〈本邦支那學革新之第一步〉這樣帶有刺激性的題目，當然不如改用〈漢文直讀論〉這樣穩當的題目為好。

#### 四、發言被勸阻後的倉石的去路

青木的追隨者和理解者倉石也出身於漢學世家。對於自幼習慣了的「訓讀法」所帶來的弊端，倉石是這樣反思的：

我出身漢學世家。對祖輩遺留下來保存在土倉中的漢籍早已司空見慣，這似乎成了我與支那學的因緣。在東京求學期間，也有數年不曾間斷上漢學塾。從舊式教育中接受了相當多的訓



練，對其特點瞭若指掌，也能予以同情的理解。〔中略〕在這樣環境下，若問是甚麼催生我的行為，那便是時代的影響。高中時的西語訓練，特別是英語學習使我眼界大開。我從英人教師那裏獲知音聲學的初步知識，又從一位教授那兒學來英詩的韻律。為了去支那旅行，我自己學習中文。而對漢籍讀法的疑念卻與日俱增。這種在德川時代一輩子也不可能有的經驗，給生活在大正時代的我帶來了深刻刺激。<sup>18</sup>

通過英語教育的訓練和現代中國語的自習，倉石反思到哪些訓讀上的問題呢。第一，訓讀會招致對中國語的要領、漢文的脈絡以及微妙表現的誤解和感覺遲鈍。「訓讀這種方法並不成熟，它常常忽略巧妙地操控多個概念的文字，以及『即』、『乃』、『也』、『矣』等表示語氣的重要單字。這樣的讀法切斷了支那語的運動神經，將手足、身首加以換位，硬是將其作成國語的樣子。」「特別是支那人濃墨重彩、或是輕描淡寫的微妙而又至關重要的地方皆被清除得一乾二淨。讀者看到的僅僅是丟了魂一樣的書籍。」<sup>19</sup>第二，只是依賴和滿足於平實呆板的國譯漢籍。這種情況妨礙了人們對中國原版和中國現狀的理解。倉石評曰：

不管《論語》還是《孟子》，有的人不用訓讀就不帶勁。就像不把孔子和孟子變為日本人就不罷休，有那樣一種將漢籍視為國書、將漢文視為國語的時代的遺風。將支那的書籍譯為純正的國語固然不錯，但翻譯的結果往往將立體的意象平面化，喪失了原書的原味。倘若習以為常，認為喪失原味和平面化也無傷大雅，或者反而認為這樣才好，那就好似在信州長大的人認為鹹鮭比鮮鮭更好吃一樣。<sup>20</sup>

本稿開頭曾提到〈本邦支那學革新之第一步〉是發表於《支那學》第五號，在之後不久即1921年春，據前述倉石的回想錄，「在東京的某個學會上，教育學的某位教授論到漢文直讀的問題，那是一種提倡用

漢音直讀的溫和的主張。我在會上則被一位前輩告誡說『你最好不要發言』。』當時倉石是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特選給費生，並兼任文學部助手。那之前不久，他在鹽谷溫教授(1878-1962)指導下完成畢業論文後，曾花一個月時間到中國沿海地區旅行，還在旅行記中披露了自己力圖改革中國語教育的志向。該回想錄中提到「東京的某個學會」，指的是斯文會的一次研究例會；所謂「教育學的某位教授」，是當時講授日本教育史的「赤門的著名教授」，一位與吉野作造有交往的春山作樹，而「一位前輩」則是指代倉石的老師鹽谷溫。

實際上，在青木論文發表兩個月之後，鹽谷在其〈漢文原形教授之價值〉中反駁道：「有些學者排斥訓讀，主張直接音讀，就像學習英法德語一樣來學習漢文。這種看法無視訓讀的歷史，而將漢文視同外國語，實為謬論。（一些專家將支那語與漢文相提並論則另當別論）。〔中略〕要之，遵循訓讀法的漢文就是日本的漢文，應該被當做國文來對待。」<sup>21</sup>對於此講法，春山在斯文會的研究例會上，從教育學的見地出發表達了相反的意見：

在原形保存方面，不應忘記詞語的配列、緩急和抑揚。然而日本的漢文僅僅限於手和眼，卻忽視了口和耳這兩大要素，歸根結底是無法激發感情的。〔中略〕要之，教授漢文應按原有的音直讀，通過直讀養成理解文章的習慣。只有這樣才能領會原文的妙處，原形保存的意義唯有如此才可謂完美。<sup>22</sup>

對當時在斯文會的研究例會上被勸阻發言一事，晚年的倉石這樣袒露心扉：

春山的發言，雖然條理有些奇怪，主旨還是提倡直讀漢文。即便不是按照現代中國語的語音，按照漢字的語音〔編按：吳音、漢音或唐音〕也可以，總之是要直讀。但我認為這樣是不行的。會後見到市村〔瓊次郎〕先生，他問我『上次春山的發言如何？』我回答說『那樣不行。但是因為當時有人告誡我不要發言』，說



到這裏，先生就笑起來了：『怎麼了，是有人給你下鉗口令了嗎？』鹽谷先生是出於擔心我，才不讓我發表意見的。諸位先生都是知道我的想法的。<sup>23</sup>

結果，被下了鉗口令的倉石開始對京都懷抱憧憬之情，因為那裏洋溢著更為自由平等的學術風氣。他拜訪了正在東京出差的狩野直喜，請求進入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毋庸諱言，倉石轉學一事也說明他對狩野的「支那迷」態度產生了強烈共鳴，「狩野對中國有自己的理解方法。雖然中國在近代化道路上停滯不前，他卻並不因此輕侮中國，而是試圖對這種停滯狀態本身所具有的意義作出評價。」<sup>24</sup>

然而，鹽谷不僅對青木的論文提出反對意見，告誡倉石與春山保持距離，還進而試圖從大義名分的制高點來阻止青木、春山、倉石等人所代表的學界的新趨勢。鹽谷寫道：

漢文傳入我國幾近二千年，是為文明之淵源、德教之根本，涵養我國民道德，發揚我國體精華，徵之於國史記錄可以明白。且其原文照樣傳入，添加訓點、送假名便可以邦訓自由自在地誦讀，是故，人皆以此為我國古典而無異議。〔中略〕然而我國教育家中有人動輒非難漢文原形，主張把漢文改寫成帶假名的日文，亦即課以譯文。許多國語學者雖贊成此法，如此卻會泯滅漢文作為古典的價值。另一方面，有支那語學者排斥訓讀，主張直接音讀，則是出於無視訓讀之歷史發展，且視漢文為外文的謬見。二者都可謂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偏見。〔中略〕試以日本語讀漢文之處，方可認為是發揚國家主義之日本精神。如若不然，捨棄大和詞語，不依訓讀而專攻音讀，或是奉隋唐為正朔，甚至難保不像清人一般滅絕自己的國語也。<sup>25</sup>

鹽谷在這裏將漢文提升到有助於弘揚《教育敕語》精神的語言文化媒介這一高度，指斥反對「漢文原形」觀點的「教育家」和「支那語學者」離經叛道，並揮舞後人給徂徠所扣的「中華崇拜主義者」、「非國民」

等帽子，來警告以「支那迷」自居的青木、倉石等新派研究者。

遺憾的是，大正後期的漢學界及「支那學」界的氛圍一直延續到昭和戰前期。1941年，倉石在其名著《支那語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出版以後不久，參加一位老先生的77歲壽誕的祝賀會。祝賀會場在東京帝國大學的山上御殿，一位先生冷不防地隔着桌子嚴厲指責倉石曰：「如果大家都像你那樣否定漢文教育，那麼《教育敕語》該擺在甚麼位置？」對此倉石淡淡地回答說：「我並沒有全面否定漢文教育，只是覺得傳統的漢文教育及其翻版對研究和瞭解中國不起作用，因而主張振興將中國語視為外語的新式漢語教育而已。」<sup>26</sup>

## 五、結語

青木主張的「漢文直讀」和倉石主張的「支那語教育」是符合外語學習與外國文獻研究的一般規律的正論。他們像重野那樣以二百年前的徂徠的宣言為旗幟，勇敢地宣示並實踐自己的主張，是值得尊敬的。而且他們為了給當時因循守舊的漢學界注入新風，作出了可謂「矯枉過正」的努力和奮鬥，也確實是必要的。遺憾的是，由於大正後期動盪的國內外政治環境和漢學界、支那學界本身面臨的困境，二人的主張及實踐不僅遭到誤解和冷落，更被視作嚴重的問題和危險。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被混為一談的可怕之處由此可見一斑。不過，二人引發的爭端並沒有演變成「森戶事件」那樣的文字獄，這也說明日本當時保持着一定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空間。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因為音讀是一般規律而一概排斥傳統的訓讀方法也會偏向另一極端。訓讀在現在的日本仍然是理解中國古典的有效手段，這是須要維持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訓讀傳統的最大原因。筆者曾在大阪大學留學，現在在關西大學講授中國思想和日本漢學，對這種情況比較瞭解。可以想像，對於文獻閱讀量日益減少的日本年輕一代，特別是對於不專門研究中國和漢學的普通



讀者而言，語序標記和送假名等訓讀規則將仍不失為他們理解漢文的必要「拐杖」。

地方文化、世界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在於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競爭。從這一認識出發，我們也應當繼承訓讀傳統，畢竟訓讀是「漢文文化圈」的一種漢文解讀方法，或者也可以說是一種「方言」。<sup>27</sup>正如歐洲各國的知識分子不認為拉丁文是外語一樣，東亞各國的知識分子也不覺得漢文是外語。在漫長的歷史中，東亞地區的人民共同擁有佛教、儒教的文化傳統，依靠漢文創造精神財富並進行交流，自然對漢文懷有親近感，這一感情和感覺並不奇怪。後人囿於近代產生的國民國家觀念，很難理解此種現象，而在國境線尚未以經緯度劃分，區域文化共有意識還沒有被國家主義徹底扭曲的前近代東亞的知識界，這種親切感無寧說是自然而當然的存在。這種感情源遠流長，在今天也有一定影響。作為東亞文化的基因，今後應當得到進一步的重視與研究。總而言之，音讀訓讀並用，以音讀為主而以訓讀為輔，這恐怕才是日本漢文教育的正確發展方向吧。

- 1 倉石武四郎著：《支那語教育の理論と實際》（東京：岩波書店，1941），頁190-191。
- 2 倉石武四郎著：〈青木さんのおもいで〉，《青木正兒全集月報I》（1969年11月）。
- 3 〈漢学宜しく正則一科を設け少年秀才を選び清国に留学せしむべき論説〉，《増訂重野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卷（東京：名著普及會，1989），頁349-350。關於重野的生平和思想，參拙文：〈重野安繹の中國觀——明治二二年の支那視察案をめぐって〉（《立教法学》第42號，1995年），見拙著：《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7）。
- 4 市河三喜、中島文雄草監修：《日本の英学100年：明治篇》（東京：研究社，1968），頁347。

- 5 六角恒廣著：《近代日本の中国語教育》(東京：播磨書房，1961)，頁219-222。
- 6 關於重野安繹對徂徠學的讚賞，參拙文：“Shigeno Yasutsugu as an Advocate of Practical Sinology in Meiji Japan”，Helen Hardacre, e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eiji Japan*(Leiden: Brill, 1997), pp. 373-382.
- 7 青木正兒著：〈支那学者の囁語〉，《青木正兒全集》第7卷(東京：春秋社，1970)，頁44及青木正兒著：〈支那かぶれ〉，同上，頁40。
- 8 關於青木的中國觀，參拙文：〈五四文学革命に対する日本知識人の共鳴——吉野作造・青木正兒の中国觀と日本事情〉，關西大學文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學科編：《文化事象としての中国》(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1)。
- 9 青木正兒著：〈漢文直讀論〉，《青木正兒全集》第2卷，(東京：春秋社，1970)，頁341。
- 10 1921年1月森戶辰男教授因〈克魯泡特金之社會思想研究〉一文，被當局認為「宣傳危險思想」遭到起訴。
- 11 斯文會著：《漢文與中等教育》(1921年3月)，頁56。
- 12 內藤湖南著：《新支那論》第6章，〈支那の文化問題——新人の改革論の無價值〉，《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頁540-541。
- 13 丸山真男著：〈荻生徂徠の贈位問題〉，家永三郎教授東京教育大學退官記念論集刊行委員會編：《近代日本の国家と思想》(東京：三省堂，1979)，頁109、134。
- 14 吉川幸次郎著：〈民族主義者としての徂徠〉，吉川幸次郎著：《仁齋、徂徠、宣長》(東京：岩波書店，1975)，頁202。
- 15 關於明治後期的漢文科廢止問題，參見長志珠繪著：《近代日本と国語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第3章第3節。
- 16 青木正兒著：〈漢文直讀論〉，《青木正兒全集》第2卷，頁334。
- 17 〈学問の思い出——青木正兒博士〉，東方學會編：《東方学回想》III(東京：刀水書房，2000)，頁169。
- 18 《支那語教育の理論と実》，頁189。
- 19 同上，頁38-39。
- 20 同上，頁44-45。
- 21 鹽谷溫著：〈漢文原形教授の價值〉，斯文會編：《漢文與中等教育》，1921年3月，頁60-61。



- 22 春山作樹著：〈中等教育與漢文科〉，《斯文》4:2，1922年4月。
- 23 〈學問の思い出——倉石博士を囲んで〉，《東方學回想》4（東京：刀水書房，2000），頁172。
- 24 戶川芳郎著：〈はじめに〉，倉石武四郎著：《本邦における支那學の發達》（東京：汲古書院，2007），頁IV。
- 25 鹽谷溫著：〈現代教育與漢文〉，《斯文》5:4，1923年8月，頁34–35。
- 26 倉石武四郎著：〈戰前教育の一典型〉，《思想》第322號（岩波書店，1951），頁357，353。
- 27 金文京著：《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讀文化圈》（東京：岩波書店，2010）。

# 「相對化」意識下司馬遼太郎的中國觀

❖ 王海 ❖

## 一、序言

司馬遼太郎(1923-1996)是當代日本著名歷史小說家，其作品涉及中日歷史故事及含相當思想深度。近年其代表作《坂の上の雲》(坂上之雲)更是因為展現日本的「國民國家」形象而備受關注。<sup>1</sup>歷史學者成田龍一在《戰後思想家としての司馬遼太郎》(作為戰後思想家的司馬遼太郎)中提到「國民國家成立的時間和空間」的問題是「接近」司馬思想最有效途徑，並指出司馬對空間的敘述常常表現為從「周緣」向「中心」的切入，是一種反中心「絕對存在」，從周邊反觀主體的「相對化」意識。<sup>2</sup>筆者在閱讀司馬的中國題材作品時發現，類似的「相對化」意識被演繹得甚為徹底。一方面，「相對化」意識特別在其中後期作品中得到進一步深化。本文以成田龍一的「相對化意識」為線索，通過司馬作品中所展現的中國形象，分析其相對化意識下中國觀的到達點以及思想來源等問題，並對其相對化意識進行脈絡化整理。

## 二、司馬遼太郎對中國文明本質的理解

司馬遼太郎自幼與中國結緣，在父親福田是定的影響下，司馬



從小接觸漢籍。高中畢業後，19歲的他曾有志報考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科(當時稱「支那文學科」)。1956年，司馬(33歲)將自己的筆名定為「司馬遼太郎」，意為「遠不如司馬遷」，其對漢學與中國的興趣可見一斑。不過直到1975年(52歲)他開始走訪中國後才在其文學作品中表達對中國的看法。<sup>3</sup>其中以《対談：中国を考える》(對談：思考中國)(1983)較為完整地反映司馬對中國文明本質的理解。

《対談：中国を考える》收錄司馬遼太郎與歷史小說家陳舜臣在1974年至1978年的四年間在中國旅行的經歷和感想。全書共分四章：第一章〈東夷北狄と中国の二千年〉(東夷北狄與中國兩千年)、第二章〈近代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の明暗〉(近代中日的明暗)、第三章〈日本の侵略と大陸の荒〉(日本侵略與大陸荒廢)及第四章〈シルクロードの歴史と魅力〉(絲路的歷史與魅力)。司馬在〈後記〉評曰：

「中國是甚麼？」「中國人是甚麼？」這問題已經成21世紀人類最切實的課題之一。然而，再沒有比這個更難的問題。我們可以找到無數相關複雜而又互相矛盾的例子。因此要想對它概括評論可謂至難之事。即使從堆積的事例中抽取出個別事例進行整理，也會和其他事件群中的概念互相抵觸。最終「中國是甚麼？」仍然是個謎，這倒反成為定論。<sup>4</sup>

可見司馬認為中國歷史的複雜性使人們難以對其進行整體上的把握。中國在經歷古代多次異民族統治，長期分裂的國家狀態，近代以來西方和日本的入侵，辛亥革命時期的共和體制，直到新中國成立，中國的歷史定位被多次質疑和改寫，從而導致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形象的缺失，很難對其在東亞世界定位。不過，司馬仍嘗試探索中國文明的本質。

「私」是司馬對中國內部體制本質的理解。不過他並不認為「私」是諸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般的血緣、宗族共同體意識。他將「私」解釋為歷代王朝的家產制意識，試圖從制度上理解中國歷史的本質。

皇帝以一己之私，選拔官僚，當成自己手足。官僚作為私權執行者，紛紛中飽私囊，這一點並不被認為是壞事。兩千年來，對於民眾來說，王朝就是敵人。儒教雖滲透至民間，但只是同族團結的口號。對於王朝的苛政，民眾間經常互通情報，商量逃避之策。<sup>5</sup>「私」可說是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為剝削、壓迫農民而設立的管理制度。這種制度以儒家政治學說為思想基礎，以科舉考試為人才保障。與此同時，歷代王朝統治下的農民，則因「最基本的糧食」被剝奪不得不淪為流民，直到高舉起義大旗。這樣，舊的王朝雖被推翻，新的王朝卻又重複「私」的統治。在司馬筆下，中國歷史被描述為一部皇帝、官僚階級與農民階級矛盾對抗的歷史。

中國的複雜性很大程度取決於民族的多樣性，這也是司馬遼太郎甚為關注之處。他認為中國在各民族交流與融合的「民族的大熔爐」中孕育出「普遍性」文明，批判在儒家思想下的漢民族本位文明史觀。他寫道：

中國，世界數大文明之一，其高度的普遍性文明對周邊民族帶來巨大影響。人們常說北方，東北方的少數民族一跨越長城進入中國，就會馬上被同化掉。<sup>6</sup>

我仔細想想看，中國周邊的國家、藩國的稱謂中沒有一個字的叫法。也就是說，你要贊成中國文明，那就是藩國。如果不贊成，那就成為夷。蒙古就是夷……。對漢民族來說，衣裝是《禮記》的根本，不穿同樣衣服的是禽獸。漢族人完全不了解他們〔注：少數民族〕想要做甚麼。只是他們沒有漢民族文明的傳統，漢族人就認為這些少數民族會隨時隨刻發起戰爭。<sup>7</sup>

以上引文可窺見儒家華夷觀念下的同化和異化。在同化過程中，周邊民族逐漸失去文化的獨立價值。漢民族對周邊拒絕同化的民族施壓和輕視。不論同化還是異化，漢民族始終處於中心及優位。少數民族則被妖魔化，淪為文化附庸。司馬回憶道：「年少時通過與這些



人〔蒙古語教師〕的接觸，我開始對中國以及其周邊，或者說對中國這樣一個史上民族的大熔爐發生了興趣。」<sup>8</sup>「陳(陳舜臣)：中國是一個複合民族國家。這是瞭解中國的第一事件。〔中略〕司馬(司馬遼太郎)：這個國家不是漢民族國家，如果不明白這一事實，中國只有自我毀滅。」<sup>9</sup>

與此相對，司馬在書中多處例舉少數民族的物產與技術帶入中原後所產生的巨大文化推動力，強調中國作為複合民族及文明的「大熔爐」這一本質。他批判儒家思想下的漢民族本位意識，認為多民族不僅是中國的文化屬性，更是關乎中國的命運和未來的重要問題。

司馬遼太郎在1975年隨日本作家協會代表團第一次訪問中國。這次旅行的見聞同樣以連載的形式被收錄在散文集《長安から北京へ》(從長安到北京)中。在參觀中央民族學院開展的新式少數民族教育以後，他不禁感慨道：

我感到我的先入觀正在消失。這種先入觀是漢民族對待東夷北狄南蠻西戎這些少數民族的絕對優越感。這種「華夷」的差別直接關乎中國文明本質。我原本以為無論世道怎樣變化，漢民族都不會給予少數民族平等禮遇。<sup>10</sup>

司馬第一次訪中後心境起了變化。他盛讚新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認為中國拋棄了民族及文明的優越感，完成從「沉重」國家到「輕鬆」國家的蛻變，對新中國平等謙虛的少數民族政策讚美不已。

司馬對新中國的印象，總的來說，體制上的「私有」及文明「大熔爐」是他對中國歷史本質的把握。這種對中國文明多樣性的認識，絕非源於傳統的儒家思想。換句話說，司馬並不是從主體內部對主體進行認識。事實上，他選擇「周邊地域」蒙古作為觀察點，反觀中國的本質，從而將中國文明放在一個可以審視、反思的位置上。

### 三、司馬遼太郎的中國批判

1986年3月，司馬遼太郎(63歲)在《文藝春秋》卷首發表首回〈この国のかたち〉(這個國家的形態)，之後此專欄持續十年，共連載121回，直到1996年2月作者逝世。在第一回原稿中，司馬闡述該系列的主旨曰：「所謂形態就是原型的意思，也就是說，在被問到『日本是甚麼樣的國家？』時，我想照此回答。〔中略〕筆者原想以火星人的視角寫這篇文章，不過心情卻實在不允許。」<sup>11</sup>司馬同樣試圖站在「周邊」反觀日本，發掘日本的本質。作為司馬遼太郎最後十年的心血，〈この国のかたち〉被認為是司馬思想的「到達點」。

〈この国のかたち〉包括從古代到近代日本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並配以司馬的解說，儼然一部司馬版的日本文化史辭典。其中，〈朱子學的作用〉、〈宋學〉及〈孫文與日本〉等與中國相關的項目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這說明「中國」在司馬的晚年思想世界中佔極其重要的空間。上一節揭示出司馬對儒家思想和漢民族本位的批判，本節試將它與主張日本獨立文化價值的「到達點」接軌，以審視司馬相對化意識下中國批判的脈絡。

一般認為，朱子學(宋學)代表科舉官僚制度走向成熟後儒學的新展開。儒學在與佛教和道教競爭中，從傳統經學(生命論、家族論和政治論)基礎上添加的形而上學(存在論)宇宙論、道德論的部分。朱子學的誕生使儒家的理論體系化、哲學化。關於江戶時代朱子學在日本勢力的消長，丸山真男認為日本近世思想史是朱子學從內部被解體的歷史。古學派、徂徠學派、國學派等皆從批判朱子學中成長。這些學派擺脫朱子學形而上學的空論，將關心轉移到「安民」、「實證」等日本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實用價值上。<sup>12</sup>究竟司馬遼太郎如何評價朱子學？先看他如何看待朱子學的創立：

宋朝鼓吹國家主義變得緊迫且必要。雖然是漢人，但在異民族國家為官之人也不少，甚至還有漢人作為宋朝的官僚通敵的事



件。在這樣的背景下尊王(漢民族正統的王)攘夷思想成立了。總的來說，這種思想是在宋朝特殊狀況下釀出的一種危機感，本身並不具備普遍性。<sup>13</sup>

司馬認為朱子學源自漢民族王朝面臨大規模異民族入侵時的強烈自我保護意識，在這樣的危機意識下醞釀出的朱子學不可能具備承載「文明大熔爐」的能力，只能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及空論。<sup>14</sup>

出身商人家庭的司馬遼太郎對大阪的思想家表現出濃厚興趣。《日本的「近代」》中，司馬盛讚富永仲基、山片蟠桃等在江戶時代活躍於大阪的思想家以及他們「不定形」的學問，認為他們是具有近代性的先驅者，因其經世致用之學衝破朱子學的藩籬。不過，提倡學問經世致用的司馬遼太郎卻不能迴避與官學意識關係密切的水戶學。一般認為，水戶學作為朱子學主導的學問體系提倡絕對皇權和正統論，並在很大程度推動倒幕運動和明治維新。對於這種正統論和絕對觀念的主張，司馬認為目前的研究「偏左偏右」，沒有「社會科學性」，故評曰：

靠著這樣的事業〔德川光國的修史工作〕，水戶成為朱子學尊王攘夷思想的中心地帶。簡單來說，宋學的亡靈居然像舊炸彈爆發一樣，把封建制的壁壘粉碎掉。當然，這樣的光景在近代非常諷刺。這種矛盾在這之後仍然持續著，一直到現在都還有殘留。<sup>15</sup>

司馬將尊王攘夷的意識形態對明治維新的推動作用解釋為一種功利主義。他認為維新志士僅將尊王攘夷作為達到維新目的的口號和工具，而其思想上仍保有相當的自由度，朱子學整體上仍處於學問和經世致用的階段。然而，在達到倒幕目的之後，本該退出歷史舞臺的朱子學，卻頑固地殘留下來。12世紀末中國的朱子學意外地在19世紀日本的近代革命中立功。

另一方面，司馬指出由於朱子學的影響，昭和時代的軍部以及左翼勢力才染上喜歡空論的惡習。尊王攘夷的意識形態在倒幕維新

之後仍然以《教育敕語》及「統帥權」等形式殘留日本，導致天皇的「絕對形象」空前強化，軍部極度膨脹，最後日本戰敗。這是對「黑暗的昭和」、「瘋狂的國家」、「統帥權」作出的「司馬流」的解釋，即把日本近代史的悲劇與朱子學聯繫起來。因此，儒家意識下的「中國文明」，諸如科舉、宦官、朱子學，在司馬心目中更多是負遺產。

司馬遼太郎把目光拓展到整個東亞大陸，將東亞也看作為一個非一元文化及流動的實體。他認為「中華思想」和儒家政治學說不可分離。在儒家學說以及後來的朱子學影響下，「中華思想」逐漸成為代表文化一元論和政治正統論的思想形態，因此漢民族被看作優於少數民族，成為推動中國文明發展的絕對主導力量；漢民族的君主和朝廷成為東亞世界的中心，少數民族都應歸順朝廷，日本也非例外。<sup>16</sup> 司馬認為中國史甚至整部東亞史在「中華思想」的影響下被歪曲為漢民族文化一元論和政治正統論的「影響史」。他寫道：

養豬的話，〔滿族的〕機動性減弱、定居性增強，漢民族的農耕文明則乘虛而入。這樣，笨拙的豬成為〔獨自文化發展的〕障礙。不管怎麼說，蒙古人作為遊牧民族，純粹地保留下來。也就是說，我〔司馬遼太郎〕認為代表遊牧民族的蒙古人和代表農耕民族的漢民族以長城為界，構築起商業對手的關係。所謂東亞史，在某種意義上是騎馬民族對漢民族的抗爭史。把兩者看作商業對手，可以更好地把握東洋史。<sup>17</sup>

與政治正統論相對，司馬主張用二元對立論看待中國。他將漢民族農耕文明與北方民族遊牧文明力量的對比消長看作推動中國文明發展的原動力，認為在經歷諸如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元朝、清朝等遊牧民族興起並佔據統治地位的時期，中國歷史更長時間處在遊牧民族的支配之下。在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對立中，沒有所謂正義或正統，也沒有所謂中心與邊緣。可見司馬的二元對立論試圖推翻漢民族的政治正統、中心論，描繪出一個非漢族（農耕民



族)主導的東亞世界。可以看出司馬看待東亞歷史時所帶有的二元對立論，去中心論等特質。同樣，這種特質也與從蒙古這個邊緣地域觀察中國這一相對化意識密切相關。

#### 四、司馬遼太郎相對化意識中國觀的思想來源

1987年《韃靼疾風錄》出版後，司馬遼太郎停止近30年的歷史小說創作，轉而開始對文化論的思考。《街道をゆく》(漫步街道)是司馬晚年的另一部文化論大作。這部長達43冊的紀行集記載司馬以日本為中心，周遊世界時對歷史、文化、社會問題的所思所想。與其他歷史小說不同，司馬在《街道をゆく》中嘗試援引各方學者觀點來引證自己對日本文化的原生性和中國文化的普遍性的看法。這些觀點大致分為兩類：第一，諸如船、橋、建築相關的專業知識。第二，思想界、史學界學者對東亞文化交流的理解。從整理的情況來看：第一，引用福澤諭吉的次數最多，司馬對《脫亞論》、《勸學篇》(學問のすすめ)及《福翁自傳》，都有詳盡分析。第二，司馬遼太郎對著名的東洋史研究者均有所論，對江上波夫的遊牧民族世界史研究和內藤湖南的中國文化交流史研究尤為重視。

福澤諭吉的亞洲觀被認為承襲黑格爾( Georg Hegel )的東亞專制及東亞停滯說。《脫亞論》、《文明論之概略》等著作因為鮮明地突出這一觀點而聞名於世。宣揚「文明的實學」、「脫亞入歐」的福澤諭吉批判中國是「君主專制的」、「深受儒教意識形態侵害」的「半開化的」、「停滯的」及「非國民國家」。對於中國的歷史以及近代化發展，司馬在比較文化論集《この国のかたち》及《風塵抄》中表述曰：

若不從根本上破壞以亞洲專制為基礎的家族制度，中國就會變為死屍。這時萬惡均集中於儒教這種奴隸道德上。30年過後成立的新中國所作的一切努力，實際上是利用社會主義與亞洲的糟粕徹底決裂。<sup>18</sup>

他又評曰：「直到清末，中飽私囊在官吏心中是正常不過，甚至是應該做的事。對於歷代百姓來說，王朝就如餓虎一般，本質就是『私』。」<sup>19</sup>「中國史上，儒教作為『國教』持續兩千年以上。社會因此失去多樣性，文明也陷於停滯。」<sup>20</sup>司馬認為儒學的政治論與禮教論決定儒學的私有性格。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學國教化背景之下，經過科舉考試，儒學成為皇帝專制統治的有力服務工具。中國的思想、文化、經濟因此受到極大鉗制，從而在體制上失去發展成為國民國家的可能性。

在司馬的邏輯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歐文明論者福澤諭吉「脫亞論」的痕跡。正如司馬在紀行文〈アメリカ素描〉（美國素描）中所說「為了看清亞洲，我們需要光線來照亮它。不過這光線不是來自亞洲本身，它來自歐美」。<sup>21</sup>也就是說，司馬受到福澤諭吉的影響，試圖用西歐文明將曾經作為「世界文明中心」的中國相對化。

司馬遼太郎把中國以及中國文明相對化，將其置入整個東亞文化流動的環境中，試圖從「非中國影響史」的意義上對東亞文化交流模式重新構造。中亞學在歐洲（特別是法國）興起，給日本的東洋史學界很大刺激。他們的關心從與日本有深交的漢文明圈轉移到非文明圈的考察。從大正時代開始，日本的文獻學家辛勤耕耘，碩果累累。<sup>22</sup>

在談到東西方文明中心轉移時，司馬對日本的東洋史研究「脫中國中心」的趨勢以及20世紀前半期東洋史學者的文獻學研究工作讚賞有加。實際上，司馬相對化意識的中國觀並不孤立存在，它很大一部分繼承了日本的東洋史研究的思想與成果。換句話說，司馬是日本東洋史學科建制下的「好學生」，他有機整合東洋史研究的成果，試圖從「非文明圈」的遊牧民族地域來看曾經作為「文明中心」的中國。以下簡要介紹20世紀日本東洋史研究的趨勢以及司馬所在位置。

亞洲北部廣大的內陸草原地帶歷來被諸如匈奴、契丹、蒙古、



女真等遊牧民族所統治。在西歐中心史觀和中華思想史觀的夾縫中，遊牧民族被蔑稱為「好戰的民族」、「歷史的罪人」及「文明的破壞者」，其世界史地位長期以來沒有得到積極評價。江上波夫首創「騎馬民族日本征服說」，將日本國家的起源追溯到四世紀的遊牧民族文化，加強日本與遊牧民族間人種的、語言的、文化的認同感，這也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對中國文化的歸屬感。杉山正明作為後起之秀，批判舊來歐美以及日本歷史學界對蒙古的否定史觀，認為蒙古帝國作為先進勢力，推動泛歐亞大陸歷史的發展。<sup>23</sup>不僅如此，山口瑞鳳、岡田英弘等學者認為遊牧文明對漢民族文明保持優勢，並長時間支配中國，否定漢民族文明對周邊民族的單向影響。在這樣的學術累積中，遊牧民族不再是野蠻的及負面的「歷史包袱」，而是作為推動歷史、文化發展的主要動力，被賦予更多正面的世界史意義。

與遊牧民族為中心的世界史相呼應，內藤湖南與其弟子宮崎市定更關注中國文化與遊牧民族文化的交融與更新。內藤湖南在《新支那論》中講到中國之所以能維持長期民族生活，完全憑藉外種族的入侵。<sup>24</sup>宮崎市定發展內藤湖南的論點，提出「樸素民族說」，認為遊牧民族沒有農耕民族對土地和物產的貪欲。遊牧民族的每一次入侵，實際上都成為背負沉重思想文化包袱的漢民族的「解毒劑」，使漢民族以及漢民族文明得到更新與再生。司馬在描述中國周邊少數民族，特別是遊牧民族獨自文化時所表現出的同情與理解都有源自日本東洋史研究的投影。

## 五、結語

司馬遼太郎與陳舜臣談到如何看待中國和如何尋求日本未來道路時如此說：

從哪裏看〔中國〕這個問題非常重要。現今美國看中國的方法就

遠遠比中國看中國要正確。要從遠處看，從水平線上看，這樣才能看得見宏觀看得見本質。〔中略〕不管怎麼說，先從蒙古這個比中國弱勢的區域看它，我總還算看到一些東西。比如通過古代朝鮮而不是現代朝鮮，或者從越南這些受到過中國影響的區域來眺望它，可以稍微理解中國一些。<sup>25</sup>

可見司馬從「周緣」切入「中心」觀察中國本質的努力。通過批判中國根深蒂固的儒家意識和與之相連的漢民族本位意識，司馬闡發對於「私有」和「民族大熔爐」的中國本質的理解，表達其反對中心、一元、正統的意識形態等的主張。在日本東洋史學的知識體系下，司馬通過相對化的視線，將中國視為一個可以反思的、流動的客體，建構多元文化意義的中國，以及東亞世界。

子安宣邦在評論近代日本對中國的思想轉變時曰：「日本以及日本文化要想作為獨立的勢力存在，或者要主張日本文化的獨立性，就有必要將中國以及中國文化加以差異化。通過強調這種差異性，極力將中國他者化，從而達到伸張日本自我文化的目的。」<sup>26</sup>受福澤諭吉和東洋史研究的影響，司馬用西方文明和遊牧文明將中國相對化的意識，實際上也是對日本文化加以「異質化、特殊化」的努力。這應該也是司馬的作品在日本社會受到極大反響的原因之一。



附表一：司馬遼太郎中國題材作品以及中國旅行

書名	體裁	出版時間	背景	中國旅行
大盜禪師	長篇小說	1969年	古代中國(明末清初)	
空海の風景	長篇小說	1975年	古代中國(唐朝)	1975年5月8日—27日訪中作家代表團
長安から北京へ	紀行文	1976年	當代中國	1977年8月12日—9月3日西域旅行
西域紀行	紀行文	1978年	古代、近代中國	1978年4月3日—17日蘇州旅行
中国を考える	對談集	1978年	古代、近代、中國	
項羽と劉邦	長篇小說	1980年	古代中國(漢朝)	1980年7月4日—20日西域旅行
中国の歴史	對談集	1981年	古代、近代中國	1981年5月30日—6月10日四川雲南旅行
戦国時代の群像	介紹文	1981年	古代中國(戰國)	
長城とシルクロード	介紹文	1981年	古代中國(漢朝、唐朝)	
中国・江南のみち	紀行文	1982年	當代中國	
中国・蜀と雲南のみち	紀行文	1983年	當代中國	
歴史の交差路にて	對談集	1984年	近代中國	1984年4月1日—11日福建旅行
中国・閩のみち	紀行文	1985年	當代中國	
この国のかたち	散文	1986年	古代、近代中國	
鞭靫疾風録	長篇小說	1987年	古代中國(明末清初)	
風塵抄	散文	1991年	古代、近代中國	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常任理事就任
草原の記	紀行文	1992年	當代中國	
台灣紀行	紀行文	1994年	當代中國	1993年、1994年台灣旅行

- 1 關於司馬遼太郎在日本的熱潮，請參考拙論：〈司馬遼太郎ブームについて〉，《千里山文學論集》第84號(2010年3月)，頁343-353。
- 2 成田龍一著：《戰後思想家としての司馬遼太郎》(東京：筑摩書房，2009)，頁160-161。
- 3 對於司馬遼太郎的中國旅行與中國題材作品的時間關係參照附表一。
- 4 司馬遼太郎、陳舜臣：《対談：中国を考える》(東京：文春文庫，1983)，頁211。
- 5 司馬遼太郎著：〈風塵抄〉，載《司馬遼太郎全集》第67卷(東京：文藝春秋，1982)，頁336-337。
- 6 《対談：中国を考える》，頁18。
- 7 同上，頁31-32。
- 8 同上，頁213-214。
- 9 同上，頁112-113。
- 10 司馬遼太郎著：《長安から北京へ》(東京：中央公論社，1976)，頁212。
- 11 關川夏央著：《司馬遼太郎の「かたち」》(東京：文藝春秋，2000)，頁5。
- 12 丸山真男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75)。
- 13 司馬遼太郎著：〈朱子学の作用〉，載《司馬遼太郎全集》第66卷(東京：文藝春秋，2000)，頁19。
- 14 在〈この国のかたち〉中，司馬遼太郎提到他的朱子學批判是對中國學者狩野直喜的宋學亡國論的發揮，並非獨創。
- 15 司馬遼太郎著：〈朱子学の作用〉，載《司馬遼太郎全集》第66卷(東京：文藝春秋，2000)，頁24。
- 16 廣義上的中華思想是一種東亞更具普遍性的世界觀。也就是說只要誰能入主中原，誰就能成為代表「中華」。元朝統治中國時對南宋人稱之為「南蠻」；滿族自治下的清朝更是封自我為「天朝上國」，拒與英國建交；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妄圖吞併中國。這些外來民族的世界觀均受到中華思想的影響。
- 17 《対談：中国を考える》，頁21。
- 18 司馬遼太郎著：〈アジアという巨大な病灶〉(可稱巨大病源的亞洲)，載《司馬遼太郎全集》第67卷(東京：文藝春秋，2000)，頁92。
- 19 同上，頁326。
- 20 同上，頁336。



- 21 司馬遼太郎著：〈アメリカ素描〉，載《司馬遼太郎全集》第53卷（東京：文藝春秋，2000），頁35。
- 22 司馬遼太郎著：《街道をゆく．六》，載《司馬遼太郎全集》第58卷（東京：文藝春秋，2000），頁380。
- 23 杉山正明雖在年代上與司馬遼太郎並無交集，不過正如杉山正明獲第六屆司馬遼太郎獎一樣，他為重建遊牧民族世界史的努力被認為繼承了司馬遼太郎的一些看法。
- 24 內藤湖南著：〈新支那論〉，載《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東京：築摩書房，1994），頁513。
- 25 《対談：中国を考える》，頁128-129。
- 26 子安宣邦著：《アジアと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亞洲如何被敘述？）（東京：藤原書店，2003），頁152。

## 第三部：政經交流篇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金港堂與商務印書館： 中日近代教科書出版業的互動

❖ 尤怡文、遲王明珠、蘇基朗、蘇壽富美 ❖

## 一、前言

長久以來，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歷程，一直被視為發展研究的最佳比較案例。因兩國現代化的起始時間相近，加上地緣關係，它們在現代化過程中存在高度學習及合作的互動。然而，又因兩國之間軍事衝突所引發的民族主義，使得中日的互動往往擺盪於合作與競爭的矛盾情境。這樣的矛盾情結，甚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影響相關研究，令許多中日互動的歷史得不到持平的處理。日本金港堂與中國商務印書館之間的合作，即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日本教育體制現代化起步早於中國，因此其教科書出版業的發展亦先於中國同行。<sup>1</sup>商務印書館在草創時期，無論在印刷技術或教科書編譯上，多借鏡於日本同業。另一方面，由於日本教科書市場過度競爭導致弊端叢生，使得日本教科書業巨擘金港堂將目光轉向新興的中國市場，意欲來華投資。於是在兩方互利的考量下達成了合資協議，商務印書館引入日方資本，改組為股份公司。此舉對商務印書館而言，不但可獲得資金與技術的挹注，也減少一個可能的競爭對手；對金港堂而言，除獲得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外，也降低



純日資公司在中國所可能招致的政治風險。然而，這樣一個在商言商的合資策略，卻在往後屢屢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而變調，成為競爭對手用以打擊商務印書館的焦點，導致合作關係結束。這段歷史一直被刻意的迴避，直至中國改革開放後，緣於對外資技術與資金的需求，這段中日合資的歷史始重新回到時代的舞台，甚至被官方媒體譽之為「第一個中外合資的樣板」。<sup>2</sup>

本研究意圖通過對舊史料的新詮乃至新史料的徵引，重新觀察金港堂與商務印書館在中日兩國教科書企業發展脈絡下的互動過程。以下先分述金港堂及商務各自創業30年左右的歷史，然後討論其合作始末的一些問題。

## 二、金港堂三十年

1872年維新政府頒佈學制，全面推動現代化教育體系。各地新式小學、中學紛紛建立，創造了龐大的教科書市場。此時期的教科書由文部省編定，而後交付民間印刷廠印刷。然而，受限於傳統行會的限制，教科書翻印的授權採特許制，僅允許少數行會成員翻印，阻止新企業分食此商機。可是市場需求實在過於龐大，教科書供不應求，文部省遂於1875年6月宣佈開放文部省藏版教科書的翻印。緊接著於9月修正《出版條例》，廢除行株仲間(行會制)，開放出版市場。自此，開啟了日本近代教科書業的發展。

金港堂創辦人原亮三郎(1848-1919)出身愛知縣地方豪族，為維新政府現代化運動所吸引，前往東京修讀漢學，後因生計窮乏，前往神奈川縣政府任職文書，1874年辭去神奈川縣之職，前往橫濱，擔任小區戶長兼任學區取締(學區督學)。明治初期，為落實新式教育，明治政府採取層級式的教育行政體系，學區取締即為此行政體系的末端，作為推動教育政策的第一線，舉凡勸學、學校設立、經費、學務、教科書等，無所不包。緣此工作經驗，原看到教科書市

場的無窮潛力。1875年文部省全面開放教科書翻印，並廢除行會制。該年10月，原亮三郎辭去戶長及學區取締一職，於橫濱創設金港堂，從事翻印教科書的生意。他利用其於神奈川縣任職時的關係網絡，成為神奈川縣的御用書商，包辦該縣的教科書發行。當時教科書市場呈現高度分割及地域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各自擁有官書店發行教科書，同時指定政商關係良好的企業為御用書商。由於教科書需求大、利潤高，因此只要獲得地方採用，便有驚人利潤。原並不滿足於作為一個地方御用書商，1876年將金港堂遷移至新興工業的聚集地東京日本橋，擴充設備，並積極擴張市場版圖至各國各地，漸漸發展成為全國性大型出版商。<sup>3</sup>

教科書的翻印免許制及自由採用安排，雖然解決教科書市場供應不足的問題，但卻也為明治政府帶來兩大問題：其一，非官方教科書中的民主自由思想助長反政府的民權運動；<sup>4</sup>其二，無管制的翻印使教科書品質低劣及錯漏百出。為防制弊端，文部省加強管制教科書出版發行，於1885年頒佈的《小學校令》中，將教科書的發行改為檢定制，所有教科書必須經文部省的檢定方可發行。<sup>5</sup>此外，更積極擴大文部省教科書的編印，企圖主導市場。從此日本教科書市場由百家爭鳴的開放制時代，進入壟斷的檢定制時代。<sup>6</sup>

1886年2月，金港堂在文部省頒佈檢定制政策前兩個月，搶先成立編譯所，從事教科書編輯，以因應新政策。文部省積極擴大教科書的編印發行，嚴重威脅民間出版業。於是時任東京書籍組合理事長的金港堂社長原亮三郎，兩度領銜上書，抗議文部省教科書的官業化路線，並透過政商網絡向文部省官僚施壓。文部省終於在1890年改變官業化政策，由民營出版商主導市場。由於教科書的編譯需大量資金，再加上印刷設備現代化亦需資金投入，因此市場越來越集中，形成四大出版商寡佔局面：金港堂、集英堂、普及社及博文堂。資金不足的中小型書商無力競爭，轉而成為依附在大出版商下的行銷網絡。



1900年文部省頒佈小學校令，對學制及教科書進行大幅度改革，令教科書市場競爭愈烈，各大出版商為取得文部省對其所出版教科書的核可及獲得各地方圖書審查委員會的採用，競相行賄相關人員。1901年1月文部省令二號，頒佈嚴懲規則，意圖管束教科書商與教育行政人員間的行賄與貪污之弊。在文部省祭出嚴罰令後，金港堂於4月發表〈小學教科書の懺悔〉，宣佈停止教科書出版，並積極尋求來華投資的機會。然而，金港堂並未真正放棄日本的教科書市場，同年10月隨即與教科書業的另兩大巨頭——集英堂、普及社，合資成立「帝國書籍株式會社」，換了個招牌，繼續經營小學教科書的出版發行。行賄貪污現象依然持續，直至隔年12月，明治政府大規模逮捕、起訴出版商及教育行政人員，金港堂亦涉案，史稱「教科書疑獄事件」。事件後不久，1903年文部省宣佈教科書改為國定制，結束了金港堂稱霸教科書市場的檢定制時代。爾後，金港堂雖力圖往綜合型出版社轉型，但疑獄事件後，人才流失，陷入經營困境。<sup>7</sup>1909年，原亮三郎之子原亮一郎另創東京書籍株式會社，發行國定本教科書，該企業至今仍為日本主要教科書發行出版商。

關於金港堂前三十年的經營績效，總的看來可分成幾個階段：開放時期，由於翻印成本低廉，加之政商關係良好，企業獲利極豐。檢定制初期，受編印成本提高，雜誌出版虧損，及轉投資企業營運危機等因素影響，因此企業績效不佳。及至1894年，裁撤編輯所，專營小學教科書後，企業績效轉虧為盈，進入金港堂帝國的黃金時代。1900教科書改革政策為金港堂帶來競爭優勢，使其獲利率攀升至高點。（圖1）<sup>8</sup>然而，在1901年停止小學教科書發行，再次轉向綜合型出版商後，獲利便開始滑落，一度出現嚴重財務危機，致使原家族出售其他股票投資以週轉，但仍無力挽回頹勢。原家族遂轉而另設新公司——東京書籍會社，以新名號再次進入教科書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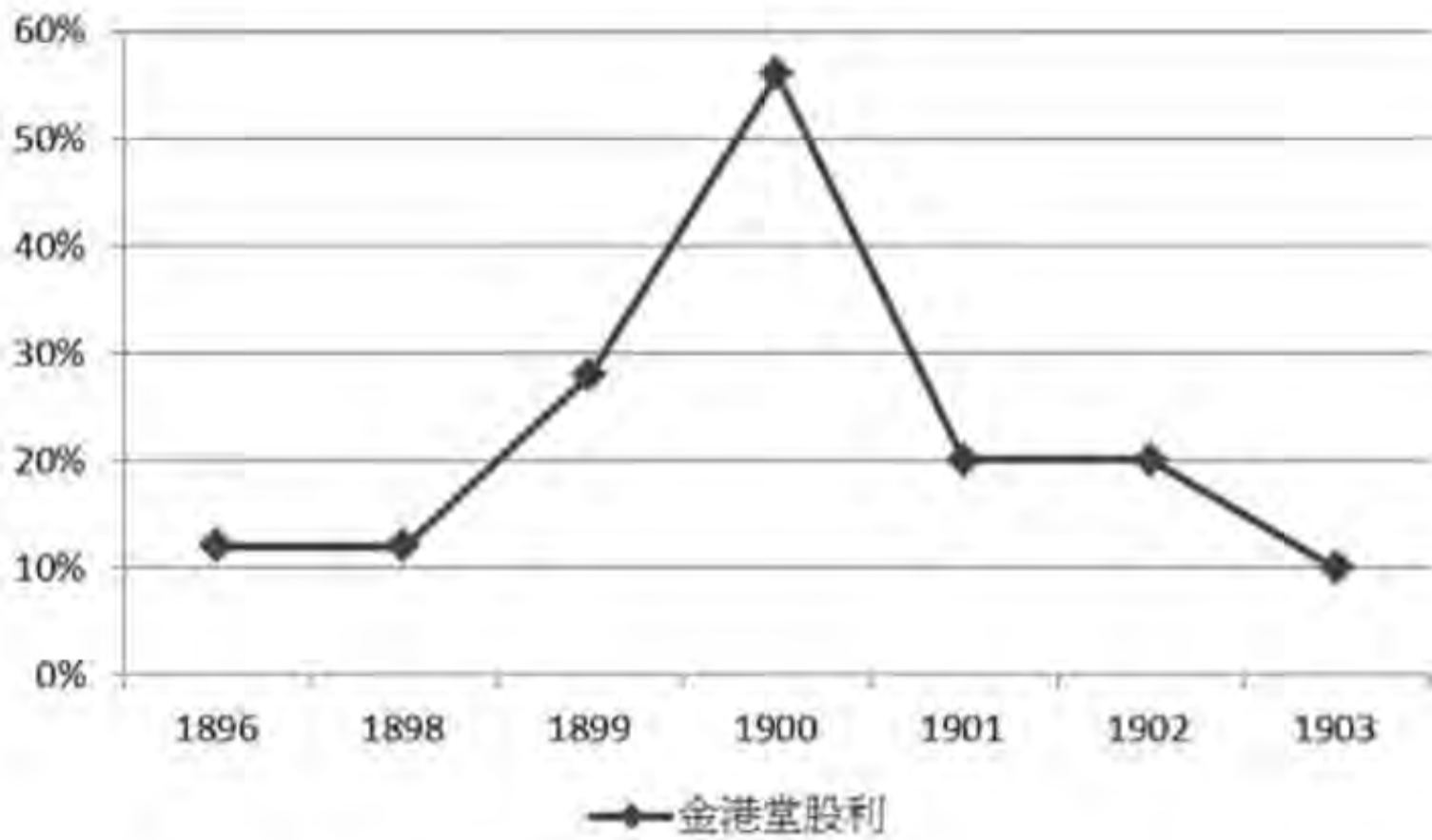


圖1. 金港堂歷年股利( 1896-1903 )

### 三、商務印書館三十年

光緒帝於1898年推行戊戌變法，詔令各省、州、縣、府開設中西學堂，「所有中學小學應讀之書，仍遵前諭，由官設書局編譯中外要書，頒發遵行」。在推動教育體制現代化之初，清政府試圖由官辦書局出版教科書，然而，一如明治政府所遭遇的問題：正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政府官僚體系並不具有充分能力，供應如此龐大的教科書市場需求，因此在1903年的癸卯學制中，清政府採取檢定制，開放民間出版業者進入教科書出版市場。

商務印書館成立於1897年，創始之初以印刷業務為主。1898年創辦人夏瑞芳( 1871-1914 )察覺到新式教育的潛在商機，嘗試編譯英語課本、詞典，及國外法政史地作品，獲得極大成功，促使其積極轉向出版業務的發展。隨著新學制的改革，商務印書館開始從事教科書的編輯。受限於資金與技術，商務印書館遭遇經營困境，故而在股東印有模的居間聯繫下，引入金港堂原家族資金。1903年雙方



簽訂合資契約，商務印書館改組成為中日合資股份企業。在原家族資金、印刷技術、編輯經驗的協助下，商務印書館推出的《最新教科書》大獲市場好評，並藉由政商網絡及分店行銷網的建立，迅速成為教科書市場龍頭，與文明書局、中國圖書、學部編譯圖書局形成四分天下之勢。<sup>9</sup>

商務印書館於1897年創立時，是由七位教友合資，後因經營困難，於1901年第一次增資，增加兩位股東張元濟與印有模。這兩位股東的加入，不僅為商務注入資金，而且憑藉其網絡關係，為商務印書館帶來新的發展方向。張元濟的知識分子網絡，讓商務印書館由印刷廠轉型成為出版重鎮；而印有模的商業網絡（印有模與金港堂原亮三郎女婿山本條太郎同為上海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為商務印書館引入日資。1903年金港堂原亮三郎等日方投資人正式與商務簽約，持有50%商務印書館股份。1905年兩次增資，增加職工股東。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商務印書館未能預見政治局勢的變化，不及將遵奉君主統治思想的教科書改版，因而受趁勢而起的中華書局攻擊。雖然商務印書館很快推出《共和國教科書》，使教科書市場出現新局。改朝換代後，學部編譯圖書局退出市場，文明書局與中國圖書公司的發展則受限於資本不足，相繼被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所併購，於是形成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兩大企業競爭的局面。在競爭過程中，商務印書局的日資色彩屢成對手攻擊焦點，於是在民族主義、挽回利權的輿論下，商務印書局喪失許多地區的教科書市場。商務印書館管理階層決定與日方股東協商，結束中日合資，回歸為純中資企業，以利市場競爭。據估計該時商務印書館佔有市場十之六七，中華則佔十之二三。<sup>10</sup>其後在豐厚獲利的誘因下，陸續又有新書局加入市場，20年代末期，市場上的主要領導出版社為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及開明書局。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隨著政權的統一，國民政府意圖

統一教科書的編定，然而新政府的官僚體系尚未有足夠的能力編定國定本，再加上民間業者的抵制，國定本政策遲遲未能實現。1934年受中日戰事影響，一方面因市場需求停滯，一方面國民政府的行政管治能力也有長足的進展，商務印書館轉而與國民政府合作，協助教育部召集六大教科書公司：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正中，合資成立編輯委員會，一起參與國定本編輯，並約定由六家出版商壟斷國定本的承包發行。<sup>11</sup>然因戰事失利，國府內遷，國定本制直到1942年方得實施。七家出版商出資成立七聯處，並透過協商，分配教科書發行人數：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正中書局三家各佔23%，世界書局12%，大東書局8%，開明書局7%，文通書局4%。從此教科書市場成為由七家出版社壟斷的寡佔市場。受迫於社會壓力，國民政府在1947年開放國定本教科書版權，所有出版社皆可印刷銷售，使商務印書館頓失可靠的獲利來源，經營陷入困境。<sup>12</sup>以後便是海峽兩岸分家經營的局面，但直至21世紀，商務在兩岸仍是重要的出版社。

關於商務印書館的經營績效，1903年中日合資前期，雖偶有暢銷書發行，但因資金不足，常陷入經營困境，因而有1901、1903年的增資。中日合資時期(1903-1913)，受益於資金、印刷、編輯的提升，獲利能力極佳，平均獲利率可達23%。圖2為此期間歷年股利，目前缺乏進一步的資料說明造成此間各年獲利起伏之因，但若考量前述市場情勢，我們推測1906年之後的滑落，或許與1906年中國圖書公司進入教科書市場有關。該時中國圖書公司，以商務印書館的日資色彩做負面攻擊，使商務丟失了許多地方教科書市場。<sup>13</sup>而1911年的滑落，或許與前一年總經理夏瑞芳虧空公款炒作橡膠股票所引發的財務危機有關。1913年的微幅下降，則可能肇源於中華書局的成立。由於欠缺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股利數據，我們無法進一步分析其經營績效，但由二手文獻記載看來，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應無出現虧損，即便是戰時，市場萎縮，受益於國定本發行的壟



斷，及國民政府資金的貸放、政府印刷業務的承包，其獲利仍維持在一定水準。直到戰後，在失去教科書壟斷發行權及優惠貸款後，商務印書館的經營方才陷入困頓，1948年不但沒有任何新書出版，連《東方雜誌》亦停刊。<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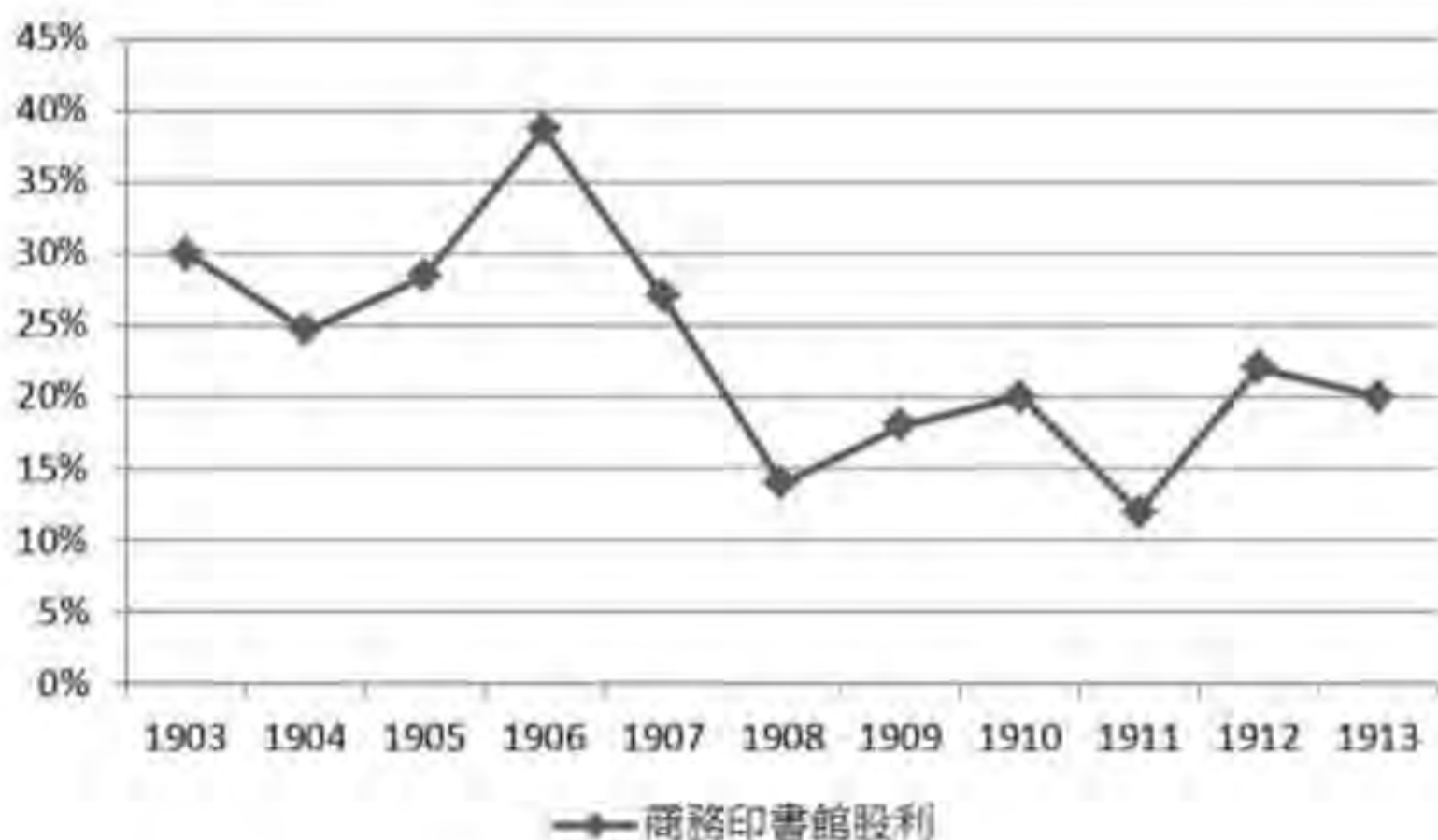


圖 2. 商務印書館股利(1903-1913)<sup>15</sup>

#### 四、中日合作始末的新考察

在瞭解金港堂與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歷程後，本節我們將說明原本兩條平行的發展路徑，在甚麼樣的因素下相交，以何種方式互動；而後又為何終止合作及如何結束。

對於商務印書館而言，選擇引進日資的主要原因有四：資金、印刷技術、教科書編輯經驗的引入，及減少潛在競爭對手。至於金港堂原家族投資商務印書館的動機，則出現了不同觀點。葉宋曼瑛推測，原家族來華投資，是為1902年涉入教科書冤獄事件的相關人員另謀生路，因而促成了1903年與商務印書館的合資計劃。<sup>16</sup>對此觀點，樽本照雄則持不同看法。樽本以為原家族投資商務印書館之

議，與教科書疑獄事件無關，雙方早在1901年已論及合資事宜。其反駁葉論之理由為「金港堂是日本的大出版社，在日本有的是工作，更不必讓小谷加藤到上海去找工作」。而之所以認為是1901年已開始合議的論證是：1902年8月商務失火後，僅兩個月就建成新廠，有違常理，顯見建廠計劃早在失火前便已擬議。<sup>17</sup>

本研究認為將1901年視為合資商議的起始點或許是合理的，但樽本的論證卻值得商榷。首先，其反駁葉論之主要論證基礎是，金港堂規模龐大、財力雄厚，自然能為涉案社員在日本安排工作。然而，姑且不論金港堂是否真有意為社員安排去處，事實是金港堂在1901年即已在輿論壓力下停止小學教科書出版。疑獄事件後更是陷入經營困境，已不再是昔日的出版業巨人。再者，由商務新廠的建造速率來判斷合資商議起始於1901年，稍嫌薄弱與間接。不過本研究亦認為1901年作為合資商議的起始，確較1903年觀點合理。支持此觀點的理由是，在前面金港堂案例介紹中，我們即曾說明雖然疑獄事件發生在1902年12月，但1901年文部省便針對教科書業行賄弊端，發令嚴懲，金港堂隨即宣佈停止教科書出版，改變出版路線，並尋求前往中國投資的機會。本研究以為雖無直接證據證明1901年原家族已與商務印書館商議，但可確定的是原家族來華投資的計劃是早在1901年便已存在，而非疑獄事件後方才促發此想。

在合資方式上，雙方議定對半持股，原家族以自然人身份持股，而非以金港堂法人名義投資。由於股東人數增加，為因應新的合作模式，商務印書館進行公司組織改組，自合資公司轉而成為股份公司。關於合資後公司法人的註冊問題，既存文獻少有關注，然而看似只是行政程序的註冊過程，實可影射出中日合資行為背後的制度環境及中日雙方如何在不同制度之間進行策略選擇。因此本研究重新爬梳史料，試圖釐清商務印書館改組後的註冊時間及註冊地點。

關於商務印書館的正式註冊時間，大多數文獻並未仔細區分成



立及註冊時間，或謂「1903年議定合股」，或謂「1903年與日本金港堂合資成立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sup>18</sup>但「成立」並不等於「註冊」，因為1903年清政府尚未頒佈《公司律》及《公司註冊章程》，商務印書館不可能於該年向清政府註冊。在清查相關文獻後，本研究發現，1914年3月6日《申報》上所刊載的〈(來件)完全華商股份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章程(民國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臨時股東會議定)〉第四條，載明：「本公司於前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遵照註冊章程呈請商部註冊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二日奉商部批准給照……」；另外，在《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所收錄的〈本館四十年大事紀(1936)〉中，亦記載着：「1905年12月正式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100萬元。遵清政府商律定為有限公司，呈商部註冊，資本100萬元，註冊時先集半數，每股100元，准許外人附股，但需遵守我國商律及公司律，次年3月12日經部批准。」<sup>19</sup>除此，我們於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業司公司登記卷中，找到商務印書館的實業部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稿底(請見附錄一)，在登記年月日一欄中，註記為前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二日經商部批准。由商務印書館的文件及官方檔案中，證實了商務印書館一直要到1906年方在政府按公司律成功註冊為股份有限公司。此事在《商務印書館110年大事記》中有較清晰的說明：1903年作「十月，正式成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吸收日資，改進印刷。」與《商務印書館大事記(九十周年)》所記無異；但1906年作「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在清政府商部註冊」。<sup>20</sup>李家駒亦指出註冊在1905年，與成立有異，但根據林爾蔚、汪家燊《商務印書館簡史(徵求意見稿)》將成立年份繫於1901年張、印二董加股之時。<sup>21</sup>由於我們未見林汪的書稿，未知其根據是甚麼。若屬實則是新的證據，說明在與日人合資前已成立有限公司。這種情況當時亦存在，就是入股的股東責任是否真的有限，完全沒有法律保障而已。<sup>22</sup>從《張元濟年譜》所見，1903年10月合資以後可能已經馬上引進日資及人才，如該年12月起年譜已不斷出現小谷重及長尾

楨太郎參與重要編務決策的情況。12月14日兩人更參與館內領導層的重大爭議，對應否跟從京師大學堂所訂的謬戾小學課程而編寫教科書一事，投下重要一票。尤有進者，年譜列出1905年2月26日及1906年2月16日張元濟出席商務印書館股東會的紀錄，所據為《商務印書館股東會紀錄簿》。<sup>23</sup>此史料暫未開放，但1906年3月商部正式註冊前，商務顯已按本身的條例進行定期股東會議。

然而，由此衍生出的另一個疑問是，自1903年合資以來至1906年獲清政府批准期間，商務印書館是以甚麼身份存在？是否具有法人身份？或者僅只是基於民事契約成立的商業組織？為探究此問題，我們繼續追溯了商務印書館在1905年向清政府申請註冊之前是否曾於其他國家登記註冊。在中文文獻中，我們並未找到關於其他註冊地點的記載，但在日文文獻中，發現了商務印書館曾於香港註冊，及中日雙方就註冊地點的協商與折衝。1914年9月20日發行的日本《揚子江報》，在介紹中日合資企業時提及商務印書館，記載如下：

公司發起人鑑於設立當時的情況(選擇註冊地點)，於中國人方面來看，唯恐實權落於日本人之事情發生，為避免股東間之內訌，其招致政府的批評，故以日本登記手續煩雜為由，於香港登記之。又為避開中國人的誤解，利用在清國農工商部登記，作為清國公司、可謀業務擴張。<sup>24</sup>

再者，於東亞同文會1915年的定期報告中亦有類近的記述：

應留意到，(中方股東)以登記手續煩之表面上的籍口(不願意在日本登記註冊)，而在香港登記設立成為英國籍，(中方股東擔心)不這做的話，實權會落入日本之手。其後，(日方股東)為使他們對日本人之誠意徹底無疑，又重新跟從清國法，公司由英籍轉變(為中國籍)，並將店全部交中國人經營，日本人只剩下作為股東的責任和權利。<sup>25</sup>



從前述兩段文字中不難看出，註冊地點的選擇，實則涉及中日雙方對於公司控制權的爭取。中方投資者，擔心一旦註冊成為日籍公司，控制權將落入日方投資者手中，因而協議前往香港登記註冊。而後，一則為取得中方進一步的信任，一則考量到中國市場業務的推廣，日方投資者同意將商務印書館註冊為中國籍公司，並由中方投資者取得經營權，日方投資者則退居為非控股股東。為進一步求證，我們曾前赴香港註冊局，但並未查獲商務印書館註冊記錄。雖然目前欠缺一手檔案證實商務印書館曾於香港註冊，然若就前述兩份日文二手文獻看來，商務印書館應該確實曾在香港註冊，只是沒多久即改籍。因此，一個可能的推測是，由於商務印書館登記未久便撤銷註冊，是以未於香港註冊局中留下檔案，姑存疑。

而導致中日合資終止的因素，普遍認為是因為該時民族主義、挽回利權思想高漲，商務印書館的日資色彩屢遭競爭對手攻訐，並因而失去市場，因而迫使商務管理領導階層，不得不與日資進行協商，買回股權。對此，樽本則認為，民族主義是環境因素，但商務解除合資關係的主要理由是商務印書館已習得金港堂所有技術，日資已無存在必要。<sup>26</sup> 本研究以為民族主義似乎為主要因素。例如1905年總經理印有模即需要上書請求農工商部發咨文給各地都統、各省巡按使及京兆尹等地方官員，著其曉諭當地商民謂商務印書館已經屬於全華資公司，以免學商各界誤信謠言，以為商務仍然受外股左右，「於營業前途不無關係」。<sup>27</sup> 可見日資的存在，確實為商務印書館的業務帶來明顯的損失。至於已經習得所有技術一說，觀兩家終止合資後，商務印書館仍持續自日本引進許多技術，足見此論點與事實不太相符。

經過多次協商後，雙方議定退股協議為：商務印書館償付日資每股146.5元，其中100元為股本，30元為預計1913年之股利，16.5元則為資產價值的折算及商務招牌的經營價值。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項，顯見該時已具有將品牌視為企業無形資產的概念。

雖然，商務印書館的中日合作，幾經曲折後，在1914年1月6日簽訂退股協議，為合作劃下句點，但由中日合作衍生出的風波並未就此打住。就在1914年1月10日，商務印書館登報聲明收回日股的當天，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及總經理夏瑞芳即於公司總發行所門前遭刺殺，行兇動機至今不明，雖有上海革命黨人陳其美買兇以報夏拒捐軍之仇的說法，但張元濟在致蔡元培書信中有以下兩則委婉之辭。<sup>28</sup>

(第18函)……夏粹翁於一月十日被兇人在本店門首狙擊，當即殞命。兇手被獲，審係出資雇來。說者謂原因由於閘北一役。以私見揣之，未必盡確，大約主因皆由於同行嫉妬，未知卓見以為然否？本館之事照常進行，繼任總經理已推定印君錫璋，亦公司中之大股東，曾任董事多年，在上海商界甚有名譽。知系雇注，並以附陳。……(第19函)……夏粹翁猝遭慘害，實出意外，差幸兇徒就獲，當已引渡，藉申國典。惟主謀者早已聞風遠揚。世途荊棘，夫復何言。開吊尚未定期，可否乞賜銘諒，尤所禱盼。現繼任者為印君錫璋，館務一切照常進行，足紓廬念。事此奉復，敬頌台祺。<sup>29</sup>

此處的「閘北一役」，即指陳其美。張元濟對內情應較外人為更掌握，可他對這說法，並不認同。所謂「同行嫉妬」，若意指其他同業，涉嫌最大或為中華書局？但中華正迅速冒起而與商務分庭抗禮，是否需要出此買凶殺人的下策？抑或張元濟的「同行」，似另有難言之隱？次函更直指「主謀者早已聞風遠揚」，言中有物，固已洞悉元凶誰屬。他的「同行」既不可能是陳其美，亦不一定是其他書業的對手（不必遠揚且無殺人之動機）。可知張元濟的欲言還止。

又數月後《申報》記追悼會事，全錄董事伍廷芳致辭，詳述回購日資本末時，亦有功成身敗之語，隱然暗示兩者不無關連之疑。該報導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三年五月十日星期日)[本埠新聞]《追悼夏粹芳君紀》：昨日午後二時，為商務印書館前總經理夏君粹芳在味莼園開追悼會。會場布置頗為壯觀，中置乙檯，檯上陳列夏公堆絹立像一架，圍以花卉，週堆花圈，場中滿掛各省政學商界以及外人所送輓聯、祭軸、誄文等，多至數百幀，男女來賓約有千數百人，場中不能容納，後至者均佇立場外。所有開會秩序紀錄如下：……(四)伍廷芳君演說大致謂：「今日到會諸君，恐有不知夏公履歷者，鄙人略為述之。夏公青浦人，出身寒素，幼年肄業上海清心中學，既壯，乃出而謀生。公志在實業，時值新舊過渡之時，見印刷事業正在萌芽時代，遂悉心研究，毅然而創辦商務印書館。初時規模甚小，繼而營業發達，思有以擴充之，奈短於資本，謀諸國人，鮮有應者。壬寅冬，有日本人携巨資來上海，思營印刷及出版業。公念我國之印刷術及編譯上之經驗者，皆甚幼稚，非利用外資兼取法其經驗不可，遂與訂約合資，改商務印書館為有限公司，其權悉操公手。曾幾何時，而竟成為百五十萬資本之大公司矣。鄙人擔任該公司董事以來，稔知夏公辦事認真而有毅力，內部組織完備，故有今日之成績。我國近年來組織百萬資本之大公司者頗多，而能如商務印書館之收效果者則甚渺，此尤足見夏公平日辦事之能力也。公為基督教徒，本宗教以立身，故遇事大公無私，人咸敬之。年來外間以該公司附有外股頗多誹謗。鄙人竊有以為不然，蓋該公司實華股多而外股少也。夏公有鑒於此，擬將外股收回，鄙人極贊成之。於是夏公東渡，商議就緒，回國發表後，猝遭狙擊，功成身敗，殊深痛惜。今承諸君到會追悼，諒皆具有仰慕之熱忱，而夏公成業以來補助公益事業甚多，其品其行，可為社會立身作則，此則諸君尤當永遠景仰而紀念之也。」<sup>30</sup>

直至1919年，商務印書館的中日合資身份，再次被中華書局用以做為攻擊焦點。該年6月日本雜誌《實業之日本》，將商務印書館列入中日合辦企業名單中，商務印書館雖即時去函要求更正，並呈文農商部說明，但中華書局利用該時抵制日貨運動，將《實業之日本》所載商務有日資一文，翻印成中文小冊，並印製負面文宣，廣寄各學校，以打擊商務。<sup>31</sup>

## 五、結語

最後，讓我們回頭檢視，中日教科書業交流過程是競是合？從產業發展角度而言，金港堂與商務印書館的合資，應該是一項雙贏的理性策略合作。當市場過度競爭以致無法獲利時，對於企業而言，除了自身經營的轉型外，便是將資金與技術輸出於新興市場，開闢新市場。但進入他國市場自有一定的風險，因此選擇與當地企業合資，便成了最佳選擇。而對新興市場的企業而言，引入外資的技術與資金，不但可使其迅速升級，領先國內其他業者，更可減少一個潛在的外來競爭者。中日合作可提升兩國出版業的現代性，但是現代性與身份認同卻呈現緊張關係。在企業層面看似理性的策略合作，卻與國家層面的民族競爭產生了矛盾。於是在民族敵對的大環境下，企業之間的策略合作只得告終，並且遺下一宗血腥的無頭公案。

最後，本研究想要說明的是，民族主義不僅造成企業理性策略的變調，也可能影響到研究者的視野，因而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環節。近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許多被湮沒的史實漸漸展露。這種積極的發展，將有助我們從全球史的角度，重新正面檢視近代中國發展的歷程。





- 實態とその位置》，《出版研究》第16號(1986年3月)，頁72-125；稻岡勝著：〈明治前期文部省の教科書出版事業〉，《研究紀要》第18號(1987年3月)，頁1-53。檢定制時代的教科書市場，參考稻岡勝著：〈明治檢定期の教科書出版と金港堂の經營〉，《研究紀要》24號(1994年3月)，頁1-144。
- 7 1901年金港堂停止小學教科書發行後的經營，參稻岡勝著：〈金港堂の七大雜誌と帝国印刷〉，《出版研究》23號(1992)，頁171-211。
  - 8 由於欠缺1897年之前的財務報表，因此前期的績效表現僅能由二手文獻記載加以觀察。圖1的數據資料來源：稻岡勝著：〈明治檢定期の教科書出版と金港堂の經營〉，《研究紀要》24號(1994年3月)，頁101-102。
  - 9 關於清末新政時期教科書市場競爭的評定，參黃林著：《晚清新政時期出版業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4)，頁112-113。
  - 10 錢炳寰著：〈20年代教科書競爭二三事〉，《出版科學》第4期(1997)，頁43。
  - 11 戴仁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80。
  - 12 汪家熔著：《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頁184。
  - 13 樽本照雄著：《初期商務印書館研究》(京都：清末小說研究會，2000)，頁275-276，279-281。
  - 14 汪家熔著：《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頁170，184。
  - 15 數據資料來源：汪家熔著：《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頁35。
  - 16 葉宋曼瑛著：〈早期日中合作未被揭開的一幕——1930-1914年商務印書館與金港堂的合作〉，《出版史料》第3期(1987年10月)，頁110。楊揚著：《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舉出三位在合資及合作過程舉足輕重的日方人員加藤駒二、小谷重及長尾楨太郎三人，均曾在教科書疑獄事件中定罪判刑，見頁29-20。
  - 17 樽本照雄著：〈辛亥革命時期的商務印書館和金港堂之合資經營〉，《清末小說研究集稿》(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227-229。
  - 18 如《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45；王學哲、方鵬程著：《勇往向前：商務印書館百年經營史：1897-2007》，頁188。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大事記(九十周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在1903年項下作「十月，正式成立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吸收日資，改進印刷」。

- 19 〈本館四十年大事紀(1936)〉收錄於《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679-680。原文載《同舟》第4卷第12期。
- 20 商務印書館110年大事記編寫組：《商務印書館110年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 21 李家駒著：《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頁28。
- 22 See Billy K. L. So and Albert S. Lee, "Legalization of Chinese Corporation, 1904-1929: Innovation and Continuity in Rules and Legislation," in Billy K. L. So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Treaty Port Economy in Modern China: Empirical Studi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2011), chap. 9.
- 23 《張元濟年譜》，頁53-63。
- 24 揚子江通訊社：《揚子江報》第17號(1914年9月20日)，引文直譯自揚子江報原文。
- 25 該時東亞同文會有計畫地派學生於中國各地旅行，詳細記錄。此份關於商務印書館的記錄載於東亞同文會第九期調查旅行報告書(191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1門6類1項、東亞同文會ノ清國內地調査一件、第九期調査報告書〕檔案的微型膠卷頁數為Reel No.1-0821，頁530〕。
- 26 樽本照雄著：〈辛亥革命時期的商務印書館和金港堂之合資經營〉，《清末小說研究集稿》(濟南：齊魯書社，2006)，頁234。
- 27 〈上海商務印書館聲明係完全華商自辦一節請查照辦理理由〉，《農商公報》第2卷第1冊，1915年第13期，8月15日，頁17a。
- 28 楊揚著：《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的興衰》，頁79-80。
- 29 張樹年、張人鳳編：《張元濟蔡元培來往書信集》(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頁25-27。
- 30 蔣維喬著：《夏君瑞芳事略》所紀略同，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4。
- 31 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頁172-173。

# 「朝日新聞富士倉庫資料」與中日戰爭 照片審查問題

❖ 貴志俊彥 ❖

## 一、緒論

以2001年在紐約發生的「911事件」為契機，日本掀起了一場有關戰爭與媒體的熱烈討論。政治、教育及媒體所傳達的信息不斷衝擊一般民眾的國際認識。自「911事件」發生之後，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言行使相關討論達到高峰。<sup>1</sup>其*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97)在日本引起相當大的回響。<sup>2</sup>日本對於媒體與戰爭關係的討論固然一直存在，近年呈現新趨勢，就是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公共傳播媒體NHK和日本國內發行人量排名第二位的《朝日新聞》。標榜維護憲法和平主義的自由派代表《朝日新聞》受到保守派媒體的抨擊，被指責為左翼的自虐式歷史觀護航。它們批評《朝日新聞》的戰爭責任論，自1990年代以來，對其批評日趨激烈。究竟《朝日新聞》的戰時報道出了甚麼問題？對當今世界有何啟示？

在探討有關《朝日新聞》的戰爭責任論及其所受批判時，我們不得不審視二次世界大戰前《朝日新聞》的報道。本文探討在滿州事變



之後《朝日新聞》的方針如何出現變化，透過「朝日新聞富士倉庫資料」的報道照片來檢討戰時審查情況。<sup>3</sup>這是由《朝日新聞》大阪總部保管，共七萬多張從1931年至1944年由該社特派員在中國及亞洲各地拍攝的照片。本文透過不獲通過使用的具體例子來剖析戰爭與媒體報道的問題。

## 二、不容迴避的戰爭責任

透過朝日新聞社公開富士倉庫的資料，可以討論該社的戰爭責任。1945年8月12日，即宣佈「終戰」的前兩、三天，內務省命令各新聞社銷毀「可追究戰爭責任及有相關暗示的東西」。這是因為戰敗在即，要保護擁有統帥權的昭和天皇，甚至政府及軍部。《朝日新聞》在8月14日，即投降前一天，仍刊登〈對敵人的非人道行為加以攻擊〉(敵の非道を撃つ)的社論，主張對原爆的敵人發動報復戰爭。8月15日，筆鋒一轉，在社論〈一億同哭之秋〉(一億相哭の秋)表明對於戰爭責任，國民要「自省自責，自肅自戒」，與天皇的「一億總懺悔論」相互呼應。<sup>4</sup>昭和天皇的言論旨在迴避戰爭責任，希望個人及集團均可在法律及道義上免罪。

同社在8月23日的社論為〈論自身的罪〉(自らを罪するの弁)，在「一億總懺悔論」的前題下，清算自己的戰爭責任如下：「關於責任，不應歸咎特定人士，必須一億國民共同負責。(中略)特別是緊密地處理國民意向、輿論及民意的言論機關責任之大，不用多說。因此我對以往的不是不會讓它淡化，我深明自己所犯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在戰時該社的片面報道與其說是來自經營執行部門和編輯評論員等報社的高層，其實多是來自基層員工，不過責任還是落在領導層上。在1945年10月召開的朝日新聞社員工大會上，通過「大會宣言」，報社領導階層承認要負上戰爭責任。《朝日新聞》實行「社內革命」，會長上野精一，社長村山長舉，副社長緒方竹虎，董

事長原田讓二及石井光次郎等幹部全體下台。在11月7日的頭版頭條，該社向讀者說明事情原委，刊登〈與國民共同崛起：總部新陣容走上建設之路〉的宣言。據稱這篇社論與前述的「大會宣言」內容基本吻合。這「11.7宣言」可以說變成了朝日此後在戰爭責任問題上的免罪符，今節錄其主要部分如下：

從中日戰爭爆發至大東亞戰爭結束為止，對於《朝日新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此我等向國民明確交待自身的責任，以期新的機構與陣容可以全力以赴，投身於新日本建設。以村山社長及上野會長為首，下至所有董事會幹部以及總編、編輯部局長及兩名社論主幹全體卸任，因為在戰爭期間，儘管有諸多制約，本報未能擔負起真實報道，嚴正批判的重責，無力打破制約。直至敗戰，國民無從得知事態進展，以致陷入今日之困境，因此向天下謝罪。今後《朝日新聞》的運營將以全體員工的共同意志為本，與國民同一陣線，以國民之聲為聲。在當今風起雲湧多事之秋，面對樹立日本民主主義進程中迎面而來的種種困難，我等謹在此發表聲明，《朝日新聞》要堅決貫徹民主機關立場。

當天除宣言外，還刊登〈新聞的新使命〉(新聞の新なる使命)社論，如此明言傳媒的戰爭責任：「自稱天下公器的新聞，要在時代洪流中負起國民輿論的指導機關的角色，必須先釐清自己的戰爭責任，所以早前《朝日新聞》率先承認戰爭責任。」

其實，根據「與國民同一陣線宣言」(即「11.7宣言」)起草者第一部次長森恭三，以上宣言是反村山長舉派的公司內的兵變，不能否定可能涉及人事鬥爭。宣言的刊登顯示森及其勞動運動推進派的勝利，並不代表朝日新聞社的政治本質出現根本的變革。<sup>5</sup>

《朝日新聞》此後的表現，似乎憑著戰爭結束後管理層和編輯部下台以及刊登上述「與國民同一陣線宣言」宣言之舉，將自身的戰爭



責任一筆勾銷。對宣言中的「我等向國民明確交待自身的責任」，並沒有明確表示究竟如何體現在報社的具體運營上而不了了之。因此公眾對《朝日新聞》的抨擊持續不斷，諸如批評曰：「《朝日新聞》至今仍不肯向國民負荊請罪。戰後歷時57年，連自身的戰爭責任還沒有反思，卻窮追不捨地追究國家的戰爭責任。」<sup>6</sup>其實朝日新聞社在「與國民同一陣線宣言」上的兩大陣營均被認為積極向盟軍總司令部（GHQ）靠攏。<sup>7</sup>今天對《朝日新聞》的批判，不但是它戰時服從軍部，也是戰後按盟軍總司令部指導作報道。

朝日新聞社在「社內革命」出現的新領導層體制並沒有維持多久，在韓戰爆發後一個月，即1950年7月，盟軍總司令部勸告日本各大新聞社清除共產黨黨員。這股叫「清共」（red purge）的運動波及朝日新聞社，以社會部小原正雄為首的勞動組合派104人被免職。1952年4月28日三藩市和平條約成立，佔領日本的GHQ被撤，也廢除與戰爭相關人士不能出任公職的〈公職追放令〉法令，因此村山長舉及上野精一等舊領導紛紛復職，重掌大權。朝日新聞社回歸舊體制，領導層從此不再重提《朝日新聞》的戰爭責任。雖然1972年1月3日論說委員森恭三在《朝日新聞》第二頁的〈從未來的回顧：日本外交的遠景2〉（未來からの回顧：日本外交のビジョン②）提到有「無可逃避的戰爭責任」，但文章將責任歸咎日本政治，沒有半句提及傳媒的責任。這篇文章難以想像竟出自曾起草「與國民同一陣線宣言」的森恭三之手。

1979年朝日新聞社紀念創刊百年，出版《朝日新聞販賣百年史》，渡邊誠毅社長在〈序〉中如此總結該社歷史：

《朝日新聞》創刊不久，明確地建立「以公平無私為主旨，以作世上耳目為本分」的編輯方針。現在〈朝日新聞綱領〉中有「不偏任何黨派的自由言論」及「公正敏速的真實報道」，這正是本社傳承百年的傳統精神。<sup>8</sup>

可見他只強調創業百年間貫徹「公平無私」的方針，對該社的戰爭責任隻字不提。要求《朝日新聞》應負戰爭責任的批評不斷，例如安田將三及石橋孝太郎合著的《看後令人驚訝的朝日新聞對太平洋戰爭的報道》(読んでびっくり朝日新聞の太平洋戦争記事)(東京:リヨン社, 1994)便是其中例子。<sup>9</sup>1990年後，對朝日新聞社的批判從不間斷，該社無視作為傳媒的戰爭責任引人詬病。1991年10月朝日新聞百年史編纂委員會出版一共四卷的《朝日新聞社史》，將戰時不公正報道的責任全部推給內務省的報道限制，內閣情報部的審查及軍部的壓力，不見其真誠地自我反省戰爭責任。朝日新聞社如此的報道姿態，跟教科書問題相似，對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影響深遠。

1989年是「戰後50年」，全國回顧昭和時期，重提悲慘的戰爭體驗及戰爭責任。朝日新聞社在1995年2月起連載〈戰後50年傳媒的檢証〉(戰後50年 .メディアの檢証)，但其中並沒有明言該社的戰爭責任，只重彈自己是無力對抗政府政策的被動者的所謂反省老調。<sup>10</sup>當時《朝日新聞》並無深化自己對戰爭責任的意識，不過是繼承《朝日新聞社史》的論調。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1月昭和天皇去世後，《朝日新聞》曾在檢討昭和歷史時毫無顧忌地提及天皇的戰爭責任，這是昭和天皇去世後朝日新聞社的新觀點，例如2001年8月18日的社論〈終戰記念日2001年夏：論歷史責任〉(終戰記念日2001年夏：歴史に対する責任とは)，正面提出天皇的戰爭責任。對此社論反感的保守派人士認為朝日新聞社其身不正，《朝日新聞》及其它傳媒的戰爭責任論重新冒起。這與〈緒論〉中喬姆斯基在「911事件」後的言論及著作拉上關係，有關傳媒與戰爭的爭議在日本沸騰。

2006年起，《朝日新聞》刊登〈照片講述戰爭：面對歷史〉及〈照片講述戰爭〉等特輯，在過程中將《朝日新聞》富士倉庫的七萬多張照片一部分數碼化。<sup>11</sup>在開展這一系列活動的同時，《朝日新聞》一反常態，客觀報道戰後長期以來被忽略的報社本身的戰爭責任問題。



2007年4月起，緊接〈照片講述戰爭：面對歷史〉連載的是〈新聞與戰爭〉系列，反思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中媒體的戰爭責任。在此之前，追究《朝日新聞》戰爭責任的言論主要來自學者和前任記者，然而在這系列中，《朝日新聞》使用報社的內部資料證明媒體對戰爭的支持，被評價為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作。我們對此可以給與正面評價，包括其本身的戰爭責任在內，《朝日新聞》開始真摯地反思媒體的戰爭責任，從而《朝日新聞》的戰爭責任論也邁進新階段。

2009年《朝日新聞》為紀念創刊130周年，開展以下幾項工作：第一，《朝日新聞》明治大正時期版面的數碼化(2006年開始，2010年4月完成)；第二，從《朝日新聞》富士倉庫挑選出來的大約10140張照片數碼化(2009年1月以〈朝日新聞歷史照片存檔〉為題正式公開)；第三，開始連載〈考證昭和報道〉(2009年3月開始)反思《朝日新聞》自身對昭和的報道。其連載多達236章，特集達11次，這部連載後以《新聞與昭和》(東京：朝日新聞社，2010)為題出版。「朝日新聞富士倉庫資料」的一部分之所以作為數據庫得以公開，象徵朝日新聞社告別昭和時代，以新姿態誠實地面對歷史認識問題。

### 三、新聞報道在滿洲事變後的變化

此節透過回顧戰前《朝日新聞》的報道內容及傳媒的審查，檢証其戰爭責任。從1872年《東京日日新聞》面世開始，翌年明治政府制定《新聞紙發行條目》加以管制，1879年改訂為《新聞紙條例》，且表明對「顛覆國家及煽動騷動者」加以嚴懲。同年《朝日新聞》創刊，日本也開始進入政府管制傳媒的時代。1893年的《出版法》及1909年的《新聞紙法》(取代《新聞紙條例》)加強對傳媒的管制。在《新聞紙法》頒布以前，新聞的管制由內務省警保局及警視廳高等警察負責，《新聞紙法》27條規定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及外務大臣有權限制報章對軍事外交的記載，成為軍部監控新聞的先河。1899年7月的《要塞

地帶法》及同年8月的《軍機保護法》對於軍事設施及其周圍自然地形的攝影、測量和複製作出了嚴格規定。1908年制定的《關東州防禦營造物地帶令》明文規定，這些法規也適用於關東州一帶。傳媒對以東京灣、廣島灣為代表的日本各地及旅順、基隆等外地要塞、軍港及重要碼頭等區域的相片及報道均須經過要塞司令官、鎮守府司令官，及要塞部司令官築城本部長的批准才可使用。<sup>12</sup>圖一的明信片在題目「旅順港口閉塞隊紀念碑及潛航艇入港風景」的前面註明「要塞司令部審閱完畢」。1925年4月頒布的《治安維持法》進一步限制相片及明信片。



圖一：旅順港明信片©朝日圖片社

雖然政府及軍方監控傳媒，《朝日新聞》是主張普選、裁軍及「大正民主」的旗手。即使到了昭和時代，它仍肯定中國的民族主義及主張滿洲是中國一部分，發揮傳媒對政治的監察功能。當時軍部及政友會因《朝日新聞》持反軍方姿態而加以敵視。

1931年9月爆發滿洲事變，關東軍根據《軍機保護法》強力限制



傳媒在當地的採訪。前《朝日新聞》記者後藤孝夫表示，大阪朝日新聞編集局長高原操(1875-1946)在事變前仍主張普選及裁軍，事變後論調「作出180度改變」，竟在10月1日發出〈滿蒙獨立成立，遠東和平新保障〉的社論。<sup>13</sup>高原在社論中謂為了減輕東三省人民的痛苦，唯有推行獨立運動，設置滿洲緩衝國。事實上《朝日新聞》正式拋棄肯定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及肯定東北各省是中國一部分的看法，認同軍部的行動及滿洲獨立運動。10月12日朝日新聞社領導層會議中確定轉軌，確定「統一社論，建立國論」的大方針，從此至戰敗為止，《朝日新聞》淪為官方喉舌。

1931年的滿州事變是分水嶺，《朝日新聞》的社論從此變成了軍部的應聲蟲。戰後的朝日新聞社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呢？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1991年發行的《朝日新聞社史》，它重覆表達同一觀點，就是轉軌的主因是受到軍部和右翼團體的壓力，滿洲青年聯盟及在鄉軍人會等組織的抵制日貨運動及日益高漲的對外強硬輿論。

直至1990年代為止，有一個一直被人忽視的問題，就是在1920年代末期，《朝日新聞》的國內銷售已達飽和狀態，因此該報社對朝鮮及滿洲等新興市場充滿期待。大阪《朝日新聞》及東京《朝日新聞》的國內發行人量在滿洲事變爆發這一年有所下降，然而在1932年的發行人量為1,054,000份(比前年增加150,000份)。1937年，即中日戰爭爆發的一年，發行人量是2,444,788份。1942年達到戰前最高峰的3,720,000份。此外，滿洲事變前夕的1929年，《朝日新聞》在滿洲的發行人量僅有16,000份，而在1940年狂升至72,000份；1942年更達100,000份的高峰。<sup>14</sup>1935年隨著九州印刷廠的啟動，報紙投遞時間縮短一整天，在奉天地區第二天早晨就可以讀到前一天的報紙。<sup>15</sup>這些變化給報紙的銷售帶來巨大影響。有評論指出報社為了贏得新讀者群，刊登鄉土部隊戰情及死難者的報道，從而使得以往與報紙無緣的農民訂報。<sup>16</sup>無論如何，以滿洲事變為契機，日本侵華令《朝日新聞》開拓新的銷售市場。

另一被疏忽的問題是撰寫社論的評論員和報社幹部對歷史認識的不足也是造成社論轉向的原因。滿洲事變之前，《朝日新聞》在持主張裁軍的政黨政治觀點的同時，也提倡與之矛盾的滿蒙「權益擁護」。儘管荒瀨豐早在1957年就已經指出了這種論調的矛盾性，而《朝日新聞》至1990年代才承認其「對內立憲主義，對外帝國主義」的態度是互相矛盾。<sup>17</sup>1932年3月，即滿洲國成立半年後，《朝日新聞》主筆緒方竹虎(1888-1956)視察滿洲國，同年11月《朝日新聞》推出滿洲版。<sup>18</sup>1934年4月，朝日新聞社在新京成立滿洲分局(通信部設在奉天、哈爾濱、大連及安東)。進駐滿洲之舉顯然體現緒方的意向。1935年1月為了保證滿洲版的順利發行，《朝日新聞》在門司成立《朝日新聞》九州分社，負責印刷及發行送往朝鮮、台灣及滿洲等地的早晚報(1937年作為總部遷往小倉)。在此之前是由大阪總部發送到九州各地，山口縣以及朝鮮、滿洲及台灣等地。<sup>19</sup>當時門司支局出版的附錄《九州朝日》進入十週年。

1936年日本國內「2.26事件」時，朝日新聞社亦遇襲，社內意識到不能令軍方不悅。同年6月政府公佈《不穩文書臨時取締法》，一定程度保障新聞記者的採訪自由，當時日本傳媒仍不是窒息狀態。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同月31日官報刊出《陸軍省令第24號》，列明「依《新聞紙法》27條，報章不可揭載軍隊行動及軍機軍略相關事情」。27條本是用來禁止揭載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及外務大臣的事情。8月14日政府改訂《軍機保護法》，以「軍事上秘密」為理由，加強對情報的管制，規定軍用車站、港口、機場、軍需資源生產地、通信施設、軍需品工場及軍需品貯藏所不可攝影。<sup>20</sup>兩日後公佈的《海軍省令第22號》，仿先前《陸軍省令第24號》，規定「依《新聞紙法》27條，報章不可揭載艦隊的船隻，部隊行動及軍機軍略相關事情。」<sup>21</sup>

朝日新聞社把握中日戰爭的機遇擴大銷量，全力報道戰況，為此於1937年派出138名特派員赴中國。<sup>22</sup>1939年4月在滿洲及蘇聯的邊界，即牡丹江、綏芬河、密山、佳木斯、齊齊哈爾及黑河六地設



置通信部。1938年4月日本政府頒布《國家總動員法》，宣佈進行戰時統制，不但軍事及外交，連一般治安及財政金融也加以監管。8月制定《新聞用紙限制令》，報社的紙張分配由政府負責。1939年的《軍用資源秘密保護法》及《國境取締法》進一步強化官方對新聞傳媒的管制。1937年9月政府設立內閣情報部，參與者包括《朝日新聞》主筆緒方竹虎，《每日新聞》主筆高石真五郎(1878-1967)，同盟通信社理事古野伊之助(1891-1966)及電影與雜誌社高層，制定傳媒「言論奉國」的體制。<sup>23</sup>1936年秋第一屆近衛文麿內閣以「管制戰時言論報道及防止資源枯竭」為理由，正式實施新聞統制。<sup>24</sup>1940年5月內閣成立新聞雜誌用紙統制委員會。12月內閣情報部升格為情報局，負責戰時民意調查、政治宣傳及思想控制。情報局是將內閣情報部、外務省情報部、陸軍省情報部、海軍省軍事普及部、內務省警保局圖書課及遞信省電務局電務課等情報工作統合起來的組織。

1941年年底爆發太平洋戰爭，同年亦是報章淪為戰時情報宣傳機關的時期。1月政府按《國家總動員法》實施《新聞紙等掲載制限令》。3月政府制定《國防保安法》，規定管制「國防需要對外國守秘密的外交、財政、經濟及其它重要國務事項」。此外，修訂了的《軍機保護法》使各報社在「國家機密」前失去採訪自由。朝日新聞社亦避免得罪軍部而進行自我審查。1941年7月各報社設立查閱課作自我審查。8月及10月政府分別頒布《新聞指導要綱》及《對英美問題相關輿論的指導方針》，新聞的自主報道能力消失。

1941年12月8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日，朝日新聞社下達「不寫報道部發表以外的東西」及「禁止刊登沒有大本營批准的東西」的命令。<sup>25</sup>政府按《國家總動員法》，分別在13日及19日公佈《新聞事業令》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臨時取締法》，使政府擁有對報章行政處分及停刊的生殺大權。<sup>26</sup>報社不再是報道機關，而完全淪為國家的宣傳機關。記者的工作變成編輯報道部提出的文章，失去自身的存在價值。1942年1月陸軍及海軍決定共同發表情報，形成

所謂「大本營發表」體制。根據前坂俊之的分析，「大本營發表」最初半年間對戰情報道比較正確，它從珊瑚海海戰(1942年5月)至伊莎貝爾島沖海戰的九個月之間，沒有發表中途島海戰的損失及開始作誇張失實報道。此後的九個月甚少發表，再過八個月的報道出現淡化損失及虛報勝利的情況。<sup>27</sup>日本傳媒不如實報道，因此國民很多連1942年2月開始的美軍空襲及1945年8月的原爆也不知道。1945年3月19日甚至出現「東京大空襲的被害責任在國民」的離譜言論。與戰後《朝日新聞》的自由形象相異，富士倉庫資料的相片反映戰時該報社為了提高銷量與軍部及政府合作的情況。

#### 四、《朝日新聞》富士倉庫保存的「不許可」照片

朝日新聞社有關朝鮮、台灣、滿洲及南洋的相片能夠保存下來有些偶然。1945年8月下旬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亞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來日在即，朝日新聞東京總公司的寫真部開始燒毀底片及相片，公司的大量文件亦在吉祥寺前進座劇團的地方燒掉，小倉的西部本社亦將相片及底片燒掉，可是大阪本社寫真部員並無毀滅相片及底片，因此富士倉庫資料的報道相片可以被保存下來。<sup>28</sup>

為了顯示戰時審查的實態，我從龐大的富士倉庫資料的報道相片中抽出若干典型「不許可」例子加以分析。<sup>29</sup>

##### (1) 日本的「外地」與邊境地帶

1899年7月頒布的《要塞地帶法》第7條有以下規定：「任何人未經要塞司令官許可，不得對要塞地帶內水陸之形狀或設施物之狀況攝影、摹寫、仿製、紀錄、複寫或複製，但對於軍機保護法有特別規定者，以其規定為準。」<sup>30</sup>也就是說，在要塞地帶內，限制的不僅



包括碼頭或橋樑等交通基礎設施，還有煤礦油田等資源地及飛機、坦克、大炮等軍用物資。此外在規定範圍內的海河山川等所有自然景觀也都被列入審查對象。

例一是印有「鎮海要塞司令官審閱完畢」字樣的風景照明信片，1928年8月23日為大阪《朝日新聞》收錄，題目為「釜山龍頭山神社」，是在從前的倭館用地修建的神社。釜山地處鎮海要塞，鎮海要港範圍內，位於朝鮮半島南部要地。朝鮮半島中部有以元山為中心的永興灣要塞，北部有羅津要塞。《要塞地帶法》使當局可審閱在這些地帶的攝影或摹寫，這張神社明信片也不例外。在滿洲而言，這條法律的適用範圍不僅在於要塞地帶，還擴大到關東軍進駐地區，特別是在滿鐵沿線。我們可以從流傳至今的滿洲明信片裏找到這些佐證，因此撫順露天開採的風景、本溪湖及鞍山礦山的風景明信片上印有「旅順要塞司令部審閱完畢」字樣。1940年政府修訂《要塞地帶法》，連日本國內的鐵路及隧道均與軍事設施同一處理，所以這個時期很少有這類相片，對鐵路迷而言是一段空白時期。<sup>31</sup>

例二是1940年10月30日大阪《朝日新聞》接收的明信片，題目為「台灣神社式年祭奉祝之喜慶氣氛」(圖二)。有趣的是從明信片的背面還可見台灣審閱制度之一斑。同年10月27日大阪《朝日新聞》台北分局局長長繩俊三提交刊登軍事報道許可申請，經台灣軍報道部有關人員和台北憲兵隊總部進行審閱後，發還大阪《朝日新聞》，其後再經內務省審閱。由此可以推斷，在朝鮮及台灣等「外地」拍攝的照片必須經當地有關部門審閱後，進而在日本內地接受審閱，也就是說要經過雙重審閱。台灣的《要塞地帶法》適用地區為基隆、高雄及澎湖島一帶。至於此照哪一部分出問題仍未十分清楚。此外，在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外地」，高空攝影也遭嚴禁，對象範圍是台灣全島、朝鮮半島南端一帶、慶尚南道、權羅南道、樺太及旅順要港等。<sup>32</sup>這些區域的空中攝影照片基本上被判斷為「不許可」照片。



圖二：台灣神社明信片©朝日圖片社

例三是「俄羅斯白種人護理其賴以為生之馬」，這張照片是1937年5月在有「哥薩克人天堂」之稱的三河地區拍攝。這個地區還擁有北滿洲首屈一指的金礦，是很多日本人嚮往的世外桃源。三河地區屬特別軍事區域，根據關東軍制定的《特別軍事地區及航空禁止區域規定》，特別軍事地區指鄰接蘇聯國境的六個區域及哈爾濱市南部地區，都是針對蘇聯的軍事基地。照片攝影在蘇聯及蒙古的邊境地區受嚴格限制，在這些區域的攝影或測量必須經過關東軍司令部，相關地區防衛司令官及特別軍事營造物保管者的許可。在這些區域的高空攝影以及民用機的飛行也受嚴格管制。<sup>33</sup> 這張照片是1937年5月9日大阪《朝日新聞》滿洲分局接收，並於同月19日通過關東軍司令部的審閱。大阪《朝日新聞》再收到這張照片是7月23日。1937年5月19日從朝日新聞滿洲支局寫給日本本社小倉社會部長的信中得知，連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寫真班所拍攝相片也要受《要塞地



帶法》限制，關東軍比滿洲國政府更掌控情報大權。信中表示連三河地區的白俄羅斯人生活狀況的相片也要經關東軍審查，審查對象不局限軍事施設，連景觀、基建、及個人與團體也不例外。<sup>34</sup>

例四是「濱河沿線札蘭屯市街」，接收日期不詳。被稱為高原城市的扎蘭屯是當時滿洲國興安東省公署所在地，即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扎蘭屯市。日本開拓移民移居扎蘭屯後，1936年修建了神社，開辦了尋常高等小學。這張照片的背面寫有這樣的提示字樣：「為接受關東軍司令部審閱，海拉爾方面的照片已全部提交。除風土民情照片之外，興安嶺博克圖、扎蘭屯、滿洲里等照片百數十張遭悉數沒收。」該地區不屬於「特別軍事地區」，這些照片上也沒有存在問題的軍事營造物，然而關東軍對北滿一帶的動向十分敏感，可以推測所有照片都被沒收是出於邊境防衛的理由。

例五是「前線XX廟待命皇軍」，背後用鉛筆寫有「諾門罕戰役頭條消息」(圖三)。

1939年5月諾門罕戰役(蒙古稱之為哈拉哈河戰役)爆發，滿洲與蒙古邊境地帶也被列入審閱對象。此相片上面還註明是1939年6月2日由福岡發往大阪《朝日新聞》的電傳。照片背面用鉛筆書寫的「關東(軍)審閱完畢」的字樣用紅筆畫兩道線表示刪除，而代之以紅筆書寫的「經陸軍省許可」字樣。儘管如此，明信片的兩面還是都被蓋上了「禁止刊登」的印。軍部當局竭力隱瞞諾門罕戰役的真相，尤其是日方的受害狀況。不過僅憑這張照片無法判斷究竟是哪一級別的部門作出「禁止刊登」的結論，推測是來自內閣省的判斷。



圖三：諾門罕戰役中的皇軍©朝日圖片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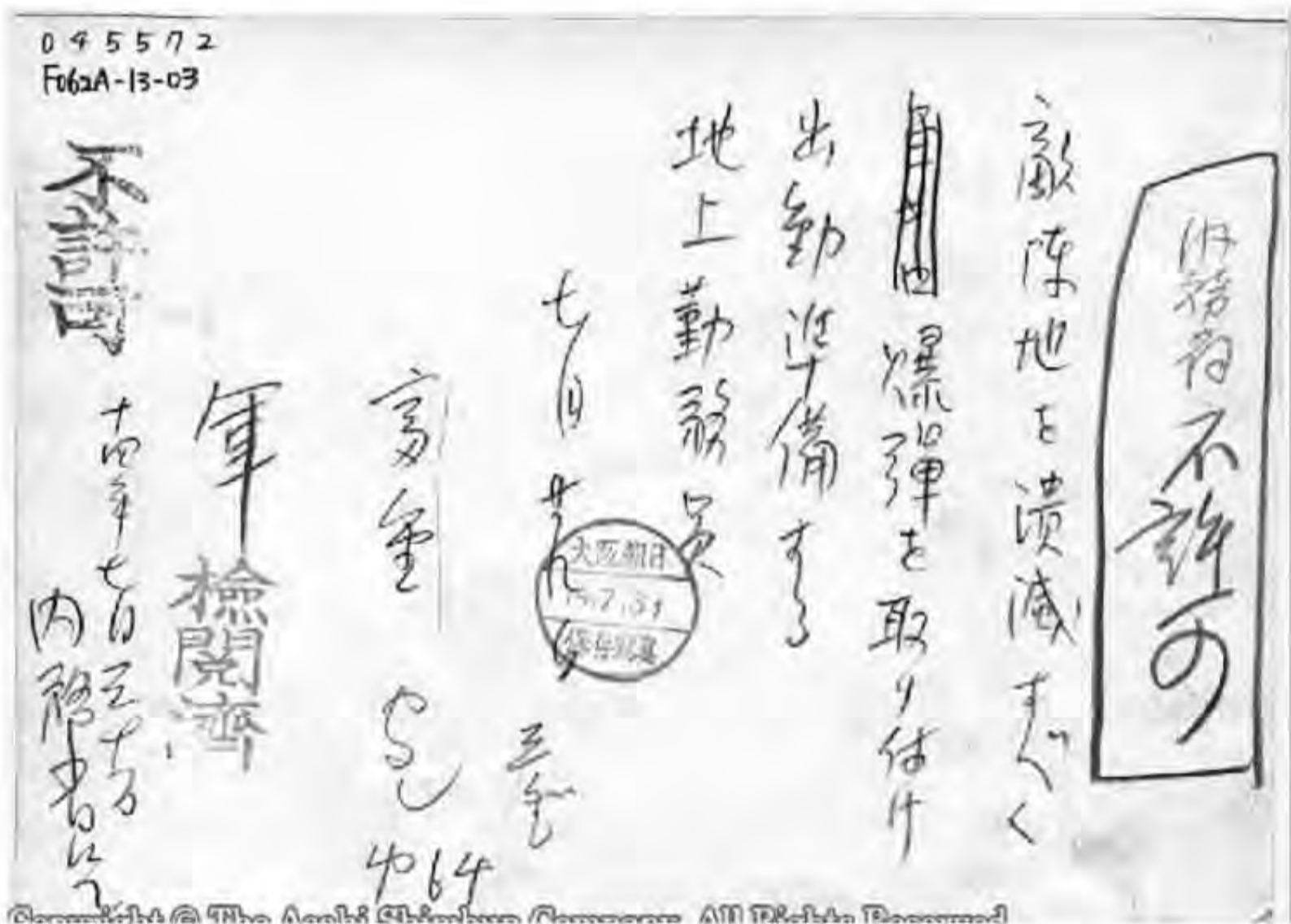
## (2) 軍隊及武器

根據1937年8月公佈的《軍機保護法》第8條，陸軍大臣及海軍大臣有須要作軍事保密，對以下的東西禁止及限制測量、攝影、摹寫、模造及複製。<sup>35</sup>第一，軍港、重要港口及防衛港；第二，堡壘、炮台及防衛所及其它為了國防建設的設施；第三，軍艦、軍機、兵器及陸軍及海軍所管轄的機場，電氣通信片、兵工廠、軍需品倉庫及其它軍事設施均作軍事機密。

例六是「地上勤務員為消滅敵軍陣地，安裝炸彈準備出動」，為1939年7月29日攝影師富重攝於黑龍江省，31日《朝日新聞》接收。這張照片儘管已經軍隊審閱通過，還是遭內閣府禁止(圖四)，推測問題在於照片拍攝了正在安裝的炸彈。《軍機保護法》及《陸軍省令



第24號》規定：「有關飛機報道中不允許標明偵察機、戰鬥機、轟炸機等飛機類型」，「一律禁止有關機場照片」，「禁止有部隊軍旗的照片」，「禁止陸軍上校以上級別的高級將領的特寫照片」及「禁止幕領將校(參謀)的集體照」。<sup>36</sup>此外1937年10月公佈的《海軍省令第28號》有經修訂的《軍機保護法施行規則》，保護「軍機」及「軍極秘」的情報。<sup>37</sup>以《朝日新聞》的「不許可」相片，可見包括氣球、特殊鐵船、水陸兩用車、炸彈等新式武器。在1939年3月制定的《軍用資源秘密保護法》中，不僅是兵器本身，對包括相關的軍需品工廠、普通工廠、作業場所、倉庫、鐵道、機場、船舶、通訊設備及實驗研究所等，也以「軍用資源」看待，相片不可公開。<sup>38</sup>



圖四：安裝炸彈的相片不獲通過©朝日圖片社

例七是「武昌武漢大學山田中支最高指揮指揮官」，背面註明照片拍攝於1939年1月19日。山田是中支那派遣軍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將(1881-1965)，他是關東軍最後一名司令官，戰後曾被流放西伯利

亞，1956年歸國。「不許可」的原因是照片中寫有「栗田部隊」這具體名稱。1937年2月的〈陸軍省令〉禁止註明師團名、旅團名及隊名，所有部隊都冠以高級將領的名字命名，以期對外掩蓋軍隊組織結構。<sup>39</sup>同年8月發表的《新聞記事取締要領》規定相片不可以寫部隊名稱，用「○○部隊」或「某部隊」代替，指揮官名字也禁用，改用「○○部隊長」或「某部隊長」。此外它追加補充了以下項目：「只限連隊長（陸軍上校）級別以下或連隊長（陸軍上校）照片的肩章不明瞭（模糊）者」及「有關部隊行軍報道」。<sup>40</sup>1938年9月修改後的《新聞記事許否判定要領》，連有軍旗的照片也遭禁止或要求修改。這些對報道的管制都顯示了日軍有點草木皆兵，恐怕其戰略或動向被察覺。

### （3）對日軍不利的照片報道

1937年8月頒布的陸軍省《新聞記事許否判定要領》和翌年9月修訂的要領中，禁止「對我軍不利的照片報道」，「對支那兵或支那人逮捕審訊的照片報道中，給人以虐待之感」的相片，可是「有關支那人殘酷性的殘酷照片報道則無妨」。<sup>41</sup>

例八是「大世界前的支那機轟炸之慘狀」，拍攝於1937年8月，是上海事變之際，國民政府軍誤炸的相片。為避免國際指責是日軍轟炸，這張照片被禁止使用。此外，當時還禁止公開屍體照片，戰時照片卻讓人感覺不到死亡氣氛。同時，日軍傷病員的照片與日軍官兵掃墓的照片等均以助長厭戰情緒為由而遭禁止。1940年6月修訂的《新聞記事許否判定要領》禁止以下「對我軍不利的新聞相片」：第一，帶來戰場實感的相片（如敵軍死體），因會過度刺激民心；第二，我方的損害及我方對敵人的損害，免得戰果披露。<sup>42</sup>

例九是「使用苦力難路中行軍的炮兵」，1937年9月10日在天津唐官屯拍攝，因影響日人形象已被禁，它會給人造成虐待中國苦工印象（圖五）。另一張是「中原會戰中若松部隊捕獲的敵軍：中央軍俘虜，左端的男



子拿着饅頭」，是1941年5月日軍進攻重慶國民政府軍時的照片。若松部隊是獨立混合第16旅。無庸置疑，這張照片也因為容易造成虐待俘虜的印象而被禁止發表。可是1940年6月修訂的《新聞記事許否判定要領》刪掉「對支那兵或支那人逮捕審訊的照片報道中，給人以虐待之感」的相片，可是「有關支那人殘酷性的殘酷照片報道則無妨」兩項，反映日人在戰爭加害者之路上開始暴走。

ID: 0000045227

苦力を使って難路を行く砲兵



圖五：戰時徵用中國苦力©朝日圖片社

## 五、結論

《朝日新聞》在1990年代後期終於發表一系列報道，開始真誠面對自身戰爭責任。它對《朝日新聞》富士倉庫資料加以整理，其中部分照片以《朝日新聞》歷史照片數據庫的形式公開，為後世留下歷史証據。它與本文也談到的每日新聞社大阪總部資料室保存的洗印照

片一樣，公開戰前普通人無法接觸到的內部資料。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我願對這項豐功偉業贈予發自內心的讚美之詞。

我們通過對「許可」與「不許可」照片的考證得出的結論並不僅僅限於媒體論的詮釋學，經許可的照片既掩蓋屍體，也掩蓋日本在中國的戰爭行為。而武器和軍隊被蒙上了一層「模糊」的面紗，從而改變人們對發生在身邊的戰爭的印象。從這一點來講，可以說戰前的報社的確做到「有助於昂揚國民戰意的報道」。報社遵守當局有關審閱的法規，時而使用經自主審閱後公開的照片去掩蓋戰爭在國內外蔓延的事實。而閱讀這些報道的讀者如同霧裏看花般去看經5W1H處理的許可照片及排演的新聞紀錄片，形成對戰爭的片面認識。<sup>43</sup>另一方面，記錄戰爭的殘酷性與非正義性的「不許可」照片在民眾的眼前被遮掩得滴水不漏。

我們應該強調對利用這些經許可的照片，被操作的宣傳信息而捏造出來的「事實」加以重新考證的重要性。媒體報道所製造的「真實」絕不僅僅是戰爭時代特殊條件下的產物，假新聞在和平時代也有可能發生。在911事件發生後，反思新聞報道的動向提出了這樣一條主張，那就是絕不能讓當代媒體的戰爭責任以時代狀況為由而不了了之。媒體不僅是突發性新聞的報道機關，同時正因為它還承擔著報道事實的責任，因此更應該刻意去防止錯誤報道。

近年在東亞地區圍繞歷史問題的討論方興未艾，我們絕不能逢迎時代要求去製造歷史認識。為了不受經過加工的意象的矇騙，需要我們對所賦予的「事實」進行重新考證，用明確的5W1H去把握歷史，從而再現歷史世界，這正是歷史學的價值所在。這一點正是我們研究「不許可」照片的意義所在。

經審閱的照片虛構戰爭印象及煽動民族對立。回顧過去的歷史，積累排除任何虛構的歷史事實是生活在當今社會的人類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還應該認識到，考證「許可」與「不許可」新聞圖片的虛偽性是逼近歷史真相的一個重要研究手段。排除審閱，確保言論



自由和信息公開正是現代社會必須尊重的倫理道德。戰爭與媒體的問題恰恰向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課題。

(吳偉明譯)

- 1 參 Noam Chomsky, *9-11*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1).
- 2 此作集英社在2003年有和譯本。受其影響的日本作家及其著作有：外岡秀俊、枝川公一、室謙二共編：《9月11日 メディアが試された日》(東京：大日本印刷ICC本部，2002)；內藤正典著：《「新しい戦争」とメディア》(東京：明石書店，2003)；石澤靖治著：《戦争とマスメディア》(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05)；淺野健一著：《戦争報道の犯罪：大本營発表化するメディア》(東京：社會評論社，2006)。
- 3 1944年9月《朝日新聞》大阪總部為避免遭受空襲之害，將創刊號以來的報紙及重點保存的照片，合共十箱轉移至奈良縣天理圖書館。就在戰敗前夕，軍部命令各報社銷毀大量照片底片及照片，這十箱資料卻幸免於難。1947年朝日新聞社收回寄放在天理圖書館的照片資料，然而由於沒有妥善的保管場所，這些照片經過一段在大阪租售倉庫間的流離輾轉之後，最終於1978年10月被運往位於大阪市西區的富士運送株式會社倉庫保管。此後歷時20年，這些照片一直被塵封在倉庫，因此被稱為「富士倉庫照片」。這些照片在1999年重見天日，被轉移到大阪總部三樓保管櫃收藏至今。參朝日新聞社：《朝日新聞の秘藏寫真が語る戦争》(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09)，頁7-8。
- 4 有關8月15日的社論言，參川島真、貴志俊彥編：《資料で読む世界の8月15日》(東京：山川出版社，2008)及朝日新聞「新聞と戦争」取材班：《新聞と戦争》(東京：朝日新聞社，2008)，頁496，498。
- 5 今西光男著：《占領期の朝日新聞と戦争責任：村山長舉と緒方竹虎》(東京：朝日新聞社，2008)，頁125-128。
- 6 參該社前記者稻垣武著：《朝日新聞血風録》(東京：文藝春秋，1991)。
- 7 山本武利根據GHQ的資料重組朝日「社內革命」的經緯，參山本武利著：《占領期メディア分析》(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96)，頁57-60。
- 8 大阪本社販賣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朝日新聞販売百年史(大阪編)》(大

- 阪：朝日新聞大阪本社，1979），頁1。
- 9 朝日新聞社因該書記載《朝日新聞》文章，以侵犯著作權為理由阻止其出版。該書翌年修訂後以《朝日新聞的戰爭責任：徹底檢証連東京體育也會吃驚的戰爭報道》（東京：太田出版社，1995）為名出版。
  - 10 連載被收輯成朝日新聞取材班：《戰後50年メディアの檢証》（東京：三一書房，1996）。
  - 11 其中一萬多張相片放在《朝日新聞》網上文獻檔案〈歷史相片公文檔案〉（歷史寫真アーカイブ），供教育機構，公共圖書館及政府部門參考。
  - 12 因此當時遞信省及關東廳發行的記念明信片及軍事郵件都受此例限制，明信片及相片要有「旅順要塞司令部檢閱済」才可寄出。不單是關東州，日本內地的明信片也要有「下關要塞司令部許可済」才可寄出。
  - 13 後藤孝夫著：《辛亥革命から滿州事變へ：大阪朝日新聞と近代中国》（東京：みすず書房，1987），頁376。
  - 14 《新聞と戦争》，頁216-217，252及《朝日新聞社史》，頁512。
  - 15 《朝日新聞販売百年史(大阪編)》，頁414。
  - 16 《新聞と戦争》，頁330。
  - 17 荒瀬豐著：〈日本軍国主義とマス メディア〉《思想》399号(1957)，頁37-39；《新聞と戦争》，頁214。
  - 18 有關滿洲版的保存，1932年11月至1935年11月有縮微膠片，1935年12年1日以後的滿洲版，可參2010年ゆまに書房出版的影印版。
  - 19 《朝日新聞社史》，頁432，434。九州支社從1938年1月起發行「北支版」及3月起推出「中支版」。
  - 20 貴志俊彦著：《滿洲国のビジュアルメディア-ポスター はがき 切手》（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頁219。
  - 21 以上陸軍省令及海軍省令收藏在〈朝日新聞歴史寫真檔案〉ID0000057083。
  - 22 《朝日新聞販売百年史(大阪編)》，頁382。
  - 23 《太平洋戦争と新聞》，頁315，323。
  - 24 《朝日新聞社史》，頁570。
  - 25 《新聞と戦争》，頁474。
  - 26 《朝日新聞社史》，頁568。
  - 27 《太平洋戦争と新聞》，頁398。
  - 28 《新聞と戦争》，頁489-490，493，50頁。



- 29 《每日新聞》其實更早公開戰前報道相片。每日新聞大阪本社所藏的「不許可」相片被輯成《一億人の昭和史10：不許可寫真史》(東京：每日新聞社，1977)及《每日新聞秘藏不許可寫真》(東京：每日新聞社，1998)。
- 30 「要塞地帶法」(「御署名原本 明治三十二年 法律150號 要塞地帶法」JACAR(亞細亞史資料中心)，檔案編號A03020380000。
- 31 拙著：《滿洲国のビジュアルメディア》，頁218-219。
- 32 田玉榮吉編：《国防と寫眞の撮影》(東京：博文館，1941)。田玉在書中表示來自憲兵司令部檢閱班所，此書獲陸軍認可才出版。
- 33 同上，頁131-141。
- 34 拙著：《滿洲国のビジュアルメディア》，頁219-220。
- 35 「御署名原本 昭和12年 法律第72号 軍機保護法改正刑法施行法中改正(勅令第578號)」JACAR：A03022076900。
- 36 《一億人の昭和史10：不許可寫真史》，頁255。
- 37 《軍機保護法》(東京：日本統制地圖株式会社，1943)，頁48-49。
- 38 「御署名原本 昭和14年 法律第25号 軍用資源秘密保護法(勅令第412號)」(JACAR：A03022328200)。
- 39 《一億人の昭和史10：不許可寫真史》，頁254。
- 40 「本邦ニ於ケル新聞、雜誌取締關係雜件第三卷」(JACAR：B02031111400)。
- 41 「本邦ニ於ケル新聞、雜誌取締關係雜件第三卷」(JACAR：B02031111800)。
- 42 昭和15年《密大日記》第7冊(JACAR：C01004794300)。
- 43 5W1H，又名六何法，是報道新聞的手法。5W是what, who, where, when, why；1H是how。

# 王韜及其日本友人的琉球問題認識

❖ 薄培林 ❖

## 一、前言

1870年代前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仍處於以華夷理念為基礎，以朝貢冊封為特徵的傳統宗藩體制之下。明治日本積極展開海外擴張政策，一步步將自明朝起即成為中國藩屬的琉球王國納入日本版圖，改琉球為沖繩縣，以期擁有近代意義上的對琉球的主權。雖然當時中日政府之間在外交上圍繞琉球問題摩擦不斷，但中日民間知識人之間的交流似乎並未受到影響。1879年因《普法戰紀》與《循環日報》的流傳而在日本聲名鵲起的王韜(1828-1897)受日本漢學界邀請訪日數月，與中村正直(1832-1891)、重野成齋(1827-1910)、岡千仞(1833-1914)等漢學家及新聞界等日本文士廣泛交流，其友好交流記錄可見於王韜的《扶桑遊記》。<sup>1</sup>

與王韜交往的日本知識人多為興亞論者，比如重野安繹、中村正直及岡千仞都曾積極提倡「興亞」，參與「興亞會」的活動。他們與王韜之間不僅有針對時局的討論，還有通過文章書信等形式的思想交流。《扶桑遊記》中分別有中村、重野之序與岡千仞之跋，可見彼此交誼之深。然而，王韜訪日的1879年，正是日本對琉球剛剛實施了「廢藩置縣」、中日政府之間圍繞琉球問題矛盾激化之際。此時中



日的這些知識人之間如何看待琉球問題？

至於王韜與近代日本知識人之間的交流以及思想之比較，先學已多有分析。<sup>2</sup> 本文僅圍繞明治初年中日之間對立焦點之一的琉球問題，通過分析王韜與中村、重野、岡千仞有關琉球地位的論述，以及表露其世界形勢認識的「興亞」言論，考察這些中日知識人在東亞國際秩序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時期中對琉球的地位及主體性是如何界定的，同時亦藉此重新審視這一時期中日知識人在國際關係認識方面思想上所發生的近代性轉變。

## 二、一段著名的中日交流佳話

王韜於1867年冬至1868年春之間漫遊英、法等國，1871年著《普法戰紀》14卷。此書為當時的知識人提供了認識世界的最新知識，為王韜博得極大聲譽。它很快就傳到日本，被廣為翻刻流傳。而日本明治維新對於中國開明知識分子是一個很大的刺激，王韜在香港期間就密切注視著日本的發展，久欲實地考察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以探其興盛之源及途徑。同時，他對日本漢學以及散失在日本的漢籍也深感興趣。

日本《報知新聞》的主筆粟本鋤雲最先發現王韜此書，視之為無與倫比之珍籍。1878年，他對龜谷省軒、佐田白茅等學者提出邀請王韜東游，立即得到重野安繹、岡千仞等眾學者的響應。1879年春，曾遊歷中國、與王韜頗為熟悉的書籍收藏家寺田望南(1849-1929)緻書王韜發出邀請，王韜欣然應邀，於1879年4月23日開始為期近四個月的扶桑之游。訪日期間，日本學者欽佩王韜之學識淵博，爭相與之交流，人數不下數百。此次訪日使王韜成為近代中日文人交流之先驅。本文集中討論王韜與重野安繹、中村正直及岡千仞三人的交往。

重野安繹為著名史學家，曾讀《普法戰紀》，對王韜在歷史敘述

體裁上的新嘗試頗感興趣，曰：「余嘗觀先生所著書，羨其文藻，愛慕其襟度通儻，不規規乎繩墨。」<sup>3</sup>重野得知王韜有意訪日，對其友中村正直說，聞王韜「有東遊之意，果然，則吾儕之幸也」。<sup>4</sup>王韜寄居其家有月餘時間，兩人時常晨起筆談。重野的文集《成齋文初集》與《成齋文二集》中，多數文章後均附有王韜之評，足可見二人在學術上的切磋交流。重野評介魏源的《海國圖志》一書，深感「其憂國之心深矣」，然而關於「海外情形」，卻「未能洞若蒼龜」，他直言「默深〔魏源〕未足以比先生〔王韜〕」，認為王韜之世界認識遠在魏源之上。<sup>5</sup>出於對王韜的景仰，重野不顧年老體弱，「偕友人數輩」陪同王韜遊覽日本山水，至《扶桑遊記》刊出後，重野又為之作序。

中村正直以翻譯《自助論》與《自由之理》而聞名。中村不僅是明治日本的學界名人，更是「經由傳教士向中國極力推介的」在中國各口岸城市中最有名的日本學者。中村在重野家中看到《普法戰紀》，閱後頗有感悟，於是也參與邀請王韜赴日的具體策劃。中村非常尊敬王韜，尤其對《普法戰紀》讚嘆不已。而王韜也在其《扶桑遊記》中抄錄有與中村唱和的詩，並評價中村：「騷壇擅盛名」，「獨以儒學，文章侷儻稱一時」，「兼明東西學術」，並請中村為《扶桑遊記》作序。<sup>6</sup>中村在其序文開頭即寫道：「人生朋友之際，聲應氣求，肝膽相照，千里來會，恨相見晚者，夫豈偶然哉。無非由於我有誠以感，彼有誠以應，纏綿牽合，交孚凝聚，而遂成一大盛事也」。<sup>7</sup>兩人意氣之相投可謂躍然紙上。

岡千仞在明治初期曾編譯《美利堅志》與《法蘭西志》。他與黃遵憲等駐日訪日的中國知識人有密切交流，在西學傳播方面，顯示出與王韜同樣的興趣。在《扶桑遊記》之〈跋〉中岡千仞寫道：「《普法戰紀》傳於我邦，讀之者始知有王紫詮先生，以卓識偉論，鼓舞一世風痺，實為當世偉人矣。」岡千仞可謂是王韜在日本最大的讚美者，他也將王韜媲美於魏源。他與王韜暢談亞洲形勢，建議其翻譯《俄志》，陪同其四處遊歷，盛讚王韜是近代中國以名士身份東游之第一



人。據實藤惠秀之統計，在《扶桑遊記》中岡千仞的出現次數多達28次，文中所記錄的每一個王、岡二人見面的細節無不顯示出岡千仞對王韜的傾倒崇拜。在東京期間，王韜參觀了岡千仞任職的東京書籍館，並捐贈自己著述70餘冊。而岡千仞則代表書籍館將《大日本史》103冊作為「交換」回贈予王韜。<sup>8</sup>岡千仞認為俄羅斯是亞洲之大患，提倡中日聯合抗俄。此觀點與早有聯英抗俄思想的王韜不謀而合。岡於1883-1884年間遊歷中國長達一年，為見王韜而先赴上海，期間拜會了李鴻章、張之洞等官僚以及各地名士文人，在上海尤與王韜、張煥倫等滬上名士密切交往，並撰寫了《觀光紀游》10卷。

重野、中村、岡千仞等日本學者對王韜的尊重，顯然與他們當時對西學的熱衷有關，但他們對王韜的熱衷也正好表明，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學界仍然有意借用中國人的著作，來認識和瞭解西方。王韜也在點評岡千仞的文章時，如此評述他與重野、岡二人友情之深厚：

鹿門慷慨激昂，中有血性。成齋秉純粹婉篤之性，而具芬芳悱惻之懷。才識學三長，竝推巨擘。此二人，余皆得與之深交，可無憾已。余平生知己絕少，〔中略〕乃不謂得知己於日東。此生平生意料所不及者也。特余老矣，何日重游得再相見，一念之，又不覺悲從中來也。<sup>9</sup>

王韜的訪日自始至終包圍在一片友好的氣氛之中。然而，對於當時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東亞國際秩序乃至世界形勢之變動等時事問題，《扶桑遊記》中卻鮮有記載，僅只有5月21的記錄中談到一些有關時局的話題。這與當時中日之間因琉球等問題而造成的政治對立似乎不無關係，隱約可見中日文人在此問題上的意見分歧。

### 三、三篇不同的《沖繩志》序

王韜訪日前後，正是中日之間因為琉球問題在外交上摩擦不斷

的時期。琉球自明代起稱藩於中國，1609年日本薩摩藩征服琉球，然而琉球與中國的關係仍然繼續至1870年代，此間琉球一直處於這種所謂「兩屬」的狀態之下。清廷並未正式知道琉球的這種雙重地位，只是把琉球看作向中國朝貢的一個藩屬。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對外擴張。1872年日本封琉球王尚泰為琉球藩王，列入華族。1873年，將琉球藩的管理從處理外交事務的外務省移至處理國內事務的內務省管轄。1874年，又以1871年漂流至台灣的琉球宮古島漁民被台灣生番殺害一事為藉口而出兵台灣，企圖維護日本代表琉球人發言的獨佔權利。如此一來，致使兩個半世紀以來懸而未決的琉球地位問題被提上了歷史舞台。1875年日本又阻止琉球向清政府「入貢」，琉球國王派人向清廷陳情。1876年日本接管琉球的司法權和警察權。1877年清政府派何如璋任出使日本大臣，命其在日本與日方交涉，要求保持琉球獨立。然而，日本仍然擅自於1879年廢琉球藩改置沖繩縣，將琉球國吞併。日本這一系列的行為，對清廷而言，無疑是對以中國為中心的傳統體制的挑戰。

琉球問題在此時期似乎並沒有太影響到王韜與日本文人的交往，不過，可以肯定此問題應該是他們在這一時期共同關注的問題之一。不僅王韜撰寫了一系列文章以表述其對琉球問題的看法，重野、中村、岡千仞這三位與王韜交往密切的日本學者亦分別有相關的著述。此三人均作有一篇《沖繩志序》，各自表述了他們當時對中琉日關係的認識，及其對琉球之地位、琉球主體性的界定。

《沖繩志》(1877)是日本最早的一部在實地見聞之基礎上體系性記述的琉球地志，由日本專管琉球事務的官僚、前薩摩藩藩士伊地知貞馨(1826-1887)著述，重野安繹校。伊地知貞馨曾任「琉球在番」，為當時的琉球問題專家，自1871年起至「廢琉置縣」的1879年間數次赴琉，是與日本併吞琉球的具體操作頗有關聯的人物之一。中村正直與岡千仞都是伊地知在江戶的昌平黌留學以來的知己，兩人分別為《沖繩志》作前序。而重野更是伊地知昌平黌時代以來最親



近的友人志士，重野在該書出版時任修史館一等編修官，後來創立日本史學會，是日本史學界元老。他校此書，並為之作後序。<sup>10</sup>由於中村與重野是當時日本文壇具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1879年10月1日的《申報》將中村與重野的兩篇序文同時轉載，分別題為〈錄沖繩志前序〉及〈錄沖繩志後序〉。

中村正直的《沖繩志序》作於1877年8月，文中闡述其反對日本政府的琉球政策之立場。中村以琉球為一獨立之「小國」為前提展開論述，對琉球的弱國處世之道予以同情。他認為國之大小是相對而言的，中、琉、日三國中，日本相對於琉球為大國，相對於中國則為小國。一個國家若想自立自存，一定要「不自驕，不自恃」，其行為必須「合於保國之道」。如果一個國家「智小而謀大，志驕而氣傲，積薄而發驟，未有不速其敗亡者也」。在此，他含蓄地警告日本只有以小國自處，「安分自守」、「不與中國朝聘會盟之事，厚積薄發，培本而蓄力」，才能「有所自立而存」，表明他反對日本破壞中琉之間的傳統關係，對日本政府的琉球政策持保留態度，同時也間接對政府的海外擴張政策提出批判。

1879年2月，中村在其為陸軍醫官渡邊重綱的《琉球漫錄》所做的題辭中，回顧以往日本與琉球之間的藩屬關係，對日本自1872年對琉球王國「封藩」以來至「廢藩置縣」的一系列「琉球處分」政策進行批判。他評曰：

聖朝為政尚忠厚，任民自主不相妨。譬如牛馬放郊野，不加衡軛不施繮。內地尚然況藩國，王道蕩蕩德洋洋。〔中略〕宜乎遠方慕其德，如子歸父客歸鄉。政教風俗不敢問，帝力何有恰如忘。嗚呼，懷遠唯在德，人情安舊固其常。包容羈縻而已矣，聖恩併與皇酋長。〔中略〕撫遠不要事隄防，不用宓賤及魯恭，宜如朱崖與夜郎。<sup>11</sup>

中村認為日本對待像琉球這樣的小國，應該遵循孔孟的「王道」，即

德治主義，各國和平相處，並濟弱扶傾，包容羈縻，而不應該貪圖其疆土。中村列舉漢代對待地處偏遠的朱崖及夜郎兩小國的做法來類比日琉關係。由此可看出，作為一名集東西方學問於一身的思想家，「欲酌東西之中而劑其平」的中村此時所流露出的日琉關係認識，仍然充滿以孟子的王道與民本思想為中心的華夷秩序的色彩，強調「德」與「仁」，反對近代西方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中村堅持國際和平主義，是傳統的儒教道德思想牽引其和平正義主張，尋求東西方思想融合的思維促使中村由對外「用強」論者轉變為非戰論者。他反對征韓論、反對日本併吞琉球等侵略亞洲鄰國之行為，亦由其國際和平主義思想衍生而來。

與中村反對日本併吞琉球的觀點相反，重野安繹在其1877年9月為《沖繩志》所作的後序中論述道，「沖繩」一詞為日語，而「琉球」則是漢字，是受中國冊封後漢人為之命名的。這本書之所以名為《沖繩志》而不是《琉球志》，是因為琉球本土人稱自己的國土為「沖繩」。從其國土名稱使用日語這一點來看，琉球人與日本人是同一民族，琉球應該屬於日本的版圖。他寫道：

沖繩志何以作？志琉球也。何不曰琉球，而曰沖繩？從土人所稱也。土人何稱沖繩？沖繩，邦語也，本土之名也。琉球，漢字也，漢人之所名也。沖繩自通漢土，受其封爵，服其衣冠，髻簪髭鬚，盡仿漢裝。而獨其稱國名用邦語者，何也？語言文字，同我邦俗，故國土之名稱，舉皆邦語也。觀乎國土名稱之用邦語，而其為我種類，為我版圖也。<sup>12</sup>

重野認為無論在種族、語言還是在交通關係方面，琉球都與日本有更深刻的歷史淵源。重野指出琉球與漢人為不同族類，在與中國交通之前、成為「漢土」藩屬之前與日本為同類，那時的琉球國「雖無藩名」，但實為日本之藩屬。他指斥琉球政府「自以天孫序世系，而不問其種族同異；自以沖繩冒國名，而不察其語言所由；反欲與殊



方異族之漢人昵比，抑又何心哉？」重野還強調，琉球本土之人讀此書，會不由得產生「內向歸本之心」，而日本「內地人」讀之，則會興起「恤同類字藩屬之心」。他認為此書之所以名為《沖繩志》，不僅僅是從琉球之本稱，同時更重要的是「併以繫內外人之心」，即促發日本人與琉球人的團結意識，這才是「恆庵氏著撰之本音」。也許是因為重野與伊地知兩人均為薩摩藩士出身，且同為日本當時一流的史學者，對於琉球的主體性及其歸屬，兩人的觀點頗為相似，都是建立在琉球從歷史上看應是薩摩藩附屬這一認識之上。<sup>13</sup> 尤其是作為日本外務省官僚的伊地知，此二人的這種琉球地位認識難免帶有民族主義與國權主義之色彩。

重野從近代歷史學的實證主義立場出發，通過琉球的語言、民族文化與日本語言文化的關聯性來判斷琉球的主體性進而決定其歸屬。他的這種認識，頗具語言民族主義之氣息，可以說是對19世紀後半期逐漸向近代轉型的東亞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的一種近代性認知，它無形中為日本將琉球納入領土、將日琉關係進行近代化改編而提供學術上支持與依據。1896年重野出版了一冊題為《支那疆域沿革圖附略說》的地圖冊，描畫自夏至清的中國各代疆域圖，展示中國版圖的變遷過程，並對各朝代情形加以解說。在每張圖中，琉球群島均被標記為「沖繩諸島」，解說文中，提到有與中國同處於宗藩關係的朝鮮與越南，卻隻字未提及中國與琉球之間的交通關係。由此可以看出，琉球屬於日本這一觀念在重野的思想裏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重野從語言、種族的角度的來看待日琉關係、論證琉球歸屬於日本，遭到中村正直的批評：「比也正名乎？名一正，而疑似判焉，向背決焉？文唯就名論事，而著撰本旨，發摘無餘蘊」。<sup>14</sup> 兩人雖為好友，且同為興亞會會員，都主張「亞細亞連帶」。重野在1880年代也曾明確提出過「支那重視論」，充滿誠意地主張「日清連橫」，但是在現實的琉球問題上，這兩位明治漢學界大師的認識卻如此截然不

同。重野此文被《申報》轉載後遭到了中國士人的反駁。<sup>15</sup>

岡千仞的〈沖繩志序〉亦作於1877年8月，關於琉球之地位，其觀點與重野安繹認為琉球歸屬於日本之立場一致。不過，岡千仞完全是從現實的國際關係角度來論證明治政府對琉球措置的必要性，認為琉球是「一島兩屬」，其政治地位不被國際公法承認，容易被西方列強借機侵佔，表明日本加強對琉球的控制、彰顯對琉球的統治權有利於穩定亞洲大局。他評曰：

我邦西南傲有琉球，猶東北傲有蝦夷，皆所以藩蔽邊海。禦侮之方，不可不講也。〔中略〕俄羅斯之於樺太，疆域懸絕，風馬牛不相及者，彼幸我不限疆界，悍然掠奪。況琉球鄰清國，又嘗受其封冊。一島兩屬，名號不正，若使美利堅當時學俄羅斯所為，則其地不羽而飛也矣。聖朝有鑒於此，其新發大號，拜島主為藩王，置兵營，嚴守備，庶幾名分一定，備虞有方。可以絕狡焉之望也。〔中略〕以樺太覆轍為戒可也。<sup>16</sup>

對於伊地知著述《沖繩志》一事，岡千仞也是從政治角度來評價，認為伊地知撰寫此書之意圖在於強調日本對琉球的領有權，杜絕其他國家對琉球的覬覦。同時，還能夠穩定當地的民心，防止琉球重蹈樺太被俄羅斯蠶食之覆轍。此時的岡千仞已經意識到「一島兩屬」的琉球與中日兩國的關係，並非近代意義上的「主權」關係，必須對於琉球的「名分」即政治地位進行近代性的界定，明確琉球的歸屬，這樣才能得到國際法的承認，避免日本像失去樺太一樣失去琉球。因此岡千仞在此文中表現出其贊成日本政府的琉球政策。

岡千仞這種對中琉日之間的國際關係認知在同時代的東亞知識分子中可以說是比較先進的。此時的中國，自1871年的琉球民遇難事件以來至1879年日本「廢琉置縣」前後，雖然也有認識到琉球的兩屬狀態、將「廢琉置縣」視為日本明治維新之一環的黃遵憲，以及主張按照《萬國公法》即近代國際法處理琉球問題，主張琉球「自立」（獨



立)的郭嵩燾等官僚存在，但是新聞媒體的琉球認識論調，仍然是「琉球清朝專屬」論為主流，旨在維持傳統的中琉關係。

#### 四、王韜對琉球地位的認識

王韜非常關注琉球問題。1879年日本實施「廢琉置縣」，王韜於《循環日報》上發表〈論日本經營琉球〉及〈論中東商辦琉球事〉，徹底批判日本「琉球處分」行為之不義與無理；通過〈辨琉球屬於我朝〉等論說嚴正主張中國對琉球的宗主權；另外撰寫〈論琉球欲圖恢復〉等論說支持激勵琉球救國運動。除此之外，他還著有〈琉球朝貢考〉、〈琉球向歸日本辨〉、〈駁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證〉、〈琉事不足辨〉等文，無一不表明其反對日本併吞琉球的侵略行為之立場。

王韜從歷史考證入手，指出琉球在歷史上臣服中國在先，朝貢日本在後，指責日本不能「私琉球為己有」，尤其強調，日本以1871年琉球漁民漂至台灣被生番殺害一事為藉口而出兵台灣一舉並不是為琉球之利益，其目的在於「剪滅琉球」。他評曰：「〔琉球〕國民船遭風颺泊，我朝本當加以撫恤，何容日本為之置詞。〔中略〕琉球之為我藩屬，日本非不知之，乃必以此為辭，其志在剪滅琉球可知矣，豈真愛惜琉球也哉？」<sup>17</sup>

王韜在〈琉球向歸日本辨〉一文中，也依據中日雙方的史書進行考證，先從時間上指出「日本之通於琉球實後於我國」，而後列舉了八條理由，論證琉球並非日本「內屬諸侯」，而是一「自主之國」，與日本的關係，只不過是「盟聘往還，貢獻不絕而已」。對於日本單方面根據中日在1874年為解決台灣爭端而簽訂的《中日北京專條》來認定清政府在此條約中已經承認琉球國民為日本國屬民這一論調，王韜更是批評道：

至討罪臺灣，尤昧於理，其始托言劫掠小田縣民，繼乃及琉球漂民，我朝大度包容，勉徇英國公使之請，而成和議。其所定

條款兩端，未嘗一字及琉球；載在盟府，人所共見。乃遂欲以此指琉球為日本屬地，掩耳盜鈴。<sup>18</sup>

他明確指出《中日北京專條》與琉球之歸屬問題無關，並不能成為確認琉球歸屬的法律依據，日方的指證純屬於歪曲解釋。及後王韜提出，對於琉球這樣的小國，中日兩國應該共同保護其「自立」，不應該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將其吞併，故曰：「即使蕞爾彈丸弱小不能自強，亦當相與共保之，俾得守其千餘年自立之國：斯乃所以聯唇齒而固屏藩之義。今反翦滅而傾覆之，挾詐彌縫，囁嚅掩飾，以便其私！將以此欺天下乎？」<sup>19</sup>

王韜比較中日對待琉球的態度曰：「日本取之，而中國欲復之，日本則俘其王，毀其國，分裂其土宇，中國則欲復其君，反其地，撫輯其民人。此二者，孰是孰非，孰曲孰直，孰仁孰暴，世必有能辨之者。」他似乎更希望維持以往的中琉日關係，保持琉球的「自立」。對於近代西方「大制小，強凌弱；奪人之國，戕人之君」的弱肉強食的國際政治，王韜批評道：「雖有公法，徒為具文」，而且西方各國對「日本之剪滅琉球」，「無一仗義執言，秉公論斷」，反而「從中袒庇，隨聲附和」，對此，王韜表示憤慨。至於日人指出的琉球在語言上、種族上、政體立制等方面都可證明與日本同類這一說法，王韜並沒有逐一反駁，只是強調日本在將琉球「封藩」、將琉球王列為華族之前，琉球無疑是兩屬的，並非日本專屬。<sup>20</sup>

王韜認為在中日琉球之爭上，西方各國或謂琉球與日本同族同文同俗，其地當屬日本；或謂琉球介於日、俄兩大國之間，日人兼併琉球於版圖則可以施以保護，絕俄人覬覦之心，其輿論大多偏袒日本。可以看出，西方此兩種論調，前者與重野、後者與岡千仞的論調頗為相似。王韜認為這些看法皆為「一偏之論」，認為琉球為一「自立」之國，「土瘠民貧」，西方列強不會為琉球而與中日失和。在此，王韜又一次提出了中日聯合共同保護琉球的構想曰：「琉球為千餘年來自立之國，雖蕞爾彈丸，弱小不能自強，而既託日本之宇



下，又入貢於中朝，久為藩服，矢慎矢恭，何不可約中朝相與共保之，以聯唇齒輔車之誼，俾為中日之維屏維翰。」<sup>21</sup>

對於「西力東漸」的威脅，王韜主張「聯日抗俄」，對日本的興亞主義懷有相當程度的共鳴與期待，甚至作為外國人會員也參與興亞會的活動。然而，日本併吞琉球，在王韜看來，英法雖然佔據東南邊境的三個藩屬，但是越南、暹羅、緬甸這三個藩屬國並未亡國；相反日本對琉球，則是「入其國，擒其王，併其土地」，既違背國際公法，更是對東亞傳統秩序的挑戰。他批判日本之作法更有甚於英、法等列強，有悖於天下公論。王韜因此批判日本政府之侵略行為，實有負「興亞」之名，對曾經期待的興亞會也開始抱有強烈的不滿。<sup>22</sup>王韜認為興亞的第一義即是中日和好，而中日和好的第一義在於歸還琉球故土，他提出琉球問題的解決方法是，日本將中山府歸還琉球王，使之奉其社稷，這樣中國才可以與日、英聯合，共防俄羅斯入侵。

王韜傾向於中琉之間傳統關係的維持，保全小國琉球的存立。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晚清知識界，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承認國際法的意義，認為中國應當依循國際法來處理對外關係。另一方面，籠罩在國際社會的強權政治的陰影中，他們又不能不對國際法的虛偽性提出質疑。<sup>23</sup>他們認為萬國公法的大小相維、強弱相制具有「存立小國之義」，這一點與王道政治的「存祀主義」相通。<sup>24</sup>王韜認為萬國公法只不過是西方強權政治的一個工具，國若則「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為我用」，因此公法是「可恃而又不儘可恃」。<sup>25</sup>

## 五、興亞論與琉球問題的矛盾

王韜在《普法戰紀》中的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對持「興亞論」立場的日本漢學家很有吸引力。在「興亞」這一理想上，王韜的確與中村、重野、岡千仞等日本知識人有共鳴之處。興亞論的思想雛形在江戶

幕末期平井國臣、勝海舟等人的思想中就已出現，1880年，即日本實施對琉球「廢藩置縣」的翌年，一批官僚與民間知識人成立興亞會，號召「日清提攜」，共同對抗西方，振興亞洲。明治日本的這種興亞主義是以「弱小國的自覺」為心情基礎，重視亞洲這一同一性，以「同文」(漢字)、「同種」、「同洲」、「同俗」為紐帶倡導亞洲各國的聯合，一度引起了東亞許多懷有危機感的知識人之共鳴。中村、重野、岡千仞等都是該會重要的會員，參與了各項興亞事業活動。王韜亦名列會員名單之上，他在興亞會成立之初見到赴香港作宣傳的該會主幹曾根俊虎時，指出自己為亞洲各國紛紛失去獨立、歐人橫行之現狀日夜憂慮，因此讚賞興亞會的宗旨，並表示願意入會；還盛讚曾根俊虎「務欲中、日聯唇齒，則亞洲可臻強盛，於以禦外侮輯鄰封而與羅巴諸大國抗衡」之興亞理念。<sup>26</sup>王韜著〈亞洲半屬歐人〉等文表達對亞洲形勢的憂患意識，在給岡千仞的信中呼籲中日的聯合，「今日亞洲中，唯中與日可為輔車之相依，唇齒之相庇」，<sup>27</sup>他還在〈中外合力防俄〉一文中宣揚中日英聯合起來共同抵抗沙俄的南侵。

王韜與中村、重野、岡千仞都是興亞主義的擁護者，不過他們在具體的思維方式上卻各有特色。中村之「興亞」立足於國際和平主義思想，尤其是他作為漢學家所具有的儒教思想傳統與政治觀。他在歐化脫亞的潮流中提倡「漢學不可廢」，反對蔑視中國和朝鮮，對當時與西力東漸隨之而來的國際上「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現實予以批判，完全是以對等平等為前提的、和平友好的興亞論。<sup>28</sup>王韜之「興亞」目的在於防範沙俄勢力擴大，其立場基本上與中村一致，主張立足於同一平台之中日合作；岡千仞之「興亞」則具有侵略性思考，他希望王韜翻譯《俄志》，目的在於「將五大洲收於掌握之中」，是日本凌駕於中國之上的興亞論。<sup>29</sup>重野安繹也提倡「日清連橫論」，在甲午戰前他的確是為了消除中日兩國的摩擦、強化兩國的連帶關係而提出的中日聯合，很有誠意，但是在甲午戰後也難免呈現出日本優越論的傾向。<sup>30</sup>



王韜在《循環日報》上發表〈興亞會宜杜其弊論〉(1880年8月16日)，在贊同興亞理念的基礎上，對日本政府「無端而構釁臺灣，蓄謀而剪滅琉球」之行為提出批判。他號召亞洲各國應該「患難相恤，在大國不以併吞小國為心，在小國不以抗拒大國為志」，提醒興亞會中人應當「求所以保邦睦隣之道，興滅繼絕之仁」，而不要作為中國通被日本政府利用。關於琉球問題，王韜曾詢問興亞會對此有何見解，但是興亞會並未做出回答。

王韜訪日時，岡千仞在東京與王韜前後見面多達28次，兩人「酒酣耳熱，輒縱談天下大計」，頗有英雄所見略同之感，以至於王韜在1880年代一直認為「鹿門之志，常欲中、日和睦，聯英以拒俄」，期待岡千仞對其一連串呼籲中日合作的言論能有所作為。<sup>31</sup> 岡千仞也應該知道王韜對日本併吞琉球的批判態度，但是對於琉球問題這一現實政治矛盾，他似乎採取迴避之處理方式，並沒有向王韜表明他認為琉球當屬日本、支持日本政府兼併琉球之立場。岡千仞遊歷中國時，與眾多清朝文人相見，自然被問及琉球事，對於不太熟識的人，岡或以「士各為其國」為託辭而一笑了之，或以「僕林下人，未審此事顛末」為由而避開正面回答。<sup>32</sup> 不過，對於張經甫等與之熟悉的上海士人指責日本「縣琉球之為無名」時，岡千仞表述有他對此事的真實想法：

中土一旦以我邦縣琉球之故，大舉問罪，則我邦雖弱小，獨立東海二千年，勢不得不一戰。一戰而敗則再戰，再戰而敗則三戰，不以千敗百挫，少屈其銳鋒，決雌雄於百戰之後，如英法百年之役。〔中略〕此可以雪東洋積年之辱也。僕林下人，不知縣琉球之何故，唯一目東洋威武震歐土，則足矣。<sup>33</sup>

岡千仞是主戰論者，他對豐臣秀吉當年侵略朝鮮持讚揚態度，認為「此役耀國威於海外」，此舉「未嘗為無功於家國」，他甚至明白地表示為琉球日本可不惜與中國一戰。<sup>34</sup> 岡千仞認為琉球問題為中日之

間的「末界微事」，希望中國能「付之不問」地放下琉球之爭，與日本聯合抗俄。他認為，中日兩國合，「則可以抗歐土」，離，則兩國都「無以自立」；若中國因為琉球、朝鮮問題而與日本互相猜忌互不相容，則會成為「歐人之所利」，造成「東洋之不利」。<sup>35</sup>

關於國際關係，中村認為「國之強弱，在於人民智德之多少，而不在版圖之大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往如同人之交際也應該遵循孔子的「忠信篤敬」、「仁愛」、「忠恕」等道德倫理。<sup>36</sup>他提倡應該將孟子的「仁政」、「王道」、德治主義以及民本思想實踐於現實的國際秩序與外交之中。他與王韜的興亞論在形式上、心情上都比較相似，都立足於深厚的儒教文化思想基礎之上。因此，對待小國琉球的態度，兩人也相近，都主張維持琉球獨立。

重野成齋的國際關係認識更具有現實主義的色彩。他在〈萬國史記序〉一文中，批判中國傳統的國際觀念——夷夏論、宗藩觀，也涉及魏源極其《海國圖志》，批判其「自稱中土」視萬國皆為「海國」之華夷意識的局限性。他曾以此文徵求王韜意見，王韜評論該文：「論高識卓，是宇宙間有數文字，讀竟不禁攝具三拜」。<sup>37</sup>重野認為「冊封進貢」的宗藩關係只是「徒擁虛名」，並無「實利」，在國際關係中，重野似乎更看重「實利」。1870年代初，重野在為岡本監輔的《窮北日誌》所做之序中，談到中日俄三國圍繞琉球、北海道的領土之爭中的利害關係曰：

南、北倭之稱，見於《隋書》。源君美以琉球為南倭、蝦地為北倭，以為皆我種類也。予固謂琉球之有支那，猶蝦地之有俄羅斯。支那以虛名爭琉球，我陽與之名而陰收其利；冊封進貢，不過順適其意。俄羅斯以利爭蝦地，我徒擁虛名而彼日收其實利；〔中略〕雖然，窮髮不毛，亦我版圖也；連眉鯨面，亦我種類也。一時為俄羅斯所逼，而內嚮之志未嘗忘焉。蓋我之策，每得於南而失乎北也！岡本監輔於窮北之地，志在開拓。夫北



之難開，不若南之易治。俄羅斯方圖遠略，固與支那不同；假令我措置得宜，猶不能保其無侵略，況於策屢失哉！<sup>38</sup>

重野強調琉球與北海道都屬於日本版圖，與日本人為同一族類。鑒於俄羅斯的強大，若開拓疆土，北海道「難開」而琉球「易治」。此言似為明治政府分析了當時日本周邊的國際形勢，希望當局能夠參照岡本監輔之論而處理琉球與北海道的問題。王韜的《循環日報》在日本併吞琉球後，以〈論日本未嘗無人〉為題，介紹了重野此論，「成齋之言，目光如炬，洞若觀火；其度事審情，可謂中矣」，在對重野之見解寄予高度評價的同時，批評清廷在琉球問題處理上的遲鈍反應與錯誤的外交處理。

## 六、小結

1870及1880年代是東亞國際關係發生巨變，中國逐一喪失周邊朝貢國，東亞的傳統體制逐步趨向瓦解的時期。琉球問題，正是這一時期中日關係的一個原點。1879年在日本兼併琉球、中日關係緊張的背景下，因《普法戰紀》而名揚海外的王韜接受日本民間學人之邀訪日，留下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話。然而，在此友好交流的一幕之外，在「興亞」理念上的共鳴之背後，中日知識人之間在世界形勢尤其是東亞國際關係認識上出現有民族主義立場上的衝突以及國際觀念上的分歧。

尤其是涉及到琉球這一現實的政治問題時，王韜訪日時與之交往至深的岡千仞、重野成齋、中村正直各持不同立場。中村對日本政府推行的琉球處分政策持反對態度，宣揚東亞傳統的「德治」、「仁政」，批判近代西方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排斥武力吞併。重野則從語言、種族這一文化角度出發，考證琉球在語言文化、民族上與日本本土的歷史淵源及同一性，認為琉球應歸屬於日本版圖。重野這種類似於「日琉同源說」的思想，在為琉球提供文化認同的同時，也

為明治政府將琉球併入日本領土而提供理論依據與學術支持。岡千仞從現實的國際政治角度出發，明確指出要改變琉球「一島兩屬」之狀態，將日琉關係進行近代化的改編，使琉球歸屬日本能得到國際公法的承認。王韜承認琉球在歷史上處於中日「兩屬」狀態，批判日本兼併琉球，割裂中琉之間的關係。他主張維持琉球與中日兩國之間的傳統關係，使琉球保持為「自立」之國，因此特提出了中日聯合保衛琉球之構想，期待中日協作，共同維護亞洲的安全與秩序。總之，王韜與中村都主張要維持琉球與中日兩國之間的傳統關係，此二人這種立足於「存亡續絕」之王道理念的立場頗有相似之處。在「興亞」理想上，四人皆贊成興亞理念，頗有一致之處，然而具體到現實的國家利益之時，岡千仞與重野之見解則明顯帶有民族主義與近代國家主權觀念之色彩。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在東亞世界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過程中，王韜與其三位日本友人各自對琉球地位的界定，以及他們對中、琉、日關係之構築所分別作出的不同思考。

儘管岡千仞與重野成齋在琉球問題上表現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與近代西方的國家主權觀念，但是不得不承認，在明治初年，日本知識人似乎比以王韜為代表的同一時期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更敏銳、更積極地接受近代西方的國家觀念、主權觀念，在琉球問題乃至東亞的國際關係問題的處理上更具有近代性的認知。當中國知識人在對外關係上尚眷戀於儒家經典中的存祀主義理想，試圖維持中國與周邊地域之間的傳統秩序時，一部分日本知識人早已擺脫東亞文人傳統國際觀念的舊套，他們更具有危機意識與國際法觀念，立足於民族主義者的立場，現實地積極地利用國際公法，及時地促使日琉關係進行近代性的改編。

1 參王曉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1992）；張海林著：《王韜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2 參易惠莉著：〈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1860-1870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近代中國》第12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徐興慶著：〈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4期（台北：台灣大學，2006）等。
- 3 重野安繹著：〈扶桑游記序〉，《成齋文二集》（東京：松雲堂書店，1911），頁18。
- 4 中村正直著：〈扶桑遊記序〉，《敬宇文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03）卷7，頁15-16。
- 5 王韜著：《扶桑遊記》5月21日之條，卷上，頁19-21。
- 6 《扶桑遊記》，卷中，頁3-4。
- 7 中村正直著：〈扶桑遊記序〉，頁15。
- 8 中田吉信著：〈岡千仞と王韜〉，《參考書誌研究》13號（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1976），頁9。
- 9 岡千仞著：《藏名山房文初集》（1920年版，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藏）卷4，〈答松林伯鴻書〉文後所附王韜之點評。
- 10 原口虎雄著：〈沖繩志解題〉，《沖繩志》（熊本：青潮社，1982），頁561-563。
- 11 中村正直著：〈琉球漫錄題辭〉，收錄於渡邊重綱著：《琉球漫錄》（東京：弘令社，1879）。
- 12 重野安繹著：〈沖繩志後序〉，《成齋文初集》（東京：富山房，1897），卷2，頁19。
- 13 另一位薩摩藩的史家伊地知季安所著的《南聘紀考》記錄從607年至1832年期間薩摩與琉球的交涉史，意圖從歷史上來證明琉球是薩摩的藩屬，此書也是《沖繩志》中所列的重要引用書目之一。
- 14 《成齋文初集》，卷2，頁20。
- 15 比如姚文棟摘譯日本修史館新纂的有關沖繩歷史地理書籍及文章而編譯成的《琉球小志》，以及王韜的〈琉球向歸日本辨〉等一系列文章。
- 16 岡千仞著：〈沖繩志序〉，《藏名山房文初集》，卷1。
- 17 王韜著：〈琉球朝貢考〉，《弢園文錄外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147。
- 18 王韜著：〈琉球向歸日本辨〉，頁150。
- 19 同上，頁151。
- 20 王韜著：〈駁日人言取琉球有十證〉，《弢園文錄外編》，頁152-155。

- 21 王韜著：〈琉事不足辯〉，《弢園文錄外編》，頁155-158。
- 22 拙論：〈清末中國の興亞会に対する態度とその背景〉，《九大法学》82號，2001。
- 23 田濤著：《國際法輸入與晚清中國》（濟南：濟南出版社，2001），頁181。
- 24 同上，頁256-260。有關晚清知識界的國際法觀，參林學忠著：《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25 王韜著：〈泰西立約不足恃〉，《弢園文錄外編》卷5，頁129。
- 26 王韜著：〈法越交兵紀序〉（1884），《弢園文錄外編》卷11，頁312。
- 27 王韜著：〈與日本岡鹿門〉，李天綱編校《弢園文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300。
- 28 參拙論：〈明治日本的興亞論與漢學：以中村正直為探討中心〉，徐興慶編《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 29 徐興慶著：〈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頁164。
- 30 參陶德民著：《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7）。
- 31 王韜著：〈跋岡鹿門送西吉甫游俄文後〉，《弢園文新編》，頁145。
- 32 《觀光紀游》卷6〈燕京日記卷下〉，頁6-7。
- 33 《觀光紀游》卷4〈滬上日記〉，頁1-2。
- 34 〈論豐臣氏征朝鮮〉，《藏名山房文初集》卷4，頁29。
- 35 《觀光紀游》卷8〈粵南日記卷上〉，頁1。
- 36 〈內地誌略序〉，《敬宇文集》卷5，頁21。
- 37 《成齋文初集》卷1，頁27-28，重野成齋著：〈萬國史記序〉後附之王韜點評。
- 38 岡本監輔著：《窮北日誌》（京都：北門社，1871）所收重野成齋之序。另外，1880年2月5日的《申報》亦轉載了《循環日報》中王韜所著的介紹重野此論的〈論日本未嘗無人〉一文（第四頁）。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從張謇的立憲運動 看晚清中國人的日本觀

❖ 村田雄二郎 ❖

## 一、引言

回顧歷史，義和團事件慘敗後，清朝開始推行「新政」，向日本派遣留學生及視察團等，對日本近代化之關心程度日益高漲。人員之往來、制度之移植亦隨之增加。關係日益密切並非意味着即可增進信任及友誼。人與物之往來愈盛，摩擦與紛爭則愈增，國家之關係反愈不安定，此為古今東西之歷史中司空見慣之事。清朝最後十年，即所謂「新政」時期之日中關係，以往的相關研究大多關注清朝模仿日本明治憲政，進行立憲改革及教育改革，主要認為是中國向日本學習的蜜月時期。與其後兩國關係惡化相比，是以友好、親睦為宗旨的「黃金的十年」。<sup>1</sup>此看法值得商榷。史料表明，在清末最後十年間，日中關係並非一帆風順。尤在日俄戰爭後，日本侵入滿洲，獲得鐵路、礦山等利權，清政府之態度亦漸趨強硬，兩國關係隨之緊張。過去的研究未曾充分注意到日本吞併韓國成為日中關係惡化的重大轉捩點。日韓合併不僅導致韓國殖民地化，且成為震撼東亞國際政治力學一大事件。對中國來說，日本吞併韓國不僅引



發了中國保全領土、捍衛利權之危機感，而且為辛亥革命的爆發埋下伏筆。

隨着日本侵略「滿洲」的意圖日漸明顯，倡導「門戶開放」的美國對日本疑心大增，而調整日俄關係亦成為外交之重要課題。日俄戰爭後重新規劃東亞勢力範圍，需要對國際關係進行調整。中國國內之立憲改革亦會受此影響，甚至可以說，中國之外交與內政是緊密地聯繫起來進行的。在此期間，中日兩國的衝突、矛盾亦隨之激化，中國的反日民族情緒逐漸加強。辛亥革命即發生於中國在這種外交、內政上出現結構性變化之延長線上。因此我認為日本吞併韓國與中國發生辛亥革命並非毫無關係的兩個獨立事件，應視之為一個歷史過程中的不同表現。

本稿以清末立憲運動之中心人物張謇(1853-1926)為中心，試圖通過分析立憲運動之核心人物張謇自身頗具矛盾之日本觀，且將其言論置於當時東亞國際關係之脈絡中，重新探討辛亥革命時期中國人日本觀(包括亞洲主義)之特徵。

## 二、張謇的立憲運動

張謇為清末立憲運動的核心人物。1906年9月朝廷頒佈預備立憲之上諭後，張謇即對此表示歡迎，對立憲的前景充滿期待，親自編譯、發行伊藤博文的《憲法義解》，並計劃出版《日本議會史》等著作，致力於介紹日本憲政，積極投身於立憲運動潮流中。<sup>2</sup>1909年秋隨着各省開辦諮議局，張謇被選為江蘇省諮議局議長，成為全國推進立憲請願運動之領導人。

以前的相關研究指出張謇的立憲改革論深受日本明治憲政之影響。其1903年的訪日令他確信「日本模式」之有効性。<sup>3</sup>張謇以振興教育和實業救國為其終生抱負，而訪問日本的體驗使其加深了對此抱負的確信。但是這並非毫無疑問地認為張謇完全讚賞「日本模

式」，並將其視為中國改革之藍本。關於張謇的日本觀，雖無系統研究，但筆者認為1909年秋，隨着立憲請願運動之正式開始，其對日本之警戒心似是逐漸加強。正是在此時期，日本吞併韓國和控制滿洲之野心日益明朗，中韓國境之劃分(即「間島問題」)及圍繞鐵路利權等，日中之間展開激烈之外交紛爭，反日輿論日益高漲。在此，筆者以1909年冬張謇公開發表的〈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以圖補救意見書〉為題材，考察當時的狀況。<sup>4</sup>

1906年清政府頒佈預備立憲上諭，正式開始進行仿效日本的立憲改革。尤在1909年10月，各省開辦作為地方議會前身之諮議局後，要求早日開設國會、制定憲法的輿論空前高漲，江蘇省被認為是立憲運動的中心地，10月14日諮議局召開會議，在前日巡撫瑞澂與被推舉為諮議局議長的張謇，決定向清朝提出速開國會及設置責任內閣的要求。<sup>5</sup>12月17日，各省諮議局代表會議在上海召開，向北京派遣請願團。張謇承此起草〈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以圖補救意見書〉(以下簡稱〈意見書〉)及〈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書序〉。後者是為諮議局請願連合會(首席代表為孫洪伊)由上海北上壯行而作。

那時要求開設國會的輿論日益高漲，〈意見書〉提出的目的正是為了說服載灃接受此一輿論，而載灃是替代幼小的宣統帝執政的年僅26歲的攝政——醇親王。〈意見書〉開篇寫到：

昌言瓜分中國之說，二年前曾一見於德報。日人之圖統監中國，則於其大隈重信餞別伊藤博文統監朝鮮時昌言之，亦見日報。彼時我國人民稍有愛國思想者，即相與扼腕憤嘆，而聞我政府及政界要人，則以為是持空言而已，未必果有其事。今年則日人佔築安奉鐵路發現後，又有佔及吉長之說。未幾又有傳說東西列強在海牙公會，密議對待中國政策三條，其最後者為統監財政，前二條蓋不忍言。八月中旬錢恂、陸徵祥先後密電外部代奏，各省鄉士大夫及於商埠，皆驚相走告，幾乎無人不知。<sup>6</sup>



### 三、關於〈請速開國會意見書〉的考察

以下值得探討的問題：一，〈意見書〉寫於何時？二，文中所謂「中國統監」傳言之具體內容如何？流傳經過又如何？三，安奉線之吉林、長春的延長所指甚麼？四，錢恂、陸徵祥之密電意指甚麼？何為對中政策三條之具體內容？

〈意見書〉收錄於《張季子九錄》，寫作時期大約為1909年12月末。實際上它是否呈送到攝政王之手，是否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因資料有限，尚不能確認。《張謇日記》中將其寫為「公呈」，由此可知至少應是在立憲派內部得到傳閱。

張謇提到的提倡「瓜分說」的德國報紙，以及將大隈重信比作韓國統監伊藤博文，以示「清國統監」的報道，報告者尚未能確認。當然在中國外交檔案等官方史料中亦未曾發現。長期擔任大隈秘書兼翻譯，並在早稻田大學創建清國留學生會館的青柳篤恒(1877-1951)後來曾回憶道：「伊藤公成為韓國統監之時，支那報紙記載：『不久將做清國統監之人，夫大隈伯乎！』」<sup>7</sup>此為根據當時的傳聞而寫，但尚未能確認此為何時、登於何報之報道。因伊藤於1906年2月渡韓就任統監，因此可認為此報道大約寫於此時，即張謇撰寫〈意見書〉的3年多以前。

大隈將作「清國統監」之傳聞在當時膾炙人口，此亦為後來之史料所證實。1915年5月，因日本對華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而編寫的《亡國鑑》中，有一章是劉彥撰寫的《朝鮮亡國鑑》，作為附錄收錄於〈韓國學生之亡國淚，原為上前清濤貝勒書〉。此為「韓國學生」為反對日本吞併韓國請求清朝援助，呈送給管理軍務的宗室載濤的書簡。其中一節寫道：「生等聞大隈有言曰，伊藤為朝鮮統監，吾當為清國統監。伊藤博士有言曰，對韓問題，今已解決。此後對清國一宜預備軍務，二宜預備財政，三宜預備外交人材，有此三者，何難握牛耳於東亞。」<sup>8</sup>

此「韓國學生」之書簡，現雖查不出其出處來源，但可證實大隈將做「清國統監」之謠言，流傳於併韓以前。但是，關於日本「統監」清朝之「軍務」、「財政」、「外交」三條，與張謇的〈意見書〉有所出入，而張謇所謂「不忍言之」的其他兩條內容則不得而知。

當時的大隈雖為憲政黨總理，但在內閣之外其政治影響力已逐漸減退，他在1907年退出政界。不過他熱衷於講演等言論活動，對清國的政治改革和東亞形勢發表很多言論。日俄戰後大隈的國際政治觀以「大隈原則」(東方門羅主義)著稱，其主旨是反對分割統治中國的「支那保全論」，主張根據趨勢判斷中國政治將走向立憲、共和，列強應促進中國之覺醒，幫助中國進行政治革新。<sup>9</sup>而因地理之近、「同文同種」之誼，可「引導開發支那」並將其「引向文明」國度者，非日本莫屬。「開發支那首先要著手於政治改良，而對其進行引導則為日本的天職」。<sup>10</sup>這些是大隈於1904年10月在早稻田大學清韓協會上講演時所表現出來的對中政策之基本態度。

大隈在此所言「開發」，正是指「滿韓殖民政策」。其在題為〈論滿韓殖民政策〉的其他講演中，高度評價英國的殖民政策，日本在亞洲大陸的位置相當於英國在歐洲大陸之位置。他評論如下：

真正能夠勝任開發清國之國唯有日本。吾國無論從地理上言之，亦或從歷史上言之，均與清國淵源甚深，殊因最具同種同文的親密關係，歐羅巴人需用十年傳授之事，日人只需五年即可。不僅如此，與其受異人種或同人種之壓迫，不如讓同人種扶助，作為人種自然之結果，會有安心感。因而易進行開發，又可獲得利益。因此日人須主動移居清國，扶助引導支那人，共達文明之境，同時開發清國無限之富源，示之於世界。<sup>11</sup>

此為典型之「帝國」式殖民地主義言論。正如此段落之小標題「滿洲開發為最大之急務」所示，對於大隈來說當前「扶助引導」的對象，除「滿洲」之外，別無他處。他表示：「總之，朝鮮為我國殖民範圍，



滿洲亦已成為皇軍連勝之成果，將為帝國領土。南方支那幾十萬里的沃野，如前所述，實需日本扶助。」<sup>12</sup>

在大隈的對外膨脹論中，「支那保全論」示意出一種可能性，即要將滿洲繼而將「支那」變成「第二個朝鮮」。<sup>13</sup>若有朝鮮滅亡之事，則非「日本滅之」，「實為朝鮮自亡矣。而於支那此理亦同。日本對支那雖已做到仁至義盡，然支那之君臣若以猜疑之心，即以野心國之權謀術數加害日本，屆時決不饒恕。無論如何寬仁大度之君主，對此亦不會姑息，棄之不問。有時亦有必要奪其國滅其人。」<sup>14</sup>此種口吻彷彿使其預感到十年後作為日本總理大臣向袁世凱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要求》一樣。而在早稻田大學聽其演講的留學生又會做何感想呢？不難推測大隈將做「清國統監」的傳聞，正是因為聽到此講演或看到此講演記錄的留學生對其產生反感或疑慮，此反感或疑慮繼而膨脹、流傳開來，成為在中國報端引起轟動之一大新聞。

〈意見書〉中所謂安奉鐵路鋪設之事，即指1909年圍繞安奉線之契約問題成為中日間重大外交懸案之事。安奉鐵路是在日俄戰爭時期，日軍鋪設的軍用輕便鐵路。此鐵路線不用說是始自韓國國境安東，在奉天與東清鐵路連接的一條幹線。此線若在鴨綠江鐵橋與京義線(京城、義州)連接起來，韓國的運輸則可達到一體化，對欲實現韓滿聯合之日本來說，此線路在軍事上、經濟上均為不可或缺之運輸動脈。在1905年12月21日締結的《關於滿洲之日清條約》(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中，第六條為「中國政府允將由安東縣至奉天省城所築造之行軍鐵路仍由日本國政府接續經營，改為轉運各國工商貨物」，承認日本可持續經營(期限為15年)。<sup>15</sup>日本為將當初用窄軌建成的安奉鐵路改建成標準軌，未與中方商議，遂欲進行測量、施工。因此經常受到東三省總督的抗議，成為兩國外交懸案。1909年1月開始的談判陷於僵局，但8月6日伊集院駐華公使發出最後通牒，因中方作出讓步，遂於8月19日締結了《關於安奉鐵道改築工事之備忘書》(安奉鐵路節略)，1910年2月25日又締結了鴨綠江鐵橋

架設協定，日本侵入滿洲所不可或缺之輸送設施得到整備。<sup>16</sup>

另外，〈意見書〉中提到的延長至吉林、長春的鐵路屬於與安奉鐵路問題同時暴露出來的吉長鐵路問題。中方計劃單獨建設經營，但日方希望共同鋪設，中方對此表示強烈反對。1905年11月開始的談判，經過反復激烈的爭論，最終雙方讓步，12月達成妥協，1906年4月15日締結協定。<sup>17</sup>其後有關借款的談判繼續進行，終於在1907年8月締結了包括滿鐵出資在內的吉長鐵路借款細目。無論安奉鐵路，抑或吉長鐵路，日本經營滿洲之野心暴露無疑，中國對此甚為警惕，有些地方出現批判政府「軟弱」的意見。特別是在東北三省，正是諮議局開設前夕，此事成為立憲派陣營中提高對利權和國家利益意識的一大新聞。

〈意見書〉中提到的海牙公會是指1907年在荷蘭海牙召開的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保和會)。「海牙密使事件」聞名於日本，其實中國亦非常重視參加此次會議，升任陸徵祥為荷蘭公使，開設公使館，同時與由意大利公使轉任為荷蘭公使的錢恂(陸徵祥被任命為海牙保和會議專使)同被任命為會議代表，派遣了由11人組成的代表團。<sup>18</sup>在會議上決定常設國際司法法院(公斷法院)常駐法官人數時，當得知中國實際上被按三等國對待時，自任為文明大國的國內官紳及外交官受到極大刺激。<sup>19</sup>據說中國特別是通過此次會議認識到，「關於日本全權代表認為中國為非文明國、野蠻國，積極地動員諸國將中國視做低於南美各國的三等國，由此得知日本為取代俄國的一個威脅」。<sup>20</sup>

不過，張謇撰寫〈意見書〉時，海牙公會已經結束。陸徵祥和錢恂在會議結束時表示，所締結的13道條約的批准手續，將要晚於大會規定的1908年6月30日，而著手於條約的翻譯和批准的準備工作。<sup>21</sup>特別是錢恂考慮到中國的國益，認為清政府不應輕率地批准條約。國內外務部接受其意見，答應交換一部分批准檔。錢恂在此期間，多次向國內要求為定於1914年前後召開的第三次會議(因第



一次大戰未能召開)做準備。<sup>22</sup>〈意見書〉中所說的「密摺」，大概與此有關，於1909年8月呈奏。

遺憾的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收藏的外務部檔案(近代名人暨外交經濟檔案數位典藏)〈保和會〉類中，未能發現相當於「密摺」的文件。按張謇的說法，似乎「密摺」已廣為世間所知。《時報》在1909年10月6日也有報道稱：「前駐義國使臣錢恂電奏；下次萬國和平會開會，各國將議定在中國勢力範圍並公同派員監督中國財政。倘若實行，中國萬分危急，宜預籌對付之策等語。此電外務部尚未呈遞。」<sup>23</sup>據此可知〈意見書〉所說的有關「密摺」的情況屬實。另外，陸徵祥於1908年1月1日寫給國內的奏摺為此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其中一段曰：

列強之間，英、俄、日、法協約方新，已成連雞之勢。日本志尤不小，隱以保各國在華利益之警察自居。其外部大臣林董於本年夏秋間公然宣言以韓事為中國之鑑，野心勃勃，流露無形。所依徨有待者，其於獨、美邦交尚未水乳耳。近自美人排斥日人問題起，而日、美之交生莫大之障礙，美有兵部塔虎脫氏東遊日本之舉，又有大舉艦隊遊弋太平洋之事，日本則青木大使奉召歸國，旅美日人之服役兵艦者，時將該艦圖式及艦中布置密為記錄，並聞有謀盜取美兵部密件售於紐約；紐約日領事署，跡彼情形，兩國構兵，亦正難料。<sup>24</sup>

陸徵祥抓住日本外務大臣林董「以韓事為中國之鑑」的威脅言論，毫不掩飾其對日本的警惕，趁日美兩國因移民排斥與開發「滿洲鐵路」問題相互對立之際，建議要牽制日本。實際上陸徵祥和錢恂得知韓國高宗派到海牙的密使被拒絕參加會議，致使目的未達，遂向本國建議只有立憲才能讓「列強起敬」，是「邦基乃鞏」之路。<sup>25</sup>他們目睹了韓國密使受到的挫折，加深認識了整理國內憲政、法制才是使中國脫離「三等國」、與列強並列之捷徑的認識。「密摺」的內容

也不會與陸、錢在海牙萬國和平會議上得到的國際形勢認識相差太遠。雖然張謇〈意見書〉中「對中政策三條」之內容不詳，但正因為是在發生了海牙密使事件、締結了《第三次日韓協約》之後，不論「密摺」真偽，「韓國統監之後即為中國，因而須加緊進行立憲改革」這種焦躁感，成為陸徵祥、錢恂和張謇等國內立憲精英們的共識。對外產生的危機感與內政改革之要求結合起來，形成了清末預備立憲運動的基本構想。

#### 四、日本吞併韓國對中國的衝擊

下面轉換視角，概觀一下中國對日本吞併韓國的看法。首先，是革命派對韓國、朝鮮的認識，如相關研究已經指出的那樣，中國同盟會機關誌《民報》對日本將韓國殖民地化的舉動幾乎未作報道。孫文等在海外活動的革命派人士相對來說對此並不關心。當然，其中不能不考慮到在日本發行的《民報》受到官方監視的問題。不過，也有像宋教仁那樣的民族主義者，關注「間島問題」，對因吞併韓國而產生的領土、國境紛爭表示出強烈的關心。<sup>26</sup>然而另一方面，在1907年章炳麟等結成的亞洲和親會中，有中國人、印度人、越南人、菲律賓人和堺利、山川均、大杉榮等日本的社會主義分子參加，但朝鮮人並未正式參與。據傳是因為朝鮮亡命活動家因章等對朝鮮的偏見憤而退出。章炳麟在同時期宛如要喚起華夷記憶那樣，如下論道：

以民族言，二國〔即為朝鮮與越南〕起居衣食多與禹甸同風。言語雖異，而文字誦讀中其音，異於日本之隔閡者。血統則朝鮮稍雜，而越南皆吾冠帶之民，間有蠻人時相錯雜，則與瓊、雷一例。是二國者，非獨力徵經營，光復舊土為吾儕當盡之職，觀其受制異國，舉止掣曳，扶衰禁暴，非人道所宜然乎。〔中略〕故以中華民國之經界言之，越南、朝鮮二郡必當恢復者也。



緬甸一司則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sup>27</sup>

圍繞朝鮮半島的勢力角逐及日本吞併韓國的行動，革命派表現「遲鈍」，與此相比，以梁啟超為中心的保皇派卻對19世紀以來圍繞朝鮮半島中日兩國的爭執表示出強烈的關心，並且積極發表言論。他們特別關注甲午戰爭後日本勢力的增長動向，在機關雜誌上刊登了許多評論和報道，例如《新民叢報》在日露戰爭開戰後不久連載《朝鮮亡國史略》。<sup>28</sup>其中梁啟超詳述了甲午戰爭以來圍繞朝鮮半島的國際關係，推測朝鮮將越來越是「日本之朝鮮」。

有趣的是該文章在介紹了1905年8月締結第一次日韓協約後，做了如下陳述：

國家行政機關最要者三事：曰財政權，曰軍事權，曰外交權。三者亡則非其國也。今改革案之第一著，即以設財政監督為綱領，厥後雖改稱顧問，猶朝四暮三之長技也。

吾儕驟睹其外交顧問之條約，見所聘者為一美國人。吾滋惑焉，謂日人乃肯割其權利之一部分讓諸他國，咄咄怪事也。徐乃知田尼遜者其人者，在華盛頓之日本公使館數十年，美人其名，而日人其實也。〔中略〕抑此外交顧問者，不過在漢城耳。自今以往，朝鮮外交之主動，不復在漢城，而在東京之霞關也。

今者日本限制朝鮮之兵，由二萬而減至一千，使朝鮮永無死灰復燃之望也。雖然，即使韓人有兵二萬，其亦何能為。日本於此，未免過慮也。〔中略〕朝鮮今後之軍政權，有如此者。三權既去，然則朝鮮政府所餘者能幾乎。吾以為舍伴食外，真無有也。<sup>29</sup>

梁啟超認為外交權、軍事權被日本剝奪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從時期上來說，這與張謇〈意見書〉中提到大隈將做「清國統監」的傳聞接近。另外，雖然在順序上不同，但在《亡國鑑》中引用的「韓國學

生」書簡上所說的「軍務」、「財政」、「外交」之「統監」再次出現。無論傳聞出自何處，梁啟超等保皇派把日本將韓國納入保護國之行動與本國的命運聯繫起來看待，亦非不可思議之事。

關於1910年日本吞併韓國，梁啟超在前一年剛創刊的《國風報》上亦積極進行介紹和評論。〈日本合併朝鮮始末記〉(署名為「長輿」，第1年第22號，1910年9月14日)，近似於前述《朝鮮亡國史略》的翻版，滄江(梁啟超)《日本併吞朝鮮記》(第1年第22、23號，1910年9月14日、24日)從古代以來的朝鮮歷史講起，論至近代的「中日爭韓」，客觀地敘述了圍繞朝鮮半島日中、日俄之角逐及導致韓國被吞併的經過。結尾處以「外史氏曰」作如下按語：「夫其於朝鮮，則既已奏凱而歸矣。而彼之挾此優勝之技以心營目注者，豈一朝鮮而已。是故吾睹朝鮮之亡，乃不寒而慄也。」<sup>30</sup>

由此可知，作為前車之鑑，梁啟超等帶着強烈的危機意識對日本吞併韓國的問題進行了觀察。同樣在《國風報》上刊載的滄江〈朝鮮滅亡之原因〉(第1年第22號，1910年9月14日)論道：「朝鮮滅亡最大原因，實惟宮廷。」亦即，與在立憲國家君主在政治上不負責任相比，專制國家之命運完全依靠宮廷，因此君主一人一家之事，全國億兆之人皆蒙「痛毒」。無論是君主專制，還是黨派「營私利」，亦或社會之「陰險無恥」，對於梁啟超等人來說「朝鮮則其最近殷鑑之顯著者也」。顯然是與中國預備立憲運動之趨勢結合起來探討吞併韓國的問題。「亡朝鮮者，朝鮮也，非日本矣。」可以說此種論斷正是他們以對國內改革之期待與焦躁交織在一起的心情看待韓國滅亡問題時，表達出來的自戒與自省之言。

張謇在〈意見書〉中反映亡國的危機意識，亦與此相差不多。張謇與梁啟超相比，有過與朝鮮直接接觸的經驗。1882年發生壬午事變時，張謇隨從吳長慶之軍隊，兩次來到朝鮮，此為與朝鮮接觸之始。當時他曾留下〈壬午東征事略〉及〈朝鮮善後六策〉等著述，建議清朝直接統治朝鮮，但因原文未曾得到保留，其詳細之朝鮮觀不得



而知。此時期張謇居住於朝鮮，通過金允植，與金澤榮(1850-1927)相識。金澤榮為1891年進士，歷任編輯局文獻備注編輯等職。1905年，因日本在漢城設立憲兵司令部，憤然離韓赴滬。幾乎是孑然一身亡命上海的金澤榮倚靠的是張謇，之後再未回過韓國，在南通終其一生。他來到中國後，一邊在通州(南通)張謇設立的翰墨林印書局從事著述、編集、校訂的工作，一邊與俞樾、嚴復、鄭孝胥等中國士大夫等交往。<sup>31</sup>據說張謇對其非常同情，不惜金錢上的援助，與其兄張謇一同熱情接待他。因受資料制約，不知金、張二人進行了哪些交談，如何認識韓國滅亡問題。但不難想像通過與金澤榮的交談或用詩文交流，加深了張謇在〈意見書〉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日本之負面印象和對立憲運動之迫切感。

## 五、結語

日本併吞韓國之際，中國報章對日一貫保持嚴厲論調，例如上海《神州日報》作出如下論評：

夫日本之欲吞併滿洲也，必先滅韓國。韓國者，由日本過渡於滿洲之橋梁也。非得此橋梁，不能過岸，非先滅韓，不能吞滿。故雖謂日本併韓為亡滿之手續，亦無不可。比來道路傳聞，日本合併韓國後，先使韓皇來朝於日本。然後，日皇遷都於韓國或建行宮而每年一巡。此風說果見諸事實，則匪特遷都於朝鮮，且將遷都於滿洲，得隴望蜀，得寸進尺，由滿洲長驅中原內地，吾恐黃河以北不能高枕而臥矣。且東報曾數數言，日本帝國必為大陸國，太〔大〕和民族必為大陸民族。今日日本既已併韓國為侵滿之前驅，封豕長蛇，其禍已兆。〔中略〕今朝鮮固不自哀而中國哀之。中國哀之而不鑑之，必使他國從而復哀中國也。<sup>32</sup>

如序言中所述，日中關係惡化之重要轉機為日俄戰爭。戰爭的結果，導致日本加緊吞併韓國，入侵「滿洲」，從而使東亞之力量均衡發生了變化。不僅如此，包括保皇派和立憲派在內，有志於改革的中國官僚和士人之間，均對日本的勢力擴張產生強烈警戒感。

日俄戰後不久，日本根據樸次茅斯條約，通過外交途徑要求清廷承認日本繼承俄國在東三省的利權。因此於1905年11月17日至12月22日，在北京召開了中日會議。日方以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和駐華公使內田康哉為全權代表，中方指名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和直隸總督袁世凱為全權代表，雙方就撤兵時期及鐵道鋪設等問題進行深入細緻的談判，會議多達22次。其結果是締結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及附約》，至此日本在「滿洲」之權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擴張。而在此條約締結前日的12月21日，日本決定在韓國設置統監府，1906年2月1日舉行了新設機關辦公室開始儀式，3月3日伊藤博文赴韓擔任初代統監。張謇在〈意見書〉中所謂在中國廣為謠傳的「清國統監」之事，即使毫無根據，但在此時期日本將韓國淪為殖民地的活動和圍繞「滿洲」權益日中之間展開緊張的外交談判同時進行，將兩者結合起來考慮，也就不難理解了。即「韓國之後即為滿洲」這種國家危機意識導致出現了大隈將作「清國統監」的傳聞。

實際上，日俄戰爭後，日中之間進行商議的外交案件不僅只有吉長鐵路、安奉鐵路的問題。此外還有圍繞「間島」的歸屬，出現了領土、國境如何劃分的問題。還有將東清鐵路利權的案件總括為「東三省交涉五案條款」。<sup>33</sup> 這些問題正是發生於張謇提出〈意見書〉的時期，為此中日之間反復進行了緊張的談判。這些均為關係到國益及領土的事件，因此在傾向於立憲派的《東方雜誌》或報紙上對交涉經過逐一進行了報道，特別是將東北地區官民對此感到憤怒與屈辱的感情，在諮議局聯合會等立憲請願運動中表達出來，且進一步擴大。

將清末的立憲運動只單純地視做中國的內政問題是不夠的。同樣，將它視為吸收、移入近代制度和思想的過程也是不足的。清



朝最後之十年，是內政與外交從未有過的緊密結合、互動推行的時代。無論是對日民族意識，抑或是發展議會政治及建設文明國家，可以說此後民國期政治運動的基本形勢幾乎出自於此時期。今後需要從超越一國史的視角，即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大勢中，將日俄戰爭、日韓合邦及辛亥革命放在一個政治過程中聯繫起來加以分析才可觀其整體像。

(張玉萍譯)

- 1 此派代表作為 Douglas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 2 藤岡喜久男著：《張謇と辛亥革命》(札幌：北海道大學國書刊行會，1885)。
- 3 川尻文彦著：〈張謇の「國際秩序」觀——朝鮮經驗と日本經驗の間〉，吉田忠編：《19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國際秩序觀の比較研究》(京都：國際高等研究所，2010年6月)，頁127-143；吳偉明著：〈張謇の社会事業と日本〉，陶德民編：《近代東アジアの經濟倫理とその実践》(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8)，頁131-145。
- 4 張謇著：〈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以圖補救意見書〉，以《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為底本，適當參照曹從坡等編：《張謇全集·第一卷·政治》(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 5 章開沅著：《張謇傳》(北京：中華工商聯合會出版社，2000)，頁196-197。侯宜杰著：《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立憲運動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208-209。
- 6 《張謇全集·第一卷·政治》，頁134。
- 7 細野浩二著：〈「支那保全」論と中国の「朝鮮」化〉，《史觀》第101冊(東京：早稻田大學史學會，1980年3月)，頁69。原載於青柳篤恒著：〈老侯と支那〉，《大觀》第5卷第2号，1922年2月，頁141。
- 8 殷汝驪編：《亡國鑑：附國恥錄》(上海：泰東圖書局，1915)。現根據沈

- 雲龍編：《中国近代史史料叢刊》第3編36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所收之影印本，頁29。
- 9 《大隈侯八十五年史》第2卷(東京：原書房，1970)(原刊1926年)，頁346-350，436。
  - 10 大隈重信著：〈東亞の平和を論ず〉，早稻田大學編輯部編：《大隈伯演說集》(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7)，頁110-113。
  - 11 大隈重信著：〈滿韓殖民政策を論ず〉，收錄於岩崎徂堂編：《大隈伯演說座談》(東京：大學館，1909)，頁244。引文對原文中的部分標點符號進行了修改。
  - 12 同上，頁250-251。
  - 13 〈「支那保全」論と中国の「朝鮮」化〉，頁75。
  - 14 大隈重信著：〈東亞の平和を論ず〉，前掲《大隈伯演說集》，頁114。
  - 15 外務省編：《小村外交史》(東京：原書房，1966)(初刊1953年)，頁705。中文之條約文收錄於王芸生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初版1932-1934年)，第4卷，頁222-224。安奉鐵路與吉長鐵路問題屬另外發生之問題，張謇的〈意見書〉誤將其作為談判內容之一加以論述。
  - 16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4卷，頁171-181。
  - 17 馬場明著：《日露戰爭後の滿洲問題》(東京：原書房，2003)，頁54-62。
  - 18 川島真著：《近代中国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頁229。唐啟華著：〈清末民初中國對「海牙保和會」之參與〉，《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3期，2005年5月，頁60。
  - 19 同上，頁230。
  - 20 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7)，頁91。
  - 21 〈清末民初中國對「海牙保和會」之參與〉，頁63。
  - 22 同上，頁72。
  - 23 《時報》，宣統元年8月23日(1909年10月6日)。
  - 24 〈保和會專使大臣陸徵祥奏摺(1908年1月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陸徵祥出席海牙保和奏摺兩件》，《民國檔案》2000年第2期，頁37-42。
  - 25 〈清末民初中國對「海牙保和會」之參與〉，頁66-67。



- 26 宋教仁著：〈間島問題〉，陳旭麓編：《宋教仁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
- 27 章炳麟著：〈中華民國解〉，《民報》第15號，1907年7月5日，頁7-8。
- 28 《新民叢報》第53、54號（1904年9月24日、10月9日）。筆名為「中國之新民」，後收錄於《飲冰室專集之十七》。
- 29 梁啟超著：〈朝鮮亡國史略〉，《飲冰室專集之十七》，頁13-14。
- 30 《國風報》第1年第23號，頁43。
- 31 崔惠珠著：〈韓末における金沢榮の中國亡命と朝鮮認識〉，《朝鮮學報》第142號（東京：朝鮮史學會，1992年1月），頁59-107；莊安正著：〈金澤榮與近代南通文人群體交往考評〉，《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4期，2005年12月；周昶、倪怡中著：〈張謇和金澤榮的交往〉，《臨滄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8卷第2期，2009年6月；鄒振環著：〈張謇と翰墨林印書局の翻譯・出版事業〉，陶德民編：《近代東アジアの經濟倫理とその実践》，頁251-272。
- 32 〈論日本併韓與中國所獨受之關係（續）〉，《神州日報》1910年8月30日，頁1。關於中國對吞併韓國的認識，參照今村與志雄著：〈日韓併合と中国の日本觀〉《思想》第537號（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3月），頁92-109。
- 33 即為新法鐵路、大石橋支路、撫順煙台煤礦、安奉鐵路沿線礦務、京奉鐵路展至奉天城根的五案。

# 大正日本的對華融資： 上海申新紡織貸款與橫濱正金銀行

❖ 遲王明珠 ❖

## 一、序

明治日本為了改革國內金融體系及促進殖產興業，建立特殊銀行制度。根據各自法例特定目的下經營的特殊銀行，在政府的法例保護與資金的實質支持下急速成長。進入大正時期，日本積極展開對華融資，以橫濱正金銀行(下略正金銀行)為首的特殊銀行團，在國家資本的主導下，進行一般被稱為帝國主義式的資本輸出，但是由於這些銀行的組織是以民間資本為主，帶着追求最大營利的本質，在政府命令下被陸續捲進對華貸款活動後，從自身利益的立場，相繼對政府的國策說「不」，使對華融資的路線不斷變更，最後發展出一個整體的融資平台，配備應對貸款的機制。

1922年上海申新紡織(下略申新)能夠從正金銀行取得350萬日圓的貸款全賴這融資平台。<sup>1</sup>一個向來依賴血緣地域關係來募集資金的中國工廠，將融資基盤延伸到海外，在得益於跨國融資的現代性的同時，也需要面對伴隨而來的另類現代性的威脅，即被外國企業購的風險。因為融資機制的背後，是日本紡織企業對外在尋覓收購



機會。政府打造的融資平台，原意是對中國進行政治目的的貸款活動，對象主要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及大規模的工礦基建，後來日本民間企業亦通過關係網絡，利用現成的融資機制，參與對華資本的輸出。本文嘗試從1922年對上海申新紡織貸款個案中，以橫濱正金銀行為中心，拆解日本對華融資平台的構造與形成過程，從而透視國家資本的主導性及國家與公司間的關係。

## 二、大正時期對華融資的本質

根據列寧的分析，銀行從基本支付的中間人功能進化到強大的資本獨佔者時，便是資本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式帝國主義的基本過程。歐洲進入二十世紀，非常富裕的先進資本國，經由民間獨佔累積到巨大的剩餘資本，向外輸出，是為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典型。<sup>2</sup>大石嘉一郎卻認為此說不適用於後進資本主義國的日本，因為在還未達到這個成熟期之前，日本已經輸出資本，更遑論有多巨大的民間過剩資本，讓銀行可以集中獨佔。在日俄戰爭後，國家財政與財閥銀行聯合起來，加速對中國的資本輸出。<sup>3</sup>

高村直助從資本主義的角度去研究日本紡織產業史時，指出在二十世紀初紡織資本的獨佔形成，並非由工業資本累積而來，而是依國家的支持。在積極利用之下，相應地向中國進行帝國主義式經濟行動，在中國長江中流域的棉紗市場形成獨佔。<sup>4</sup>池上和夫分析對中國貸款的資金來源，以大藏省預金部佔相當比率來說明有很強的國家主導性。<sup>5</sup>可見對華輸出資本上的國家主導性看法幾乎是共識。1986年幾位學者提出新論點，認為以前的研究忽視各投資主體自身的利害關係和其錯綜複雜的影響，主張在日本的資本輸出上，民間關係的意義大於國家主導性。<sup>6</sup>其後坂本雅子更進一步提出推動對外帝國主義經濟活動的主體其實是財閥集團，並舉出明治期開始，三井物產會社和大倉組等財閥推動政府對華貸款，換取對中國資源和

市場的控制權，達致長期利益。財閥從本身的利益立場考慮，利用了國家。<sup>7</sup>

日本在日俄戰爭後對華貸款的資金來源大部分是依國家財政和引進外國資本，通過特殊銀行來實行。相對於普通銀行而言，特殊銀行是以個別法例去確定其特殊業務目的，包括作為管理殖民地金融而分別在1899和1911年成立的台灣銀行和朝鮮銀行，1902年以引進外國資本去興辦國內產業而成立的日本興業銀行等。為改革國內金融和收回貿易商權，明治政府採取的其中一個方案便是在1880年創立橫濱正金銀行，是日本實質上第一間「特殊銀行」，並於1887年7月7日進一步度身訂做《橫濱正金銀行條例》，明確地將對外匯兌業務劃入正金銀行的營業範圍，並管理在外國的公債和官方資金等事務。作為明治政府對外的御用外匯銀行，正金銀行佔全國對外貿易總額四成以上的外匯兌換。<sup>8</sup>為改變外國銀行壟斷貿易金融的局面，在強力的政府保護與支持下，正金銀行的本質其實是由民間發起，有三份之二民間資本的商業公司。

前人研究顯示正金銀行在不同歷史階段扮演不同角色，明治前期用作對抗外國銀行，甲午戰爭後作為政府的官方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商社對外擴展的主力銀行，隨後是對中國輸出資本的前鋒等。<sup>9</sup>一般由於研究焦點的角度問題，都是傾向將正金銀行作為政府政策的執行者和聽從者來看待，並未能以獨立的角度來審視正金銀行與政府間的關係，比較少看到像石井寬治強調正金銀行的兩面性，在處於國家利益的公共性及為公司股東利益的營利性之間，產生兩難的矛盾。<sup>10</sup>

本文因得益於近年才公開的《正金銀行檔案》，期望對問題的分析帶來新啓示。<sup>11</sup>以下將承接前人的研究成果，再引證兩點：第一，因為融資結構為政治目的而設計，所以日本對中國借款是以國家主導性為主，但在1920年代民間企業開始懂得利用關係網絡，參與資本輸出；第二，通過拆解日本對中國貸款的融資機制，從其形



成過程展示出特殊銀行在國策面前，以公司利益為首要考慮。

跨國的日本融資在當時主要貸與中國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重要工礦鐵路業，對於民間工商企業還是比較少見。申新的貸款能夠達成，是由於當時日本政府已打造了一個對外的融資平台。日本方面應對這筆貸款的團隊包括與申新最初進行接觸的正金銀行、貸出款項的十七行銀行團、負責統籌聯絡的銀行團代表株式會社日本興業銀行與及簽署貸款契約的東亞興業株式會社(下略東亞興業)。這些都是明治時代因應國策，通過正式立法和其他勸諭鼓勵等方式誕生出來的公司。在這個平台上，各個環節都不是偶然的產物，使得申新這筆貸款必須經過重重架構才能達成。

### 三、上海申新紡織的跨國融資網絡

申新是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的家族企業，榮氏是民初的麵粉大王和棉紗大王，在無錫、上海、濟南和漢口建立其工廠王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集團內的福新麵粉、茂新麵粉和申新紡織總共擁有十二間麵粉廠和四間紗廠。在營運上，榮氏兼採中國式網絡關係及西方式階層管理，它既在集資和人事上依仗家鄉無錫的網絡，也同時堅持在公司的階層結構最高處由個人集權掌控。<sup>12</sup>1916年以無限公司形式成立的申新，用大股東身份進行封閉式的集權管理，不需要像有限責任股份公司般會受到股東大會等權力的牽制。然而因為股份過度集中令公司的資本基礎變得狹窄，在擴張發展時，便容易出現資金短缺問題。集團不斷藉着向本土銀行與錢莊借款來收購擴張，結果造成商業生涯中多次在順逆境之間反覆來回。1920年代初期，因大戰期間過度擴張，在固定資產上投放資金過多，戰後市場急速萎縮，使申新的流動負債額達到流動資金的兩倍半之多。<sup>13</sup>加上1921年冬上海交易所倒閉風潮引致銀行收縮信用，面對中國銀行的105萬兩及各錢莊的100萬兩快將到期的債務，榮氏企業陷入財政

危機。不過，榮氏始終貫徹其集權的方針，沒有尋求資本市場的援助，賣掉部分股份以換取資金，而是轉向新的貸款渠道，向日本方面尋求幫助，走出與正金銀行現代性相遇的第一步。

申新直接找正金銀行借款有可能是通過宋漢章的關係。首先在1921年底，面對債務困境，當時在無錫的榮德生，亦趕赴上海與榮宗敬共商對策。不久，申新派出了其中一名小股東亦是福新麵粉廠的經理王堯臣向正金銀行上海分行(下略上海正金)提出貸款500萬日圓。<sup>14</sup>榮氏為人十分熟悉如何建構和利用網絡關係，不單廣結有利公司融資的關係，還通過結緣姻親來鎖住管理與技術的人材。<sup>15</sup>榮德生與宋漢章交情不錯，後來更聯成姻親，三女敏仁嫁給宋漢章的次子宋美揚，宋漢章不單是當時上海銀行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而且與正金銀行的兒玉謙次有交往。<sup>16</sup>在1916年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拒絕執行北洋政府停兌令的事件中，宋漢章曾找時任上海正金支店長的兒玉商議，結果對策是向袁世凱偽稱上海中行的全部資產都已抵押予上海正金作為貸款擔保，不能隨意動用，借助日本人勢力來應對北洋政府對銀行金庫染指的意圖。擔保之事雖然虛假，但却完成正式的抵押手續，由駐上海日本總領事辦理登記，兒玉對於宋漢章的膽識與為人品格十分傾倒，二人因此建立互信關係。<sup>17</sup>

兒玉在1911至1919年一段長時間擔任上海正金支店長，在1921年底榮氏集團財務困詰之時，榮宗敬托人到處尋覓押款。是時兒玉已經調回總行任董事，並專管「東洋課」，負責中國的營業事務。申新這次貸款的過程中，上海正金與總部的電報往來所請示的就是兒玉本人。以榮氏如此善用關係的人，在當時公司財政告急之際，似乎不太可能會漏掉這些線索。究竟申新與正金銀行之間是否通過宋伸展出的關係，這點還沒有找到進一步的證明，但是申新成功貸款一事，確曾受惠於兒玉。榮宗敬更在1924年8月13日寫了一封謙恭的信，給當時剛升任正金銀行總行長的兒玉，對貸款中「多蒙先生竭力幫忙，銘感謝謝」。按信中內容所示，榮氏與兒玉是素未謀面之



交。<sup>18</sup>這封信的目的還不止於此，是時正好是快要到約定還款期，而且已經是一度延長過的新還款期，但榮氏仍需要將其中80萬日圓再度延期，否則用來擔保的三個紗廠和連帶擔保的福新麵粉公司整體會被用來抵債。就是這個時候榮氏寫的這封信給兒玉，後來申新貸款順利地再度延期兩次之多，沒有遭到契約規定以擔保資產抵債之命運。可見榮氏的手段和網絡關係，其融資基盤亦從家鄉無錫到經營基地的上海，再伸展出國境之外。<sup>19</sup>

#### 四、橫濱正金的對外營業員角色

申新最先接觸的是上海正金，提出以上海的第一、第二和漢口的第四紗廠作為抵押，希望在農曆年關前貸款500萬日圓。<sup>20</sup>正金銀行的角色只是對外前台的營業人員，並沒有一手包辦，因為在對華貸款問題上，政府悉心培養出來的正金銀行曾對政府說「不」。

正金銀行自1893年在中國開設上海辦事處(後升格為支店)以來，北京、天津等地陸續設立分支，與中國官方和地方關係保持接觸。1905年政府下令以低息資金支持在「滿州」的日本商人。正金銀行開始向中國輸出資金，貸款金額亦漸增大，在1906當年就一次過承接了三筆總額超過300萬兩的貸款。<sup>21</sup>這些都是積壓資金和高風險的長期貸款，與向來經營的出口短期借貸業務不同，何況正金銀行在外的分支機構能掌握到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深感中日經濟關係將會越趨複雜，未來難以預計。1906年11月15日召開董事會一致決議以後按原來的銀行放款方針辦事，專門經營與外匯有關係的普通客戶的短期融資，並決定今後對中國長期貸款的要求採取「斷然謝絕」的方針。<sup>22</sup>

這個投資方針從商業立場考慮，是無可厚非之舉，但是却明顯與政府的國策大唱對台。時為日俄戰爭後，日本消除了對俄國的顧忌，開始積極利用貸款交換對華資源與市場控制權的配套政策，當

然期待一手扶持起來的正金銀行作出配合行動。可是，正金銀行却對政府說「不」，將燙手的山芋推出門外，之後遭到在國外的日本商人和國內朝野的輿論非難，甚至有提倡不如另外設立一間新的滿州銀行去應對。不過，正金銀行與政府間的關係並沒有進一步惡化，因為不需多久，兩者之間的關係又開始找到新的平衡點。由於正金銀行在中國分支機構發展快速，收到不少存款，開始感到只存不貸的營利壓力，正金銀行在1906年在中國的存款總額已超過1,262萬兩，還在不斷增加。<sup>23</sup> 只要消解對壞帳的顧慮，政府便可繼續利用正金銀行現成的駐中國分支系統，經常保持與清政府有關方面的經濟聯絡，所以政府同意正金銀行提出的條件，在銀行資金充裕之時，先採用行內的資金應對貸款，到資金緊迫之時，政府便作出實質的支援。萬一中國方面出現了償還困難，政府便需要在解決方法上作出「充分的指導」，對貸款風險作出保證。

政府的支持消解了正金銀行的不安，總行長在1907年8月9日對中國各支店發出訓令，當有清朝官府或其他關係來的貸款申請時，將條件內容轉向總行長申請，得到政府的指示後決定是否批准。<sup>24</sup> 接着更派出董事巡視上海等地支店，並帶去行長的新訓示規條，強調正金銀行在鑽營利益的同時，不要忘記對國家的義務，注意要以大局為重，甚至有時需要作出多少犧牲。<sup>25</sup>

訓令展示出積極配合政府的態度，同年9月對湖北官錢局200萬兩銀的7年期貸款和12月盛宣懷30萬日圓的5年期貸款，及至後來轉到正金銀行負責的著名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貸款時，資金來源完全是出自政府的預金部，即是主要為日本普羅大眾的郵政存款。正金銀行只是中介身份，將政府貸款轉貸出去，所有本息都是收到後再上交政府，本身不承擔風險，只賺取中間1%的息差。<sup>26</sup> 事實上，正金銀行本身對漢冶萍貸款的評價非常低，在1912年8月6日上交政府的意見書上，直言「現況破產可預見，會帶來莫大損失」。<sup>27</sup> 加上貸款內容相當複雜，有提供鐵礦石來對沖利息，有轉移部分金額



給中國革命軍購買日本武器等，種種情況都會令正金銀行在營商角度下，寧願安穩地收取手續費式的利息差額。到1922年遇上申新貸款時，正金銀行的主要角色是營業員，負責前台的應對與商談以及支付貸款金額，在此以外的工作，則是由另一間特殊銀行負責。

## 五、日本興業的內部統籌聯絡員角色

日本興業銀行(下略興業銀行)在申新貸款中，負責聯絡國內出資的十七行銀行團達成協議，並管理及定時檢查申新的抵押品，向銀行團成員報告等，是整個貸款鏈的聯絡中心。興業銀行本身沒有出面承擔整筆貸款，而且一如正金銀行般，在對華貸款問題上都曾對政府說「不」。

興業銀行根據1900年3月公布的《日本興業銀行法》籌辦，並在兩年後開業，其設立原意是引進外國資本以興辦國內產業，通過在國內外發行興業債券來集資。政府在1905年3月9日修正法例，放鬆原來的規限，只要部門大臣許可，便從「不可經營法例規定範圍以外的業務」變為可以「在外國經營銀行業務及其附帶業務」。<sup>28</sup>發行債券的融資對象也擴寬到「在外國之公益事業」，即是包括了日本政府、外國政府或在外居民的設施事業、交通事業和認可的拓殖事業。而融資的擔保抵押品亦不再限於債券股票類，改為十分廣義的財團擔保，也就是說可以以工廠、鐵路、礦山等來抵押，讓興業銀行發行債券融資。<sup>29</sup>這些修正條文賦予內閣對內容演繹時的彈性，使興業銀行的融資業務從規限於日本國內一變成為可以同時對國外發展，尤其是指向中國。

法例上的障礙清除後，興業銀行在政府暗令之下，於1913-1915年間已貸出850萬日圓，集資的債券除了台灣銀行在第一筆時承接了50萬日圓以外，其餘全部都是興業銀行獨力承包。<sup>30</sup>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次逆轉為貿易出超國，累積大量儲備。在積極準備

對華貸款之時，政府有感以往過於依 正金銀行，所以在1916年命台灣銀行和朝鮮銀行加入。興業銀行面對漸次增大的負擔，與政府開始討價還價，1917年政府同意以後凡是政治貸款，由正金銀行負責，經濟貸款則由三行銀行團承接。可是不久便發現「經濟貸款」的性質複雜，跟着來的指令包括與中方籌辦中華匯業銀行的資金500萬圓，「西原貸款」合共14,500萬日圓，前者興業銀行總裁志立鐵次郎借詞推卻不果，種下了他日後辭職之原因；後者日本政府為免刺激列強和考慮到與南方孫中山派系間之關係，決定交由具「民間色彩」的銀行出面處理。<sup>31</sup> 因此這個燙手山芋便落在興業銀行為首的三行銀行團手上。

對於被逼承接連串名為「經濟貸款」的政治貸款，興業銀行總裁志立對政府說「不」，選擇在1918年2月中華匯業銀行成立之時辭職。同年7月新的國策下，中國國營製鐵廠計劃需要貸款一億日圓，這次三行銀行團同時說「不」，想學正金銀行一樣，在政府出資下，作為名義上之貸款銀行，大藏大臣回以強硬態度，招來了興業銀行再次獨自對政府說「不」。最後迫使政府讓步，只需三行承接一成的金額，其餘九成的資金與本息上的風險全歸政府負責。<sup>32</sup>

在正金銀行與興業銀行相繼說「不」後，在微妙的分界線下，分別處理中國的「政治貸款」與「經濟貸款」，雖然後者並不見得就如大藏省所言，是為了銀行營利動機的貸款。在貸款額越來越大之下，政府又推動了一些主力的普通銀行在1918年4月組成海外投資銀行團，自此，對外以正金銀行為代表，內部則由興業銀行為統籌聯絡，背後配備龐大的銀行團作為支援。

## 六、十七行銀行團提供民間資本的角色

1918年2月在政府推動下組成的海外投資銀行團共有18個成員，分別是橫濱正金銀行、株式會社日本興業銀行、株式會社台灣



銀行、朝鮮銀行、株式會社第一銀行、株式會社第三銀行、株式會社十五銀行、株式會社三十四銀行、株式會社第百銀行、株式會社三井銀行、株式會社三菱銀行、株式會社安田銀行、株式會社住友銀行、株式會社鴻池銀行、株式會社山口銀行、株式會社加島銀行、株式會社近江銀行共17間及後來在1920年合併入十五銀行的浪速銀行，組成時的18間後來變成了17間。首四間是「特殊銀行」，後面13間是「普通銀行」，在申新貸款中，平均分擔金額。<sup>33</sup> 海外投資銀行團陸續為政府解決貸款的募資難題，盡量利用各自籌募的資金，吸收興業債券，使政府動用國家財政和預金部的壓力減輕，可以逐漸抽離投入的資金，也使興業銀行對華貸款的承擔比率由一開始的幾乎百分之百降至總額的三分之一。<sup>34</sup> 日本民間資本直接參與對華的資本輸出正式開始。

在特殊銀行說「不」之後，這些貸款機會及伴隨着的風險現在輾轉分攤到普通銀行的手上，在遇到申新貸款時，銀行團當然也希望減低風險，所以當時並不是直接與申新簽署貸款契約，而是通過東亞興業，將風險轉嫁出去。

## 七、東亞興業的簽約代理角色

1922年2月18日申新作為借款方簽署契約，上面的貸款方是日本的東亞興業株式會社。在融資架構上的角色是簽約代理人。東亞興業是作為日本對華投資的唯一機構而創立的。<sup>35</sup> 其前身是1907年大藏大臣建議下成立的日清起業調查會，以對清國的經濟事業進行調查為目標。兩年後便以原班人馬為骨幹發起成立東亞興業，創立發起人是跨行業的組合，而且都是針對現代化中重要的交通、資源和財政業界的專門人才。東亞興業表面上為對華投資的民間公司，但業務內容與方針，都與國策息息相關。其貸款對象包括江西南潯鐵路公司、武昌電燈、財政部銅元局、溥益製糖公司、有線電信及

京綏鐵路等。<sup>36</sup>它更在中國投資地產，藉着物業所有權擴大日本在當地的政治影響力。業務所需的龐大資金遠遠超過創立時的100萬日圓資本金，缺口由日本政府填補上去，包括動用全國郵政存款的政府預金部、國庫、銀行團和發行公司債券等。

在一般企業最頭痛的資金問題上，東亞興業得天獨厚，對中國的貸款以槓桿式「投資」，資本金與投資總額之比是1916年的100萬對900萬日圓，1917年的300萬對1,500萬。<sup>37</sup>1923年上半期註冊資本是2,000萬時，投資額已超過5,870萬，令到當時實收資本只是1,150萬的東亞興業自身負債超過4,327萬日圓。<sup>38</sup>其經營模式主要是代理人的中介業務，周旋於日本政府、財閥與中國官民之間，收取手續費和利息差額。

表 1：申新的貸款契約條件<sup>39</sup>

簽署日期	1922年2月18日	1922年3月16日	1922年4月1日
內容	借款契約	協議書	借款契約
簽署者	借方：申新紡織 無限公司 貸方：東亞興業 株式會社	銀行團17成員簽 署	借方：東亞興業株 式會社 貸方：銀行團代表 株式會社日本興業 銀行
貸款日圓金額	3,500,000	興業204,000 餘各行206,000	3,500,000
年息	11.5%	10%	10%
扣除手續費	貸方扣除 借款額之1%	貸方扣除 借款額之0.5%	貸方扣除 借款額之0.5%

東亞興業作為簽約代理人，需要連帶擔保，對履行債務負上全責。雖然申新用了三間紗廠作抵押，但是擔保的實質意義在於萬一



不能回收本息之時，是否確實會有買家承購，變回現金償還銀行，最理想當然是能確保有買家，所以東亞興業雖然是貸款契約的簽署代理人，但是其背後代表的並非是銀行團，而是沒有在融資平台上露面的買家日華紡織株式會社(下略日華紡織)，它才是貸款的真正拍板人。

## 八、日華紡織株式會社的角色

決定申新貸款之關鍵是在沒有出台的日華紡織身上，貸款之所以成立，是因為日華紡織答應銀行團在萬一申新不能償還債務之時，出手購入整個工廠，所以銀行信任的並不是申新或東亞興業，而是日本在上海的企業日華紡織，但是社長和田豐治只是作出口頭承諾，並沒有簽署任何契約，所以只能說是「道義上」的風險承擔人。

日華紡織是以富士瓦斯紡績株式會社社長和田豐治為首投資的公司，1918年在收購上海鴻源紡織廠的基礎上成立。<sup>40</sup>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紡織企業看中中國龐大市場，低廉的技術工人和棉花的供應產地，加上中國取回關稅自主權後，決定在1919年開始改變紡織品的入口關稅。<sup>41</sup>所以原來對華出口的日本紗廠希望通過收購將生產基地轉移至中國，但是中國紗廠只一心希望借款解燃眉之急。

1921年底，申新提出貸款時，上海正金認為這是營業本質的貸款，融資平台顯出濃厚興趣，整隊人馬隨即熟練地啓動工作程序。首先是由日華紡織的常務董事田邊輝雄實地調查和評估工廠的擔保價後，將方案帶回日本報告；上海正金準備如何騰出墊支貸款的資金；興業銀行聯絡十七行銀行團並取得協議；正金銀行與東亞興業也協定了貸款利率。萬事俱備，就差日華紡織的和田社長點頭。當時距離農曆大除夕的1月27日已沒有多少天，但是不管申新如何催促必須在年關前收到貸款，以便償還錢莊與中國銀行，除了興業銀行以外，銀行團都是在靜靜等候。

興業銀行的副總裁小野英二郎與東亞興業的常務董事白岩龍平二人正為此事奔波，因為和田收到最新入口機械價格廉宜的消息，臨時改變主意，對350萬的貸款金額感到猶豫。另一方面，榮宗敬聽到通知要削減金額後很不高興，認為以上海的兩間工廠來擔保都不能抵借350萬日圓的話，實在有損顏面，於是發出最後通牒，貸款金額不能減少，但可以增加漢口的第四紗廠作擔保，否則便取消貸款之議。事實上，單上海第一、第二紗廠的估價已達600萬日圓，還未計算漢口的第四廠在內，足超過了貸款金額有餘，和田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好機會，在最後限期，終於點頭，答應萬一將來要處置申新的擔保工廠時，會以相當於貸款本金加利息的金額，將工廠全部收購，翌日東亞興業與申新便在上海簽署臨時貸款契約。<sup>42</sup>

至此可謂大局已定，由前線營業的正金銀行開始，到尋找適當「買主」和交涉金額的興業銀行，盡量壓低貸款風險的海外投資銀行團，代理簽署契約的東亞興業，到掌握決定權的實際投資者日華紡織，便是整個貸款的決定過程。那麼，建造出這個融資平台的日本政府在整個過程中，是否有參與，如果有的話，又是扮演何種角色？

## 九、外務省的角色

外務省是打造出對中國融資平台的兩個重要政府部門之一，另一個部門大藏省除了制定政策以外，主要監管銀行財政方面，並協調銀行之間的資源分配，例如指令日本銀行以低息提供資金與正金銀行等，及以預金部資金通過直接存款、貸款、購買債券等方式向特殊銀行提供直接的支援。在實際對中國貸款的審查上，則是由外務省負責。申新貸款的資金是由銀行團平均分擔，不存在向預金部商討資金之需要，在整個決定的聯絡過程中，沒有看到任何一個環節需要向大藏省申請批准。

外務省則不同，因為它握着一個重要的權力，就是負責在海外



作最後把關，控制海外正金銀行能否付款。外務省在海外監管正金銀行這個權力始自正金銀行開業當年，為了監督政府提供給銀行放款的資金去向，大藏省定下規則，由外務省協助下執行，當時海外公使及領事館需要保管抵押貸款的出口貨物之船運提單及保險單，等待外國收貨人拿貨款來交換單據，及需要核證收款後的存放戶口。不單如此，就是政府部門指令正金銀行海外支店向外國付款時，在外領事館亦需要檢查其出納和結存的情況。所以外務省屬下的在外公使和領事館是實質近距離監管正金銀行海外支店和辦事處的機構。

在對華貸款方面，1917年大藏大臣勝田主計制定方針，指令貸款時盡量利用東亞興業等中介公司，而個人或公司在對華貸款和投資之時，就算不強加干涉，也應盡量向在外的公使領事或國內的外務省報告，然後由外務省通知大藏省；而資金準備方面，外務省得提前與大藏省協議，才對貸款作出覆示。<sup>43</sup> 這個規定雖然有含糊之處，但是申新的借款金額巨大，又是通過大藏省指定的中介人東亞興業，所以理應按照規定，向外務省請准。

申新的臨時借款契約在1922年1月25日已由借貸雙方簽署完，雖然急於想支付貸款，但在最後一關上被卡住，因為這筆貸款並未取得外務省的許可，被上海總領事館拒絕認證契約。契約如不能正式成立的話，上海正金也就不能依約付款。外務省的亞細亞局只在開始時收過此事的初步報告，之後到風聞已簽完臨時契約為止，都沒有被知會，感到十分不快，在一份內部報告中記錄：「就算知道外務省在大體上沒有異議，東亞興業也應先申請批准，這次的不當做法，以後需要注意。」<sup>44</sup> 解決方法是依照正規程序重新辦理一次，在1月25日東亞興業派人去亞細亞局請求批准認證，1月27日上海總領事也依足手續請示外務大臣後，1月30日外務大臣終於通知上海總領事可以認證了，貸款契約才得以完成。

從以上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外務省在對申新貸款個案中並無實

權，即使知道既成事實，也只能作出事後批准。其實，這種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比申新稍為早一點進行商談的類似貸款中，寶成第一第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的500萬日圓貸款契約在1921年12月30日雙方簽署後，外務省報告中記錄了亞細亞局對此事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在事後質問東亞興業，其後外務大臣亦訓斥上海總領事，以後金額比較大的經濟投資必須依照以前的訓令，先經過外務省批准後才能認證。<sup>45</sup> 由此可見，外務省並不能經常落實控制或監管到所有對華貸款，起碼在申新貸款個案中，只能作為追認的橡皮圖章而已。

## 十、結語

從申新貸款的個案中，看到中日兩方都依關係網絡的作用，一方面是榮氏集團如何成為了擴展融資基盤到海外的先行企業之一；另一方面，拍板貸款的日華紡織與特殊銀行間的關係也非比尋常。和田豐治同時兼任日華紡織和富士瓦斯紡績(與東京瓦斯合併之前為富士紡績)的社長，富士紡績創立時的第一任會長富田鐵之助曾任中央銀行的日本銀行第二代總裁，和田曾在1913年受首相邀請出任興業銀行總裁，雖然最後決定捨興業而留在富士，但自此與興業銀行關係密切，在發行公司債券和眾多事情上得到了很多方便。<sup>46</sup> 在申新貸款中十分落力奔走的興業銀行副總裁小野英二郎亦同時為東亞興業的董事。東亞興業的創立股東之一高橋是清為正金銀行的第七代行長，在這樣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下，日華紡織想在中國投資收購紗廠，沒有比通過融資平台的消息更為快捷，營運更為順暢。

事實上，融資平台的確成功幫助日華紡織達到了目的。當時，連申新在內同時商談的共有三筆紗廠貸款，結果，上海寶成第一第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後來因無力償還，1924年底在上海拍賣，只得日華紡織一家競投，以560萬2千日圓投得。<sup>47</sup> 它履行了在寶成貸款



前對興業銀行的承諾，不會讓銀行團損失。1922年7月20日簽署貸款100萬日圓的華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後來經過數次拖延利息和再度貸款後，在1924年終於委託日華紡織經營。<sup>48</sup>幸運的是，只有榮氏的申新紡織無限公司最後在1925年償清全款，得以從契約的擔保抵押條款中全身而退。

通過申新貸款的個案，我們明白日本對華融資結構原來是為政治目的之國策而設，所以由國家主導，但由於銀行在考慮利益立場上與政府產生分歧，所以結構需要不斷調整，而當時日華紡織通過關係網絡，成功地坐上了便車，利用現成的融資平台達成海外收購，結果也參與資本輸出。

- 1 350萬日圓屬巨額貸款，作為對比參考，1921年日本郵政儲蓄的平均存款額是每帳戶36.22日圓。參石浜知行著：《特殊金融機關史論》（東京：育生社，1937），頁18。
- 2 Vladimir Ilyich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pp. 29–30, 82–83.
- 3 大石嘉一郎著：《日本資本主義史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第7章。
- 4 高村直助著：《日本資本主義史論》（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80）和《日本紡績業史序說》（東京：塙書房，1971）。
- 5 池上和夫著：〈中國借款の一形態——大藏省預金部の海外事業活動〉，《一橋論叢》卷71，號6（東京：日本評論社，1974），頁29–47。
- 6 參國家資本輸出研究會編：《日本の資本輸出——對中国借款の研究》（東京：多賀出版，1986），第1章及第5章。
- 7 坂本雅子著：《財閥と帝国主義》（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3），序論。
- 8 橫濱正金銀行編：《橫濱正金銀行史》（東京：坂本經濟研究所，1976），頁515。
- 9 齊藤壽彥著：〈外国為替，貿易金融機關としての橫濱正金銀行の發展過程〉，《千葉商大紀要》卷39，號4（千葉：千葉商科大學國府台學會，

- 2002), 頁69-95; 郭予慶著:《近代日本銀行在華金融活動: 橫濱正金銀行(1894-1919)》(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10 石井寬治著:《〈横浜本店・神戸支店の生糸金融〉》, 山口和雄、加藤俊彦編:《兩大戰間の横浜正金銀行》(東京: 日本經營史研究所, 1988), 第4章。
  - 11 2000年近七百箱正金銀行的原始資料由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經濟史資料分析室展開整理及複製微型膠卷, 由丸善發行, 至今已出版6期共1,037卷。
  - 12 Sherman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117, 178.
  - 13 許維雍、黃漢民著:《榮家企業發展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頁44。
  - 14 1921年12月19日東亞興業上海辦事處信件。外務省外交資料館資料編號B04010772800〈外務省記錄, 1門7類1項〉, 頁43-44。
  - 15 榮宗敬最常被引述的名言便是「搭上一萬股子, 就可以用他們10萬、20萬的資金」。所以積極參與銀行錢莊的股份。參《榮家企業發展史》, 頁87。
  - 16 宋漢章是首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 創辦外匯業務, 因1916年領導上海中行對抗北洋政府的停兌令, 名聞全國, 1918年任上海銀行公會首屆會長, 1925年上海總商會會長, 後任中國銀行董事長, 並創辦中國保險公司。
  - 17 兒玉謙次著:《中国回想録》(東京: 日本週報社, 1952), 頁41; 在中國方面, 也有該段探訪記錄, 參姚松齡著:《張公權先生年譜初稿》(台灣: 傳記文學出版社, 1982), 頁28-29; 另有記錄當日宋往訪正金銀行經理兒玉和麥加利銀行經理, 以行屋地契為擔保, 商借透支200萬圓備用(實未支用), 參董昕著:《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研究(1912-1937)》(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頁330, 340。
  - 18 武田晴人編:《横浜正金銀行マイクロフィルム版》(東京: 丸善, 2006), 卷0365, 頁696-698。
  - 19 在此之前, 申新曾在1917年向台灣銀行借款30萬圓, 為期三個月, 到期後轉押予中日實業有限公司, 續借40萬圓, 為期六個月, 資金仍是台灣銀行的。參《榮家企業史料》上冊, 頁60-61。
  - 20 1921年12月19日東亞興業上海辦事處信件。參考外務省外交資料館資料編號B04010772800, 頁43-44。



- 21 大藏省編：《明治大正財政史》(東京：財政經濟學會，1938)，卷15，頁474。
- 22 《橫濱正金銀行史》，付錄甲卷之二，第154號，頁819-821。
- 23 正金銀行在中國各支店的存款結餘：

年末	千兩
1901	1,656
1903	6,950
1905	11,137
1906	12,620
1907	10,673

參《日本の資本輸出——對中国借款の研究》，頁16。

- 24 《橫濱正金銀行史》付錄甲卷之二，第159號，頁844-845。
- 25 《橫濱正金銀行全史》，卷2，頁123-124。
- 26 《橫濱正金銀行史》付錄甲卷之二，第167號，頁883-885。
- 27 大藏省預金部編：《特別調査ノ七：支那漢冶萍公司借款ニ關スル沿革》(東京：大藏省預金部，1929)，頁126。
- 28 明治33年3月法律第70號《日本興業銀行法》第11條，及對照明治38年3月9日法律第49號《日本興業銀行法中改正法律案》第11條。
- 29 〈日本興業銀行法中改正法律案〉第12條，第9條，日本興業銀行編：《日本興業銀行五十年史》(東京：日本興業銀行，1957)，頁52-54。
- 30 同上書，頁230。
- 31 日本興業銀行年史編纂委員會編：《日本興業銀行七十五年史》(東京：日本興業銀行，1982)，頁40-41。
- 32 這筆借款最終因為寺內內閣全體辭職而沒有實行。參《日本興業銀行五十年史》，頁241-242。
- 33 除了興業銀行是分擔204,000日圓外，其他16間銀行各負擔206,000日圓。
- 34 《日本興業銀行五十年史》，頁232。
- 35 大藏省預金部編：《東亞興業株式会社融通金ニ關スル沿革》(東京：大藏省預金部，1929)，上冊，頁7。
- 36 大藏省預金部編：《東亞興業株式会社融通金ニ關スル沿革》上冊，頁1，4。
- 37 故古市男爵記念事業會編：《古市公威》(東京：故古市男爵記念事業會，1937)，頁163。

- 38 大藏省預金部編：《東亞興業株式会社融通金ニ関スル沿革》上冊，頁21，31，37-38。
- 39 武田晴人編集：《橫濱正金銀行マイクロフィルム版》，卷0365，頁785-820。
- 40 籠谷直人著：〈日本綿業における在華紡の歴史的意義〉，森時彦編：《在華紡と中国社会》（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社，2005），頁9。
- 41 飯島幡司著：《日本紡績史》（大阪：創元社，1949），頁177。
- 42 參武田晴人編：《橫濱正金銀行マイクロフィルム版》，卷0365，頁881，874，885，829，867，863。
- 43 勝田龍夫著：《中国借款と勝田主計》（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72），頁72-73。
- 44 亞細亞局：「申新紡績三百五十萬元借款ニ関スル件」，日期不詳。外務省外交資料館資料編號B04010772800，頁45-46。
- 45 亞細亞局：「上海宝成紡績会社五百萬元借款承認方ニ関スル件」及1922年1月19日內田外務大臣致上海船津總領事電報，參考外務省外交資料館資料編號B04010772700，〈外務省記錄：1門7類1項〉，頁8-11，40。
- 46 澤田謙、荻本清藏著：《富士紡績株式会社五十年史》（東京：富士紡績，1947），頁152，368。
- 47 1924年12月27日東亞興業株式會社常務董事白岩龍平致外務省亞細亞局的報告。外務省外交資料館資料編號B08061015300，〈外務省記錄：E門1類6項0目〉，頁132。
- 48 1924年1月14日東亞興業株式會社給外務省亞細亞局的報告。外務省外交資料館資料編號B04010772900，〈外務省記錄：1門7類1項〉，頁213-215。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 執筆者一覽

### 吳偉明

本書編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專攻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旁及港日關係史及日本流行文化。近年研究以德川時代的中國人傳說、日本中古易學及港日文化交流為重點。

(以下執筆者按所屬大學排列)

### 日本：

#### 村田雄二郎

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專業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以及清末政治史。近年來致力研究晚清/明治時期日中關係史。曾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留學兩年，又於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擔任客座研究員。

#### 貴志俊彥

日本京都大學區域研究統合情報中心教授，日本學術會議聯合會員，專攻日中關係史、東亞區域研究、區域通訊學及滿州國研究。獲科學研究費補助金2010-2011年度研究資助。

#### 陶德民

大阪大學文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曾任美國麻省Bridgewater State College 助理教授，現任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東亞文化交涉學會首任會長(2009年6月-2010



年5月)。研究領域為日本漢學史、近代東亞國際關係史。

#### 祖運輝

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任日本關西學院大學國際學部教授。曾在台灣、新加坡、澳洲和香港任教與研究。研究興趣和著作包括中國戰爭電影、日本環保文化、日本攀山和探險的歷史、日本華僑史、日本的東南亞觀、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和中日宗教社會問題。

#### 王海

2006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日文系，2009年在同大學取得外國語言應用碩士學位後，2009年在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日本近現代思想史，研究課題為司馬遼太郎的思想世界。

#### 沈薇薇

2007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2010年在關西大學大學院取得文化交涉學碩士學位後，進而攻讀博士。研究方向為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課題為明治時期大阪的漢學塾——泊園。

#### 薄培林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碩士，九州大學博士。歷任北京外交學院助教、九州大學法學研究院助教、關西大學亞洲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現任關西大學非常勤講師。

#### 台灣：

#### 徐興慶

日本九州大學文學博士，現職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台

灣日語教育學會、台灣日本研究學會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思想交流史、台日教育交流史、翻譯及日語教育。

#### 陳瑋芬

日本九州大學文學博士，主修中國哲學史，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及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合聘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日本漢學、儒學概念的發展變化、中日知識轉型、中日西學西化思想史等等。

#### 中國：

#### 王曉秋

196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外關係史研究所所長。並擔任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會名譽會長、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中方委員等職。

#### 王寶平

日本關西大學文學博士，歷任杭州大學、浙江大學教授，現任浙江工商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浙江工商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院院長，早稻田大學客座研究員、二松學舍大學日本漢文教育研究項目海外據點聯絡人。專攻清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 尤怡文

台灣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曾為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部特別研究生、德國海德堡大學短期研究生、台灣中央研究院博士候選人培育計劃獎助人員，現為上海交通大學助理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比較政治經濟發展史。



## 香港：

### 蘇基朗

澳洲國立大學博士。曾執教香港樹仁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及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在香港中文大學歷任系主任、大學教務長、協理副校長、歷史學講座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等職，現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及主任。曾在劍橋與哈佛作訪問學者。

### 黃天

本名錦泉，曾赴日深造，畢業於法政大學社會學系，後留校在圖書館自修年餘，專研明末清初史和中日關係史。1985年應三聯書店之邀，來港出任高級編輯，主編了多本大型畫冊，先後在香港及海內外獲獎。曾於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講授中日關係史。

### 遲王明珠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哲學博士學位課程學生，早年畢業於同校的經濟系，從事商業工作多年後重返母校，取得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學位後繼續攻讀。研究興趣為日本明治時代的公司法與制度史。

## 美加：

### 任達( Douglas R. Reynolds )

1976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斯吉德莫學院、日本早稻田大學等院校，並在東京大學任訪問學者兩年。1980年起任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歷史系教授，並任亞洲

研究中心主任、本科生學部主任等職。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兼及西方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歷史。

傅佛果( Joshua Fogel )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於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任教，現任多倫多約克大學( York University )歷史系教授，教授東亞史。主要探討中日關係史。他亦是學術雜誌 Sino-Japanese Studies ( chinajapan.org )的編輯、Sino-Japanese Studies Group的負責人。

蘇壽富美( Sufumi So )

多倫多大學第二語言教育學博士，美國維珍尼亞州佐治梅遜大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現代及古典語言學系助理教授。從事大學日本語教育工作二十多年，自2004年8月起擔任佐治梅遜大學現代及古典語言學系日本語課程總監，同時以英語教授應用語言學及日本社會文化科目。